

世纪之光

主编 许明

Y
AGEDADANG

苏共：一个大党
衰落的启示

王长江 /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SHUAILUODEQISHI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本电子书制作者

世纪之光

主编 许 明

王长江 / 著

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王长江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9
(世纪之光/许明主编)
ISBN 7-215-05112-9

I. 苏… II. 王… III.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 党的建设 - 研究 IV. D35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5705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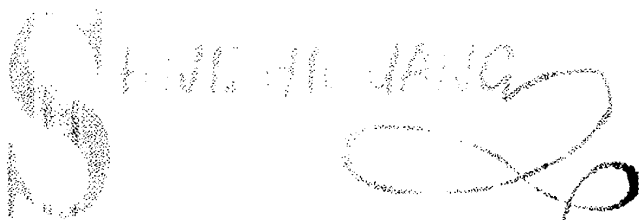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印张 9.625

字数 231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0.00 元

目录



绪论 / 1

苏共是一面镜子 / 1

怎样研究苏共 / 6

关于政党的几个基本论点 / 11

第一编 初期的探索

第一章 任务、方向和道路 / 19

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 / 19

“退却” / 23

没有完成的转变 / 28

第二章 在国家权力的阴影下 / 34

领导, 还是代替? / 34

弊端初现 / 37

认识官僚主义 / 39

对多党制的探索 / 46

两个例子 / 49

第三章 寻找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 53

党和工人阶级 / 53

党和农民 / 59

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左”情结 / 62



第四章 集中化的党 / 67

集中:内战时期党的建设的主趋势 / 67

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党的建设的两个支点 / 70

禁止派别存在 / 75

任命制的形成 / 79

驾轻就熟的集中 / 83

列宁的最后努力 / 87

第二编 传统党建模式的确立

第五章 斯大林党建模式的确立 / 91

党内论争 / 91

斯大林党建模式的确立 / 97

第六章 党政关系的变形 / 100

异变的起点:不同的国家观 / 100

“万能”的党政机关 / 104

错误的暴力导向 / 107

肆无忌惮的官僚主义 / 113

第七章 难造“主人” / 120

名不副实的主人翁 / 120

定调:农民 = 资产阶级? / 124

“贡税”制度 / 129

目录

农业集体化 / 133

暴力消灭富农 / 139

大饥荒的惩罚 / 143

第八章 党内集权:体制和活动方法 / 147

党内民主的消失 / 147

作为传统党建模式根基的任命制 / 153

谁是被监督者? / 157

解不开的党内矛盾之结 / 159

丑陋的政治怪胎:个人迷信 / 162

第九章 沉重的思想道德代价 / 165

打个比方 / 165

“左”——道德堕落之滥觞 / 168

畸形化的思维 / 171

误读恐怖 / 173

心理、道德的毒化 / 177

第三编 改革的轨迹

第十章 难逃束缚的改革 / 185

新的出发点:利益原则 / 185

突破点:反对个人迷信 / 188

着眼点:建设一个“全民党” / 193



落脚点:加强党的领导 / 197

改革,还是沿袭? / 201

第十一章 “停滞时期”的苏共 / 206

平平淡淡的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 / 206

传统党建模式的固化 / 209

特权者的党 / 214

从根上烂起的腐败 / 218

道德的失落 / 221

第十二章 苏共的“根本革新”之路 / 225

举起“根本革新”的旗帜 / 225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 / 230

有步骤的改革 / 234

第十三章 从改革走向毁灭 / 239

从一党制转向多党制 / 239

党的派别化 / 243

责任何在? / 247

走向毁灭 / 251

第十四章 几个重大问题的评说 / 254

关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 254

关于“民主化”、“公开性” / 256

关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 / 259

关于戈尔巴乔夫对苏共失败的责任 / 262

目录

启 示 / 268

启示之一：必须跳出党政不分的怪圈 / 268

启示之二：从机制上保证党和群众的密切
联系 / 273

启示之三：不断提高党的创新能力 / 281

启示之四：努力推进党自身的现代化 / 289

序

编写“世纪之光”丛书还是 20 世纪的事（1999 年）写这篇序已是 21 世纪了。

20 世纪发生了许多震撼历史的大事。可以举出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如此全球规模的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造成人类空前的浩劫。这笔账只能算在资本主义制度身上，已是铁铸的事实了。可以举出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的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为开端的新科学技术革命，这场声势浩大的新产业革命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 21 世纪将展现出一场真正的伟大的社会运动。还可以特别举出，1956 年美国社会劳动结构第一次出现“白领”超“蓝领”此后“蓝领”工人比例越来越少到 20 世纪末已降至 10% 以下。这是一个被人忽视而其意义实在重大而深远的事实，它表明体力劳动在人类社会中第一次降至次要地位，从此脑力劳动者第一次取代体力劳动者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力军，将成为人类更先进更美好的新社会的创造者。

这套丛书要讲的是另一件震撼历史的大事。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纪元。如果说 19 世纪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那么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则是从理论走向实践。十月革命的道路鼓舞和指

引了全世界共产党人前仆后继地奋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然而，到了 20 世纪末，苏东剧变，一些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特别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崩溃，连共产主义的敌人也为之瞠目结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诞生要经过许多挫折、磨难，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当年与封建王朝的斗争也经历过数以十计的成功与复辟的曲折。共产主义运动有高潮，也有低潮，这也合乎规律，过去有过高潮，现在又跌入巨大的低潮。问题是在低潮面前，共产党人怎么办？有人叛变了，有人落荒了，历史总是嘲弄着那些在高潮中混入运动的投机分子和意志薄弱者。真正的共产党人将“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揩干身上的血迹，又重新战斗”。重要的是如何战斗？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做好两件事：（1）重新组织队伍，凝聚革命力量；（2）总结经验教训，进行理论创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动力；一个全局的深刻的运动失败，一定是理论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理论创新，也不可能凝聚真正的革命力量，共产主义运动也就不可能走出低潮。因此，理论创新是首要大事，也是至关紧迫的大事。

如何进行理论创新？

第一，“老祖宗不能丢”。我们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决不是抛弃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历史实践证明是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必须坚持，并把它与当代世界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适合新世纪的新理论来。抛弃真理还能创什么新呢？

第二，要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不敢扬弃那些经历史检验已经证明是不正确或过时的观点和论断，创新从何而来？如果像教条主义那样，把老祖宗的话神化为句句是真理，当做不可逾越的雷池，自己不敢跨过去，也不让人超越，那就从根本上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这不仅不可能有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而且必

将断送马克思主义。

第三，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理论创新不能从概念出发，更不能囿于传统的条条。惟一正确之路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事实出发。100多年约共产主义运动实践是最根本的事实，正确总结它是理论创新最好的源泉。要敢于正视共产党人用血、汗、泪换来的失败，引出教训方能化为新的正确的起点。要全面地掌握客观事实，而不是随心所欲地抓一两个事实为己所用。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这里，邓小平同志提出分析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是十分重要的方法。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才能看清历史的总趋势，指出我们前进的方向。就像站在足够的高度才能看到长江之水浩荡东流，如果随便站在长江岸边，站在长江某一段，那么就得出长江向南，或向北，甚至向西流的荒谬结论来了。

第四，要放到100多年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来总结，来创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孤立的在真空中的运动，而是始终并永远与人类社会发展休戚与共地融会在一起。这就是我在前面谈到的20世纪还有许多震撼历史的事实。其中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尤其是脑力劳动者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力军，格外值得重视。不联系这些划时代的变革一起来研究，就共产主义反思共产主义运动，无论如何也是不全面的，也难以准确深刻。从150年前《共产党宣言》诞生之日，人类就敲响了资本主义灭亡的丧钟，开辟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伟大时代。大体上说，第一个50年是资本主义危机与国际共运形成阶段，资本主义陷入重重危机，共产主义在理论和实际的斗争中前进，逐渐形成声势浩大的国际性运动。第二个50年是革命与战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帝国主义之间争夺市场的战争、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等层出不穷。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这个阶段，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

引导下不断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辉煌一时。辉煌的时候经验很重要，是珍贵的财富，但“福兮祸所倚”，也决不是没有值得认真总结的教训。第三个 50 年，人类进入了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失败了，痛定思痛，总结教训就是财富，但也决不是没有经验需要认真总结上升为新的理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就是一个举世公认的成功例证。

第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理论创新当然主要地要靠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问题是党中央的理论从哪里来？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党中央领导脑子里固有的？当然都不是。除了来自他们自己的社会实践外，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集全党的智慧”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一再号召大家创新，提出“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三大历史性任务。我们应该深刻领会，认真实行。须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也必然是全党全民共同的责任。如果每个共产党人不以天下为己任，把国家民族兴亡，把共产主义运动走出低潮的历史使命担当起来，不贡献自己一份智慧和创造性，那么党中央如何“集全党的智慧”呢？又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呢？邓小平同志说得好：“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因此，党的意识形态领导部门首要的责任就是遵循邓小平、江泽民同志的教导，发现、支持和组织那些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真心实意、满腔热情地鼓励他们进行理论创新，否则就是失职。不敢面对理论创新的挑战，错失理论创新的机遇，必将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新的重大损失。

毋庸赘言，要理论创新是不容易的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更是一项历史性的重大课题，不下“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

句空”的功夫是不行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又是十分重要的课题。重大的课题往往总是敏感的课题，因为它必然触动各种人们的神经。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之所以敏感，主要表现在右的和“左”的干扰。自称“自由派”的学者，往往借理论创新为名，批判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企图用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理论来代替在 21 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而一些自封的“百分之百马克思主义”者，视理论创新为大逆不道。因此，马克思主义要理论创新必须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 牢牢记住邓小平同志的教导：“警惕右 主要防‘左’。”

许明同志是一位勇于思考 and 创新的青年学者。我们原本不认识。几年前，在一次学术研究会上倾听了他的发言。他对共产主义价值理想的真诚追求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他写作或主编丛书，我都非常乐意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我曾为他写了一首诗：

男儿不言愁，
忧民情未休；
但求报国事，
布衣亦风流。

现在，他主编的“世纪之光”丛书即将出版，约我写序，我有权利拒绝吗？抚今追昔，写了如上一些话，是为序。

时间是无情的，历史是公正的。我坚信播下真理的种子，总是要发芽、开花、结果的。

刘 吉

2002 年 1 月 8 日于和平里五乐斋

绪 论

如果说 政党是政治的一个谜 那么 苏共就是政党的一个谜，是谜中之谜。苏共在世界政治发展史上和政党发展史上占有的地位 都是别的政党所无法相比的：它作为第一个共产党执政 被赋予了重大的象征意义，被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自此开辟了新的纪元；它的垮台，同样被赋予重大的象征意义，被一些人看做是 20 世纪开始的共产主义实验的失败。正是这种地位，才使得大量通过研究苏共得出的结论，意义都远远超出这个国家和这个党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它已失去执政地位若干年，人们研究这个党的兴趣仍然不减的根本原因。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研究苏共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历史造成了中共与苏共之间的特殊联系，也就造成了苏共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中共的特殊影响，造成了研究这种失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意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党理应从苏共的教训中得到更大的收获。

苏共是一面镜子

对素无民主传统的中国来说，政党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舶来品。从把这个舶来品移植到我国的最初尝试到现在，我国的政党政治

已有 100 年的历史。翻开这段历史 可以肯定地说 没有哪一个政
党会像苏共那样，对我国政党政治的发展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无
论从我们党的主观愿望看 还是从共产国际的要求看 在党的组织
原则、组织形式、活动内容、对党员的要求等方面 苏共都是我们党
效法的惟一模式。对这个问题，当时几乎不存在任何疑问。事实
上苏共也不允许任何别的党创造有别于苏共的党的建设模式，不
允许对苏共模式提出任何形式的质疑。

20 世纪 40 年代，我们党逐渐成熟起来。但革命武装斗争的
环境 使苏共模式看来很适合我们的国情 因而我们党对苏共的学
习也就更加自觉。如一位老同志所言 我们这一代人 大多数都是
从《联共布 党史简明教程》（以后简称《教程》）中懂得马克思主
义的。这本《教程》早在延安时代就被列为我们党的“干部必读”。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学到的是俄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值
得称道的是 我们提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而且在
这一阶段确实结合得很好 在这种结合中 西欧的和俄国化了的马
克思主义变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20 世纪 50 年代 作为一个执政党 我们党开始领导社会主义
建设。经验告诉我们 独立自主 不照搬照抄别人的模式 才能找
到符合本国国情党情的新路。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毕竟是前所未
有的事业。在这样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
有任何把握。惟一有强大影响的可供借鉴的经验是苏联和苏共的
经验。所以 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们党再度把学习《教程》作为必
修课 掀起了向“老大哥”学习的高潮。书中的第十章“布尔什维
克党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第十一章“布尔什维克
党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第十二章“布尔什维克党为完成社
会主义建设和实施新宪法而斗争”加上结束语 被指定为干部学
习社会主义的基本教材。不能说我们要刻意照搬苏联的经验。相

反 由于看到了苏联模式存在的问题 我们党主观上想摆脱苏联模式的愿望日益强烈。然而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回过头来看 那时的探索，在许多方面都仍然没有能够跳出苏联模式的窠臼。

20 世纪 60 年代，我们党和苏共之间爆发了大论战。论战的根源，实际上是国家间利益的冲突。这场论战导致了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决裂。从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的角度看，这场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我们党的抗争有完全正当的理由。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里面还包含了我们党想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道路的愿望。然而遗憾的是 我们采用了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 不但没有扬弃苏联模式和苏共模式 反而否定了赫鲁晓夫修正这个模式的企图 成了斯大林模式的坚定捍卫者。我们同苏共的决裂，非但没有导致对苏联模式的否定 倒毋宁说是赫鲁晓夫要修补这个模式 而我们站在不容忍这种修补的立场上来反对苏共和赫鲁晓夫。这样，在走自己独立的社会主义和党的建设道路的选择面前，我们失去了放弃苏联模式和苏共模式的良机，还把这个模式的内容变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 从而使之更僵化、教条化了。我们从“左”的方面批判了赫鲁晓夫 这种批判的反作用力把我们推到了比苏联模式和苏共模式更“左”的方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 就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我们未能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苏联的道路，为什么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 苏共、我们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不约而同地举起了改革的旗帜。同样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们党和苏共在执政和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都惊人地相似，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形成的观点、认识、看法和主张 也有大量的相似之处。

正是因为这种相似性 使得如何评价苏共的历史 特别是如何评价这个党改革的失败，对我们党今后改革的走向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 分析苏共 实际上也就是在分析我们自己。分析苏共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常常决定着 we 选择的

改革方向的正确与否。

比如说对“和平演变”因素的分析。苏联发生剧变，苏共丧失执政地位，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无疑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党应当把反对“和平演变”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甚至是作为和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等量齐观的重要任务来对待？提出这种观点自有它的道理，但这样的观点并不正确，往往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因为“和平演变”的因素无论怎样重要，都不过是一个外因。外因不通过内因是无法起作用的。况且，人类生存在一个地球上，不同社会制度之间本来就无法避免相互影响。如果说，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使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很多适应性的变化，却避免了它的灭亡，而号称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得多的社会主义制度却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垮掉了，那恰恰说明这个社会主义模式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连资本主义的影响和演变都经受不住。希望别人放弃演变，如同希望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放弃资本主义制度一样，是不现实的。把重点放在如何更快地发展自己上，而不是放在怎样抵制别人演变上，才是顶住演变的可靠途径。否则，演变仍然或早或迟会发生。

又比如说对领袖个人因素的分析。讨论党的垮台，不能不讨论领导这个党的领袖所起的作用和担负的责任。对于领袖处于非常重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尤其不能忽视这一点。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在共产党内，头等重要的问题，是要防止党内出现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物？如果这个结论是对的，那么可以断言“文化大革命”中“警惕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的观点仍然是正确的，在党内大搞阶级斗争的做法是正确的。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坚持唯物史观，还是用唯心史观来看待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问题。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会因为领袖人物的错误而遭受曲折，但绝不会因此而垮掉。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恰恰说明，这个党是一个脆弱的党，是一个弊病缠身的党，是一个危机四伏的

党。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苏共就是这样一个党。问题不在于在这个党里怎样出现了一个摇旗呐喊地领导这个党走向错误深渊的领袖 而在于他这样做的时候 为什么大批有觉悟的“特殊材料制成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会跟他走 甚至在事情已经非常明显地发展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时，这个党也无力制止他。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思考整个党的问题所在，而不是只关注一个人或少数人。

再比如说，对改革与苏共失败关系的分析。改革诱发了党的垮台 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那么 这是不是意味着 党不应该提出改革 或者在其他领域可以提出改革 而党本身不能改 在那些认为党本身不应该改革、苏共垮就垮在对党进行革新的人看来 指导苏共进行党的建设的基本原理都是正确的，关键是没有照着这些原理去做。因此，不需要搞什么改革，只要严格遵循基本原理，一切问题都能解决。这种思路听来不无道理，只是有一个问题无法讲清 如果问题的关键只是照着做 是没有做好 那么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执政党都做得不好，而且所犯的错误都如此惊人地相似？的确，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本原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规律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必须对这些理论遗产的价值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 更需要指出的是 真正的共产党人向来把这些原理看做是各国党行动的指南，而不是、也不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具体答案。时代在发展 党面临的条件、地位、任务在变化。除了应当根据时代的变化调整和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外 政党本身的结构、活动方式也必然要随着时代和任务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变革。所以 对党自身进行改革 是所有政党发展的客观要求 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很难想像，一个政党在建立了一套与当时时代相适应的体制和运作方式后，就等于有了一副能够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可以一劳永逸地固守这种体制和方式 以不变应万变。用这种思维来设计党的建设，是很难避免重蹈苏共

覆辙的。

可见，苏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一面不可多得的镜子。我们的改革，我们的探索，都应该充分利用这面镜子。

怎样研究苏共

本书不是要对苏共作为执政党领导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个历史作出全面的评价。它既不是一部苏共党史，更不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史。它的关注点放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像苏共这样一个大党，怎么会在执政 74 年以后不但失去执政地位，而且自身也退出历史舞台？作为一个执政初期只有几万人、后来则有近两千万之众的政党，苏共走过了怎样的道路，竟至最后使自己落到了这样的田地？苏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从党的建设角度谈及这个问题的文章和著作，已经不在少数。然而，要把这项研究引向深入，恐怕需要从方法论上作些反思。实事求是地说，在研究苏共的方法论上，不乏大量深刻的见解，同时也有不少误区。这种误区，反映在一些比较典型的观点中。

例如有一种观点：苏共失败是因为这个党在改革中改变了自己的性质。这种“变性说”是最省力的，因为它既不会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能够用最简单、鲜明、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所有的问题。对于长期习惯于单向思维的我们来说，或许这种解释最容易使人接受。然而，事实上，“变性说”没有讲出更深层次的东西。“变性说”就如同是在说苹果之所以会被扔掉是因为它本身的腐烂一样。它不能说明，虽然苏共改变性质导致了执政地位丧失，但除了苏共之外，改变自己性质的党还有的是。近的如东欧各国的原先执政的共产党，远的如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社会党。这些党并没有因为改变性质而逐渐衰落，相反许多党还因为改变了性质而获得发展，不少党还掌了权。改变性质可能会导

致党的失败 却也可能导致党的新生。从这里面 我们只能看到苏共失败的或然性，而看不到它的必然性。

又如有一种观点：苏共失败是因为党的领导人把这个党引到了一个毁灭的方向。因领导人的错误而导致政党灭亡的例子是有的。但是 对苏共这样一个大党来说 把领导人的错误作为解释整个党的悲剧的主要理由 就会带来一系列说不清楚的问题 为什么这个党如此大量的党员和干部面对个别人的“葬送”会束手无策？为什么号称“战无不胜”、“无坚不摧”的党 到最后连自己少数领导人的错误都纠正不了？为什么一个有如此广泛基础的党，几个人就能把它轻易埋葬？回顾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中对 1848 年革命失败的总结，可以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清醒。恩格斯指出：“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 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 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 这种回答也许正确 也许错误 但在任何情况下 它都不能说明任何东西 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所以“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①恩格斯的话距今已有 150 多年 但对于上述我们论及的观点 却有惊人的针对性。

又如有一种观点：苏共失败是因为这个党在党的建设中放弃了民主集中制。乍听起来 这不无道理：一个政党 如果只有集中，缺乏民主（比如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之前的苏共），就没有活力；如果只有民主 缺乏集中（比如后期的苏共）就是一盘散沙。但仔细推敲起来 就不对了 除了共产党之外 其他绝大多数政党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6 月第 2 版 第 483 页。

不主张民主集中制，甚至有的党还由原来主张和拥护民主集中制转到后来反对、放弃民主集中制（如法国共产党）这些党却没有因此而垮台。相反，倒是那些一遍又一遍地声称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党总是在不断地出毛病而且毛病都十分相似：高度集中，缺乏民主。显然，要克服原来的弊端，简单地放弃民主集中制肯定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把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是放弃民主集中制，也很难令人信服地说明问题。况且，在一定意义上，放弃民主集中制与其说是这个党失败的原因，不如说是它的结果。

还如有一种观点：苏共失败是因为这个党在实践中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建党原则。这种观点在特定的含义上讲是对的。但是，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它用来说明问题的力度就不够了。马克思主义固然很科学，而且应该坚信，这个主义并未过时。但许多政党，包括大部分执政党，都不按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来运作，照样发展得很好，照样吸引选民，照样执政，而且经常一执政就是十几年、几十年。即使不执政，它们对国家和政府的运作照样有很大的影响。这毕竟是事实。任何理论都不是圣经，都要在实际中运用才能产生作用。而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失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那么经不起失误，而且像苏共这样的大党居然会在短短的几年之间垮掉？这是仅用“违背理论”所无法解释清楚的。

上述列举的种种观点和看法，之所以不能产生强大的说服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总也不能摆脱传统的思维，似乎既然政党都是阶级的政党，那么政党的失败原因也应当到这个党阶级性的丧失以及与此相关的方面中去寻找。照此推理，一切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规定性相违背的理论、观点、行为，都可以看做是苏共失败的原因。然而，这不是实事求是。这是在用理论检验实践，而不是用实践检验理论。

毫无疑问，由此我们应当得出结论：对苏共的研究，对苏共失

败原因的研究 应该换一个角度 换一种思维模式。

分析苏共这个庞然大物的衰败，是不能用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方法的。我们既不能停留在陈旧的思维上，把事情简单说成是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或个别领袖变节变质的结果，也不能满足于把所有大大小小的原因排列在一起，以示全面。本书力图在研究方法上体现如下指导思想：

（一）应当从复杂性、多样性上去深刻认识苏共的问题。如果把苏共比做一座大厦，那么很显然，导致这么一座巨型建筑倒塌的，绝不会是因为几块砖的问题，而只能是结构性的问题，是它的整个框架出了毛病。这样说并非只是理论的推断。在总结苏共教训时，我们会发现，几乎在党的建设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可以找到导致苏共失败的因素。如果我们根据自己的偏好和倾向，抓住其中一两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甚至为了强调问题的重要性有意夸大某些方面、而缩小另一些方面的意义，那么即使结论不失深刻，也仍然不能避免片面和绝对。此外，还应特别注意隐藏在原因背后的原因，看到原因的多层次性。比如说，只看到“民主化”、“公开性”体现民主、激发了人们的参与意识，看不到它导致苏共涣散、丧失领导能力是不对的，但只看到它的消极方面、看不到归根结底它是对过去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状况的否定同样是不对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当苏共在人们熟悉的“社会主义”前面加上“人道的、民主的”两个修饰词的时候，人们会表现出那么高的热情。

（二）应当把重心放在探讨各种原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上。我们说看到原因的复杂性、多样性、多层次性，不能简单地把苏共失败归结为一两个原因，并不等于说所有原因都不分主次、同样重要。相反，在纷乱复杂的原因中，必定有主要原因和非主要原因、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表层原因和深层次原因、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之分。问题只在于，这众多原因的主次不能用研究者的主

观设想来确定，而要从它们的客观逻辑和客观规律来认识。探讨各种原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 揭示它们的内在逻辑 给各种原因以恰当的位置，是正确认识苏共失败原因的最可靠的方法。不透彻地把握各种原因之间的联系，就很难给这些原因以准确的定性。例如 不了解‘全民党’的概念是在认为苏联社会已经进入建设共产主义阶段的前提下提出的，就很容易把这个概念看做是故意要抹煞党的阶级性、降低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 不了解斯大林时期的重大错误给苏联人带来的严重创伤 就很难理解 为什么即使改革使人们的生活失去了保障，绝大多数人也仍不愿意回到改革前的时代。

（三）应当从有机体的角度看苏共领导国家的整个活动。苏共对苏联社会的领导 从总体上看是失败了。但是 苏共领导苏联国家 74 年这一事实，毕竟是存在的。黑格尔曾经说过：“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当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苏共失败的原因时，我们会发现，黑格尔的这句名言讲出了一个十分深刻的真理。苏共的确有很多错误。在许多次的历史选择中，苏共都错过了历史给予的机会 误入歧途。但是 即使是错误的选择 也并不总是荒谬的 仍然会有它合理的因素。我们以往对苏共的认识 恰恰缺乏这方面的深刻性。我们往往用我们自己认定的标准作为依据，把苏共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肌体肢解成我们所需的部分，要么鉴定苏共符合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本原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其失败只是因为改革以后违背了这些基本原则 要么认为 苏共本来就没有按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办事 性质上是背离的 宗旨上是背离的 指导思想上是背离的 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也统统都是背离的，才最终导致了今天的下场……如此等等。如果我们不去研究为什么会出这种状况的原因，而满足于用现成的理论往苏共身上套，那么，我们就无法真正获得教训和启示，甚至连苏共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为什么会容忍这种背离都说不清

楚。这样去总结所谓的“经验教训”，恐怕我们自己也总有一天会误入歧途。

（四）应当从政党发生发展规律的高度把握苏共的失败。什么是政党？政党应当是干什么的？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以为解决了。然而实际上，正是这个基本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无一例外地都没有搞清楚，或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总以为政党是特定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代表，是这些阶级、阶层或集团取得和巩固政权的工具——这已是把握了政党最本质的东西，还能有什么比这更深刻的内容吗？孰不知，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忽略了作为政党所共有的性质。无视这些性质，就等于无视政党活动和发展的共同规律，就不可避免地要因违背规律而受到惩罚。从这个角度说，苏共的失败首先不是它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失败。苏共的失败，首先是它作为一个政党的失败。政党作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政治现象，有它特定的地位、任务、功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也有自己的地位、任务和功能。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连一般政党的位置都没有摆正确，连一般政党的任务都担负得不好，连一般政党应有的功能都不具备，要做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很难的。苏共首先不是违背了共产党活动的规律，而是违背了一般政党活动的规律。作为一个政党，它有自己的目标，而且就其目标本身来说是崇高的。但是，它的运作却缺乏科学性。它没有在政党该在的那个位置上，没有起到政党应起的作用。需要它的地方，它不愿驻足，结果使政府与人民之间缺乏联系，出现桥梁真空，不应当由它待的地方，它却凯觫、贪婪地抓住不放，结果为国家机器所同化，变成了国家机器的奴婢和附庸。

关于政党的几个基本论点

把握了认识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苏

共悲剧之所以发生 关键在内因 在党本身。苏共是苏联社会的政治核心 是整个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败就败在它没有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应有的体现，败在老百姓不再认可这个制度。之所以造成这样一个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归根结底在于领导这个社会的党由一个充满活力的、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党 渐变成了一个失去活力、群众对之离心离德的党 逐步丧失了领导国家和社会前进的能力 难以担负起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使命。苏共没有满足国民对一个执政党的基本要求 在国民眼里领导国家和社会不得力、不够格。这是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根本原因。

因此 本书对苏共失败原因的探讨有两个支点或逻辑起点 其一 分析的中心对象是苏共本身 是这个党在路线方针、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自身的社会基础、组织运作等方面 即党的建设中的问题和失误。苏共最终执政失败 主要滥觞于此。其二 把苏共作为一个通常意义的政党来研究，而不只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研究。除去光环和神话，才能冲破乌托邦标准对我们思考的束缚，得到实事求是的认识。

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弄清关于政党的一些最基本的理念。

政党不是自古有之。政党产生的前提，是人们对国家及其权力认识上的转变。在奴隶社会和封建专制社会，为了使普通人远离权力 以永远保有统治地位 掌权者给国家权力罩上了一层非常神秘的面纱 似乎权力来源于上帝 非凡人所能左右。这就是“君权神授”说。在这种条件下，政党是难以生存的。随着人们政治意识的觉醒 特别是随着资产阶级作为独立阶级的发展壮大 人们渐渐不满足于对国家的神权政治的解释，而把国家权力与人的天生权利联系起来 认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用民主政治的观念取代了神权政治的观念。这之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国家权力来源的解释。他认为，国家权力并不神秘，

不过是人们为了组成社会，让渡出自己的部分与生俱来的权力，构成了公共权力。人们可以把这些权力授权公共机关来行使，也可以在认为必要的时候收回它们。

很显然，这种解释并非个别智者的遐想，而是资产阶级这个在经济上强大起来的新兴阶级在政治上提出掌握国家权力的要求的理论体现。所以，这些解释虽然今天看来显得有些粗糙，却始终是主张民主政治的现代国家赖以立足的基石。当代最有影响的国家理论如政治多元主义、政治精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无不与此有深厚的渊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也深受“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这些民主政治基本理念的影响。

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不能不采取组织化的形式。掌握权力的阶级为保住自己的权力和既得利益，同样以政治组织的形式相对抗。这种组织，就是政党。政党是各阶级利益、愿望和要求的组织化。可以说，对民主政治的诉求，产生了近现代政党。

因此，我们的第一个论点是：政党是人类政治文明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民主政治是参与政治。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政党的产生，是和政治参与密切联系的。这里面有两种情况：

一是，专制统治者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拒绝民众（或一部分民众）的参与要求。这时政党就不得不首先领导民众进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斗争的方式依统治者的状况而定。如果统治者慑于民众的力量，被迫作出让步，逐步施行民主，民主政治就能通过和平过渡的方式逐步确立。如果统治者顽固地对抗民众，甚至以暴力对付民众的要求，代表这些民众的政党就往往诉诸暴力，带领民众用革命手段来推翻专制统治，为民主政治扫清道路。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论断，揭示的就是这一本质。在上述情况下，往往是政党的建立在先，民主政治的确立在后。

二是，在民主政治已经或正在形成的条件下，政党积极参与和

推进民主政治，成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有效手段。民主政治的原理其实很简单：民众作为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者，决定权力的使用，决定直接执行权力的人选 对施权者进行监督 对施权结果进行评价。这就是所谓的直接民主。但在实践中，直接民主的实施有很多不可逾越的障碍 如国家规模、公民素质、操作成本等。实践的结果，就是出现了和直接民主相匹配的间接民主形式。民众通过选出的代表来代替自己行使一部分 不是全部 权力 即代议制民主。政党作为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代表 作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有效手段，理所当然地成了代议制民主的主角。

因此 我们的第二个论点是 政党是民众参与政治的工具。

政党作为民众政治参与的工具之所以不可少，是因为政党有着许多独特的功能。在民主政治中，国家作为民众授权的公共权力机关 分散的权力如何科学地变成集合在一起的有机的权力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且 公共权力大于个人力量 民众个人是无法控制它可能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趋势的。这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看到，政党作为自愿组成的政治组织，逐渐具备了这些方面的作用和功能。这是政党虽然为许多人所讨厌、却又能在讨厌情绪的包围中生存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西方学者对政党的研究不断深化 其中包括对政党的功能和作用的研究。应当注意的是，这里面概括出的一系列比较深层的内容，有许多方面是作为政党共性的东西来勾画的。有的学者认为，政党的作用体现在两个功能上：一方面，政党向社会作出反应 另一方面 政党对社会进行控制。几乎所有政党都表现为两种功能的结合。有的学者一一列举了政党的各个方面的功能 目标制定功能 利益表达功能 社会化和动员功能 精英形成与录用功能等。无论列出多少种功能，政党都越来越具有这样一种共性 它一端连着民众 因为只有得到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支持 政党才能生存和发展 另一端连着国家、政府、权力 因为只

有掌握权力 或对政府的运作施加影响 政党才有存在的价值。政党不同于民众 因为它是民众的组织化 政党也不同于政府 因为它代表民众对政府的要求和控制。

因此 我们的第三个论点是 政党是沟通民众与政府联系的桥梁。

政党从许多意义上说是一个桥梁。但是，如果政党仅仅限于“桥梁”作用 那它就又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 这种作用可以为其他社会组织——工会、妇女组织、青年组织、压力集团等所代替。政党不同于这些组织 最为突出的一点 就是它除了起政治桥梁作用之外，还以获取和掌握政权为基本目标。政党不只是一要维护自己那部分民众的利益不为国家权力所侵害，而且要通过掌权，利用国家机器来为本集团的民众服务。这是政党掌权的目所在。无论是哪个阶级的政党，都必然以此为头等重要的目标和任务。

掌握了国家权力之后的执政党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即如何才能在掌权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与其民众的联系。权力在手 对推行这个党的主张十分有利 但同时党本身也由于靠近权力而有被权力腐蚀、同化的危险。所以 政党在政治体制中需要有明确的定位。在西方国家这不成问题，因为政党是在民主体制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但在有些国家，政党先于民主体制而出现 政党不仅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 也参与了国体和政体的创建。旧的政治体制向新的政治体制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真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党来暂时填补的。这就产生了两种可能：一是 政党代行国家行政权力 而当国家行政体制健全之后 政党把权力逐渐归还政府 二是 虽然政权机关重新建立 政党却并不把权力还给国家 而是继续占用 从而形成了政党与国家、政府关系的一系列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可能会由民众政治参与的工具变成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是政党的错位。这种错位，几乎包

含了政党变质的全部危险。政党始终应当是人民控制政府的工具，而不应当变成政府和国家权力本身。

因此，我们的第四个论点是：政党是人民控制政府之手的延伸。

政党因着影响和控制权力的需求而产生，而权力又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可能 有被滥用的可能 这就是掌握权力的政党有可能腐败变质的根源所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个公理 说的不是权力本身会变质 而是掌握权力的人有变质的可能性 不管这些人是由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由此而论 权力必须受监督和制约。时时与权力有着摆脱不掉的干系的政党，尤其是执政党 无疑也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为了监督和制约权力 西方国家设计出了一整套的机制和办法 三权分立 多党制 舆论监督等。这些机制和办法都是建立在西方社会所特有的那套文化、价值观念基础上的 任何别国都不应照搬照抄。但是 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 以掌权为目标的政党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 却是政治运作最一般最起码的游戏规则。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活动 不仅仅是为了取得政权 还要利用政权实现更高更远的目标。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同以往政党的特点 例如成员有较高的思想觉悟、自我约束的能力强等。但是 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抽象概念。既然它要掌握权力 就不能不同时受权力的影响。所以 和夺取政权一样 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 执政既是实现目标的机遇 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并非只要性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就一定能经受住这个考验。只注意权力利于贯彻执政党主张的一面，忽视其对政党性质和功能可能扭曲的一面 从而不愿意接受监督 往往会使政党误入歧途 失去正确的方向。

因此 我们的第五个论点是 政党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伟大，不能也不应体现在它可以违背政党

活动的共同规律。恰恰相反，它的伟大在于它能够科学地认识规律、遵循规律、掌握规律。离开了这一点，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历史这样告诉我们。

苏共以自己的失败这样告诉我们。

第一编

初期的探索

十月革命胜利,布尔什维克党成了执政党后,许多新的问题和任务摆在这个党的面前:怎样发展经济,使走社会主义道路确实成为全体人民的共识?怎样处理作为领导的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体现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合法性?怎样处理党与其社会基础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主人翁地位?怎样使党切实成为人民当家做主的手段和工具?列宁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索。有一些问题解决了,但有一些重大的问题没有解决,或在认识上有失误。概括起来就是:对在执政的条件下,共产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个党和搞革命暴动时期的党有什么区别,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第一章

任务、方向和道路

布尔什维克党把自己执政后的根本任务定位在发展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上。这是十分正确的，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但是，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没有完全摆脱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观念。体现在实践中，就是把没有商品货币的计划经济看做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惟一正确手段，甚至想通过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后来在列宁的倡导下推行新经济政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但就全党而言，多数人的观念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这为列宁之后党的路线的改变埋下了种子。

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

掌握了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列宁有十分清晰的认识。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列宁明确地指出：“现在成为俄国执政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发展特别明显地表明，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历史转折，这一转折构成目前政治局势的特点，要求苏维埃政权确定新的方针，就是说，以新的方式提出新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发展经济。“目前时

局的全部特点 全部困难 就是要了解从主要任务是说服人民和用武力镇压剥削者转到主要任务是管理这一过渡的特征。”^①列宁把管理国家的任务首先归结为纯粹经济的任务，归结为经济改造的任务。从这里可以看出 列宁非常清楚 随着政权的巩固 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

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毕竟是前所未有的事业。从事这样一个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榜样和模式可供参考。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接受过来的、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理想 如何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仍然保留着许多封建专制色彩的后进资本主义国家里变成现实？这个问题，自始至终是俄国的共产党人关注的焦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为回答这个重大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建立政权之初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探索 没有摆脱“社会主义 = 公有制 + 计划经济 + 按劳分配”的简单认识。诚然，在步骤上，俄共领袖的认识是有区别的。在党内有很大市场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派主张全盘“国有化”、“社会化”，立即消灭商品货币，继续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手段来巩固政权。而列宁的基本看法是 不能指望一夜之间建成社会主义。步子要稳妥 要从搞国家资本主义开始。所以，列宁的大量注意力放在国家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和监督上。当然，列宁当时还把世界革命作为俄国搞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之一。没有这一点，很多事情就无从谈起。用列宁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把宝押在国际革命上面”^②。很显然，这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充其量只能算是刚刚开始。

即使是这样一个初步探索的进程，也被随着国内战争而来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打断了。1918年夏天，国际敌对势力盗

① 《列宁全集》第 34 卷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155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7 卷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372 页。

用国联的名义对苏维埃俄国发动武装干涉，国内各种反对力量也乘机发动武装叛乱。为赢得这场战争，布尔什维克党采取军事化措施来动员一切人力、财力和物力。这就是著名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的主要内容有：(1) 实行余粮收集制。强制征收剩余农产品，严禁私人贸易。具体内容包括：根据国家需要向各产粮省征收粮食、饲料、肉类及其他农产品，征收按阶级原则进行，富农多征，中农少征，贫农免征。对实施的实际结果，列宁的概括是很准确的：“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付的都是纸币。我们当时不这样就不能在一个经济遭受破坏的小农国家里战胜地主和资本家。”^①(2) 对中小企业也实行国有化，目的是在最短时间内完全推翻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最严格地集中分配原料及产品，最终达到一切工业都为前线服务的目的。(3) 对一切阶级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让资产阶级参加体力劳动，实行“不劳动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4) 经济管理高度集中化。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工农国防委员会，负责协调军事、交通、粮食和红军给养等管理工作。同时，对交通也实行非常措施，转入军事状态，有时甚至停止客运，集中运送军事物资及其他重要物资。

“战时共产主义”作为战争环境下的一种临时措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将“战时共产主义”付诸实施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内在对“战时共产主义”这样一种特殊措施的认识上，却出现了严重的误区。它对整个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乃至对苏共以后 70 多年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

^① 《列宁全集》第 41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第 2 版，第 208 页。

列宁在 1918 年 5 月给予“战时共产主义”很高的评价。他发现“战时共产主义”不仅对于保卫苏维埃政权是卓有成效的而且还可以用来进行共产主义分配 通过它可以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他指出：“战时共产主义”是“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在他看来，“合理地分配粮食和燃料 努力获得粮食和燃料，由工人在全国范围内对此实行最严格的计算和监督，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真正的、主要的前阶。这已经不是‘一般革命的’任务 而正是共产主义的任务，正是劳动者和贫苦农民应当向资本主义进行决战的任务”^①。这种想法对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全党迅速接受了这一思想，党的领袖们甚至打算把消灭货币的想法付诸行动。1920 年 11 月，正式成立了“取消货币税工作委员会”拿出了取消货币的具体方案。只是由于列宁的慎重 这个方案才未予以实施。

很显然，“战时共产主义”的实施及其对取得国内战争胜利产生的积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个政策的消极方面掩盖起来了。它使布尔什维克党头脑发热，甚至列宁也不例外。这大概源于布尔什维克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想。例如在十月革命刚刚获胜时期，“左派共产主义者”就主张“只能用消灭货币和财政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的办法”来解决财政和货币危机，“彻底走不要货币而组织商品交换的道路”^②。其实当时列宁并不完全反对这种观点，只是认为“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要求操之过急。在这里 布尔什维克党恪守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发的一个基本思想，即：商品货币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在他们看来，搬掉这块基石，资本主义就再也无法立足。然而，在落后的国家，

^① 《列宁全集》第 34 卷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339 页。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 2 辑 人民出版社 第 12 页。

离开了商品货币，落后的经济就无法发展到“物质财富的极大涌流”这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可以认为热衷于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这时重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

因此就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反倒更加强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实施。列宁主张完全禁止任何私人贸易 取缔私商 关闭市场 并在契卡中专门建立了打击投机行为的特别革命法庭 惩办投机商。1920年12月，莫斯科苏维埃封闭了具有象征意义的苏哈列夫卡自由市场 在水陆交通要道部署岗哨 查禁投机商、“苏哈列夫卡分子”。人民委员会还规定 所有苏维埃机关、企业、团体不得自行到市场采购商品。列宁明确表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把我们在军事工作方面获得的经验运用到和平建设方面去。”^①

“ 退 却 ”

只是到了1921年6月列宁才对“战时共产主义”有了新的看法。列宁凭着无产阶级领袖特有的敏感，逐渐意识到了群众中因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产生的不满。这种不满在战争基本结束后终于爆发出来，使布尔什维克党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1920年年底至1921年春，各地普遍发生农民骚动。仅西伯利亚一个县参加暴动的就有5万多人。这之中，最典型的就是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要塞发生的水兵叛乱，它给布尔什维克党敲响了警钟。事件显然是由余粮收集制和“战时共产主义”的一系列措施引起的。水兵们（实际上就是穿着军装的农民）与该年2月下旬彼得格勒发生的工人罢工相呼应，组织起临时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现有政策的决议。决议提出，“鉴于现

^① 《列宁全集》第37卷 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88页

有的苏维埃并不表达工人和农民的意志”，应立即通过自由和秘密投票重新选举苏维埃；给予所有工人和农民政党以言论和出版的自由 给工人和农民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释放所有政治犯 取消共产党的特权地位 取消所有武装的共产党特遣队“，因为任何政党都不能享受宣传它的思想的特权并为此目的从国家那里领取经费”保证农民处置他们的土地的充分权利 保证个体小规模生产者的权利，只要他们不雇佣劳动者；实行对所有人都平等的配给制。

喀琅施塔得事件被作为反革命叛乱平息下去了。但事件本身令布尔什维克党震惊。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在十月革命时曾是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支持者 现在调过头来反对布尔什维克党 这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以喀琅施塔得事件为代表反映出来的群众情绪 使列宁看到 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常规化 把它作为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途径肯定是不正确的。他指出：“‘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① 该年 10 月 他承认对‘战时共产主义’的认识存在错误：“当时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军事任务的突然压来……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决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 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② 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 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热情 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 and 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

① 《列宁全集》第 41 卷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208—209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2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182 页。

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①列宁对这一错误的严重性是有充分认识的。他指出：“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 1921 年春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相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②

看到把“战时共产主义”作为通向社会主义的常规道路行不通，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决定另辟蹊径。这促成了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在 1921 年 3 月俄共（布）十大上，列宁作了关于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大会根据这个报告通过了列宁起草的相应决议。这是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标志。1922 年 11 月，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和特点概括为 6 个方面：一是经济命脉在我们手里；二是土地归国家所有；三是农民经济活动的自由；四是“大工业（和大农业）在我们手里”；五是私人资本主义；六是“国家资本主义”^③。列宁指出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新经济政策的真正实质在于：第一，无产阶级国家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第二，对于大资本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叫作‘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原则。”^④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作了解释：“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⑤

① 《列宁全集》第 42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176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2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184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427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4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263 页。

⑤ 《列宁全集》第 4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84 页。

但是，可以看出，直到这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也仍然把“战时共产主义”（其实是绝对平均主义）看做是共产主义的方法。正因为此，列宁把新经济政策当做“向资本主义退却”，这种看法最终也没有完全改变。1921年年底列宁描述了这一认识：“1921年开春以来，我们提出完全另一种改良主义式的办法，来代替原先的运动的办法、计划、方法、制度。所谓改良主义式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振兴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只是随着它们振兴的程度而使它们有可能受到国家的调整。”^①1922年他在检讨“战时共产主义”的错误时讲道：“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②在这里，我们可以读出两层意思。一是，我们不能设想通过“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二是，“战时共产主义”是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只是不能马上实行而已。这就是说，“战时共产主义”的那种制度仍然可能是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而新经济政策，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通向这个方向的桥梁。对这一思想，列宁的表达是明确无误的。他指出，新经济政策“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②。在列宁看来，之所以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因为“跟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

列宁的这种认识，反映了当时人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普遍概念。所以，甚至在不少布尔什维克党的反对者看来，新经济政策也表示这个党放弃了原来的目标和信仰。有人断言，照着这条路走下去，布尔什维克政权必然发生资本主义方向的演变。基于这种认识，有的人对苏维埃政权从反对立场转向支持立场。“路标转换派”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第278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第184页。

就是其中的典型。其代表人物宣称：“我赞成支持俄国的苏维埃政权 我之所以赞成 是因为它踏上了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政权的道路。”

这种认识不只具有理论意义。实际上它包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性：既然是退却，那么这种退却到什么时候、在什么位置上停止？什么时候又应重新转入进攻？列宁不但有由退却转入进攻的打算 而且认为这个转折并不遥远。到 1921 年 11 月 列宁已经开始谈论起停止‘退却’的问题 并开始对退却的界限作出预测。他指出：“我们已经退到了国家资本主义。但我们退得适度。现在我们正退到国家调节商业。但我们会退得适度的。现在已经有一些迹象可以使人看到退却的终点了，可以使人看到在不不久的将来停止这种退却的可能性了。这次必要的退却进行得愈自觉，愈协调 成见愈少 那么 我们就会愈快停止退却 而随后的胜利进击就会愈有把握 愈迅速 愈波澜壮阔。”^②在 1922 年 3 月的俄共十一大上 列宁明确宣布退却已经结束 应当停下来。“我们已经可以停止而且正在停止我们所开始的退却。够了。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并且毫不隐瞒 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 我们走得比我们能够控制的远了一些 但斗争的逻辑就是这样。”^③他提出 必须重新配置力量以便转而对资本主义成分实行坚决进攻。党的决议中把这一条写了进去。

当然，停止退却并不意味着就马上进入进攻。在列宁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列宁实际上越来越倾向于把新经济政策看做是一项长久的措施。列宁讲到，“我们要认真地和长期地 当然 正如我们已经正确指出的，并不是永远）执行这个政策”^④。这个“长期”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92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2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252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8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42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337 页。

到底有多长，列宁没有明确指出。但是从他的讲话和各类文稿中所表达的意思看，这个“长期”大约是一二十年。例如，列宁一直寄希望于世界革命的到来，而他的“退却”往往和世界革命还没有出现这一点有密切的联系。在这种前提下，列宁说：“只要在 10—20 年内和农民保持正常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①布哈林后来在解释这一点时是正确地理解了列宁的思想的：“我们关于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但这种改变决不意味着背离无产阶级的政策。相反地，它说明考虑了巨大的革命经验。我们在新经济政策中第一次找到了小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事业之间的正确的结合。新经济政策不是对无产阶级路线的背叛，而是惟一正确的无产阶级政策。”^②无论如何，列宁都把新经济政策看做俄国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在 1922 年写给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讲话提纲中，列宁在回答“怎样走向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时明确强调：“只有通过新经济政策。”^③

但是，有退却就必然有进攻。什么时候进攻，怎样进攻，仍然是党内普遍关心的问题。尽管新经济政策越来越被看做是一项长期的政策，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政策，但它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总有一天，它还是要被丢掉。关于什么时候丢掉的问题，列宁留给了后来人。

没有完成的转变

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建设

① 《列宁全集》第 41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第 2 版，第 378 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上册，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22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3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第 324 页。

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向贴近实际迈进了一大步。但是，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党完全摆脱了比较左的理想主义观念，则为时过早。应该看到，即使是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也仍然有一个继续和实际结合的问题，仍然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准确理解列宁的思想，可以看到，列宁并不是在认识上完成了从坚持计划经济到把商品经济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手段的转变之后，才提出新经济政策的。相反，在列宁的政治词典中，商品、货币、市场这些东西，仍然和资本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甚至和资本主义是一个东西。所以，他实施新经济政策，最初的着眼点不是放在允许商品和货币存在、允许买卖自由上，而是放在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交换”上。列宁思想深层的想法是，如果这个交换能够把商品、货币排除在外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例如，列宁一开始就强调，1921年春实行的商品交换“要求，尽管没有说出来，但还是要求）不通过商业而直接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迈步”^①。这种商品交换“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②。具体说，就是“农民可以把皮子交给皮革工厂，换回半成品，或者交出亚麻，换回一定数量的布匹”。时任农业人民委员的米柳亭把这种方法非常准确地称作“实物商品交换”。

很显然，列宁这里所说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产品交换”。这种交换与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买卖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是一种买卖，不是自由贸易。因为布尔什维克党仍然十分坚定地相信，自由贸易会导致资本主义。列宁在俄共十大上明确强调：“流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我们所有的人，哪怕是只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起码常识的，都知道这种流转和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第506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第228页。

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①。

怎样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的“重新恢复”？列宁为此绞尽脑汁。他的逻辑是实行粮食税就意味着农民手中有余粮，而有余粮就意味着将会出现粮食交易、贸易自由，出现商品货币关系——资本主义的可能。因此，解决的办法应当是：一方面，国家通过税收的形式获得农民手中的一部分粮食，另一方面，国家还能控制农民手中剩下的余粮。这个办法，就是产品交换。“不是余粮收集制，也不是粮食税，而是用大工业（‘社会化’工业）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产品，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社会主义的基础。”^②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后来把新经济政策同“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明确区分开来：“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而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又是从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③。

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列宁在最初考虑新经济政策时是主张“商品交换”（即产品交换）而反对市场、反对贸易自由的。因此，有人把列宁主张新经济政策理解为他已经看到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能性，这是不确切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不过很显然，这种排除了自由贸易的“商品交换”不大可能在实践中收到效果。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当年春天，农民的播种面积几乎没有扩大。到1921年秋天，出现了粮食危机。面对危机，列宁坦率地承认“商品交换”即产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如果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54页。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76页。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08页。

我们不想硬着头皮不看自己的失败 如果我们不怕正视危险 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 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

“商品交换”——产品交换——设想的失败，使列宁认识到还“退却”得不够 还应退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 应当允许农民有买卖的自由。之所以允许这种自由，是因为“当我们还没有把他们改造过来的时候……就应当保证他们有经营的自由”^②。列宁是这样概括自己发展了的认识的：“1921年开春以来 我们提出 还不是‘已经提出’ 只是刚刚‘提出’ 并且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完全不同的、改良主义的办办法来代替原先的办办法、方案、方法、制度。所谓改良主义的办办法 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 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 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 或者说 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③

在这个基础上，1922—1923年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在十一大报告上 他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 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建设得很不好，很不熟练，但毕竟已在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即新的生产和新的分配的基础上开始建设）同千百万农民赖以生存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④使这种结合得以实现的途径和手段 不是最早的余粮收集制 也不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设想的产品交换，而是在允许存在私人买卖条件下把私人利益和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作社。这是列宁得出的新的结论。就是在这个认识前提下 列宁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 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 第228页。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 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 第23页。

③ 《列宁全集》第42卷 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 第245页。

④ 《列宁全集》第43卷 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 第75页。

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①在这里可以看到列宁认识的两面：一方面 列宁已经不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项临时的政策 而是共产党把农民吸收进来搞社会主义的一条惟一正确的道路；另一方面，列宁也仍然认为农民经济只是通过新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联姻，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本身。

列宁在这一阶段所表达的思想变化非常值得研究。可以肯定地说 列宁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 与其说是有了结论 不如说是他的结论在不断改变、深化。能看到列宁思想的这种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至于在列宁去世前他的思想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学界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研究者认为 尽管新经济政策如同列宁在 1921 年理解的那样，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有本质的区别 但在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 即在原则解决市场同国家的关系问题方面它们是一致的，两种政治方针都没有超出“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毕竟列宁只有一年多的时间 全力以赴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其余大多数时间在巩固政权和国内战争的环境下度过）这对于任何一个天才和伟人 对于回答什么是和本国国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都太短太短了。

尽管后来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但是全党的认识水平很不一致。许多已经被列宁深刻认识到东西，在当时并没有为全党的大多数所认识。布哈林是少数比较正确地理解列宁思想的党的领袖之一。布哈林后来甚至认识到新经济政策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1928 年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六大的报告中指出：“依我看来 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经济——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367 页。

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①哲学家波格丹诺夫也讲道：“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时期,市场是组织经济的因素。而现代形式的市场,也将是过渡时期实行国家调整的基本手段。”但是,党内大多数没有达到这个水平。相当部分的党员和干部仍然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退却”,把市场看成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特征,急不可待地要转入进攻。这是后来苏联发展方向发生逆转的重要因素。斯大林成了这些人的突出代表。

表面看来,列宁和这些人之间只是认识程度的深浅有区别。但是实际上,这后面隐藏着方法论的根本不同。列宁的观点和看法之所以经常不断地变化,是因为实践在不断变化,是因为他始终在寻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俄国国情的有机结合。而这些人之所以跟不上列宁思想的变化,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头脑中已有的理论来审视实践,评判实践,宁肯冒理论无法实现的险,也不愿根据变化的实践修正理论。俄国党的历史上,这种“左”的观念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

“左”的思想对这个党具有强大的影响。在确立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列宁同党内的“左”的思想的斗争是这时期活动的一条主线,正是通过这一斗争,才使布尔什维克党逐渐走到了更加符合实际的道路上。但是另一方面,“左”的土壤并没有被铲除。列宁在他生命最后阶段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没有在党的政治路线中体现出来。党的政治路线和党内大多数的基本思路仍然是:新经济政策是向资本主义的退却,一待时机成熟,就应该立即停止这种退却,重新开始消灭商品货币的进程。列宁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

第二章

在国家权力的阴影下

在确立了党的目标和任务之后，可以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来促进这个目标和任务的实现——这是执政党和地下党的最大区别。布尔什维克党正确地看到并充分地利用了这种转变带来的巨大能量。然而，正确地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就要对国家权力的本质和党与政权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布尔什维克党的问题恰恰出在这个方面。党对国家的特质认识不够，过分强调阶级和政党对于国家运作的主观任意性，低估国家权力异化的可能性，没有看清官僚主义等现象与集权体制的必然联系。在此基础上，对党政关系的处理基本上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概念，党越来越为权力的阴影所笼罩。这个结果，不能不影响到后来。

领导 还是代替？

对于国家的认识，列宁早些时候是比较清晰的。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关于未来国家的描述，忠实地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进行总结之后概括出的基本原则。他指出，在革命胜利后，要建立“人民管理制”、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制。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必须“使所有的人

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①。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曾设想将这样一套思路付诸实施。在俄共七大上他指出：“对我们来说 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 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②

不过 列宁很快发现 在政治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俄国 这种设想并不现实。和任何类型的国家机器一样，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也是一套复杂、精巧的体制和机制。它不是像列宁原先设想的那样——绝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填表、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 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行使这些职能。所以，掌权的工人阶级直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是无法做到的。在 1919 年俄共八大上 列宁以他特有的坦率承认“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③。

这就是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国家机器仍将保持“政治国家”的特性。既然如此 那么 国家机器成为超越社会之上的力量的可能性就仍然会存在。实践已经表明，国家权力机构的运作具有惊人的不受控制的力量。对它是否控制得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制的形式。这使得国家体制形式变得非常重要。人民群众直接掌权已经不可能，但至少应当有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体现人民群众对国家权力的控制。探索和打造这种体制和机制，是掌了权的共产党面临的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低估了国家体制形式的独立特性。等到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真正成了国家领袖

《列宁全集》第 31 卷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105 页。

《列宁全集》第 34 卷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49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36 卷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155 页。

后，他们渐渐感觉到了国家权力作为不愿受控制的力量巨大张力。苏维埃机关取代旧国家机器成了整个国家运作的基础，实际上不久苏维埃的网络就取代了党的网络，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中央领导控制各州的主要渠道。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党本身怎样活动的问题。党的机构的功能在衰退。这种衰退如此明显，以至于有人就此提出 党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取得政权)现在共产党员在苏维埃中占优势，所以党可以取消了。这显然是一种危机。解决这种危机的办法有两种：一是 认真研究政党和国家机器的不同性质，给它们在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体制中以恰当的定位，充分体现两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二是 政党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分取其中的部分权力。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探索中，后一种思路在实践中逐渐占据了上风。

布尔什维克党通过把政权机关的职能大量地转到自己手里的方式 来实现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控制。可以说 这正是政党国家化、行政化的最初起点。

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党做了 4 件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第一，建立党的部门管理机构和组织专职队伍。1919 年党的八大决定成立 9 个部作为党务管理机构。其中 5 个部会后立即成立：情报和统计部 组织指导部 档案和分配部 巡视员部 总务部。还有两个部稍后成立 农村部和妇女工作部。第二 由党的机关行使人事分配大权。关于这一点 我们后面要做专门的分析。第三 党的机关在经济上独立于苏维埃国家机关，由中央委员会直接给地方党委会拨经费。这笔经费由内务人民委员会提供。第四，大量接受新党员入党。为了适应党接管国家权力的需要，党的队伍在执政后第一年就扩大了 9 倍 两年扩大了 10 倍：1917 年 2 月有党员 24 000—25 000 人 到 1919 年 3 月八大时，党员人数已增加到 25 万人。到 1920 年 9 月 又猛增到 60 万人。1921 年 3 月十大时党员总数为 75 万。仅 1919 年 10—12 月的‘党员周’里 就发展了大

约 20 万新党员入党。新入党的党员相当一部分被充实到党和国家机关。1922 年，在党的机关中工作的党员占到全体党员的 30%。

通过党对权力的控制和接管，党成了整个国家机器的核心。国家和政府机关、社会团体等，都以上下级的关系服从党的机关。列宁明确强调：“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党 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 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① 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

弊端初现

在这种情况下，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于已经出现的这种以党代政的状况，列宁自己也遇到过不少。1922 年 4 月，列宁写给斯大林一封信，从信的内容上可以看出当时党政关系混乱的程度：

“斯大林同志

请中央书记处 如果不归它管 而归组织局管 就请组织局) 决定：

(1) 立即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及其妻子季娜伊达·巴甫洛夫娜·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办理去德国的签证；

(2) 根据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赴德治疗所需时间给这两位同志假期……

① 《列宁全集》第 41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55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27 页。

如果遇到阻碍，难以满足我的这一要求，请告诉我是哪些阻碍。’^①

显然 连列宁也不清楚哪一个机构负责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给国家计划委员会假期的问题不通过国家系统来解决。

在批评不负责任、相互推诿的官僚主义现象时 列宁举过一些典型的例子 说明党政关系存在的问题。例如他批评道 对外贸易委员部连购买一批国外罐头的事也不敢决定，非要等政治局的决议 等政治局委员的亲自干预。列宁借此说明“；在我们党同苏维埃机构之间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关系，这一点是我们一致承认的。我方才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有些具体的小事都要弄到政治局去解决。”^②

当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党政关系的混淆带来的后果是有认识的。所以在布尔什维克党掌权的第三年 党的八大就专门作出决议 试图划分党和国家机关的各自职能。决议认为 无论如何不应当把党组织的职能和国家机关即苏维埃的职能混淆起来，否则“会带来极危险的后果”。职能的划分包括两点 其一“；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来贯彻自己的决定”；其二“；党努力领导苏维埃的工作 但不是代替苏维埃”^③。对于如何处理党和国家机关职责的问题，列宁后来也提出了基本原则“；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 及其中央 的苏维埃政权的职责 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④鉴于党政不分带来越来越多的消极后果，以及处理好党和苏维埃国家机关之间

《列宁全集》第 52 卷 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412 页。

《列宁全集》第 4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110 页。

③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1 分册 第 571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4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64 页。

关系的极端重要性 后来的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 也都多次强调党政分开问题。

然而在实践中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 而且愈演愈烈。这和理论上没有弄清问题的实质有关。实际上，什么是领导 什么是代替 什么是总的领导 什么是频繁干预 甚至什么是领导 什么是管理 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词典中也都不是分清楚了。例如 列宁本人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就讲过 党现在的任务是管理俄国。要有成效地进行管理 除了善于说服人们 除了善于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外 还必须善于实际地进行组织工作。在其他一些地方，列宁也多次讲到党对国家的“管理”问题。这里屡屡谈及的“管理”显然指的是政府治理。这种“管理”非但不能和“总的领导”相提并论 倒是很容易和“琐碎的干预”混在一起。所以列宁也承认，领导和代替实际上是很难区分的。因为党的上层领导就是苏维埃机关的上层领导，这是一回事。列宁甚至说：“作为执政党 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成一体 现在是这样 将来也是这样。”^①主观上一直想把党和国家机关的职能分清楚 实践上又始终没有分清楚 其原因在于对国家权力本质认识上的偏差。

认识官僚主义

既然国家暂时只能由共产党代表人民来管理，而不是由人民自己来管理 由此马上出现的问题是 如何防止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本身成为官僚 权力高度集中 党政不分的体制 运作的结果 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官僚主义现象。1922年党的十一大承认：“在党组织的周围就经常出现为党组织服务的庞大的机构，这种机构

^①《列宁全集》第41卷 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 第11页。

逐渐扩大 连它本身也蒙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 而且占用了过多的人力”^①。列宁晚年对国家机构的运作非常不满。他看到官僚主义的危险,抱怨重大的事情依然只有“通过那个人数十分少的,可以称之为老的党卫军的阶层的权威来决定”^②。他质问:随随便便地纠正数百个优秀专家的工作,用一些庸俗的笑话来回避问题 以自己有权‘不予批准’自傲——难道这不是可耻的行为吗?

谈到官僚主义及其产生的原因,布尔什维克党毫不迟疑地把它归结为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列宁的思考很有代表性。列宁一再强调 新的苏维埃官僚主义是建立在旧的、分散的农业基础上的上层建筑。这种旧的农业的分散性事实上是一种起消极作用的根源。这种分散性在几年之内把具有几十万大多数是从过去官僚阶层中留用的旧官员的中央行政机构强加给国家。所以,列宁强调:“我们必须懂得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是绝对必要的 这种斗争也像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斗争的任务一样复杂。官僚主义在我们国家制度中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脓疮,以致我们的党纲也提到了它,这是因为它和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及其散漫性是有联系。”^③列宁实际上不同意说官僚主义是从新政权本身派生出来的。在他看来 官僚主义来自留用的旧官员。因此 官僚主义首先表现在国家机关中。至于党内产生的官僚主义,列宁把它归结为国家机关的影响:“显然 在苏维埃机关中复活了的官僚主义也不会不在党的组织中产生有害的影响,因为党的上层领导就是苏维埃机构的上层领导 这是一回事。”^④接受了旧国家机关,也同时接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 第175页。
[德] 沃尔夫冈·莱昂哈德:《是一次新革命的前夕吗?》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第19页。

③ 《列宁全集》第41卷 人民出版社 1986年10月第2版 第25—26页。

④ 《列宁全集》第40卷 人民出版社 1986年10月第2版 第33页。

受了旧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列宁认为这是不幸之所在。“我们接受了旧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这是我们的不幸。”

把官僚主义归结为是由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带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关于官僚主义的来源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国家问题时已经有所涉及。他们认为 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 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 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毫无疑问，官僚主义现象就是国家这个“祸害”的若干“最坏方面”中的一个。在国家没有消亡之前 为了防止这些“最坏方面”回过头来损害人民的利益，工人阶级必须对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更加以监督和防范。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途径有两条。一是，一切职位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 并且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二是 对所有公职人员 不论职位高低 都只付给和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以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这样可以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官僚主义就是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的典型表现。

列宁的同代人 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袖 也曾对官僚化的危险提出过警告。他们在批判官僚主义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官僚主义与体制的关系问题。卢森堡在《俄国革命》一书中预言：“苏维埃的生活也必然会随着全国政治生活的窒息而日益瘫痪。没有普选 没有广泛的新闻和集会的自由 没有自由的思想争论 每个公共机构的生活就会停息 就会变成醉生梦死的生活 官僚政治就会成为独断专行的因素。公共生活逐渐销声匿迹，几十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和工人队伍的精华随时被请去开会，为的是给领袖的讲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 人民出版社 1987年10月第2版 第284页。

话喝彩鼓掌 给提出来的决议举手通过。”卢森堡预言的现象没有必然性，但卢森堡的预言后来却被事实所证明。长期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库西宁，在认识上也有其独到之处。1921年库西宁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写了一篇专门探讨工人组织中的官僚主义问题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认为：“如果把这种官僚主义看成是在无产阶级组织中工作的知识分子偷运进来的小资产阶级的东西，那就过于简单了……在过去合法的工人运动中，这样的工人是屡见不鲜的 他们直接来自车床而担任工会工作、当代表或作新闻记者等工作之后 迅速蜕化变质 沾染上了官僚主义方法的一切不良的特点。”列宁曾对这篇文章的观点表示赞同^①。

官僚主义来自国家权力本身。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有官僚主义这种现象。所以，官僚主义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发生异化的一种具体表现。在总结了无数个国家的历史经验之后的今天看这个问题 应该说已经十分清楚了。但在当时 在权力过度集中的体制的弊端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之前，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为什么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的国家也会发生异化？以反对任何性质、任何形式的国家而著称的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俄国人巴枯宁说出了其中的部分真理。他认为，无产阶级掌权也会出现少数管理者的专制 更危险的是 它好像是所谓人民意志的表现。就其成分来说 这个少数是工人。但这些过去的工人，一旦变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统治者，就不再是工人了。他们将从“国家”的高度来看一切普通的工人 他们将代表的 已经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和他们想管理人民的“野心”，。由于科学至少现在只是为数很少的人的财富，那么这些为数很少的人就应该成为社会生活的领导者。“在革命后的第二天，新的社会组织就应当建立起来，

^①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 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 1980年出版，第 179—180页。

但不是……通过各人民组织、公社、乡、区域自下而上地自由联合的办法来建立，而只是由这少数有学问的人的独裁的政权来建立。”巴枯宁的错误在于他力图把国家由民主转向独裁说成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因而反对所有形式的国家。但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却真的被不幸而言中了。

当然，列宁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他看到把官僚主义看做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带来的毛病，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所以他又主张用更多种多样的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来杜绝毒害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性，反复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这实质上是从权力制约的角度探讨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的可能性。但总的说来，列宁确实没有完全搞清楚官僚主义的根源，在实践上采取的办法也就不可能十分科学，事实上还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列宁倾向于用加强党（特别是党的机关）加强以前没有从事过行政工作的工农干部的权力的办法来遏制官僚主义的泛滥。德国学者鲁道夫·巴罗这样概括列宁的思路：“由于不能从上而下地进行纠正，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党应该怎样监督国家机器，使它不致沿着官僚主义的例行公事和营私舞弊的道路蜕化。解决的方法就是把党的机关建设成为另一个凌驾于国家机关之上的官僚机构。”^①这种概括大体上是正确的。例如，列宁把从工人阶级中补充新的、富有生机的干部，看做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根本力量。他多次讲到，要通过从下面选拔工人来消除官僚主义。

毋庸说，这在认识上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党的机关的权力越加强，它的官僚主义就表现得越严重。可以说，加紧向国家机关输送没有行政工作经验的工人的结果，与其说是减弱了官僚主义的影响，倒不如说是助长了官僚主义现象。因为，如果说，最初苏维

^① [德] 鲁道夫·巴罗：《抉择——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

埃国家中的官僚主义主要反映在从旧国家机器中留用的行政办事人员身上。那么现在，官僚主义有了更富生命力的载体。这等于是在为官僚机构打强心针、输送新鲜血液。所以，强化党的机关权力的尝试后来也陷入了两难处境。但列宁未能因此而改变思路。他进而把工农干部中也出现官僚主义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共产党员缺少文化。“俄国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的经济力量完全足以保证向共产主义过渡。究竟缺少什么呢？缺什么是很清楚的：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如果拿莫斯科4700名负责的共产党员和一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领导谁呢？说共产党员在领导这堆庞然大物，我很怀疑这种说法。说句实话，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①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新进入机关的党员没有文化、不懂管理，又要对几乎所有问题进行决策，必然要犯瞎指挥、滥用权力的毛病。但是，这远不是问题的根本。

由于对国家的认识有误，布尔什维克还往往把出现的矛盾看成是实行党的领导与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不愿服从党的领导之间的矛盾。所以，越是出现官僚化，就越要强化党对国家机关事务的干预。这就走到歧路上去了。因为，就当时政权运作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而言，其性质是很复杂的。有些矛盾的确是由于留用的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意对抗党的领导（就像通常阶级分析方法所必然得出的结论那样），还有一些则是由于强行实施不符合国家机关运作规律的党的指示或外行领导内行引发的。对于这种矛盾，解决的办法应该是党组织按照国家机关自身运作的要求去进行领导，而不是取代国家机关继续进行违背规律的行政。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学者夏皮罗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他说，布尔什维克确实从帝国政权那里接管了大量文官制度人员，对旧制度的改变仅仅限于在它上面加了薄薄的一层权力极大又不承担责任的共产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第93—94页。

党员而已。而且在某种程度上 这种状况还不如旧制度 因为在旧制度中，某些法律秩序和对执行机构的制约因素已经开始生根，而共产党员却破坏了刚出现的这种法律秩序的一切痕迹^①。有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并不理解这一点。例如，当克拉辛提出党应当把“恺撒的东西交给恺撒”（意指政府的工作应交给政府去做）时 季诺维也夫则争辩道：我们无须为党对整个国家机器的专政感到羞愧 也无须加以隐瞒 越是早一天能做到这一点 就越好^②。

对权力机构本身产生官僚主义的问题，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有了较深的认识。他意识到，新的国家机构不过是和旧制度下的机构一样的官僚机构 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一下 这个机构是整个地从旧时代接受过来的。国家机器有自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作规律。列宁似乎捕捉到这方面的某些因素。例如他感到“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 但是这一年……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 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 可是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③。这不是因为国家机关的掌权者是异己力量 而是因为“我们的人到处发号施令 结果完全事与愿违”^④。尤其是 当看到“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 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时 列宁感到很吃惊。他支持托洛茨基的建议 认为不但应该反对苏维埃国家机关内的官僚主义，而且应该把这个斗争扩大到包括党组织局的官僚主义在内。他还希望能和托洛茨基组成一个集团，共同反对这些已经侵入党的肌体的官僚主义。

① [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 东方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257 页。

② [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 东方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353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85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4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94 页。

不过，因为疾病的又一次发作，列宁的想法未能得到实施^①。

对多党制的探索

政党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时期，苏维埃国家的政党体制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单独掌权的一党制格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政党体制模式，后来被斯大林解释为必然规律。他指出：“几个党，也就是政党自由，只有在有利益敌对而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的社会里，譬如说，在有资本家和工人、有地主和农民、有富农和贫农等等的社会里，才会存在。可是在苏联已经没有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等阶级了。在苏联只有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不仅不彼此敌对，相反地，是互相友爱的。所以，在苏联也就没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这些政党自由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可以存在，这就是勇敢和彻底保护工农利益的共产党。”^②斯大林的解释在很长时间内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似乎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存在其他政党，而且似乎列宁也是持这样的观点。然而这不是历史的原来面貌。诚然，掌了权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确是把其他政党都消灭了，这是事实。但是，结果并不能说明列宁的初衷。恰恰相反，在列宁的思想里，是包含了社会主义多党制的设想的。

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刚获得政权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发动和领导了十月革命。但是，参加十月革命的并不只是布尔什维克党一个党。以农民为主要社会基础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积极参加了起义，并在起义胜利后继续保

列夫·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512—513 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 第 408—409 页。

持了同布尔什维克党的合作。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以此为基础，建议两党联合掌权。只是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害怕社会革命党的分裂而拒绝参加，才使 1917 年 11 月成立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成了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政府。列宁在谈到这件事时表示“极为遗憾”。他说：“我们曾经建议，而且还在建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我们分掌政权。他们拒绝了我们的建议，可见并不是我们的过错。”^①

即使如此，列宁也没有放弃多党合作、成立联合政府的尝试。他强调，“我们愿意成立苏维埃联合政府。我们没有把任何人排除于苏维埃之外”^②。他认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排斥多党合作。相反，它允许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布尔什维克分掌政权，实行联盟。“这个联盟可以成为‘真诚的联合’，真诚的联盟，因为雇佣工人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利益没有根本相悖的地方。”列宁相信，“无产者同被剥削劳动农民之间的‘真诚的联合’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③。从他的论据可以看出，列宁的想法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建立在对苏维埃政权将来社会基础的正确分析之上的。1917 年 12 月，已经同右派社会革命党决裂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接受建议，和布尔什维克党组成了联合政府。遗憾的是，国内战争爆发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不是和布尔什维克党同舟共济，而是利用苏维埃政府内外受敌的机会，参加了国内叛乱，图谋取布尔什维克党而代之。这样，左派社会革命党被宣布为非法，两党的合作就又一次破裂了。

晚至 1921 年 3 月，列宁还提出过多党合作的可能性。他的话出自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富农的出现和小资产阶级关系的发

① 《列宁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10 月第 2 版，第 70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10 月第 2 版，第 31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10 月第 2 版，第 98 页。

展自然会产生相应的政党 在俄国 这些政党是在几十年当中形成起来的 我们对它们都很熟悉。这里要选择的 不是让不让这些政党发展 因为小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必然会产生这些政党 我们要选择的 而且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选择的 只是集中和联合这些政党的行动的形式。”

当然 在仍然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根本特征的前提下 能否真的实现多党制，是大有疑问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卷入叛乱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反对剥夺富农和中农。而且从历史发展规律看 包括计划经济在内的统制型经济 往往与高度集权联姻。但无论如何 列宁的确曾为社会主义政权提供过多党制的选择。这充分表明了其思想的开放性特征。

除了列宁，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袖在对待政党体制的问题上，表现得就不那么慎重了。许多领导人对掌权情况下需要其他政党的批评和建议缺乏起码的科学态度。例如，托姆茨基曾为一党制大唱赞歌。在 1922 年苏共十一大上他发言称：“国外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是一党制。这是不真实的。我们有许多党。和外国不同的是 我们有一个党在掌权 而其余的都在监狱里。”他的话还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②。这段话迎合了党内相当一部分人热衷于掌握权力 却不愿受到任何监督和约束的心理。所以 虽然听上去痛快淋漓，却没有了列宁的那种深邃的洞察。

在列宁之后，布哈林也在探索中涉及了政党体制问题。在看到高度集权的体制暗藏着对共产党的巨大危险后，布哈林曾经试图寻找一种比较科学的政党体制。1936 年 当得知高尔基曾提出把知识分子联合成一个单独的政党参加选举的设想后，布哈林评

《列宁全集》第 41 卷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67 页。

《火星》杂志 1989 年 9 月号 俄文版第 38 期 第 27 页。

论道：“某种第二党是必要的。如果只有一个候选人名单 没有竞选，这就和纳粹主义一样了。为了在俄国人和西方人的眼里使我们和他们有区别 我们应该建立有两个候选人名单的选举制度 作为一党制的对立面。”^①很显然，在高度集权体制已经形成的情况下 这种设想是无法实现的。非但如此 这一思想还成了布哈林被处以极刑的罪名之一。

两个例子

由于当时党和国家所处的特殊环境，为了保证和强化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地位，列宁经常根据需要采取一些特殊手段处理重大问题和事件。就这些做法本身来说，列宁自有他的道理。但是，这些方法和手段对后来体制的形成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里有两个相当典型的例子。

一个例子是解散选举产生的立法议会。1917 年年底举行立宪会议代表选举。布尔什维克党在 3 600 多万张选票中只得到 900 万张。多数人支持了其他比较温和的左翼党派。1918 年 1 月 18 日立宪会议开幕 707 名代表中只有 175 名布尔什维克代表 加上 40 名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在立宪会议中可以依靠的全部力量。而相比之下，社会革命党有 370 名代表。在立宪会议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倚仗自己的多数，否决了布尔什维克党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在这事关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地位的紧要时刻，布尔什维克党利用工人和军队的支持，解散了立宪会议。列宁称之为“用革命专政的名义直截了当地而彻底地清算掉形式上的民主”。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编：《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88 页。

布尔什维克党解散立宪会议是特定情况下的行动，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对民主选举的否定。列宁讲到了解散立宪会议的理由：立宪会议的选举因为候选人名单是十月革命前产生的而不能客观地反映现实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不符合人民的意志，造成了危机。要消除危机，立宪会议必须无条件地宣布承认苏维埃政权和它采取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因立宪会议而产生的危机便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解决。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要采取最有力、最迅速、最坚决的革命手段来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势力，而不管他们用什么口号和机构（即使是用立宪会议代表的资格作掩护。”^①在后来的实践中，列宁对在选举中如何切实体现人民的意志，还是非常重视的。斯大林时期使选举流于形式的做法，实际上是对列宁有关思想的消极、扭曲诠释的结果。

第二个例子是对恐怖手段的大规模采用。列宁非常鲜明地主张，在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和残酷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必须使用“恐怖手段”同反革命进行斗争。他表示：“阴谋家一面制造阴谋，一面要苏维埃政府放弃恐怖手段。不，我们决不放弃恐怖手段。”^②列宁争辩道：“在最残酷的国内战争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阴谋引入外国军队来推翻工人政府的时期，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居然不用死刑来惩罚这种行动，是可以想像的吗？除了不可救药的可笑的书呆子以外，任何一个人都会否定地回答这些问题。”^③他公开宣布：“恐怖手段和肃反委员会都是绝对必要的。”^④“枪决”是列宁那时经常使用的字眼。例如，实行余粮收集制时，征粮队必须给被征收者开出二联或三联收据，凡不开收据者“予以枪决”；对诬告者必须“严加追究并处以枪决”等等。列宁赞扬“红军采取了连

① 《列宁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67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7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41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37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76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37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第 2 版，第 397 页。

旧政府都没有采取过的直到枪决的严厉措施”。直至 1922 年 列宁仍然主张 不应该取消恐怖手段；依我看 应把枪决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之类的一切活动”^①。对于敌人攻击布尔什维克采用枪决的办法，列宁针锋相对地回答：“是的，我们采用了 而且是完全有意采用的。”

当然，列宁绝不是热衷于恐怖手段。他对这种手段的认识是清醒的。在讲到使用恐怖手段的必要性时 列宁强调：“我们是被迫采取恐怖手段的。”恐怖主义是由称霸全世界的协约国的进攻引起的。世界各国的舰队封锁一个饥谨的国家，难道这不是恐怖手段？外国代表利用所谓外交豁免权去组织白卫分子暴动，难道这不是恐怖手段？是协约国的恐怖主义 是称霸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的恐怖手段强迫我们采取恐怖手段的。”

所以 当情况和局势发生变化的时候 列宁立即提出：“应该考虑到新出现的从战争向和平的转变 逐渐改变策略 改变镇压的办法。”^②列宁在这里不仅仅是表达了一种思想。他还把自己的思想付诸行动。在战争状态结束后，列宁及时提出缩小肃反委员会的权限。列宁认为 随着平时时期的到来，“必须改革全俄肃反委员会 规定它的职能和权限……我们的政权愈趋向稳固 民事流转愈发展 就愈需要提出加强革命法制这个坚定不移的口号 就愈要缩小那些对阴谋者的袭击给予回击的机关的活动范围”^③。根据列宁的提议，1922 年 1 月俄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撤销全俄肃反委员会；一切反对苏维埃制度的犯罪案件或要求苏维埃法律解决的案件，均分别由革命法庭或人民法院经过审判程序予以解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186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2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192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37 卷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386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38 卷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124 页。

⑤ 《列宁全集》第 42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353 页。

决。”这里面已经可以看出，在列宁看来，随着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党对国家的领导也要由过去的非常手段转向依靠法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不难看出，列宁是非常懂得采用特殊手段和方法的消极后果的。因此，在因形势的要求而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列宁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总是严格地把握着事情所允许的度。而当形势恢复正常以后，他又总是及时地作出调整，放弃适用于非常时期的特殊手段和方法。可惜的是，斯大林在后来的实践中没有掌握列宁这种高超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他把这些临时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措施都作为共产党执政的惯常手段保留下来，这就带来了许多问题和隐患。

第三章

寻找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一个取得了政权并把首要任务转向经济建设的政党，一方面要利用政权力量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社会阶级基础。在这方面，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农业国掌权的布尔什维克党，遇到的是前人所没有遇到过的难题。因为它面临的，不只是如何保持和自己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联系，而是同时面临两个巨大的阶级：工人和农民。作为执政党，不得不同时和这两个阶级、而不是只和其中的一个阶级相处。而且更重要的是，和这两个阶级相处得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的命运。考察布尔什维克党在解决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方面的实践，可以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

党和工人阶级

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的自我认定。执了政的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来领导国家的。列宁有一段话清楚地表达了布尔什维克党与工人、农民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说服了俄国。我们已经夺回了俄国——为了穷人，为了劳动者，从富人手里，从剥削者手里夺回了俄国。现在我们应当

管理俄国。”^①应该说有了这个前提 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就十分简单、明了了。然而 实践远不像理论那么简单。尽管有党的性质作前提和基础，掌握了国家权力的党和作为国家公民的工人阶级之间，仍然有一个重新磨合的过程。

实践表明，党作为掌权者，工人阶级作为国家主人翁和公民，一开始就存在某种程度的不适应。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和不和谐，往往是由既有理论和实践的强烈反差引起的。这种矛盾和不和谐 主要反映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反映在对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认识上。

工人阶级在国家中应当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布尔什维克党掌权，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主人。列宁更多地把这种主人翁地位理解为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但相当一部分人（这里面有理论家、革命者，也有大量的普通工人），往往把它与个人经济地位的变化、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作条件的改善、个人升迁的机遇等联系起来。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理想与实际的矛盾。不过，在这里面，贫穷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十月革命初期 当布尔什维克需要利用专家而不得不给予他们特殊待遇时 工人都十分反感。他们总以为 随着革命的胜利 他们的物质生活应有所改善。“党教导我们，一旦我们着手建设共产主义，消费品将在全体劳动者之间平均分配。然而现在这些资产阶级专家却突出地享受照顾和高工资，而工人所拿的工资却比革命前的旧时代还要少些。”^②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至于产生这种概念的原因 可以说是两方面的：一是工人思想觉悟相对较低，二是说明了党组织在革命前的宣传鼓动工作出现的偏差。工人心态的不平衡有时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在一些

① 《列宁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6月第3版 第477页。

②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1988年版 第41页。

企业中，发生了工人打死工程师的事件。

第二，矛盾和不和谐反映在对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认识上。

这一点和上一个问题有关。虽然做社会主人的理念是工人参与革命的根本动力，但对于究竟什么是主人，许多人缺乏完整的概念，不少工人实际上怀有偏狭的理解。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讲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明工人对“主人”及“公有制”等相关概念认识上的模糊程度。她写道：“农民对有利于自己的能拿到手的一切都‘拿了’。一部分工人，特别是与乡村有联系的那一部分工人也受到了感染。有许多人——工人、女工、士兵跑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来找我。他们告诉我说，以前在工人出厂时普遍实施的抄身制废除了。工人自豪地说：‘怎么，难道我们是小偷么，竟来抄我们的身？我们现在是工厂的主人了！’不过对‘主人’这个词他们往往用小私有者的眼光理解得十分简单。记得有一次（那是后来的事了），一个女工向我们提出申诉，说它因为给自己剪了一块衣料而被解雇了。‘难道这不行吗？我们是主人嘛。’家里要用工具，厂里的锉刀呀，凿子呀，有什么不好拿的呢。对待劳动的态度起初也特别。一个女工来到我们这里说，她们今天不上班。我问她：‘为什么呢？’她回答说：‘大家都有一大堆家务事要做。现在我们是主人了，工作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我们就决定今天不上班！’”^①这种事情虽然看上去不大，反映的却不是小问题。它表明，在把工人由名义上的主人变成真正有责任心、有使命感的主人方面，布尔什维克党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如果共产党不能逐步克服这些狭隘的思想，相反却利用这些狭隘的思想来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那么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

第三，矛盾和不和谐反映在社会分配问题上。

即使是工人阶级政党内部，一旦掌权，也存在社会分配的问题。

^① 《回忆列宁》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8页

题 这是不能回避的。比较务实的列宁 很快放弃了过去一直主张的低工资、同待遇制度 开始实行对负责干部给予特殊食品配额的制度。据说这是由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因饥饿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引起的。为了防止出现类似的情况，列宁指示建立“疗养食堂”。从此开始，这种特殊配额制一直保留到 1988 年。在经济发展落后、社会还比较贫穷的条件下 这样做显然有理由 因为共产党人并不应当是禁欲主义者。但是，问题不在于此。既然实践和理论相比已经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就必须从理论上对实践重新作出解释。但是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 这种解释没有出现。

由于理论和实践的反差，工人的不满开始显露出来。早在 1923 年年初 布尔什维克党内就出现了一个自称“工人小组”的团体，其观点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反差必然带来的思想迷惘。这个团体认为：“最大的危险在于 很大一部分担负领导工作的首长们的生活方式，已迅速开始改变了。倘若任何一个托拉斯（譬如说糖托拉斯）管理机构的成员们每月拿到二百个金卢布的钱，此外还享用一套又漂亮又便宜的住宅和一辆免费使用的小汽车，而一个工人除了得到由国家配给的有限的口粮外，每月平均只拿到四至五个卢布 倘若这种状况存在一个时期 新的阶级分化是不可避免的。”^①

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都被作为旁观者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看得清清楚楚。他满怀善意向俄共领导人发出忠告：“同志们 在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下述情况 即统治阶级整体的生活水平，比被统治被奴役阶级中某些成分的生活低这样多。这一闻所未闻的矛盾是历史留给无产阶级的一种厄运；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就存在于这一矛盾之中，在资本主义还没有获得巨大发展

[德] 沃尔夫冈·莱昂哈德：《是一次新革命的前夕吗？》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第 17 页。

以及它还没有能够把生产力统一起来的国家中，尤其如此。集团精神和工人贵族阶层……正是从这一矛盾中产生出来的。但是，无产阶级如不以其集团利益的任务消除这一矛盾，就不会成为统治阶级。如果它不为普遍利益牺牲其集团利益，就不能保持它的统治和专政。显而易见，在这方面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是容易的。经常矛盾的消极方面并不困难：‘你，一个营养不良、衣衫褴褛的工人是主人，还是这位身着毛皮大衣、拥有地球上一切财富的新经济政策男子是主人？’……在这方面，蛊惑宣传是轻而易举的。如果用集团精神的概念来提出问题，而不是用列宁主义的概念，也就是说，从关于历史上处于一定地位的无产阶级实行统治的学说出发来提出问题，那么，避免这种蛊惑宣传就困难了。’葛兰西的话读起来有些令人费解，但他的意思还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共产党不能使工人阶级从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看问题，那么，工人的整体生活水平不高，普通工人和掌权者之间存在差异，其他阶级或群体从共产党的政策中得利，都会造成工人阶级对共产党的疏远，削弱党执政的基础。

第四，矛盾和不和谐还反映在工会地位和作用的争论中。

在 1920 年 11 月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后托洛茨基挑起的工会问题争论中，托洛茨基主张工会“军事化”，提出将工会和生产机关、经济机关“融合”起来，实际上是想把工会变成国家管理工业的一个机关。这当然是非常错误的。但在争论中，也出现了由“工人反对派”代表的来自另一方面的声音。“工人反对派”主张国家“工会化”，提出把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工会，由工会选举出中央机关来管理整个经济。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工人反对派”的这种主张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工人和工会的想法。列宁在革命胜利之初也曾有过把工会变成工人管理国家的手段的设想。但对工人阶级状况和社会主义本身的认识，使他很快放弃了这个观点。“工人反对派”则继续坚持这种观点。这是产生分歧的根源。这

表明布尔什维克党需要解决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如何能够顺利实现由工人直接管理国家的观念向由政党来代表工人管理国家的观念的转变，同时又能保持二者的一致性？工会问题争论历时 4 个月结束了，但分歧的根源始终存在。后来因为在工会实行越来越普遍的任命制而产生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布尔什维克党与工会之间矛盾的继续。

需要指出的是，一系列矛盾的出现，分别可以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人群众那里找到原因。显然，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还没有完全摆脱某些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观念。正是这些观念，使得布尔什维克党革命前的理论和立于这个理论之上的宣传和鼓动，带有不少理想主义的色彩，而没有估计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党取得政权后，过去的理论依然保留了，现实却出现了距离，两者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反差。这样，在工人的革命热情浪潮过后，接着而来的，就是失望情绪的蔓延和工人对党的热情的下降。理论与现实的距离越大，失望就越大，不满就越强烈。从规律上说，过左的、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看得过于简单化的理论和主张，造成的就是这样一种客观效果。

另一部分原因，则来自当时工人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俄国是一个封建专制色彩浓厚的落后资本主义国家，这也不可避免地会在工人阶级身上体现出来，例如农民意识、急于求成的心态等。阶级斗争的激烈进行，社会转型采取激进革命的形式，都对这些局限性起了放大的作用。这种情况下，过左的、往往情绪化的东西往往比理智的思想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列宁在政权稳定后的转变之所以会遇到如此强大的阻力，其原因盖在于此。如，签订布列斯特条约被看做是卖国；实行一长制被看做是依靠小资产阶级来对付工人；使用技术专家被看做是对工人阶级缺乏信心；向资产阶级妥协；甚至在军队中起用有觉悟的旧军官也被看做与党的性质不符；等等。这是有可能改变历史发展方向的潜流。

这种历史局限性和潜流，在列宁时期并没有被清除，只是没有占上风而已。它为后来斯大林模式的产生准备了温床。

党 和 农 民

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党与工人的矛盾主要来自原有理论和当前实践的反差 那么 它与农民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

喀琅施塔得事件实质上体现出巩固了执政地位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农民之间的最初矛盾。当然 出于政治的原因 布尔什维克党没有承认这一点。俄共十大通过的决议把喀琅施塔得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叛乱。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也许是不得已的，但它也带来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党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执政的共产党究竟应当怎样对待农民？

在很长的时间里 列宁思想中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 就是在本质上把农民看成与工人阶级相对的非社会主义的力量。这和他把商品、货币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固有因素是一致的。在他看来 农民是资产阶级的可靠后盾。“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 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 而凶猛十倍 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 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 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这是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 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①1919年10月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指出：“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重新复活起来，同共产主义进行着极其残酷的斗

^① 《列宁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3版 第135页。

争。^①在这种认识的前提下，在党的建设方面，列宁对农民采取了极其审慎的政策。1917 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在农村只有 4 个支部 494 名党员；1917 年有 203 个支部，4 122 名党员（这时俄共已有 24 万党员），1918 年也只发展到 2 304 个支部，14 792 名党员。

当然，列宁也并非把农民等同于资产阶级。他更多地认为农民是既容易跟资产阶级跑、也有可能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阶级。争取这个阶级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布尔什维克党夺权之初，列宁就签署了土地法令，宣布立刻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付任何赎金，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连同所有牲畜、农具、农用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直到召开立宪会议为止。有人说，苏维埃政府的土地法令是抄袭社会革命党的。列宁却回答：“谁拟订的不都是一样吗？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群众的决定，即使我们并不同意。”^②这体现了列宁身上一以贯之的实事求是精神。

争取农民的工作并不因为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巩固而失去意义。相反，农民的向背，仍然是执政党地位是否稳固的标志。所以列宁指出：“或者是我们能在无产阶级政权支持下发展小农的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把小农组织起来；或者是资本家控制小农，——斗争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此。”^③在列宁看来，对农民阶级（特别是作为一个同盟阶级）应当采用争取、共存的方法，而不是采用消灭的方法。这样，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就不可能仅仅靠使用暴力，而是应当承认农民的利益，实现工人、农民等各种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长期和谐和协调。列宁最初无疑是主张用消灭（不是肉体消灭，而是摧毁这个阶级存在的基础意义上的消灭）手段

① 《列宁全集》第 37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第 2 版，第 269—270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0 月第 2 版，第 20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89 页。

的。但是 列宁是一个善于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概念出发来看待和解决现实问题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他看到这种手段实际上不可能达到目的时，就转而寻找其他途径，即共存。

新经济政策是朝这一方向思索的一个必然的逻辑的结论。列宁已经意识到 内战结束后的国内危机形势 反映的是布尔什维克党与农民的矛盾。“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①他在有关新经济政策的论文提纲中这样写道：“向政治转化。1921 年春天的经济转化为政治：‘喀琅施塔得事件。’”^②他指出：“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③“新经济政策对我们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能够检验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同农民经济的结合。”^④“其实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找到了我们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我们的功绩就在这里。不然，我们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人革命家了。”^⑤列宁从这个角度十分简洁地概括道：新经济政策就是“在过渡和接近的意义上适应农民”^⑥。

当然 列宁绝不是简单、笼统地对待农民。列宁非常明确地把贫农作为依靠对象，把富农作为打击对象。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对待中农。他著作中笼统提到的农民，实际上大部分指的就是中农。建国之初，列宁把中农看做摇摆不定的阶层，提出了同中农妥协、对中农让步、和中农联盟的口号。但随着战争和余粮收集制的推

① 《列宁全集》第 41 卷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50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1 卷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382—383 页。

《列宁全集》第 42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190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4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73 页。

⑤ 《列宁全集》第 4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74—75 页。

⑥ 《列宁全集》第 4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395 页。

行，中农利益受到损害。看上去这好像只是个政策执行中的偏差问题，实际上，却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而形成的对中农的偏见。列宁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在党的八大上指出：“怎样推翻资产阶级，怎样镇压资产阶级，这我们学会了，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怎样调整好与千百万中农的关系，用什么方法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我们还没有学会的，这点我们应当公开承认。”^①认识到与中农合作的重要性，党的八大确定了对待中农的基本原则：“俄共对中农的政策是逐步地有计划地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党的任务是把他们同富农分开，关心他们的需要，把他们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用思想影响的办法而决不用镇压的办法来克服他们的落后性，在一切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力求同他们妥协，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面向他们让步。”^②然而关键在于，确定的政策在实践中有许多并没有得到落实。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恐怕还是对执政党地位变化及其带来的功能变化的认识不清晰。

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左’情结

尽管列宁对党和农民关系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但就全党而言，面对工人和农民两大阶级，布尔什维克党内‘左倾化’的倾向仍然清晰可辨。

当 1921 年新经济政策被当做工农联盟的基础提出来时，党内许多人对改变对农民的立场感到迷惑不解。这一政策本身遭到了来自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强烈反对。有些人把新经济政策称为“富农方针”、“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认为它“带有强烈的富农分子

① 《列宁全集》第 36 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94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6 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14 页。

的味道”是“对十月革命的背叛”。就连接受了新经济政策的托洛茨基也用痛苦的口吻把它看做是党进入了“对小资产阶级投降的时期”。党内相当多数都是不情愿地接受新经济政策的。赫鲁晓夫是其中的一员。他甚至到后来还认为，新经济政策实质上就是恢复私有财产 恢复包括富农在内的中产阶级。与此同时 作为党员，他又表示拥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表露了自己这种矛盾的心情：“我们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了。很幸运 那时政治形势也很好。工人对党的指导路线有所理解 并且遵循这些路线。但是要我们自己适应新经济政策，却仍然是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①可以说，这种看法，在当时有相当的普遍性。布尔什维克党的不少党员都认为，党的共产主义方向改变了，党变质了，甚至觉得理想幻灭了。许多人干脆退党。根据官方数字 仅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的一年里 就有 14 000 多人由于不理解新经济政策而主动退党。甚至还有一些人以自杀来表示自己的绝望。当时的著名诗人勃洛克 还有皮达可夫的妻子 都是在这种绝望情绪影响下自杀的。一些思想上不能接受新经济政策的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竟为此嚎啕大哭。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前提下，新经济政策理所当然地被看做是向资产阶级的让步，是向资本主义的退却。也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前提下 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相当数量的人 怀着焦急的心情 盼望反击时刻的到来。

由于实施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发展被看做是资本主义的恢复和发展 随着这一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带来的矛盾 自然而然地就被看做是阶级矛盾的激化。1923 年俄共十二大就是这样认为的。大会通过的决议确认：“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经济关系，一方面使相当大一部分力量单薄的农民的发展遭到了困难，使群众一部分人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 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44 页

贫困化，同时使主要是中等的和富裕的农户开始发展起来。……这样的农户开始成为富农。随着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生活经济关系的发展，富农的比重日益增长。”这和列宁 1921 年的判断似乎很不一致。当时列宁只认为“全体农民几乎已经成为中农”^①。

由于实际上把农民看做异己力量，对农民进行剥夺的主张就能够在党内被堂而皇之地提出来，而且还得到不少人的认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就是典型的例子。“左”的认识是这一主张的思想基础。按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这一理论，在工业内部自给的积累开始之前，必须有一个最初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主要来源于“国家经济体之外”的大笔资本必须集中起来由国家掌握。被孤立的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选择余地很小，因此投资的根本来源只能是农民经济。应当把农民经济的剩余价值大量地初步地转让给国家工业部门，作为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解决办法。其手段，是通过工业和农业两个部分在市场关系中的“不等价交换”，来积累新的资本。国家工业应利用其独特的超垄断地位来实行“一种旨在剥夺各种私人经济的价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这个药方，后来为斯大林所实践，尽管斯大林也曾和布哈林一起反对过这种论点。

当然，也有一些人按照列宁分析认识问题的方法来思考党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例如布哈林。布哈林不反对消灭富农，但他主张用比较自然的方式。他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强调：“有些同志对农村的某些现象作出了正确评价的同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能用行政压制的办法把农民扣起来。前景应当是由于分化我们这里将出现资本家和雇农，阶级关系将日益尖锐化，事情终将完全不可避免地发展到我们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即采取

^① 《列宁全集》第 41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第 2 版，第 366 页。

强制剥夺富农的行动。”^①他认为，不需要现在就鼓吹使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尖锐化：“不现在我们这里是另外一种情况。我们应当通过经济途径来行事……我们这里是工人专政，但这一工人专政有农民阶级作为同盟者。工人专政在经济和文化上向农民阶级提供的援助越多，农民阶级就将越多地通过合作组织参与我们的共同体系，将越多地加入共同的文化。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差别就越小。总之，我们正在走向这种境界，即工人和农民的划分将变成劳动者的先进阶层和一些落后阶层的划分。”^②今天看来，布哈林的认识更接近真理。不过，从后来党的政策的转变和布哈林的个人遭遇看，恐怕可以说，党内多数更愿意接受的是激进的主张，而不是类似布哈林这样的温和的观点。

“左倾化”也表现在新党员的接纳上。相对工人而言，布尔什维克党对农民入党采取的态度和政策带有显而易见的歧视性：一方面对农民进行严格限制，另一方面又对产业工人的身份有一种近乎迷信的信赖。两方面的强烈对比，可以说是俄国党执政之初的一个重要特点。俄共中央 1924 年一月全会专门作出《关于接收产业工人入党》的决议，要求吸收 10 万名以上产业工人入党。决议明确强调：“被接收入党的仅限于产业工人。”由于大量吸收新成员，1924 年 5 月俄共（布）十二大已有党员 735 881 名，其中有 241 591 人是为纪念列宁而新入党的党员。‘这样靠成分和数量作为主要指标接纳的党员，质量究竟怎样，是可想而知的。在清党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也同样把成分作为采取不同的政策的依据。中央委员会在报纸上公开要求：对于工人，在呈交证件、鉴定方面应放宽些；对于农民，应严格区分富农和诚实的劳动农民；对于“摆委员架子的”和担任享有某种特权的职务的人应从严。对于旧

① 《布哈林选集》第 137—138 页。

② 《布哈林选集》第 96 页。

官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 应特别注意审查 对原属其他政党尤其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人，应进行最细致的审查和清洗。根据这一要求，在开除出党和退党的人中，工人占 20.4% 农民占 44.8% 职员和其他自由职业者占 23.8%^①。

如果客观地评价历史，就不能不看到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左倾化”情绪对后来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不良影响。从这个角度看 当代俄罗斯有些学者今天对那时的评价 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 但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例如，一个学者认为，“在评价布尔什维克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税收政策时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征税工作都反映出政权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相互不信任，政权机关对一些富裕的纳税人抱有敌对情绪。同时不应忘记，‘社会上的危险分子’（‘富农’、‘耐普曼’）不仅在纳税方面受歧视 他们丧失了公民权 选举权）他们及他们的子女不能成为有影响的社会组织的成员，不能在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中工作。因此从那些年的税收政策中可以得出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训：任何阶级歧视都会对经济状况产生极为有害的影响 并最终导致社会退化。”这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当时的政策带来的消极后果。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 注释 11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483 页。

第四章

集中化的党

由于执政，党的环境和任务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党的运行机制、活动方式和方法要不要进行相应的改变？综观布尔什维克党的自身建设实践，我们会发现，在这一时期，对这样一个似乎是提出也显多余的问题，这个党实际上尚不能作出系统的回答。党总体上继续沿用了十月革命前领导地下斗争时期形成的模式。其结果就是党内民主机制得不到确立，地下党高度集中的形态由于外部条件的变化演变成过度集权，使党的建设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列宁在世时未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大大增加了党的建设前景中的不确定因素。

集中：内战时期党的建设的主趋势

在准备夺取政权时期，列宁针对俄国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诸国的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基本原理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并根据这一学说，建立了在组织结构、组织机制和活动方式等方面都完全有别于其他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个政党的组织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具有“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列宁指出，集中制思想是布

尔什维克党的“惟一原则性思想，应该贯串在整个党章中”，是“《火星报》力求奠定的作为建党基础的基本思想”^①。

列宁对集中制的突出强调，显示了他对俄国国情的深刻把握，是符合俄国国情和俄共党情的。可以这样理解：列宁不反对民主的原则，与此同时，也强调在这个基础上俄共应当比西欧社会民主党在组织上更加集中。这是由俄共所处的客观环境决定的。列宁明确解释了当时党内实行集中制的极端必要性：“在专制制度下进行革命工作，无论在多大的范围内搞选举制和分散制，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并且简直是有害的。”^②当然，这种集中制不是卢森堡所指责的“官僚集中制”，而是民主集中制。列宁在给卢森堡的信中阐明了这一点。

取得政权以后，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内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国际形势却十分严峻。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包围、干涉和武装反抗，使布尔什维克党认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仍然是必要的。列宁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③（注意列宁在这里是把铁的纪律和全党的普遍信任作为两个同等的条件来看待的）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④这就是后来为斯大林所不断引用的那句名言。

基于这种认识，在这一时期，作为地下党活动显著特征的极端

① 《列宁全集》第8卷 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 第236页。

② 《列宁全集》第7卷 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 第9页。

③ 《列宁全集》第39卷 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 第202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3版 第135页。

集中制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比以前更有所加强。与国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相适应，俄共党内也采用了“极端集中制”的领导体制和“战斗命令制”的工作方法。党的机关实行精简，党中央有权解散任何地方委员会，干部的调配“全部由党中央掌握”，对应由选举产生的职务实行任命^①，上级机关的一切决议下级机关绝对必须执行。要求“在目前阶段党必须直接实行军事纪律”等。在1919年3月党的八大上建立了党的最高机关体系：选举了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其任务是对政治工作实行总领导。为了领导党的整个组织工作，通过了关于建立组织局的决定，并规定组织局每星期应举行三次会议。列宁对两个机构的相互关系作了准确的说明：组织局调配力量，政治局确定政策。它使集中和铁的纪律的要求能够很顺利地变成具体的行动。

列宁公正地评价了特殊时期党本身的军事化半军事化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内战是被推翻的阶级夺回失去的政权的尝试。执政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带领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捍卫政权，粉碎阶级敌人的企图。从这个角度判断布尔什维克党的自身建设，高度集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列宁为实现集中建立了卓有成效的机制。建立和改进中央委员会、建立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实际上都是俄共为党和国家的生存需要而采取的措施。没有这个机制，俄共就会被反动派扼杀。列宁就是这样认为的。他指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善于思考、正直、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②在这里，列宁在强调铁的纪律的时候也强调了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条件：工人阶级全心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3版，第134—135页

全意的拥护。

在强调集中的同时，列宁始终没有忘记这种集中应当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列宁指出，党的各级组织“是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成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必须向党员报告工作，可以撤换”；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的，“全体党员在选举代表的同时就整个组织所关心的有争议的问题都能人人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意见”^①。列宁提出了党内监督的任务。1918年党的九大决定成立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委员不得兼职。不过总的说来，在这一时期，俄共没有足够的机会来实施列宁所说的那套党内民主。而且往往由于极其复杂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还不得不对党内民主有所限制。列宁曾多次提到“形式上的民主对革命的适宜性”的问题，认为抛开实际去追求民主，就会走到错误的道路上去^②。

可见，由于巩固政权的需要，高度集中的党内体制和活动方式在执政初期的布尔什维克党内得以继续保持。集中制的加强，是内战时期党的建设的主趋势。只是应当指出，列宁在采用这样一些措施的同时，也明确强调其中大多数措施是与党的本质相矛盾的，是应急的、只具临时意义的，今后应当停止使用。

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党的建设两个支点

尽管实行极端集中制有它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合理性，对于一个掌握着权力的党，这种体制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消极的

①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249页。

②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67—268页。

后果。这些后果，随着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逐步巩固而逐渐显现。1921年俄共（布）十大指出了战时的集中制带来的弊端，认为“集中化发展了官僚主义化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战斗命令制往往采取被歪曲和不必要的压制形式，必要的特权变成了各种舞弊行为的凭借；党的机关必要的紧缩削弱了党的精神生活……这一切引起了党内的危机”^①。把问题概括为“党内危机”说明了这些后果已经达到的严重程度。

党本身出现的问题，根子在于：一方面，党取得了执政地位，另一方面，党的体制、机制、活动方式方法都还是过去保留下来的。这就造成了两者之间的不适应。如果说，在国内战争的情况下，这种不适应还被巩固政权的需要掩盖着的话，那么在转入和平建设时期的时候，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情况下，这种不适应就完全没有遮掩地暴露出来了。

和平建设的基本内容，就是实施新经济政策。它向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哪些问题？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同农民的妥协，是向商品、货币、市场的让步。它并不仅仅像它的名称所表达的那样，只是一个政策的转变（采用“政策”的说法本身表明布尔什维克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有局限性），而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寻找的一个新的起点。它必然暗含着各个领域的相应的深刻变化。这里面就包括了政治体制、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变化。实践的发展推动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的探索。但是，专注于新经济政策的操作问题的布尔什维克党，显然还没有太多的精力来设计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蓝图。

列宁正确地看到了党的执政地位给党带来的不可忽视的影响。正如英国学者伦纳德·夏皮罗概括的那样：“在国内战争时期和在人对人激烈仇恨的条件下把全部政权垄断在共产党手里是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 第566页。

一回事 在现在设想的同农民实现休战的条件下保持这种垄断 是又一回事,需要颇为不同的党的机器'^①。布哈林的说法也很有代表性。他认为 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布尔什维克党不再是“内战的党 而是国内和平的党”。国家不再主要是“镇压的工具”相反,它为“合作”和“社会统一”创造必要的和平条件^②。但是,列宁没有考虑改变党的体制和运作方式。他更多地把注意力倾注在完善政治机器上。俄共十一大决议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党在这个方面的基本思路:“新经济政策在很多方面给党造成了新的困难。由战时共产主义的条件转到在新的环境下进行工作,这在最初一个时期造成了极其纷纭复杂的关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政党和过去一样,无论如何不能容许敌视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获得组织自由。此外 鉴于资本主义必须要得到局部的恢复 党应当最积极地参加调整由此引起的各种关系。”根据这个思路 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的布尔什维克党的自身建设有两个支点:一是发展和扩大党内民主,二是继续加强集中。

在列宁看来,这两个支点是并行不悖的。由于党处于执政地位 又领导着工人和农民两大阶级 需要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 需要全党积极探索 因而需要在党内充分发扬民主 创造相对宽松的环境。党内民主不只是一种作风,而且应是探索正确道路的前提。布尔什维克掌权没有任何经验。通过“战时共产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一度曾是全党的共识。只是在看到这条道路无法走通之后,布尔什维克党才开始转向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本身也有一个探索的过程。1921年俄共十大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同时又维持着“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制。从该年夏秋开始 交换被

① [英] 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 东方出版社 1991年版 第237页。

② 《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第433页。

纳入商品市场关系的范围 新经济政策才彻底形成。但是 即使如此，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许多经济战略和实践方面的问题仍然没有搞清楚。也正因为如此，党内出现了各种意见的激烈冲突。很显然，意见的交锋对于一个没有过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党来说是正常的。而且 只有在各种意见都充分表达出来的前提下 才能逐渐摸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内战结束后党内民主的呼声日渐强烈 原因即在于此。

与此同时，党内集中的加强成为党的建设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为什么在党的根本任务转向经济建设、实行新经济政策也需要更民主、更宽松的环境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却进一步加强了集中？列宁有自己的独特思路。我们知道，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做是向资本主义的“退却”。既然如此 在他看来，“退却时最危险的就是惊慌失措”。所以 列宁认为 要保证退却不发生混乱 不变成逃跑 就必须强调集中和纪律。他指出：“在伟大的胜利进攻之后 实行退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退却的时候 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进攻的时候 即使维持不了纪律 大家也会自动向前飞奔 但在退却的时候 就必须自觉地遵守纪律 百倍地需要纪律 因为在全军退却的时候 它不清楚 也看不见退到哪里为止 看见的只是退却 所以有时只要有一点惊慌的喊叫 就会使大家逃跑。这里的危险是很大的。真正的军队在实行这种退却的时候，就架起机关枪，一旦正常的退却发生混乱 就下令‘开枪！’这样做是对的。”他强调，“正是在这种关头 退却要有秩序 要准确规定退却的限度，不要惊慌失措，这是最主要的事情”^①。在这里，列宁用军队撤退的比喻恰当地说明了自己对强调党的集中和纪律的思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列宁把许多措施都限定在“临时”、“应急”、“当前适用”的范围内。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第87、88页。

在这两个支点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作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尝试。

第一 扩大党内民主。列宁高度重视党内活跃的民主气氛 尊重党内不同意见。列宁本人是发扬党内民主的典范。他不赞成泛泛地谈论党内民主 但一旦有了条件 列宁就立即提出发展党内民主的主张。在他的倡导下，1921 年党的十大历数了战斗命令制和极端集中制的种种弊端 决定以工人民主制代替极端集中制 以使所有党员都能“积极地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且积极参加党的建设”^①。后来他还提出过一系列加强党内民主的具体措施，如在党员大会上要经常广泛讨论有关全党生活 从一般的到地方上的一切重要的问题 必须使党的领导机关的公开会议成为一种制度；加强党员对领导机关工作的经常性监督 等等。

在党的十大通过禁止党内派别存在的决议后，列宁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保障党内不同意见能有一个表达的渠道。他指出，“党在坚决反对不实事求是的和带有派别性的所谓批评的同时，也将继续不断地采取一切手段并试验各种新的办法，来反对官僚主义 扩大民主 发扬自主精神 检举、揭发和驱逐混进党内来的分子”。他建议“更经常地出版《争论之页》和专门文集 力求能就问题的实质来进行批评”^②。他强调应保护少数派的权利，认为对少数派保护的绝对保证是允许他们出版刊物。在列宁时期，党的领袖们之间对不同意见在报刊上进行争论的现象是司空见惯的。当时党的处境虽然困难，但由于探索的气氛浓厚，整个党显得积极、活跃、生气勃勃。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2 分册 第 49—66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1 卷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82 页。

关于上下级党组织的关系，也是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党的十三大决议明确了这一关系的基本原则，强调，“上级机关只有在下级组织公然违反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时，才能解散下级组织。在任何其他情况下，上级组织应召开相当的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来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或纠纷。在问题没有按照这种方式解决之前，下级机关不得停止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①。这一整套措施看上去很有针对性。当然，真正实施起来，问题就要复杂得多。关键在能否建立合适的机制。

第二，强调集中统一。为此列宁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禁止派别存在，推行任命制，加强中央机构权力，加强自上而下的监督等。和前者相比，这方面的力度要显得大得多。

禁止派别存在

在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情况下，列宁加强集中的一个最令人注目的行动，就是禁止党内派别继续存在。经常性的派别活动，是俄国党的一大特色。在俄国党的历史上，几乎围绕每一个重要的、有时甚至是不重要的问题，都出现过派别。

列宁对派别的认识是复杂的。他清楚地看到了派别斗争消极的一面，这是促使他下决心在俄共十大上取消派别的一个重要动因。例如内战结束后出现的喀琅施塔得叛乱表明，党内“工人反对派”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为叛乱者所利用。他们宣称不要共产党的集中制，“只有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管理权掌握在劳动阶级由改革了的工会所代表的手中，那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357页。

和国才能强大起来”^①。出现的这些现象使列宁认识到：“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即令是个别集团的代表人物满心想要保持党的统一，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②据此，俄共（布）十大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所有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③。

但是，列宁对派别的另一面同样有不同寻常的认识。很显然，他确信，党内的不同意见必须有足够的反映渠道，才能充分体现民主。而在没有找到这一渠道的合适形式的情况下，俄共党内由来已久的派别活动形式，仍不失为表达党内不同意见的有效形式之一——尽管列宁也看到这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形式。据米高扬回忆，在召开俄共（布）十大期间，列宁甚至组织了一次自己一派的严格保密的会议，连会议的请柬都是私下印制的。斯大林当时表示怀疑说，这个会议会不会被托洛茨基分子利用来指责列宁的拥护者搞派别活动。列宁和蔼地微笑着，开玩笑地回答说：“我是在听一个老练的派别活动分子在说话吗？”^④列宁甚至谈到：在正确的党内集团之间结成联盟永远是需要的，这应当是实行正确政策永远不可少的条件。他特别强调，应当尽量把派别中健康的成分和不健康的成分区分开来，认为“我们还不能十分有效地反对官僚主

- ① [美] 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革命的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226 页。
- ② 《列宁全集》第 41 卷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78 页。
- ③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2 分册 第 65 页。
- ④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 1980 年出版，第 168 页。

义充分贯彻民主制 因为我们还软弱无力 谁能够在这方面帮助我们 那就应当吸收他'^①。正因为如此 当梁赞诺夫在讨论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过程中提议应该在谴责派别活动的同时要禁止按不同的纲领进行代表大会的选举时 列宁表示反对 因为他看到 一旦在重大问题上发生分歧 按不同纲领进行选举是无法禁止的：“如果发生了根本的意见分歧 是不是能够禁止把分歧意见提交全党来裁决呢 不能 这是一种奢望 是无法实现的 因此我提议加以否决。”^②列宁还多次强调 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是“当前”所处时期的要求。他指出：“党必须团结 党内不容许有反对派存在——这就是从目前形势中得出的政治结论。”^③他强调：“现在不应当有反对派 现在不是时候 不管怎么说 现在需要的是步枪 而不是反对派。这是客观情况造成的 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④把禁止派别存在说成是形势所迫 这里面就暗含了某种不确定的东西：将来怎样？看来列宁似乎还不准备回答今后允不允许存在反对派的问题。

所以在动手取消派别之前 列宁本意是想找到一种替代的形式 以便在派别被取消之后 这种替代形式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列宁没有如愿以偿。不定型的构想 最后只是为设立《争论之页》这样的脆弱建议所体现。列宁最终想出的解决办法带有很强的人治的因素。如夏皮罗所说：“共产党领导人的善意、忠诚、自觉地履行他们的职守——这些就是列宁能够建议的全部药方。”

① 《列宁全集》第 41 卷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32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1 卷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101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1 卷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28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41 卷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36 页。

⑤ [英] 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 东方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258 页

有理由认为，列宁是预见到这项措施将会产生的消极后果的。所以，对于如何防止这条规定的滥用，列宁有一定的考虑。例如，列宁对派别所下的定义是非常严格的。他认为派别是“具有特别的纲领，力求在某种程度上自成派别和规定自己的集团纪律的集团”。这里面实际上包括了判定派别的几个主要条件：第一，有特别的纲领；第二，规定自己的派别纪律；第三，主观上认定自己是一个派别。虽然列宁没有讲这几个条件是选择条件还是必要条件，但从他的定义本身看，三个条件应当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作为佐证，列宁在世时，实际上没有把任何不同意见作为派别来处理。列宁对派别问题的慎重态度，表明他看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除了列宁，党内还有一些著名活动家对这个决议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有过估计。拉狄克说出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我投票赞成这个决议时，就感到它可能被用来反对我们，但我仍然支持它……在危险时刻，如中央委员会认为需要，让它对最好的党员去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吧……中央委员会即使搞错也不妨！这比目前存在的动摇性的危险要小些。”可以认定，大多数抱有这个想法的代表之所以在表决中对这个决议投了赞同票，除了出于对党分裂的可能性的忧虑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列宁的信赖。谁也不会认为，列宁会利用这个决议对党内同志进行镇压。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如果党的领袖不再是列宁，又将如何？夏皮罗对此有一段虽然尖刻、但不失明快的评语：“列宁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准备采用的方法是任何人也自愧弗如的。不过他本人在这过程中经常保留着某些理想主义的火花。他有一种不为权力腐蚀的天生的禁欲品质，他可以在做坏事的时候也联想到他所信仰的最终的善良目的。他像大多数理想主义者一样，对他的追随者

也抱有同样的希望。”^①然而，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达到列宁的品质、达到他的水平。

总的说来，在党内，对实施这一决议的消极后果有预见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多数人看到的只是它的积极意义。至于后来，斯大林把俄共（布）十六大《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作为“大棒”来无情地对付党内反对派，他们就更是无法料到了。

任命制的形成

如果说集中的加强并不一定意味着对民主的削弱，那么任命制肯定是一个例外。这里所说的任命制或委任制指的是对应该由施权对象选出的施权者采取由执行机关来任命的方式。所以，任命制是选举制的替代物。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种替代都是对民主的损害。

就社会民主而言，任命制损害的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国家权力的来源是人民，这是无可争辩的道理。党代表人民在革命中取得了政权，也只能根据人民给予它的、定期更换的委托书来治理国家。就是说，党应该每隔一个时期就向人民申请新的权力委托书。在操作方法上，它通过定期普选的形式来体现。这是为什么普选往往被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程度的指数的原因。用任命制代替普选，就搞乱了官员和人民之间的授权、责任关系，使党的权力来源变得不明确。

就党内民主而言，任命制损害的是党员的基本权利。党是有共同意愿的人们自愿联合而成的政治组织，党员是党的主体。党员共同讨论、决定有关党的活动的一切重大问题，包括党的各级领

^① [英] 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58 页。

导人。如果他们的地位和权利得不到体现，党员就会从心理上、乃至行动上对这个党产生异己感，最后疏远、离开这个党。毫无疑问，用任命制代替党内选举，必然会使党员逐渐丧失主人翁感，导致广大党员对党的机关和党的干部认同感的下降。

在布尔什维克党身上，这两种情况都在列宁时期就开始出现，尽管其中有大量不得已而为之的因素。

俄共党内和与国家关系中任命制的产生，有两个方面的渊源。一是传统。由于俄共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经常没有充分的客观条件实施党内选举，逐渐形成了委任制的传统。苏共自己也承认，“在我们党处于非法时期，党组织被迫保持完全的秘密状态，各级党的委员会都是通过从上到下的指定或指派的方式组成。”^①另一个渊源是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后的特殊国情党情。布尔什维克党是通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取得政权的。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党员人数少、地方各级党组织不健全。这是该党执政初期的一个突出特点。据统计，到 1918 年 2 月，已经建立党组织的只有 39 个省、52 个县、16 个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巩固政权，委任制就成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俄共掌权后，有相当一段时间处在国内外敌对势力包围和干涉的非常状态，党内民主仍然缺乏培养发育的良好条件，任命制也就继续沿用了下来。从列宁当时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这一思想。例如他指出：“目前的关键在于人才，在于挑选人才。”全部情况的关键不在于政治……而要挑选所需的人才，检查实际执行情况。”^②在他看来，“把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机械地分开是不行的”^③。为解决干部问题，俄共中央要求普遍建立地方党委会，同

《真理报》1952 年 12 月 7 日。

《列宁全集》第 43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08、109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3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19 页。

时选拔优秀的党员到苏维埃组织中去工作。1919年俄共(布)八大成立了与政治局并列的组织局,并设立了负责执行和日常工作的书记处。为此确立的工作总原则是:“组织局管调配人员,政治局管政治问题。”组织局和以书记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委员为首的书记处——负责组织工作。”^①俄共九大对组织局和书记处作了更加明确的分工:“把组织性和执行性的日常问题移交上述的书记处处理。组织局(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则对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进行总的领导。”^②这样,选拔和任命干部的职责就落到了组织局和书记处的头上。繁重的干部任命工作,使组织局显得十分活跃。例如,1919年4—11月,中央委员会开了6次会,政治局开了29次会,而组织局开了110多次会。而且,在任命干部的实践中,书记处的权力迅速扩大。俄共(布)八大实际上把组织工作的大权都交给了书记处。如组织局成员中无人表示反对,书记处的决定可视为组织局的决定。

俄共广泛采用了中央组织局和书记处直接委派和任命党和国家各级干部的制度。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决议确定:“党的工作人员的全部分配工作由党中央委员会掌握”。按照八大的规定,在所有苏维埃国家机关里,都成立了最严格地服从党的纪律的党组。在1923年俄共(布)十二大上,斯大林在代表中央作组织报告时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应当表现在把能够理解我们的指示并且能够忠实地执行指示的人安置在一定的工作岗位上”。“因此,登记分配局即中央委员会的那个负责登记我们下层和上层主要工作人员并分配他们工作的机关具有重大的意义。”它的任命范围不应只限于党的委员会,“必须毫无例外地包括一切管理部门和党赖以掌握我们的经济机关并实现自己的领导的全体工业指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 第593页。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 第30页。

挥人员’^①。这里表达的显然是全党的普遍共识，而不只是斯大林个人的想法。

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解散经选举产生的地方党组织，由委任的人另组班子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例如 1919 年和 1920 年，俄共中央两次解散了乌克兰共产党（布）经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另行任命了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并宣布，党员在没有得到俄共中央书记处正式任命的情况下不允许接受乌克兰党和政府的领导职务。俄共中央曾派斯大林参加了乌克兰共产党 1920 年的那次代表大会，会上斯大林对选举结果并未提出任何异议。1921 年 5 月，钢铁工人工会中的党员以 120 票对 40 票否决了中央委员会为这个工会的监察委员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央委员会却对表决结果置之不理，委派了一个由它自己提名的几个人组成的委员会。

干部任命制对巩固政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弊端。最主要的弊端，就是广大党员对作为“公仆”的党的干部失去了监督和约束，官僚主义和种种不良作风蔓延开来。党内许多人都起来批评党内民主的缺乏。例如捷尔任斯基在 1923 年 9 月中央全会上指出：“党的涣散、党内生活的窒息和任命日益代替选举导致了一场政治危机，并使党对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陷于瘫痪。”^②列宁对登记分配处的工作也是很很不满意的，认为它用“死气沉沉的官僚主义”“彻底败坏了”^③干部选拔分配工作。列宁后来越来越清醒地看到了这种“在特殊情况下”才“必要”的任命制的弊端，多次提出要以自下而上的选举制来代替它。为此，1920 年俄国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作出决议，强调：“在特殊情况下，对应由选举产生的职务实行任命在原则上是必要的，但同

① 《斯大林全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72 页。

② 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 70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 分册，第 5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第 419—420 页。

时建议中央委员会在分配工作人员时一般应以推荐代替任命”^①。党的十大通过的决议强调在配备党的干部时不允许损害选举原则，认为“工人民主制的形式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它的表现就是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决议要求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实行选举制，在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可以推荐制代替委任制，逐步实行选举制。“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决议通过以前，应开展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②党的十三大也确认，工人民主制“就是全体党员有公开讨论党的生活中一切重要问题的自由，有对这些问题展开争论的自由，同时，自下至上的各级领导人员和集体领导机构都应由选举产生”^③。可惜的是，列宁没有为此作出进一步的构想。而在实践中，委任制仍然顽固地存在。1920年书记处成立的推行任命制的两个重要下属部门——登记分配局和组织指导部恰恰是在党的十大提出要排除委任制后的1921、1922年全面开展活动的。和以往的公开任命相比，这以后的任命往往被称为“推荐”，表面上地方委员会的选举形式得到了保留。任命制演化成变相任命制。

这样，在列宁死后，党的火车开向了一个他本人都不曾料及的方向。

驾轻就熟的集中

还有三件事情与权力集中、加强纪律的趋势有关。

一是对党的队伍的整顿。

-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41页。
-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72—90页。
- ③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357页。

党手中掌握了权力，必然使大批投机者混进党内。列宁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布尔什维克政权越是取得成就，“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十分敌视整个无产阶级的分子涌进党里来的势头就会更猛烈”^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列宁设想了一些办法。首先，他认为，入党应当规定更严格的条件。他主张规定较长的预备期，例如一年半至三年。如果要缩短预备期，就应当有不少于 4/5 的多数同意，而且应当是在几个，不是一个党组织里都得到 4/5 多数的赞同。其次，列宁发起清党运动，清除已经进入各级党组织的不良分子。1921 年 8 月—1922 年 3 月的第一次清党中，共有近 16 万人被除名，占党员总数的 24.1%，这里面还不包括 3 个省级地方的材料。

二是赋予中央委员会开除自己委员的权力。

《关于党的统一》决议第 7 条规定：“如果有三分之二票数认为必须把某个中央委员降为候补中央委员或开除出党，那么这项措施就应当立即执行。”列宁是因为看到了党内存在分裂的危险，才建议写上这一条款的。所以他强调，这是一条特殊措施。在他看来，中央委员会是党的代表大会选出的机构，从理论上说，只有代表大会才能开除中央委员，因而这一条款并不符合民主集中的基本原则。列宁明确解释了这一点：“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时候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这是对它表示最大的信任，让它来领导。至于说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有这种权利，那是我们党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也没有容许过的。这是一种极端措施，只有觉察到情况十分危险，才能例外使用……我希望我们不去用它。”为了把这一决定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的限度，列宁当时建议不公布这一条文。“我们建议不公布第 7 条，是希望不用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9 页。

这一条。”^①

中央委员会有了开除自己委员的权力，但同时中央委员会自己的权力则被大大压缩了。由于有了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实际上被分散到了这三个机构中。1921年党的十大明确规定，中央委员会会议由以前的每月开两次变成两个月开一次。中央委员会权力的这一扩一缩，恰恰说明中央机关不受约束的权力的扩大。

三是党内监督的加强。

列宁主张扩大在俄共九大上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能。中央监察委员会必须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而且要“由党内最有修养、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能够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中央监察委员会应成为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在解决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问题时享有充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领导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的决定由中央委员会执行。要是中央委员会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之间有不同意见，就把问题提交这两个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解决。如果两个委员会还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则把问题提交最高一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②。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自己在党内和苏维埃中的职权的行爲，同破坏党内的同志关系、散布毫无根据的侮辱党或个别党员的谣言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破坏党的统一和威信的流言飞语的现象”^③作斗争。

不过，在设计监察委员会这个机构时，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那就是：监察委员会不是出于对权力进行监督的考虑建立的。当时的监察委员会主席索尔茨就明确强调：“监察委员会肩负着严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 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 第97页。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 第302页；《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记录》莫斯科1972年版 第337—338页。

③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 第70页。

肃而又重要的任务 谨防各种阴谋活动和派别的形成 并与之展开斗争。”^①从列宁的考虑中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迹象。列宁曾说：“监察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就是，对那些在苏维埃机关和党内的野心未遂而神经失常的所谓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应该建议采取关心和个别对待的态度，甚至往往采取一种给予直接医疗的态度。应该尽量安慰他们 以同志的态度向他们说明问题。”^②由此可见 监察委员会更实际的意义是要配合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防止和对付反对派。特别是党的十大通过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以后，这个任务就更加明确了。如 1922 年党章所说 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帮助巩固中央、区域和省的党的统一和威信’^③。把这个机构定位在“帮助”各级党委会上 就等于说 它不再是监督各级领导机关 在中央如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乃至中央委员会 工作的机构。所以 尽管从理论上说 成立监察机构是抑制高度集权的步骤 但从实际的效果看，它却加强而不是缓解了高度集中的倾向。到后来斯大林利用监察委员会打击反对派 压制不同意见 监察委员会就更成为党内权力斗争的工具。

综上所述 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既对党内民主给予强烈关注，又强调了集中。列宁显然是想把民主和集中都纳入正常的轨道，按照这个轨道来调整和修正民主和集中的内容。但同时应该看到 实践的结果 不是党内民主和集中同步发展，而是出现了失衡，主要是集中的方面大大加强了。其原因在于 所有提出的原则要得到落实 最终必须有相应的机制。俄共需要一个既能够使各种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又能在共识和为大多数

① [美]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革命的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258 页。

② [美]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革命的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268 页。

③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2 分册 第 226 页。

所认可的路线方针政策形成之后得到贯彻的机制。然而实际上，地下斗争和国内战争条件下形成的党的组织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原封未动 而这个体制又是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这样 党内就出现了越来越集中的趋势。

许多有经验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对党内集权给予关注。“民主集中派’的主要人物萨普龙诺夫批评中央集权 称‘你们同发号施令的领导人一起把党员变成驯服的留声机’认为长此下去 中央委员会也会由一个领袖取而代之：“甚至这里可能只任命一个独一无二的指挥官 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了。’不幸的是 这一点后来变成了事实。

列宁的最后努力

列宁在对党的前途忧心忡忡中离去。他给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留下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也留下了一系列有关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问题。

执政党是什么？执政党就是掌握了国家权力的党。权力是一个函数。这个新的要素的介入，使党处于一个全然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之中。权力既可以给执政党施展宏图提供条件，也可以给执政党带来困惑、难题，甚至会腐蚀执政党。其实 列宁去世前已经十分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对于党内不同观点的争论，列宁一直是持宽容态度的。但是 在党手中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情况下 这种争论可能会演变成许多因素掺杂在一起的权力斗争。对此，列宁也看得十分清楚。他甚至推测到，党的高层领袖之间的这种斗争，很可能会导致党的分裂。

这种状况，是身为党和国家缔造者的列宁极不愿意看到的。因此 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 列宁在他生命将息之际 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作了最后的努力。

首先 列宁看到 分裂的危险 ,一大半是由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造成的。“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 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 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所以,列宁提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 掌握了无限的权力 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 我没有把握。”^①当然 列宁这样做绝非偏袒托洛茨基,也不是刻意削弱斯大林的权力。他显然是想让两人的权力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以构成双方合作的基础。然而遗憾的是,列宁的良苦用心并没有为党的领袖们所理解。在列宁去世后的中央委员会上 讨论列宁政治遗嘱的时候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出于个人目的和政治上短视,极力支持斯大林留任总书记,托洛茨基则只好保持沉默。这样,中央全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手中的无限权力没有被削弱,在这方面导致党分裂的因素没有被剔除。

其次,列宁建议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把它增加到50—100人。列宁坦率地说明:“我不必向同志们隐瞒 我认为增加中央委员人数的重大好处在于减少中央委员会决策时的个人的、偶然的因素 为决策作更多的准备 更精细地检查在这些会议上作出的所有决定 从而使我们中央委员会具有更大的稳定性 就是说 既能保持它的工作的继承性,又能防止在这个机构与群众联系不够的情况下可能引起的分裂。”^②列宁认为 这样做 可以达到双重甚至三重目的 中央委员愈多 受到工作锻炼的就愈多 因某种不慎而造成分裂的危险就愈小。列宁强调 要吸收第一线的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 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 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 能够成为忠诚拥护苏维埃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 人民出版社 1987年10月第2版 第339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 人民出版社 1987年10月第2版 第437—438页。

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机关”^①。列宁认为，“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②。1924年5月召开的俄共（布）十三大接受了列宁的这一建议，将中央委员的人数扩大到53人。但是，这些被扩大进中央委员会的人不像列宁所设想的那样主要是来自第一线的工人，而是由斯大林主持的组织局和书记处挑选出来的基层干部。看来，由于领袖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列宁的意图，事情尽管做了，却没有起到列宁所希望的那种作用。

失去了高超的舵手列宁之后的苏共之舟，将驶向何方？

《列宁全集》第43卷 人民出版社 1987年10月第2版 第341、342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 人民出版社 1987年10月第2版 第337页。

第二编

传统党建模式的确立

在党的建设方面，列宁给党留下的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却又不完整的遗产。同时又可以说不，他留下了一幅未完的蓝图。继承这份遗产、继续这幅蓝图设计并把它付诸实施的重任，最后落到了斯大林的肩上。他不得不回答列宁没有回答的一系列问题，如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领导国家，怎样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等。在这些方面，斯大林并不只是简单继承。他有他的探索，有他的创新。但是，就像列宁曾经评价的那样，这个“只会炒辣菜”的政治厨师把它做成了一道辣菜。后来苏共乃至其他共产党经历的曲曲折折、风风雨雨，都和他建立的这套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五章

斯大林党建模式的确立

人们通常把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并被看做是惟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 叫做传统模式。在这个传统模式的基础上 也生长出了党的建设的模式。我们可以叫做传统党建模式。什么是传统党建模式 这个概念有三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 它是和被称为传统模式或斯大林模式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相匹配的党的建设的一整套体制、理论和实践 第二 它表面上与列宁建立的那种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模式一脉相传 第三 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都在一开始执政就全面地搬用了它，因而逐渐成为所有这些党发展的障碍和要改革的对象。

这个传统党建模式，是在斯大林时期确立的。

党内论争

列宁防止党内矛盾（特别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个人之间的矛盾）激化的尝试未能获得成功。就在列宁病情加剧的时候，这种矛盾和争论就开始变得激烈起来了。

1923 年 10 月，托洛茨基就党内民主问题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矛头直指斯大林为代表的

党的机关，认为党的机关的官僚化已经达到了闻所未闻的程度。他指出：“一个广泛的党的工作人员阶层已经形成并已分布到党和国家机关中，当这个阶层认为等级森严的书记体制就是能代表党的意见和作出党的决定的机关时，它已完全放弃了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至少放弃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的机会。在这个放弃发表自己看法机会的阶层下面是广大的党员群众，每项决定都是以要求的形式和命令的形式转达给他们。”^①托洛茨基的指责有许多是切中要害的。实际上正是列宁晚年对这个问题的强烈关注才使托洛茨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是，他选择列宁病重这个时机向当时已经控制了党的组织系统的斯大林发起挑战，又显而易见带有争权的性质。

支持托洛茨基的一些人跟着也给党中央政治局写信，后来这封著名的信被称为“46人声明”。以斯大林为核心人物的多数派理所当然地要起来反击。结果是，托洛茨基等人在10月底的中央全会上遭到谴责，他们的行为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客观上具有“派别活动的性质”、“派别分裂的性质”，使党的统一有遭受打击的危险并造成党的危机”。

实事求是地说，托洛茨基等人的主张在当时的确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党员的看法。由于过度集中带来的弊端日益明显，党内有比较强烈的要求民主的呼声。所以，尽管托洛茨基等人受到批判，1923年12月5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还是比较充分地表达了这方面的思想。决议表示要严格实施各级负责人员的选举制，特别注意支部书记应由选举产生；一切问题都必须交给全体党员讨论，更好地向全体党员报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省代表会议和全党代表会议应每两年召开一次，以使全体党员每年有两次发表意见

^① [美] 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革命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334—335页；《真理报》1923年12月29日。

的可能性；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反对党的机关和党的实际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歪风，处分那些阻碍党组织在实际工作中实行工人民主制原则（如限制会议上的发言自由，不按党章规定而限制选举等）的党的负责人等等。遗憾的是，这个决议实际上后来被看做是向机会主义分子的让步，不再被提起。

双方的争论并未结束。1923年12月下半月至1924年1月上半月，辩论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这次辩论最初似乎是围绕党的几个现任领导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进行的。后来，争论涉及党内民主方面更广泛的问题。出于斗争的需要，托洛茨基曾猛烈地抨击斯大林无限扩大机关权力的行为。尽管他有自己的目的，但从他的批评中，大体上可以看到党内集权已经达到的程度。托洛茨基指出：“不管战争时期的官僚主义在个别情况下具有何种畸形的形式，但它同目前的官僚主义比较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了。目前的官僚主义是在和平发展条件下形成的，党的机关不顾党的思想水平的提高，继续顽固地代替党考虑和决定问题。”^①纯粹的或者绝对的集中制是不能实现的，是同群众性的党的本性不相容的，集中制和党的机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目的本身。民主和集中是党的建设中的两个方面。任务就在于，用最正确的办法即最符合实际情况的办法把这两个方面平衡起来。这种平衡在最近一年里丧失了。重心被不正确地移到机关方面去了。党的主动性被贬到最低限度……通过削弱党的主动性来过分强调机关的集中制的做法使党内产生了一种不适感……大家几乎都认识到或至少感觉到党的官僚主义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人们发出警告的呼声。”^②托洛茨基警告：“党要求我们的制度中少一点官僚主义习气，有人则打算用党的统一的要求来抵消这个要求。如果党走了

① 《真理报》1923年12月29日。

② 《真理报》1923年12月11日。

这条道路并牺牲了党内民主这种最必要的生存因素 那么 除了加剧内部斗争和损害自身的中枢系统外，将会一无所得。如果对党本身都不表示信任，那就决不能片面地和以最后通牒式的口吻要求党信任机关。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对党、对党的自觉性和纪律性所报的偏执的官僚主义的不信任态度是机关制度中一切坏现象产生的主要根源。党……希望革新机关，并提醒它：它是党的机关 是由党选出的 它不应当脱离党。”^①但是，争论带有明显的人身攻击的成分。特别是越到后来，这种特点越明显。由于托洛茨基已经被定性在“分裂党的派别”上，党内听不进这种理智的批评。据苏共历次党的会议文献记载，每当托洛茨基或其他什么已经被看做派别领袖的人作类似的发言时，会场上总是伴随着“胡说！”“污蔑！”“滚下台去！”这样一些完全情绪化的粗鲁叫喊。

所以，辩论的结果，又是托洛茨基陷于孤立，承认错误。1925年中央全会批判了“托洛茨基主义”解除了他的主要职务 并决定继续在全党开展批判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揭露它的“反党”、“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性质。

托洛茨基两次挑战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党内斗争的完结。相反 随着权力越来越集中到斯大林为首的党的机关 特别是书记处的手里 党内政治力量失衡 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内斗争也一轮接一轮、一浪高过一浪地继续进行。托洛茨基的挑战失败后 原先与斯大林结盟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斯大林之间的矛盾显露出来。他们围绕组织问题和理论问题展开了论争。相互间的批评看上去是由于看法、观点的不同 实际上仍然是围绕权力问题进行的——季、加等人认为斯大林权力过大 需要限制 而斯大林则针锋相对。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在党的十四大上遭到失败。新反对派被定性为具有“托洛茨基主

^① 《真理报》1923年12月28

义——孟什维克主义的实质”而季、加等人被看成“是一些伪装得不高明的托洛茨基分子”。

两个失败的反对派不甘就此罢休 决定联合起来 共同对付斯大林。在 1926 年 7 月中央全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两个反对派捐弃前嫌 实现了联合。然而 联合没有壮大反对派的力量，倒是其显而易见的派别特点成了他们的致命伤。斯大林抓住这一点狠狠打击。经过一年多激烈的斗争，在 1927 年 11 月的中央联席会议和 12 月党的十五大上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首的一大批反对派分子被开除出党。党的十五大给他们的定性是十分严重的：“反对派在思想上已同列宁主义决裂 蜕化成了孟什维主义的集团，走上了向国际和国内资产阶级势力投降的道路，客观上变成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第三种势力的工具。”

其实 就党内这些辩论的内容讲 所涉及的问题都没有超出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范围。很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党的领袖们对列宁思想理解的深度和角度不同所致。其中的观点和看法，有的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也有的只是着眼点不同的可供选择的方案。这些问题包括 在苏联这样一个落后的、为资本主义所包围的国家 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通过什么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党专政”是什么关系？怎样概括列宁主义的基本内容？怎样估计党内状况和存在的弊端？怎样看待世界形势和世界革命？等等。在领导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的情况下，存在意见和认识的不同毫不奇怪，发生争论也在所难免。

问题在于处理矛盾和争论的方式方法。为了在辩论中取得胜利，双方都要极力证明对方的不正确。这就使得辩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如果说 在争论之初 双方都还能比较客观地探讨问题的话 那么到后来 就发展到都想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例如 在最初的争论中 斯大林等人承认托洛茨基不是主观上想分裂党 反对

有人提出的把他们开除出党的“割除”政策。但到后来 这种主张完全改变了。斯大林公开赞许使用极端措施。他宣布：“有人会说这是高压手段。是的，这是高压手段。高压手段在我们党的武库里从来没有被认为是不可用的。”^①在一次又一次的辩论中失败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不但被扣上了“反党”、“反列宁主义”的帽子 而且还被逐步降职、褫夺职务 直至最后“自绝于党”而被开除出党。连本性善良、最初不同意对反对派采取组织手段的布哈林，后来也同意采用组织手段。反对派对斯大林、布哈林为代表的多数派的攻击同样是变本加厉的 从批评党的机关的“官僚主义蜕化”到认为斯大林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思想路线，把他看做资产阶级和官僚主义的代言人。

争论发展到后来是如此失去理智，以致托洛茨基开始看到政治迫害乃至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的可能。“我担心你们正要像乌斯特里亚洛夫那样，即像热月派篇章那样来枪毙我们。”^②到 1927 年，这个问题已经成了公开谈论的话题。托洛茨基在党的会议上称：“斯大林为他们自己所提出的当前任务就是分裂党 清除反对派 使党习惯于肉体消灭的方法。”^③他预见到这种做法对党的肌体的危害：“组织上的恐怖制度不可能仅仅限于对付所谓意识形态上的异端邪说，不管这些异端是真的还是臆造的。这种制度不可避免地一定会渗透到 党 组织的整个生活和全部活动中去。”^④

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对派的失败带有必然性。这样说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 反对派反对的实际上不是个别人 而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利益。支持它的是高度集权体制的受益者。这一点，决定了理论论

① 《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 人民出版社 1954 年 12 月版 第 77 页。

《托洛茨基言论》下册，第 725 页。

③ 《托洛茨基言论》下册 第 825 页。

④ 《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第 396 页。

争背后隐藏的权力斗争的本质。二是，反对派的论点有时是正确的，但他们采取的方法却是过时的派别斗争的方法。这种方法已经被列宁所否定。正是这两条，使反对派处处被动，如同一个人要同一群手持冲锋枪的战士决斗，却又穿一副老掉牙的盔甲、手持长矛，无论如何也不能逃脱被击倒的命运。

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取得了胜利。通过把所有与之意见相左的领袖人物从政治上完全搞臭的办法，斯大林确立了他在党内的统治地位，结束了列宁去世后的过渡时期。斯大林成了列宁开创的事业的合法继承人。

斯大林党建模式的确立

斯大林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继续其对党的建设的探索的。所谓探索，首先是继承。斯大林的继承是怎样的一种继承？由于认识和水平所限，更由于党内斗争的极端化，决定了其理论的不可避免的片面性。他的继承带有很大的缺陷。和反对派一样，他对列宁的理解也受到自身素质的限制，总体认识没有、也不太可能达到列宁的深度，没有在列宁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许多重要方面还严重背离了列宁的思想，最终形成了集权的模式。或许可以这样说：斯大林更多地继承的是列宁党及其活动的外在形式，而不是其灵活、辩证的内核。

教条地、绝对化地对待列宁的思想，把这些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抛在一边——这是斯大林对列宁的继承的最大特点。关于列宁思想和斯大林思想之间的区别，德国学者鲁道夫·巴罗有一个十分准确的描述。他指出：“列宁采取的措施，是同当堡垒受到围困时为了生存而发生的残酷斗争相联系的，这种措施不应该在已经发生变化的新环境中，成为对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的无可挽回的限制。斯大林领导下的党，把列宁贯彻过的所有事情（如禁止派

别存在 (使党内不可能形成另一翼) 都一成不变地确立下来, 使早先的、最初的、适合于非常情况的结构形式固定下来。”^① 麦德维杰夫的说法也表明了类似的观点: “总括起来说, 斯大林并未破坏 20 年代初奠基的政治体制机制。因此, 他并不是推翻基础的人。但他发现、掌握并发展了体制中所包含并已付诸实施的东西中最不好的部分。”^② 斯大林主义是产生于我们的社会、我国和我们的体制内部的现象, 因此要把斯大林执政时期发生的事情同列宁执政时期的事情完全割裂开来是不可能的。革命与斯大林时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一次革命都会创造出几种可能性、几种选择、几种发展方案, 而斯大林主义则把其中的一种变成了现实。”

斯大林设计的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在外部特征上, 这种体制和列宁时期的党十分吻合。就党的建设方面而论, 反对派反对的就是这个体制, 而斯大林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屡屡获胜, 组织上依靠的也是这个体制。为了增强这个体制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斯大林采用了列宁的有关论述作为理论基础。1926 年联共 (布) 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引用列宁的话, 并把它作为“党的出发点”^③; 党的出发点是: “谁只要稍微削弱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 (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④。斯大林把列宁时期不得不实行的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的体制当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惟一模式。

① [德] 鲁道夫·巴罗:《抉择——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批判》, 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95 页。

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464—465 页。

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466 页。

④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3 分册, 第 244 页。

斯大林在他的著作中论述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经验时充分体现了这种倾向。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论列宁主义基础》和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两本书。

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列宁主义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被描述为有六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 它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 第二 它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 第三 它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 第四 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第五 它是意志的统一 是和派别组织的存在不相容的 第六 它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在这里面 除了集中、纪律、专政外，我们是看不到列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痕迹的。

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 斯大林概括了苏共党的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 第一 没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第二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如果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第三 如果不打垮那些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进行破坏活动的小资产阶级派别，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 第四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如果不同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打垮投降主义者，就不能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就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 第五 如果党陶醉于胜利而骄傲起来 不再注意自己的缺点 害怕批评 那也当不了无产阶级的领导者 第六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如果不同广大群众保持广泛的联系，不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疾苦，不向群众学习 那它就不能成为真正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在这六条经验中 我们同样感觉不到这个党是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既有党内民主 又有集中的党。

集权模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并不断发展和强化。它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变形，也导致了党本身和党的运作的重大变形。这个变形的过程是用沉痛的教训写成的，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第六章

党政关系的变形

在斯大林党建模式体现出的一系列变形中，最根本、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党和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变形。党被放到了权力体系中的不恰当位置，处在权力的直接腐蚀之下。这样的国家和党，不仅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控制，使官僚主义盛行，人民失去主人翁感，而且反过来损害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使党、国家和人民之间产生严重隔阂。正是党和国家关系的严重变形，引起了党群关系、党内关系等方面的异变，党逐渐失去了作为人民当家作主工具的功能。

异变的起点：不同的国家观

不能正确认识国家 就不能正确认识执政党的位置 不能正确认识党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个惟一的执政党来说，这是很危险的。斯大林时期党政关系的最大特点 就是搞混、搞乱了二者之间的区别。

社会主义的国家和以往社会形态的国家有什么不同？尽管斯大林在诠释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过程中大量地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语录 但是实际上 对于这个根本问题 二者在观念上

是有重大差别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忠实于他们思想原意的理论家往往把国家当做一个终归要消亡的实体来研究，斯大林则倾向于把国家作为永恒的现象来看待。按照马、恩、列的逻辑，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出现官僚主义集中制。因为社会主义是从下而上组织起来的劳动集体的自治社会，这样的社会不允许政治同经济分离，不允许出现同劳动者异化、不受社会监督的权力机关。劳动者集体担负起许多政治和经济职能，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生产者自己决定他们同意设立什么样的机构，保留什么类型的机构符合他们的利益。生产者关心的是怎样能少花钱而又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出满足自己的需要所必须的物质财富。做到这一点的先决条件是国家逐渐非政治化、国有财产社会化。这样就能真正实现“廉价的管理”。而从斯大林实践看，国家更像是一个无所不能、替人民包做一切事情的机构。在他看来，国家应当实行中央集权，由上层来管理，应当关心公民，应当乐善好施。

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党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就必然会被扭曲。我们知道，在党应当如何领导国家、党和国家机器的关系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上，列宁明确提出了党政职能分开的思想。诚然，如前所述，在具体实践中如何准确把握其关系，列宁也不是十分清楚的。我们已经看到，在一系列文章、著作中，列宁在论述党政关系时没有理清“领导”、“管理”、“总的领导”等之间的区别，并且坦率承认有时无法分清。这表明列宁对这个问题还在探索之中。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则是，由于没有明确的规则作指导，已经开始出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不过无论如何，列宁绝对不是从简单的党政分工或党的机关与政府机关共同瓜分公共权力的意义上提问题的。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党政分开”的提法。但是，他对“党政分开”思想的理解，不是离真理近了，而是离真理更远了。他实际上把党政分开理解为国家主权在党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划分。在他看

来，党政分开就是党来作决定，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团体来执行这些决定。斯大林断言“党管理国家”“党是政权的核心”^①。党的领导就是党的机关作为上级机构对政府进行指挥。“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②他强调在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专政，即党的专政。只是在这一理论前提下，斯大林才去谈论党不能代替苏维埃和群众组织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指示加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对这些指示的实行，再加上居民对这些指示的实行。”^③按照这一思路，党就是行使一部分国家权力的机构。这就注定了党和政无法分开，“党政分开”只能成为空洞的口号。实践中日益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与此密切相联。

斯大林也借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把国家看做有可能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他的说法是苏维埃的“作用愈增大，它们对党的压力就愈显著，它们就愈顽强地力图削弱党的领导，它们对党的反抗就愈猛烈”^④。但他开出的处方不是让社会（包括党）来监督权力机关，而是把国家的权力向党的机关转移。他强调党作出的决议、发出的指示和口号应“具有实际决定效力”“具有法律效力”^⑤。在党的十七大上，基洛夫还提出了一个历次代表大会都闻所未闻的建议：“把斯大林同志总结报告中的所有论点和结论当作党的法律来贯彻执行。”对这样一个显然非常可疑的建议，大会代表没有提出——确切些说，是没有人敢于提出——不同看法，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 第 417—418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 8 卷 人民出版社 1954 年 9 月版 第 36 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 8 卷 人民出版社 1954 年 9 月版 第 36 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 7 卷 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6 月版 第 142 页。

⑤ 《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 12 月版 第 58 页。

而是随即爆发出“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全场起立”。把领袖个人的指示等同于立法 带来的后果很快被实践所证明 权力没有被控制住，而是变成了不受任何制约的力量。

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一个论点的批注很能说明他在党和国家关系问题上的观念。托洛茨基认为：“党集中掌握总的领导权。它不直接参加管理 因为它的机关不适合做这项工作。”斯大林的批注是：“这意味着党不存在了。”^①很显然，斯大林在这里有自己的逻辑 党要体现它的存在 它的机关和各级组织就必须直接参加管理。如果说，斯大林在大量的著述中为了避免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直接发生矛盾而拐了许多弯子 从而显得含糊、不明确 那么可以说，这个批注道出了他的真实思想。

斯大林的这些思想和观念用来指导实践的结果，就是党的机关代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斯大林按照这些思想和观念确立了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模式，党通过行政手段全面控制国家和社会。从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起，党的机关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和影响。它们集中了越来越大的实际权力，同时又不受选举机关的监督。这大大促进了行政命令体制的形成，并且党自身也迅速官僚化了。如果说 在 1930 年以前，党的书记处还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了全面负责党员分配、但不干预对工农业的日常管理的传统的话，那么，在这以后，这个机关开始全面插手这方面的工作。1930 年，在苏共十六大上，卡冈诺维奇强调 党的现有机构完全不能满足对干部的需求，因为干部的需求大大增加。解决的办法是将组织分配部分分成两个部门，即组织指导部和分配部。组织指导部只负责确实是党的机构所需工作人员的分配，并监督地方党组织。分配部则负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分配。它分成 8 个处，负责国民经

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802 页。

济的各个部门 如轻工业、重工业、运输、农业、财政、计划和贸易。每个处专门负责本部门人员的分配工作。1934年又设想把各主要生产部门党的活动和管理工作全部集中到一个部门，书记处因而改组为9个部 农业部、运输部、工业部、计划、财务及贸易部等，4个国民经济管理部门和列宁主义宣传部、党领导机关部、两个行政部、特务部。1939年党的部门再度改组：一切人事工作集中在干部管理委员会，宣传鼓动工作集中在宣传鼓动委员会，保留了1934年管教育和管农业的两个部以及特务部，建立了事务管理部和管理下属党组织的组织指导部。在共和国一级，党的书记处也进行了和中央相适应的变动。到1952年书记处已经设有以下各部 宣传鼓动部 党、工会和共青团机关事务部 农业部 轻工业部，重工业部 运输部 计划部 金融贸易部 行政部 妇女部 学校部，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文化艺术部。有些地方还有工程部 建筑材料部 木材和造纸部 石油部和水产部^①。

这一系列的调整，都围绕党的机关对国家和经济管理机关的直接控制这个主线进行 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一个党包揽国家和社会一切事务的完整的体系。

“万能”的党政机关

要想知道党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包揽究竟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这可以通过无数俯拾即是例子来说明。

例如农民种地。在斯大林体制下，农民种什么，什么时候种，怎样种 什么时候收割等 都不是由农民自己、而是由党的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来决定的。国家通过法令的形式向集体农庄庄员颁

[英] 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 东方出版社 1991年版 第539页。

布的首要纪律，就是完成产量定额指标并把规定的数额上缴国家；只有在这前提下，才可以将种子及其他产品供给农庄庄员。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种子被吃掉。赫鲁晓夫几次建议应允许农民在把粮食上缴国家之前留下种子，均被斯大林否决。农民根本不知道国家拨给的种子的特性，对种地也就失去了积极性^①。

为了提高收成，乌克兰农民采用浅耕的方法耕田。浅耕的理论是由一位教授在萨拉托夫研究发展出来的。但浅耕操作曾被宣布为“违法”，实行这种耕作方法的人居然会被付之审讯，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被判处死刑。那位发明浅耕的教授本人就是因为其主张而受到了惩处，并被关进了监狱^②。

20世纪40年代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之间曾有一场关于春小麦和冬小麦问题的争论。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到斯大林的过细干预。在乌拉尔地区种植春小麦能够获得较好的收成。鉴于此，斯大林决定在全苏推广春小麦。但是，春小麦对于乌克兰这种气候和土壤条件的地方并不适宜。然而，当赫鲁晓夫对此表示疑义时，斯大林粗暴地要求他作为决议来执行。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赫鲁晓夫也因此惹怒了斯大林，而且差一点遭遇厄运。后来，尽管推广春小麦明显没有取得成效，却没有人再敢提出反对。只是由于赫鲁晓夫在战后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被斯大林接受时，才由斯大林亲自宣布，不再强迫乌克兰种植春小麦。

又如文化、教育、艺术、科技。和对工业、农业的干预相比，党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进行琐碎干预，更被看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撇开那些被认为事关重大政治方向的思想理论讨伐（如哲学上反对德波林学派的斗争，文学上对“拉普”的批判等）不说，这种干预甚至深入到一篇文章、一出戏。例如，1930年第6期《无产阶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页。

^②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46页。

级革命》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学术文章。该文在充分肯定列宁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错误斗争的功绩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列宁在战前对考茨基中派主义的危险有着某种程度的估计不足。就是这样，一个完全属于枝节性的学术问题，居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斯大林亲自著文，发表了《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对该杂志允许该文发表提出“坚决抗议”，并用“反党”、“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贩”、“伪造者”、“腐朽的自由主义”等大帽子，上纲上线，对文章的作者进行批判，还采用行政手段，对编辑部进行改组，对作者及与作者有关的学者给予审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解职等处罚。

对歌剧《伟大友谊》的处理也很典型。这是一部从内容上说平淡无奇的歌剧，和其他歌功颂德的剧作并无二致。但该剧在音乐方面作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探索。不知什么原因，这种探索触怒了斯大林。为了这么一部歌剧，1948年居然由苏共中央作出《关于穆拉得里的〈伟大友谊〉歌剧》的决议，谴责这部剧在音乐和结构等方面的问题。该剧的探索被断定有“形式主义偏向”，一大批著名作曲家受到点名批评。

类似的事情还很多，涉及面从社会科学延伸到自然科学的广泛领域。影响较大的如生物学方面的争论。苏共中央直接充当这场纯学术争论的裁判者，荒谬地判定李森科一方正确，代表无产阶级；另一方错误，代表资产阶级。大量的新学科，如遗传学、共振论、心理学等，都被宣布为伪科学，大批科学家随即受到迫害。

有时斯大林过问的事情之细令人不可思议。从某些方面看，他更像一个勤政的沙皇。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谈到斯大林曾亲自下命令建造现代化的收费厕所的事情，还是当做“工人阶级领袖”

的优秀品德来描述的^①。斯大林反对在莫斯科开设无轨电车，理由是他认为，无轨电车通过中央电报大楼门前的斜坡时肯定会翻车。当好不容易试车成功后，斯大林勉强同意了，但设双层电车的设想在斯大林那里则无论如何也通不过了^②。

党对国家、社会甚至私人生活的全面干预，使党成为矛盾的焦点。这无助于党的威信的提高，反而会导致对党的信任感的下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党无法保证不犯错误，不出现失误。如果说，在斯大林高度封闭的体制下，这种错误和失误还能被精心掩盖的话，那么，只要这个密闭系统稍微松懈，弊端就会奔泻而出，就像后来真的出现的那样。

错误的暴力导向

失去监督和约束的权力往往恶性膨胀，这几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斯大林政治模式最大的败笔，就在于以“党的领导”名义进行的专政，后来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命令制加恐怖的实施体系。党和人民实现目标的工具异化了，反过来成为压迫人民的力量。而苏共被逐出历史舞台，极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它的这一恶行，不愿再回到这种体制中去。

国家机器的异化，突出体现在斯大林培植的国家安全机构逐渐成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甚至党的机关也不能除外。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所在的莫斯科党代会就有这种情况。“提名为莫斯科市委和省委委员的所有候选人都必须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审查和‘批准’。中央委员会也好，就整个党来说也好，都不能再提拔自己的成员。在评价任何党员的工作，决定其是否能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93 页。

^②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95 页。

选任党的高级职务等方面，都只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话说了算。我们已习惯于这样一种信念，以为上述做法有助于地方党组织揭露钻入党内的敌人。”^①1937年夏，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一项特别决定，授予内务人民委员部以逮捕中央委员的临时权力。而在以前，逮捕一个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必须经中央委员会的批准。

至于国家机器的异化所达到的程度，反对苏联制度的西方敌对势力显然经常大加渲染和夸大事实不可轻信。但是对有些特殊人物的看法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例如，美国人约瑟夫·E·戴维斯这样描写道：“这里的恐怖统治令人胆颤心惊。全国上下都笼罩在这种氛围之中。秘密警察（往往于凌晨1点至3点）的夜袭使每个家庭都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一个人被带走以后几个月没有消息，再后来便销声匿迹了。”在餐馆服务中心，每天都能看到人们面带惧色，交头接耳，谈论着新的被捕者，新的判刑者，朋友间彼此牵挂。由此可见目前人们的心理以及恐怖统治的程度。^②戴维斯何许人也？此人30年代出任美国驻苏大使，回国后写了《出使莫斯科》一书。书中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表示了极大的好感，不但认为苏联对反对派的审判公正、可信，而且相信布哈林确实卷入了谋杀斯大林的阴谋活动，相信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德国的间谍。苏联外长李特维诺夫称他的书“向读者呈现的是准确无误、实事求是的历史纪实”。这个评语用到他对恐怖气氛的描写上，肯定是非常准确的。

在斯大林执政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反对“人民的敌人”的运动实际上接连不断，继“工程师—破坏者”案件（“工业党”审判案）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120页。

[美]约瑟夫·E·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第227、228页。

之后就是迫害农艺师—科学家 B. 格罗曼、H. 康德拉季耶夫、A. 恰亚诺夫等人(“农民党案件”)此后 M. 米留亭和 A. 斯米尔诺夫—H. 艾斯蒙特案件、“克里姆林宫案件”和“莫斯科案件”、“反对“民族倾向分子”的运动一个接一个地进行。在 1929 年的“乌克兰解放联盟事件”中，一批历史学家、科学院院长被打成“民族主义者”罪名是“在发展乌克兰语言学、术语学、正字法和字母表方面从事破坏活动”。这听起来已经是非常离奇了。随后的对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军队工作者、党和政府其他领导人的公开的和秘密的审判，1937—1938 年对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的大规模清洗（最后还有镇压政治犯（拉科夫斯基、斯皮里多诺娃等人）和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前夕和初期镇压军事领导人的运动，其罪名更是匪夷所思。战后又有对战争中苏军战俘的镇压。1991 年 6 月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说从 1920 年到 1953 年在苏联约有 420 万人受到镇压，其中有 200 多万人是在 1937—1938 年间被镇压的。如果仅凭这些数字还难以形成完整的概念，那么我们可以拿一个历史数字来作比较：“俄国 19 世纪在 100 年中由于政治原因被处死的有几十名，死在监狱里和流放地的‘政治犯’有几百名（最多几千名）。”

被公认能比较客观严谨地运用史料的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提供的数据被人们广泛引证。他认为，整个斯大林执政期间被囚禁人数为 1 200—1 300 万人。仅 1936—1939 年间进行的政治清洗就涉及 400—500 万人，其中 10% 的人被枪决。下面是这场肃反运动的一些具体数字：列宁建立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 15 名委员，在斯大林时期有 8 人被处决或病死狱中，1 人被逐出苏联。6 名元帅中有 4 人被处决；195 名师长中有 110 人被处决，220 名旅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81 页。

长中有 186 人被处决，海军舰队司令员只有 1 人幸存。航空国防委员会和化学国防委员会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清洗。

发生在布哈林身上的事情可以说明当时人们的恐怖心态。1936 年十月革命节前夕，布哈林已经受到谋杀的指控，处境非常艰难。十月革命节那一天，布哈林决定到红场去。但他不是作为苏共的领导人走上列宁陵墓的而是作为《消息报》的主编站在观礼台的一侧。这时，站在观礼台上的斯大林远远看见了他。过了一会儿，一个哨兵走过来。布哈林立即以为这是斯大林派来逮捕他的。好在哨兵向布哈林敬礼，并转达斯大林的口信：“布哈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请转告您，您站的不是您应站的地方，请您上列宁陵墓！”但是，12 月对布哈林的指控更加肆无忌惮，以致布哈林几次想开枪自杀。一天，一群内务部的人带着搜查证闯进布哈林家中。正要动手搜查，电话铃响起。原来是斯大林向布哈林问候，似乎他根本不知道布哈林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当得知情况后，斯大林生气地呵斥：“叫他们统统都滚出去！”搜查也就没有再继续进行下去。

有人说这是斯大林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有的人则为之辩护，说斯大林显然并不知情。就事情本身作出判断的确是一件不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部失去约束、走向极端专制的国家机器，通常是用人的鲜血作润滑剂，运作才会顺畅。而恰恰是这一点，使苏共的领导失去了道义的基础。在这方面，戴维斯的说法是正确的：“人类固有的尊严会产生对压迫的极大不满。任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无法补偿思想、言论的自由和个人感情上所遭受的劫难。”^①

应该承认，斯大林对实施恐怖、践踏法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说这一点有充分的依据。1934 年 12 月 1 日，根据斯大林的

^① [美] 约瑟夫·E. 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红旗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292 页。

指示，未征求政治局委员的意见，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作出了《关于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作若干修改》的决定 强调有关恐怖行动的案件应当在 10 天内完成审讯。审理案件时不准旁听。对判决不准上诉，不准请求赦免，判决一经作出立即执行。1937 年 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指示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对被捕者采用体罚手段。 1939 年再次要求必须采取这样的手段。他强调 体罚方式作为一种例外今后也应当采用 对于公开的和拒不缴械投降的人民公敌来说这是完全正确而可行的方式。

到斯大林晚年，他个人性格中的某些不健康的方面被高度集中的权力进一步放大了。斯大林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案件，来证明他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例如列宁格勒案件、医生案件等。这些案件的离奇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例如“医生案件”首先源于斯大林的疑神疑鬼。他曾经问过 为什么同一个医生给季米特洛夫和日丹诺夫两个人治病，这两个人都死了。在一次例行检查身体中，给斯大林检查身体的著名医生维诺格拉多夫发现斯大林的身体状况不好 于是在病历上写道 必须立即使病人完全停止一切活动。知道这一建议后斯大林非常愤怒，认为医生是想利用职务之便阻止他参加一切政治活动。为此，斯大林命令逮捕了维诺格拉多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件事发生后 克里姆林宫医院马上就出现了“揭发者”和“告密者”，一大批医学家被捕入狱。如果不是斯大林的死，那些被抓起来的专家和医生的命运将是十分悲惨的。

斯大林还亲自参与了某些恐怖事件的处理工作。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回忆起这样一件事情：“在偶然一次和父亲在别墅会面时我走到他房间里，正好听见他在和什么人打电话。我在旁边等着。电话里是别人在向他汇报 他听着。后来 他像下结论似的说了一句：‘好吧 汽车车祸。’我清清楚楚记得他当时的语气：不是提问 而是肯定语气 是答复。他不是问 而是提建议 汽车车

祸。……根本没有发生任何车祸。‘汽车车祸’是我父亲在别人向他汇报执行情况时建议的正式说法。”^①第二天，斯大林告诉女儿，他们的一个熟人因车祸死了。这件事对她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斯维特兰娜在斯大林死后离开了祖国，同时也彻底放弃了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使用暴力带来的国家性质的异化和党本身的异化，对党和国家与人民的联系产生的消极后果，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早在1920年列宁就深刻地指出：“以前的历次革命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工人靠强硬的专政不能坚持下去，工人不懂得单靠专政、暴力、强制是保持不住的，惟有掌握了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使用一切有这种经验的人才能保持得住。”^②

热衷于恐怖不是斯大林个人的爱好。布尔什维克党掌权之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与之合作。但当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与本党的主张发生矛盾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不但退出政府，而且参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由布尔什维克党的合作对象变成了苏维埃政权的镇压对象。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上，俄共党内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不同意列宁的签约主张。当同样反对和约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提出逮捕列宁为首的人民政府成员、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联合政府时，“左派共产主义者”中居然有人参与讨论这个建议，只是由于布哈林等人的坚决抵制才未付诸行动。看来，对暴力认识上的偏执和滥用暴力手段，是俄罗斯政治中始终存在的一个特点。它和政治民主不发达密切相关。

①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外文出版社《编译参考》编辑部印 第14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 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 第241页。

肆无忌惮的官僚主义

权力失去制约 必然导致腐败。苏共党内的腐败现象 发端于斯大林时期。

有一种说法认为 斯大林时期苏共党内没有腐败现象 或腐败现象非常罕见。这是有待商榷的。我们知道，腐败现象不单单是一种作风，而是附生在失去约束的权力之上的毒瘤。斯大林时期腐败现象不如后来严重 这是事实。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 腐败现象才像瘟疫般泛滥开来。但是，很难把这一点作为说明腐败现象和高度集权没有联系的理由。腐败本质上是权力的滥用。至于权力滥用以什么样的形式体现 则要依具体情况而定。一方面 在计划经济（即短缺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在物质生产还处于低水平的条件下，在货币甚至被看做是资本主义因素的条件下，腐败现象不可能表现为后来我们看到的那种权钱交易。另一方面 在斯大林个人独揽大权的情况下 这种权力滥用的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他个人的好恶。一旦失去斯大林的信任，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乃至物理生命都可能会完结。斯大林个人对腐败现象肯定是深恶痛绝的。这样，权力滥用就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出现，更多地要表现为其他形态 例如官僚主义、欺压群众、特权现象等。这是斯大林时期一个很大的特点。

利用国家权力为少数人服务，是斯大林时期最无可置疑的事实。斯大林时期 对党的各级干部，一方面实行高压政策 强迫服从、严厉镇压；另一方面 又许以种种特殊待遇。干部特殊化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了一个其利益和普通大众有别的官僚特权阶层。在这一时期，列宁时形成的配给制发展到了非常精细的程度。有各种各样的配给制 供家属用的 供职工用的 供人们在工作单位用的 还有几类专门供首长使用的 即

所谓的字母卡。作为补充，还有各种商品的购货证和票券。普通老百姓是绝对没有可能得到这些东西的。因此，把配给的和用购货证买到的酒类、衣料、鞋套、鞋类及其他各种杂物拿来进行投机倒把，几乎成了高中级干部家庭正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①。在这方面，前美国驻苏大使戴维斯有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他认为党和政府领导人的个人生活“无可挑剔”；高级官员中没有贪污现象，他们的习惯很简单。在克里姆林宫他们过着优越的生活，在乡村有自己的别墅，配有汽车和各种舒适的生活用具。他们非常注意避免炫耀。委员的工资据报道每月不超过 900 卢布，不过他们做什么事都不要钱。”^②如此“无可挑剔”！

这一时期，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之比大约为 1:50。其实，工资的差别不是最主要的东西。表面看，甚至可以说工人和行政人员在工资水平上实际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如果从特权的角度看，情况就大不相同。党和国家的官员有自己的特供商店、内部餐厅、豪华住宅、郊外别墅等。行政命令体制的加强不仅使行政人员数量增加，而且也使特权阶层扩大，出现了为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规定的各种不同待遇的等级制度。工作人员根据不同职务到不同的专门医院就诊。斯大林还在官员中实行“钱袋”（即中国人所说的“红包”）制度，即领导人员的工资附加款。其数量按职位高低从几百卢布到几千卢布不等。这笔钱装在信封里秘密发给，不上税，甚至交党费也不包括在内。部长级人员从这里面可得到 2 万多卢布，相当于 1960 年改革后的 2000 多卢布。这一时期机关工作人员的月工资大致为 270—600 卢布。连戴维斯也认为，在苏联“政府本身成了打上各种阶级烙印的官僚机构。如特权、高水准的生

①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11 页。

② [美]约瑟夫·E·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红旗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94 页。

活等等。实际生活表明，政府高级官员可以享受特别的高级生活服务，例如在克里姆林宫饭店为他们提供高级生活享受。这里从上到下都能发现阶级的迹象”。“党员构成了一个明显的特权阶层。”^①顺便说一句，在整个官僚阶层中，党的官员又居于它的上层。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要比一般政府人员的待遇更好些。1925年，党内官员的工资比同级政府官员的工资可高出50%。

甚至对苏联满怀热爱之心的法国著名文学巨匠罗曼·罗兰，在1935年应邀对苏联作了一个月的访问后也坦率地承认，“对党自身来说可能不知不觉地形成由久经考验的领导人、忠于党的技术工作者、各种先进生产者以及工人大军、集体农庄庄员大军和士兵大军的精英人物组成的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②。他观察到：“宫廷中的达官显贵即使应该得到这种恩赐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但人民却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空气（我想说的是住房）而进行艰苦的斗争”^③。看到这一切，笃信苏联人确实是“在为全人类更美的、最好的、灿烂的未来而工作”的罗曼·罗兰是很受刺激的。

当然，以今天的观点看，这点特权也许已经不算什么。但是，如果考虑到，一方面 是官员无所不在的特权 另一方面却有几百万普通农民饿死在穷乡僻壤 那么可以说 这种特权给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带来的冲击，绝不亚于今天的腐败现象。

实际上，因看到特权现象而对社会主义信念产生疑问的不仅仅是国外的旁观者，更主要的是本国的普通党员和群众。也就是从这里开始，以前形成的道德标准逐渐走向崩溃。“许多共产主义原则被迫放弃。至少是暂时放弃。‘无阶级’社会的设想在实

① [美]约瑟夫·E.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

② [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119页。

③ [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页。

践中已经或正在被摧毁。”

官僚阶层一旦形成并把自我服务作为目的，国家遭受巨大的浪费和损失就不可避免了。赫鲁晓夫在他退出领导岗位后经过反思，清楚地描绘了斯大林时期官僚机构已经具有的那种自我服务的性质：“每个庞大的行政管理机关总是要设法表明自己的存在是有道理的。为此，它炮制出一封封的电报，到处派出视察员，来来回回地重复电报中提过的事情，检查本部经费的使用情况，以及发出诸如‘只应喝煮沸过的水’等陈腐无味的通告。”

官僚主义的泛滥和官僚阶层的形成，不能不对党和国家的性质产生影响。至于这种影响达到的程度，学者们的看法不完全相同。苏联学者布坚科把官僚阶层看做一个独立的阶级，断言：“斯大林政权就其社会阶级本质而言是党和国家官僚的政权。”^③他论证说，这个政权从工人阶级政权蜕变而来，国家职能与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利益越来越分离，因此具有相对独立性并进而具有另一种内涵，即国家机关越来越受制于党和国家官僚以及斯大林上层统治集团的压力。官僚是由社会分工必然产生的，但官僚阶层的出现则由于权力失去监督，官僚脱离群众，如列宁所说，变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这就是官僚制的实质”^④。布坚科认为，以往对官僚往往笼统地否定他们的独立作用，认为他们“虽力求达到个人专制，但它终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⑤，这显然估计不足。另一个苏联学者布列特涅娃也认为，在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管理机关已经变成了惟一的、有无限权力

[美]约瑟夫·E.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

②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页。

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8页。

④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11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6页。

的支配者，因此也就是国家财产的实际占有者，国家管理机关甚至通过自己的指示、命令和规章，即通过企业的惟一行动指南的‘小法典’（绝不是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自己的所有权。于是官僚即国家管理机关中的公职人员就变成了一个实际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而城市和农村中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直接生产者则变成了一个实际与财产分离的阶级”^①。当然也有些学者仍然坚持不把官僚阶层看做独立阶级的观点。不过，无论哪种观点，多数学者都承认官僚阶层的存在。

官僚机构的自我服务与“公仆”论、“先锋队”论等官方意识形态形成巨大反差。只要搞好了和上级的关系，官僚是可以不向人民群众负责的。甚至可以不做任何事情。斯大林自己就曾经在1934年苏共十七大会上描述过他和一个地方干部关于播种的谈话：

“我问：‘你们的播种工作怎样了？’

他答：‘斯大林同志，你问播种工作吗？我们已经动员起来了。’（笑声）

我问：‘那末结果怎样呢？’

他答：‘我们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笑声）

我问：‘那末以后又怎样呢？’

他答：‘斯大林同志，我们有了转变，马上就会有转变。’（笑声）

我问：‘究竟怎样了？’

他答：‘我们那里有了一些进展。’（笑声）

我问：‘可是你们的播种工作究竟怎样了？’

他答：‘斯大林同志，我们的播种工作暂时还毫无头绪。’（哈

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2页。

哈大笑)”

斯大林是把类似现象作为干部工作的态度和水平来嘲笑的。但是 如果联系一下当时业已形成的体制 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可笑之处 相反 倒是使人感到深深的悲哀。

在斯大林本人是否搞特权的问题上，似乎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是 尽管斯大林在许多问题上犯了错误 但对待自己是严格的，包括生活作风、对待子女等方面。对此可以相信。但是，很难说斯大林对特权现象的泛滥没有任何责任。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回忆道：“他的生活全部由国家包干。每个月从苏共中央、国防部、部长会议以及其他由他当荣誉成员或象征性成员的机关源源不断寄来的工资口袋 他看也不看 就塞在抽屉里了。克里姆林宫住所里有一张这样的书桌。后来所有的东西运到了别墅，那里也有一张他从来不用的书桌。抽屉里放满了这样的工资口袋 等一塞满就不知把它们弄到哪儿去了。”^①此外 不可否认 斯大林在建立官僚等级制和特权制度方面 确实是有意识地做了许多事情。客观上造成了这样一种后果 服从和听话 便一切都有独立思考、标新立异 就有失去一切 甚至生命 的危险。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一个为斯大林做烤肉的高加索厨师长当上了陆军少将。每次到莫斯科，都看到这位厨师长的绶带和勋章越来越多。还有一个专门为斯大林的厨房采办酒类、烤肉用的羊羔和其他各种食品的格鲁吉亚人 在战争期间当上了陆军中将。

布哈林晚年正确地看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党和国家已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 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印 第 355 页。

经完全合在一起了——这就是全部不幸。’^①他看到了整个党和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开始从管理体制上寻找官僚主义的根源。他认为，无产阶级在改造社会和领导经济方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使用组织手段，这一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无产阶级过多地承担这种职能，那它就不得不建立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为了利用小生产者和小农等人的经济作用，就需要大批的职员和管理人员。要想以国家官员（不管你怎么称呼，事实上这就是国家官员）取代所有这些小人物，这就必然要制造出一个庞大的机构；而维持这个机构所需要的费用将远远超过小生产在自发状况下所出现的非生产性开支。由此得出结论：这种管理形式，无产阶级国家的整个经济机构不仅不能加速，却只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它将走向预期目标的反面。”^②

① 《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166 页。

② [美] 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革命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564 页。

第七章

难造“主人”

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初期，党和群众的关系是有裂痕的。出现裂痕的原因，多半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急于达到理想主义目标，而脱离了俄国劳动群众的实际需要。列宁为修复这道裂痕做了大量的工作。到列宁晚年，应该说，这道裂痕已趋消失。然而，到斯大林时期，试图用强制手段制造“主人翁”阶级的主观臆想，使这道裂痕不但复又出现，而且越来越深，导致了党和劳动阶级之间关系的严重变形。在高压政治下，这种变形或许不会以反抗和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却深深地埋下了后来危机的种子。

名不副实的主人翁

关于执政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 列宁讲得非常清楚：“只有当一个国家能运用政府机构的全部威力，把群众派遣到资产阶级当局想叫他们去的地方的时候，资产阶级才认为这个国家有力量。而我们的力量概念却不同。在我们看来，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

候 国家才有力量。”^①让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把国家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做——这就是列宁处理执政党和群众关系的基本立足点。

用这个描述来衡量斯大林时期的状况，就可以看出这时的党群关系离开列宁的思想有多么远。

斯大林时期党群关系的基本特点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越俎代庖 包办一切 缺乏对人民群众的起码尊重。这不但使工人和广大劳动群众对自己国家的主人翁意识日渐淡漠，而且造成党和群众之间的严重对立和隔阂。这种心理上的对立，都在后来的改革中转化为实际的不服从、对抗和反叛。

而且斯大林把劳动人民内部关系看做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他在一次批驳托洛茨基的观点时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统治要求由一个具有明确有效的纲领和不容争议的党内纪律的政党在无产阶级内部实行政治上的统治。结盟的政策在本质上是同革命专政体制相矛盾的。我们指的不是同资产阶级政党结盟，这种结盟根本不可能，我们指的是共产党人同那些代表着落后程度和偏见各异的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团体结盟。”他认为 这就是共产党“独占领导”的实际含义^②。斯大林就党群关系作过不少论述，其中大量论述是对列宁思想的正确阐释和发挥。但是在实践中，斯大林更多的是从统治者而非领导者的角度看问题。

这首先体现在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方面。

在斯大林时期，党和自己阶级的关系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斯大林指望 在把工业生产全部集中在国家手里之后 会出现工人工作热情的高涨。然而事与愿违。工作热情没有出现，倒是出现

旧《列宁全集》第 26 卷 第 234 页。

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802—803 页。

了工人劳动纪律松懈、劳动积极性下降的现象。这实际上是高度集权的工业管理体制使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无法体现出来造成的。但斯大林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他的着眼点在抓管理、抓经济核算制和强调一长制。希望通过加强管理来提高工人工作的积极性。

这当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少工人完全是带着给别人、而不是为自己工作的心态从事劳动的。于是 就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劳动生产率低下、质量上不去、消极怠工等。党的十六大指出了这一点：“在数量指标方面 工业的计划任务超额完成，然而在质量指标方面却始终落后的。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工业产品成本和建筑工程造价的任务 始终没有完成 因而降低了工业部门总的工作效果。”大会承认“，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工业产品的质量状况。当前 产品质量处于极其低劣的水平 偶尔还有继续下降的趋势”^①。这里谈到的，虽然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实际上反映的却是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存在的问题。由于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 和理论上应有的结果相比 这个关系并没有理顺。

从党和工会之间的关系上，也可以看出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出现了断裂的痕迹。

列宁曾经把工会设想成实现人民直接管理的一个重要途径。他不止一次地提出 工会“应该变为国家的组织”，“工会必然要国家化”。当看到这个设想实际上难以实现时，他才逐渐改变看法，认为工会不是管理机关 而是工人学习管理的学校 是党和国家联系群众的“传动装置”。内战结束后和托洛茨基的争论 更使列宁坚定了这一立场。不过 在列宁看来 既然工会无法起到原来设想的那种作用，那就不能把工会和国家机关混为一谈。在工会和国

^①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 2 卷 第 182 页。

家的关系上 列宁阐述了一个精辟的思想 工会要保护国家 因为国家是工人自己的国家；同时工会又要保护工人的利益免遭国家的侵害，因为国家是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国家。这个定位是十分确切的。他强调，工会的任务就是保护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甚至在国营企业中也是如此：“由于迫切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 使每个国营企业扭亏为盈，由于必然会产生本位利益和过于热衷本位利益的现象，这样做难免造成工人群众同国营企业的经理即管理人员或同企业主管部门在利益上的某种对立。因此，即使在国营企业中，工会也义不容辞应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 使之不受雇用他们的人侵犯。”^①应该说，列宁关于工会作用的观点至今看来都是非常正确的。列宁实际上是看到了国家作为管理者和工人作为劳动者之间存在的矛盾。

遗憾的是，斯大林把工会保护工人利益的职能完全撇到了一边，把服从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变成了工会的惟一职责。1929年4月，中央委员会对工会的职责作出规定，确定工会“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劳动纪律、组织工人阶级的生产积极性、组织社会主义竞赛方面 以及在对无产阶级的新的阶层进行阶级教育方面应该起决定性作用”^②。这样 在党变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之后 工会也就随之变成了国家的附庸 变成了党的传声筒 失去了联系群众的作用。

在和工人阶级的关系上 苏共的教育作用发挥得怎样 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以往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 要么不够 要么只是从较浅的层次上认识。其实，这里面有些深刻的内容并没有被挖掘。例如 共产主义目标怎样与现实结合 在斯大林时期 人民

《列宁全集》第42卷 人民出版社 1987年10月第2版 第367页。

② [美]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革命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出版社 1985年版 第49页。

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而且是有保障的。问题在于，苏共把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订得太近，想得太简单。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这种反差是后来人们对共产主义缺乏信心、甚至认为它是一种空想的重大原因之一。又如，如何克服工人阶级中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但这不等于它中间没有落后的成分，作为一个阶级不存在历史局限性。共产党的责任之一，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克服这种历史局限，而不是相反。利用工人阶级中间存在的落后意识和历史局限性来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政治任务，而不是靠激发他们的先进性来推动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前进是斯大林时代政治的一个很大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纵容和放大了工人阶级中间存在的落后的观念和意识。把追求平等变成了平均主义、大锅饭，把主人翁养成了不愿劳动的懒汉，都是非常明显的结果。在这种状况长期沉淀而形成既得利益的条件下，当需要引入市场机制、增强社会活力（手段是改革，拉大差距，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地位大不如从前时，这些人的失落感比任何人都强烈。对党的失望也最明显，就像苏共所显示的那样。

以上种种都表明，苏联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实在是名不副实。

定调：农民 = 资产阶级？

尽管苏共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存在不少问题，但最大的问题不是在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上，而是在党和农民的关系上。这和列宁时期遇到的情况十分相似。列宁已经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但是事实证明，要让列宁去世后的苏共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如果说，为了击败托洛茨基等党内反对派，斯大林还能和布哈林站在一起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坚

持和农民结合的方针 那么 在反对派被淘汰出局后 斯大林则逐渐离开了这个方向。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的斗争，主要围绕这个问题。

布哈林对共产党与农民的关系的理解，要比斯大林更接近列宁的思想。他正确地认识到 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 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少数。所以 在取得革命胜利后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无论怎样也必须与农民融洽相处，因为农民拥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占人口的多数。这个思想 没有跳出列宁关于“退却”的偏“左”的认识的范畴 但很显然 沿着这样的思路走下去 建立强大的执政基础是可能的。布哈林指出，“农民经济中戈比的积累为社会主义工业中卢布的积累打下了基础”。因此，应当鼓励农民搞私人积累，从而扩大乡村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并使农民增加可供销售的农业剩余产品。这一过程应通过流通来实现。“我们将通过流通过程 而不是直接通过生产过程达到社会主义 我们将通过合作社达到社会主义。”他用这个论点来说明坚持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在他看来 党的目标不是“贫困中的平等”也不是“削弱比较富裕的上层，而是……把较低的阶层提高到这一高水平上来”。他强调：“贫穷的农民社会主义是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只有白痴才会说 世上总会有穷人。”^①这相当于后来中国共产党领袖邓小平的说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和布哈林一起反对托一季联合反对派的斯大林，并不直接否定布哈林的观点。1927年8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发布的决议指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拒绝反对派关于用暴力剥夺余粮的荒诞的，预谋在国民经济发展中造成更多困难的蛊惑性的建议……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认为，这些建议实际上要推翻在列宁领导下由党制订的新经

^① 《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394 页。

济政策。’^①这和布哈林的观点是一致的。

但是，斯大林实际上很快就离开了这一立场。或许在他看来，在实践中用起来更顺手的不是布哈林的主张而是“左派”们的建议。

那么，斯大林是怎样解决党和农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呢？

一方面斯大林更倾向于抱住列宁早些时候的论点不放 即把农民作为应当消灭的阶级。他写道：“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可能用我国内部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②“我国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不是什么别的，就是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可能性。”^③“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在斗争进程中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本国的资产阶级。”^④既然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就等于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那么农民就是资产阶级——这是斯大林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思路。“在斯大林看来，农民只是渣滓。他毫不尊重农民和他们的工作。他认为要使农民干活的惟一办法就是向他们施加压力。”赫鲁晓夫如是说^⑤。

不能小看斯大林关于农民的观念。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观点是斯大林全部主要主张的基础。俄罗斯学者卡尔宾斯基对此作了有说服力的说明。他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全部实质都躲在所谓农民必然有“小资产阶级性”这一教条里。这一教条包含了他的主要论点，包括所谓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成功而不断加剧的理论在内。这一教条又派生出关于市场和价值规律的“资产阶

①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 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135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 8 卷 人民出版社 1954 年 9 月版 第 64 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 8 卷 人民出版社 1954 年 9 月版 第 231 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 9 卷 人民出版社 1954 年 4 月版 第 20 页。

⑤ 《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三联书店 1975 年版 第 186 页。

级性”关于一切国有的都比集体的好、关于阶级的利益高于全人类的价值等公理^①。

斯大林的观点深受被列宁批评的“左派”的影响。在斯大林时期，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列宁时期存在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左”的情结再度膨胀了。他们的思想没有跟上列宁思想的变化，始终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一些“左派”人士 1927 年表达了这样的观点：“2 500 万小农户是俄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根源。逐渐从这一大批人中间出现的富农阶层，正在重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下埋藏一个大地雷。”^②党内大多数人都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在党的十四大上 斯大林作了这样的估计：“如果有人向共产党员提出问题说 究竟党更有准备的是剥夺富农 还是不做这样做而去同中农结成联盟呢 我以为 在一百个共产党员中就有九十九个人会说 党最有准备的是这样的口号 打击富农。”^③应该说 这个估计是正确的。

在许多方面，斯大林思想上是和这类观点气脉相通的。1925 年俄共十五大通过的决议反映了这种思想。决议强调：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向前推进的同时，“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而来的特殊矛盾、特殊危险和困难也日益增长。这就是私人资本在其作用相对降低的情况下有了绝对的增长，尤其是把业务转向农村的私人商业资本更是如此；农村富农经济随着农村分化的加剧而日益增长；城市资产阶级也在日益增长，力图在经济上同商业资本主义经济和富农经济勾结一起来征服基本中农群众”。

要制止这种状况继续下去，除了放弃新经济政策，别无他途。从这一需要出发，斯大林开始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进行不符合列

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版 上册第 313 页。

② 《真理报》1927 年 11 月 2 日。

③ 《斯大林全集》第 7 卷 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6 月版 第 279 页。

宁本意的解释。他停留在列宁最早的思想，即停留在把新经济政策看做是向农民的让步和向资本主义的“退却”上。不但没有任何前进，而且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了发挥。斯大林宣称：“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谁不了解新经济的这种过渡性即两重性，谁就离开列宁主义。”^① 为了保持忠于列宁思想的外观，斯大林把新经济政策曲解为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退却阶段，第二阶段是进攻阶段。他把第一阶段预计得很短，认为到 20 年代末，退却阶段已经结束，开始进入进攻阶段。他强调：“新经济政策是党容许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并预计社会主义成分要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其实，新经济政策只是以退却为开始，但它预计在退却过程中重新部署力量并举行进攻。其实，我们已经进攻几年了，而且很有成效地进攻着，发展我们的工业，发展苏维埃商业，排挤私人资本。”^② 在 1929 年 12 月《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中，斯大林更进一步认为：“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集体农庄问题，过渡时期的经济问题，现在都有了新的提法。”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③ 斯大林这些话明白无误地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抛弃新经济政策是早晚的事情。

这就给党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定下了错误的基调。

① 《斯大林全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54 年 9 月版，第 302—303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54 年 9 月版，第 82 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 12 月版，第 151 页。

“ 贡税 ” 制度

果然到 1929 年 斯大林真的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了。

这一年 斯大林决定对农民重新转入进攻 因而被看做是大转变的一年和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这个新的转变时期的两个基本方面 就是高速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这两个方针 从经济上说是斯大林为国家发展提供的对策，从政治上说则是他为理顺党和工农两大阶级的关系下的重药。这里面 农业大转变的含义 主要是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富农阶级。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列宁确定的新经济政策和对待农民政策的基本思路。正是从这里，开始了大规模地剥夺农民和用暴力消灭农民的进程。

“ 贡税 ” 制度 是这个进程的两项基本内容之一。

何为“ 贡税 ” 简单概括 就是靠榨取农民、用行政手段逼农民拿出钱的办法来积累资金，发展重工业。斯大林对这种政策的解释是 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工业化 而工业化的资金 既然不能从国外得到，那就只能从农民那里得到。农民不仅应向国家交纳直接税和间接税 而且应该让他们购买工业品时“ 多付一些钱 ” 在出卖农产品时“ 少得一些钱 ” 这可以被看做是向农民征收的“ 额外税 ”、“ 贡税 ” 和“ 超额税 ”。斯大林的这套“ 贡税论 ” 实际上是被列宁批判过的“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 ” 的思路。这种观点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代表。他认为 只有剥夺农民 才能使工业发展获得必要的资金。

需要强调的是，列宁反对这种靠挖农民来发展工业的“ 原始积累 ” 绝不仅仅是发展经济的方法问题。列宁清楚地认识到 虽然这种方法有可能使工业得到迅速的发展，但其代价却十分巨大，甚至得不偿失 因为这会破坏工农联盟 使布尔什维克党与农民的关系大大恶化 从而削弱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换句话说 列宁关心

的是共产党的政权能不能长期巩固的问题。这体现了列宁思维的特点 每当对一个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时 都要考虑到国情民情 考虑群众是否跟党走。斯大林则不去想这一点。极左派那种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毛病 在苏共党内又一次发作了。不过这一次不是发生在反对派身上，而是发生在已经掌握了党和国家大权的斯大林身上。这注定对苏共的未来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具体操作中 农民经受的痛苦实际上远远不只是‘多付’和‘少得’的问题。因为规定农民要交的粮食 不仅仅是定额 还有所谓‘超额完成定额’。其含义 如赫鲁晓夫所说“，就是要由一位党委书记跑到集体农庄去 决定集体农民自己需要多少粮食 交给国家多少粮食。常常是连当地的党委也不能决定征收额，而要由国家来为整个地区规定定额。”^①斯大林要求农民把自己收入的一半交给国家，同时又把粮食价格压在成本以下。赫鲁晓夫描述了斯大林时期这方面的情况：“农民出售自己产品所得的价钱 比这些产品的成本还低。有时，甚至从集体农庄运送产品到国家收购站的运输费用也高于农民出售这些产品所得到的收入。例如，斯大林所规定的土豆收购价格简直是象征性的。一公斤土豆国家常常只付给三个戈比。”^②斯大林甚至对每一棵果树都征收特别税。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到的一件事很有代表性 有一次 赫鲁晓夫去看他在农村的表妹。这个表妹对他说 到秋天 她打算把自己的苹果树全部砍掉。赫鲁晓夫无比惊讶，觉得这很可惜。表妹回答得也很简单：因为她种的苹果不足以抵上苹果树按新规定应缴纳的税。所以 可以肯定 这种制度其实是战时那种余粮收集制的再度复活 只不过换了‘税收’的名称而已。

在实践中 对农民征税还使用了“阶级方法”对富农课以重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三联书店 1975年版 第180页。

② 《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三联书店 1975年版 第186—187页。

税对“贫苦农民”免税而对政权机关一贯指望的经营管理形式如集体农庄、土地共耕社、公社等实行特别优惠的征税制度。1929—1930年每一个农户平均需要缴纳的农业税税额分别是：集体农庄庄员 10 卢布 74 戈比，个体农户（“劳动”农户）18 卢布 9 戈比，富农 172 卢布 49 戈比。有关规定的明显特点是阶级歧视：不但向富裕农民和部分中农征收高额个别税，而且还有种种其他的限制，如取消他们的贷款和购买机器设备的权利。如果他们在市场出售自己的粮食，那么将以投机罪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取消选举权等。这种情况无异于杀鸡取蛋，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农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再度丧失。为摆脱沉重的税赋，也为了不当富农，农民们减少播种面积，宰杀和变卖牲畜，变卖机器设备，放弃经营，大批农民跑往城市。

虽然富农成了专政和被剥夺的对象，然而奇怪的是，苏共认定富农成分的标准却相当含糊。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和苏共轻率得令人吃惊。1927年12月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粮食人民委员米留亭指出：“什么叫富农，从根本上讲，至今分析这一问题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准确的定义，而流行的划分富农的方法是不准确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无法弄清富农的确切比例和人数。莫洛托夫在代表大会上说：“对于全苏联来说，确定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整个比例数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①米留亭主张“富农可以按以下特征划分：第一，使用雇佣劳动力；第二，看是否从事买卖，即将资本转化为货币，或者出租农具，靠他人劳动获取剩余价值。”^②如果翻翻列宁的著作，就会发现，这恰恰是列宁描述中农时使用的标准^③。人民委员会在1929年5月最后确定的标准是相

①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土地关系》第12页。

苏联《十月》杂志1988年第2期。

③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170—171页。

当笼统的：一是连续雇佣工人者（未规定人数）；二是使用动力设备加工农产品者；三是经营或季节性出租设备、房屋和企业者；四是出租动力机械者；五是从事贸易、放高利贷或充当中介人者。这就完全切断了农民扩大生产的可能，给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无情的打击。

带来消极后果的，不仅是对富农的重税，还有对“贫苦农民”的免税。显然，这是布尔什维克党政治上扩大自己在农村的社会基础的尝试。按照有关政策，1923—1924年免缴农业税的农户占全部农户的2%，1924—1925年这个比例提高到20%，1925—1926年已达25%。1928—1929年完全免税的农户占全部农户的36.7%（其中根据最低标准免税的占20%，根据折扣总量免税的占16.7%）。但是，“免税”政策的结果，看似赢得了贫苦农民的拥护，实际上却是这部分人的社会寄生性受到了鼓励。他们不愿发展自己的经济，或因害怕政府方面的惩罚措施而不敢这样做。因为如果他们上升为富裕户，就会使昔日的贫农地位丧失，从而丧失一系列的优惠和特权（特别还包括政治方面的权利，如受社会歧视，子女在上大学、参军等方面受到限制等），所以1924—1927年农村中很快出现了一系列消极现象：消费需求过剩，生产积累不足，农民经济分散化的速度加快，外出做零工和各种副业的人大量增加，而农业因此受到损害，用副业收入而不是靠出售农产品来支付税款的现象日趋盛行，最终导致粮食种植业发生危机，粮食市场解体。

无数事实表明，在经济领域实行歧视政策，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因为在这种政策的导向下，发展经济被认为是危险的事情，而一无所有却成了光荣的象征。斯大林时代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正如一个俄罗斯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这一时代的整个社会制度都浸透了无情的阶级排斥精神。资本被剥夺，消除了利用生产资料作为剥削手段的可能性，消除了资本主义

的主要社会内部对抗……于是使资本家置身于社会之外。在对待封建主方面也是如此。剥削者，即原先的一个统治阶级的成员……不仅被剥夺了自己原来的统治地位，他还被革除出苏联社会，像勉强可以忍受的脏物一样栖身于社会的不受重视的位置上……他不是从肉体上而是从社会上被消灭了。不是封号，也不是金钱，这些都化为乌有了，而是无产者和劳动者的称号打开了取得社会地位的道路”。

我们不必赞成他的立场，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他讲的事实。

农业集体化

错误的政策使危机成为必然。1927、1928 年苏联的农业状况很不好。粮食收购比往年少，不能满足城市人口的需要。出现粮食收购危机。从收成上看，这些年不是很差的。但“国家只能收到所有谷物的一半，只能出口二十分之一。而旧俄国曾出口 1 140 万吨谷物”。虽然从 1926 年开始恢复了粮食出口但到 1928 年实际上又停止了。1929 年粮食收购工作更加吃力数量比 1928 年又有减少。连莫斯科的面包都不能不间断地供应了。这危及到正在进行的工业化，成为一个影响到国家发展的问题。

发生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农民虽然要履行他们对国家和合作社机构的义务，却拒绝按照低廉的收购价格向国家出售粮食。斯大林却把原因归结为党组织工作不力和富农的破坏：“现已证明，我们在粮食收购工作中有三分之二的错误是由于领导不力造成的。正因为如此决定对我们的党组织狠狠施加压力给它们下达采取措施搞好粮食收购的硬性指令……私有者的富农利用我们组织的宽容和迟缓冲破粮食市场上的防线抬高价格并使农民产

① 《列宁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170—171 页。

生观望情绪，以致粮食收购工作更趋瘫痪……为了恢复我们的价格政策并取得重大转机，现在应该打击粮商和富农，应该逮捕投机商、富农和其他破坏市场和价格政策的人。”斯大林认为，粮食收购中出现的问题，根子在于农村中富农的存在。“只要富农存在，对于粮食收购的怠工就一定会存在。”他认为：“目前苏维埃制度是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基础上：联合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①。

在斯大林看来，苏维埃制度不能长久地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基础上。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搞集体化，而且单靠农业局部集体化“是完全不够的”。这就是斯大林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这一观点显然与列宁关于工农联盟、关于新经济与农民经济结合的思想是相矛盾的。但是，尽管布哈林等人正确地坚持列宁的思想，斯大林却不但一意孤行，而且故技重演，把布哈林等人的不同意见当做“右倾”、“资本主义倾向”、“反党路线”来批判，又一次以高压手段封杀了探讨的可能。全盘农业集体化，就是在这种氛围中进行的。

1929年下半年开始，农业集体化全面推开。大部分地方的党政和经济组织对仓促实现集体化没有思想准备，于是出现了搞强迫命令的普遍现象。农民中的组织和解释工作被对中农甚至部分贫农的粗暴命令主义和暴力所代替。许多州提出口号：“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不少农民受到不加入集体农庄就“作为富农没收土地和财产”的威胁。

在建立集体农庄方面，所有党组织都发疯似的承担了拔高了的指标，保证在短期内完成全盘集体化。莫斯科省计划从1930年至1932年年底的3年时间实施集体化，却要求工作人员1930年

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0页。

春季就完成任务；中央黑土区定了2年实现集体化的计划，却向工作人员提出了半年完成的要求。这样的例子，在当时俯拾即是。当然，对个体农民加入农庄，中央宣布的原则是自愿。但地方领导人们知道，要么百分之百集体化，要么丢掉党票。

普通农民则对集体化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莫洛托夫在晚年回忆起当时民间流传很广的一个笑话：有人问农民怎么治虱子，农民答：“在脑瓜上写‘集体农庄’四个字，虱子就全逃光了。”

农业集体化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推行这套政策的结果，是加剧了共产党和农民之间的对立。甚至由此引起了社会的反抗。因为这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对农民财产的剥夺。农民用杀掉牲畜来表示反抗。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牛的数量从6010万头下降到3350万头，马的数量下降了2/3以上。在哈萨克斯坦，畜牧业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牛从650万头锐减至96.5万头，羊从1860万只减少到130万只，马从350万匹减至30万匹，骆驼从100万峰减至60万峰。这使已经连续3年遇到危机的农业生产雪上加霜。

带来的这些后果，斯大林自己也是承认的：“我们从1月到3月收购了将近三亿普特粮食，当时收购的是农民的机动粮，从4月到6月我们连一亿普特也没有收购到，因为那时我们不得不在收成的好坏还看不清楚的情况下触动农民的防荒粮。但粮食还是必须收购的。于是重新采取了非常措施，产生了强迫命令、破坏革命法制、挨户巡视、非法搜查等等现象，这就使国家的政治状况恶化，给结合造成了威胁。”

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一些人对集体化的后果有所预见。例如赫·拉科夫斯基1930年写道：“问题在于集体农庄庄员将不是为自己而工作。惟一将在集体农庄不断滋生、成长和发展的新型

[美]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 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第273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7月版 第178页。

的集体农庄官僚。这种官僚主义将是形形色色的。……把农民各阶层（除明显的富农以外）纠集在一起的集体农庄将被官僚机构的钢箍从四面八方紧紧锁住。集体农庄将在各方面忍受贫困，然而作为这种贫困的抵偿却是出现为数众多的官僚们以及种种公开的或秘密的保护人。这再次证明官僚的社会主义又产生官僚证明官方文人硬说我们早已贴近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将是一个官僚王国。”^①事实都被这些话给言中了。赫鲁晓夫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农民当时的困境：“集体农民陷于最悲惨的状况。有些人一个工作日只得一个戈比左右——有些人可能一无所得。”

实现集体化后，苏共与农民的关系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应该说，斯大林始终没有改变对农民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不要说富农、中农就是已经进入集体农庄的农民斯大林也是视为异己的。这从斯大林不愿在农村发展党员可以看出来：到1948年年初只有1/3的集体农庄建立了党组织。即使到1952年10月召开苏共十九大时，总数已由于合并而减少到94 800个的集体农庄中，仍有约18 000个没有建立党组织。在已建立党组织的76 000多个集体农庄中，只有大约5 000个基层党组织拥有党员在25人以上^②。

这种情况下的党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联盟关系不如说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英国学者莱文有一段话讲得很好：“一种使农民无可靠收入的国家化、一种没有较高报酬或较高生活水准的高级形式、一种不靠农民小块自留地就养不活农民的集体制度——所有这些都是把理论上认为是先进的形式强加给它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若·亚·麦德维杰夫：《政治日记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317页。

② 《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187页。

③ [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544页。

们毫无准备的人民的结果。拥有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机械拖拉机站以及数量众多但不能信任的农民的庞大的农业部门成了这一制度的一个沉重负担，成了其基础之中的一个造成社会动乱和经济停滞不前的不稳定因素。国家的作用是剥削而不是鼓励发展，这必然要制造出一大批针对俄国社会大多数的、具有镇压职能的行政机器。”^①历史对违背规律者的惩罚总是显得如此深刻而无情。本来是想从根本上为经济发展解除一切束缚与桎梏，解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践的结果却是得到一个效率低下、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监视和控制、对他们的积极性进行压制的国家行政部门。本来是要寻找一种可以使农民一劳永逸地摆脱剥削和贫困的形式，事实上却是建立了一个缺乏内在动力、“主人”们感受不到主人翁感的高度集权体制的附属品。

斯大林不是没有看到这种情况。由于加入了集体农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骤降。对于出现的这种现象及其农民的想法，斯大林描述得非常到位：“个体农民必须亲自照料自己的经济，因为这个经济只是他个人的经济，他不能把经营这个经济的责任推到其他任何人身上，他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人可以指靠。当时个体农民如果不愿意挨饿，不愿意饿死，就得亲自照料播种和收割，照料农业劳动的全部过程。一旦转入集体经济，情况就根本改变了。集体农庄不是个体经济。集体农庄庄员现在这样说：‘集体农庄是我的，又不是我的。集体农庄是我的，但同时又是伊万、菲力普、米哈伊尔和其他庄员的，集体农庄是大家的。’昨天还是个体农民，今天已是集体农民的集体农庄庄员现在可以把责任推到其他庄员身上，可以指靠其他庄员，因为他知道集体农庄是不会使他挨饿的。因此，集体农庄庄员不像他过去经营个体经济的时候那样

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96页。

操心了，因为现在对集体农庄经济的关怀和责任是由全体庄员分担的。’^①但斯大林决不愿意得出结论说，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经济优于集体农庄经济。这是他无论如何不能承认的。所以，他只好要求提高领导者的责任心。结果是不言自明的：这对提高农民积极性毫无用处。

斯大林把造成危机的原因归于地方干部未能正确地理解和执行中央的政策。针对此，斯大林于1930年3月发表了《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对集体化过程中的某些过火行为提出了批评。就文章本身的内容看，斯大林的一些观点是很好、很正确的。例如他讲到要在集体化中坚持自愿原则，反对向农民使用暴力的行为。他批评那些对过火行为负有责任的人：“他们忘记了在和我们的阶级敌人斗争时，暴力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在对待作为我们的同盟者的中农时，暴力就是不可容许的和极端有害的了。他们忘记了：在解决军事性质的任务时，骑兵式的突袭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在解决集体农庄建设任务而且是联合中农来进行的建设任务时，骑兵式的突袭就是不适用的和极端有害的了。这就是在农民问题上发生错误的根源。”^②斯大林还讲到：“这些错误是由于我们在集体农庄运动方面迅速取得胜利而产生的。胜利有时能冲昏人的头脑。胜利往往使人产生过分的自负和骄傲。这特别容易发生在执政党的代表人物身上。尤其是像我们党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比的力量和威望的党。”相信法令、决议和命令万能的心理，在这里是很可能产生的。党的革命措施在我们辽阔广大的国家的某些角落变成党的个别代表的空洞的官僚式的命令手段的危险，在这里是很现实的。”^③但是实际上，斯大林的文章根本没能制止违背

① 《斯大林全集》第13卷 人民出版社 1956年4月版 第199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 人民出版社 1955年12月版 第178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2卷 人民出版社 1955年12月版 第186页。

自愿原则的做法。因为一方面，加速农业集体化是党的既定方针，是农村向社会主义根本转变的保障。这样的保障，当然实现得越快越好。人们不能冒失去这个保障的风险而去解决所谓速度过快的问题。另一方面，斯大林固执地认为，右倾危险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的主要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显然宁肯被人看做主观上渴望迅速进入共产主义而在客观上有些急躁的革命家，而不愿意被人看做对实现共产主义没有迫切愿望、贯彻党的指示不力的后进者。中国人所说的“‘左’比右好”刻画的就是这种心态。

暴力消灭富农

不科学的政策和方法导致整个社会的矛盾都激化起来。有的地方农民被逼无奈，出现了杀害共产党员的行为。暴力反抗强迫加入集体农庄的事件不断发生。仅1930年年初到3月中旬这段时间内，全国就发生了2 000多次农民武装暴动。只是在哈萨克斯坦就发生了400多次农民武装反抗，有的参加者规模达5 000人。

斯大林对党本身失误的反思浅尝辄止，却用他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认定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1928年他宣称“，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必然的尖锐化”，“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①。1935年斯大林更进一步强调：“必须记住，敌人的处境愈是绝望，他们就愈想把‘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垂死挣扎的惟一手段。”^②1937年他又宣称：“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7月版，第149—150页。

② 《斯大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14页。

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 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 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①根据这一理论，斯大林把党与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说成是党与富农的紧张关系，把事情归结为富农的反抗，把它说成是农业遇到问题的重要原因。因为“富农在目前条件下是不会自愿地、自发地交出充分数量的粮食的”。他强调：“在我国工业各部门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进行的恶毒的暗害活动，在农村中富农反对集体经济形式的凶暴斗争，机关中那些充当阶级敌人代理人的官僚主义分子对苏维埃政权的各种措施的总工行为——这就是我国的垂死阶级现时的主要反抗形式。”^②

对于阶级敌人的反抗 当然要坚决无情地予以镇压。所以 斯大林这套说法的结论，必然是诉诸暴力。虽然，在党的十五大上，斯大林也曾指出：“有些同志认为可以并且必须采取行政手段 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去消灭富农 认为下道命令 盖个印 就完事了。这是不对的。这种手段是轻而易举的，但决不会是有效的。我们应该根据苏维埃法制采取经济上的办法去战胜富农。而苏维埃法制并不是一句空话。这当然不是说不能采取某些必要的行政手段去对付富农。但是行政手段不应当代替经济措施。必须严重注意我们合作社机关的实践中在和富农进行斗争方面、特别是在农业贷款方面歪曲党的路线的情形。”^③然而 在实践中 斯大林却对农民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政策。这样做其实并不偶然。因为在斯大林头脑里 农民始终是异己力量。早在 1921 年斯大林就曾认定“农民是不会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采用强迫方法使他们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必需的”^④。按照这一思路 对农

① 《斯大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第 128—129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 12 月版 第 265 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 人民出版社 1954 年 12 月版 第 266—267 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 5 卷 人民出版社 1957 年 11 月版 第 7 页

民可以施用暴力。如此说来，用暴力对付富农，更在情理之中。

斯大林很快开始把消灭富农阶级的任务提上日程。斯大林命令把富农的财产没收，把他们的家庭迁往边远地区。1930年7月苏共十六大通过决议，“委托党的中央委员会保证今后仍然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真正做到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并在苏联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①。

斯大林热衷于采取粗暴简单的行政措施。1927—1928年冬天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对富农采取了非常措施，没收他们的余粮。而加大了税率的级差，则是排挤富农、消灭富农行动的具体体现。在实行集体化的地方，使用行政命令手段变得更加顺理成章。对完不成国家规定任务的地区，轻则停止供应商品，重则把地方干部送上法庭，或是把整个村子迁往边远地区。1932年在卡冈诺维奇的参与下，北高加索有16个村镇整个地被迁出北方地区。斯大林对稍有违规的行为都规定了极其严厉的惩罚。饥民因为偷集体农庄几穗麦，就可能被枪决，起码是10年徒刑。故民间称之为“五穗法”。司法人民委员克雷连科1933年1月在中央全会上大发雷霆：“有人公然抵制严格执行这项法令。有个人民陪审员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为四穗麦判刑10年，我实在下不了手。’这是一种从娘胎里带来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似乎判刑不该根据党的政治指示，而该根据‘最高正义’。”

在这种情况下，人道是没有任何市场的。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只消讲一件事就足够了。在消灭富农过程中，莫洛托夫委员会决定把5万户富农迁到北方边疆区。边疆区党委说，只作了接收2万户的准备，其余的，连无火炉、无油灯的工棚都没有造好。

^①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2卷第222页。

[美]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285页。

斯大林的答复十分无情：“这种说法是想推翻党已经通过的移民计划，中央无法同意。斯大林。”

惩罚固然严酷，农民的反抗并没有停止。不仅个体农民，甚至集体农庄，耕地的面积也缩小了。他们拒绝向国家交售粮食，把粮食埋在地里。于是斯大林又在集体农庄内下手。斯大林称，应当在集体农庄内部而不是外部寻找敌人。在这里，抄录一段斯大林关于如何寻找敌人的话，可以感觉到这种“寻找敌人”工作的规模和烈度。他指出，阶级敌人的面目已经改变。“人们在集体农庄外面寻找阶级敌人，寻找面貌凶、牙齿大、脖子粗、手持半截枪的敌人。”现在的富农和富农的走狗，现在农村中的反苏维埃分子，大部分都是“沉默寡言的”“和蔼可亲的”人，几乎是“洁白君子”。这种人用不着到集体农庄外面很远的地方去寻找，他们就坐在集体农庄里面，在那里担任仓库管理员、事务主任、会计员、秘书等职务。他们任何时候也不会说“打倒集体农庄”。他们“拥护”集体农庄。可是，他们在集体农庄里进行的怠工和暗害活动却使集体农庄大受其害。”^①这是在公开号召扩大暴力。他关于农村阶级斗争的估计，无疑对农村残酷无情的斗争和剥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于多数地区在消灭富农时把他们个人的非生产性财富也分配给贫农，农民头脑中那种把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的卑下意识被大大激发起来，这就使得所谓“富农”的范围不可避免地扩大了。麦德维杰夫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谈到这种情况。它指出一些村子把一系列中农当成富农来没收，理由是各种各样的。“例如，一个中农因为过去卖给同村人十几把镰刀而当成富农被没收了；另一个中农是因为出卖了自己的余粮；第三个是因为买了自留地；第四个因为两年前卖了牛；第五个因为卖了鞋底子；第六个因

^①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4月版，第204—205页。

为于 1927 年把谷草卖给合作社等等。”^①在这种情况下被冤枉、错划成分的农民有多少？仅举一例：当速成的农业集体化带来灾难性后果，斯大林发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提出批评后，苏共开始纠正过火行为。在这过程中，为错划的富农摘帽，被摘帽者竟达农民总数的 15%，而苏共对富农数目的估计，最高时也未超过 4%。在许多地方，被当做富农剥夺财产的人达人口的 15%，被褫夺选举权的人达 15%—20%。据官方计算，全国的富农户有将近 100 万个。仅仅一年之中，就有近 300 万“富农”及其家属和“富农的帮手”被流放到遥远的边疆地区，其中一部分人被枪毙，几万人被送到集中营去消灭。凡是靠自己的劳动或儿孙们的劳动积攒起富裕家产的劳动者，甚至是接受了富农宣传的雇农，都被划入“富农的帮手”这个范畴。另一个含糊的标准是雇工。只要雇用工人，就经常可以成为“没收富农财产”的理由。然而，在当时不同季节里使用雇工的不仅有富农和中农，而且还有因种种原因不能耕种自己土地的贫农。

大饥荒的惩罚

强制性的收购政策和集体化政策，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急剧下降，最后终于结出了可怕的果实。1932—1933 年，乌克兰歉收，斯大林动用警察和国家安全机关强行收粮，致使 400 多万人饿死。哈萨克斯坦有 230 万人死亡，另有 90 万人因不堪忍受饥饿和被硬性改变生活方式，迁往中国、蒙古、阿富汗、伊朗等国。这次饥荒蔓延到包括农业人口达 2 500 万的广大地区。后来的作家们描绘了这次饥荒的可怕情景。我们可以引用一段麦德维杰夫在《让历史

^① [苏] 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60 页。

来审判》一书中引过的文字来感受一下当时的情况：

“粮食往外运 运粮时 白天黑夜到处是尘土飞扬……人们六神无主了 连牲口都变得野了 总是恐惧 乱吼 狗半夜里 唔唔地叫。土地龟裂了。后来秋天来了，不断下雨，接着是多雪的冬天。没有粮食 在区中心也无法买到粮食 因为实行粮食配给制。在车站货亭里也买不着面包，因为武装的哨兵不让进去。不用购货卡的面包不供应。

“秋天起大家开始吃土豆 没有面包 土豆很快吃完了。圣诞节前开始屠宰牲口 没有什么肉 全是骨头。当然鸡也全杀了。肉很快就吃完了 但是牛奶 一滴也没有了 全村一个鸡蛋也见不着。而主要是没有粮食，颗粒没有剩，全拉走了。春播没有办法进行，连种子全给拉走了。希望寄托在秋播作物 现在是在雪底下 春天还没有影子呢 可是全村饥荒已经来临。肉吃光了 黍米吃得一干二净，人口多的家庭土豆也吃光了。一片恐怖。母亲们看着孩子，怕得喊叫起来……怎么办？……夜里醒了，周围静悄悄，没有人声，也没有手风琴声。活像坟地一样，只有饥荒满村转，不睡觉。孩子们从早就哭个不停，要吃东西。母亲们给他们吃什么？雪？谁也帮不上忙……但是冬天真正的饥荒还没有到来。当然大家没有精神了 因吃土豆皮肚子鼓起来了 但是还没有全身肿。后来从雪底下挖起橡实子 把它烤干了 磨坊主人大转他的磨盘 把橡实子磨成粉 烤成面包 正确地说是烤成饼吃。橡实子面比大麦面还黑，但这也很快没有了。橡树林很少，两个村子都涌到这里来了。可是国家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发给饥民，他们吃的可都是农民种的粮食。难道斯大林不知道这些？所有的道路都设有哨卡——军队 民警 保安部门 不让饥民从农村出来 城市进不去 车站周围都是守卫队 连小车站都有守卫人员……

“开始融雪的时候 全村真的全挨饿了。小孩不睡觉 连夜里都要吃的。人们的脸如土色 眼睛也昏了 和喝醉了一样……饥饿

在折磨人们。人们已不多走路，总是躺着。他们有着幻觉，好像车轮响了，斯大林从区中心送面包救孩子们来了。妇女比男人更能坚持，活得更顽强。可是她们的负担更重——孩子们向母亲们要吃的。有些妇女亲吻着孩子，劝他们说：‘呵，忍着吧，不要喊了，我从哪里弄吃的来？’另一些妇女和疯子一样，骂孩子：‘别叫，弄死你！’她们随手拿到什么就用什么打孩子们，只要他们不再要吃的就行……猫狗全没有了，全杀了。把猫狗也煮了，煮了头做肉冻吃。雪融化了，人们饿得全身浮肿，脸肿了，腿和枕头一样，肚子里浮水，不断小便，都来不及到院子里去。孩子们的头像铅球似的，脖子细如同仙鹤，能看得见手和脚上的每块骨头在皮肤下面活动，整个骨架子好像被黄色纱布包起来一样。小孩的脸衰老不堪，筋疲力尽，和七十岁的老头一样，青春时期已不成为脸了，不是人的脸，只有眼睛，上帝啊，斯大林同志，我的上帝，你见过那样的眼睛吗？也可能，他真不知道，他不是写了一篇关于冲昏头脑的文章吗……

“全村一个接一个地死亡，起初是小孩和老人，后来是中年人。一开始还埋起来，后来也不埋了。死人就在街上，在院子里，最后的人在房子里扔着。全村安静了——全死光了。”

麦德维杰夫还引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中农由于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和反对上面派来的全权代表而被判刑 10 年。村里的民警不愿意，也没有时间送他到监狱去，他就收拾了行李自己一个人去。表面看他是对自己的命运无所谓，实际上他有自己的农民的聪明打算：在监狱里他不至于饿死。事情已经严重到这样的地步，苏共如何使农民相信，它还代表着农民的利益？

列宁确立的新经济政策的本质，是利用市场关系，建立共产党

与农民之间的正常关系。但是，这个过程由于斯大林发起“社会主义的进攻”而被破坏了。农民获得土地（即使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不属于他）便会迸发出骇人的干劲来推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斯大林却用国家权力的利刃生生地把农民和土地割离开来。农民在失去了土地的同时也失去了积极性，失去了对共产党的信任。可见，斯大林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是以党和群众关系的严重对立为代价的。伴随重工业基础的迅速建立，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也大大降低了。对于共产党来说，这种代价得不偿失。

第八章

党内集权：体制和活动方法

党内关系的状况，是检验一个党是否真正有力量的重要指数。如果拿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的党内关系状况作个比较，就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重大区别和反差。在斯大林时期，党内民主逐步消失，确立了高度集权的体制，同志关系逐渐被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等级关系所替代。党内关系的这种严重变形，使党由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们组成的党蜕化成了一个由惟一的至高无上的领袖独断专行的党，由一个充满探索精神的党蜕化成了一个故步自封、墨守成规、垂垂老矣的党，由一个为人民大众的党蜕化成了一个官僚主义的党。以后的改革和垮台，都应该从这个事实出发来理解。

党内民主的消失

斯大林时期党内机制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缺乏民主。

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对任何一个政党来说，都关系到党的长远存在和发展。在当今时代，各种类型的政党都特别重视党内民主，道理即在于此。自然，党内民主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在党执政的条件下，党内民主还关系到社会民主的健康发展。列宁本人是遵循党内民主的典范，而且十分看重民主。

对于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如前所述，在列宁在世的大部分时间里，充分实施民主、从制度上保证党内民主的条件是不具备的。而且往往由于极其复杂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还不得不对党内民主有所限制。党内极端集中制几乎横贯整个列宁时期的党的建设实践。

斯大林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捍卫了列宁阐明的一些基本原则。但是他没有看到列宁的比较完整的、把夺取政权作为首要目标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和他的比较不完整的执政党的建设思想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这就在捍卫它的同时也把它教条化了。列宁建党理论中关于集中的思想被从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剥离了出来。我们知道，列宁是把极端集中制（他也称为战斗命令制）严格规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内战争条件下的。而斯大林时期这一概念则大大泛化，极端集中制被看做共产党执政的固有特点。到了20世纪50年代，甚至有人明确地把极端集中制说成是党达到最终目标的组织手段：“实现根本改造社会的任务要求在共产党的整个组织机构上实行最严格的集中制。只有集中的组织才能有计划地领导工人阶级为消灭资本主义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革命斗争。”后来斯大林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者进行压制乃至肉体消灭，实行个人专断，导致个人迷信盛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重大损失，都同这种过度集权的党的建设模式有关。

斯大林把列宁时期不适宜发展党内民主的特殊情况当做无产阶级政党的固有本性继承下来，就使缺乏民主成了一种常态。例如，斯大林把禁止党内派别的规定扩展到对付党内不同意见。列宁曾就党内民主和集中作过一个明确的界定：“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②他对派别下了严格的定义。按照这一定义，在当时

① 《苏联共产党党的建设论文集》学习杂志社1955年版第76页。

②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121页。

各派别宣布解散之后，列宁便没有再对任何一个仍然持不同观点和意见的人采取措施。斯大林则不然。一开始，斯大林在划分派别问题上是比较谨慎的。例如，当布哈林等人的观点受到批判时，斯大林反对把他们看做是派别：“右倾分子有没有派别组织呢？我认为没有。能不能说他们不服从我们党的决议呢？我认为我们还没有根据拿这一点来责备他们。能不能断言右倾分子一定会组织自己的派别呢？我对这一点是怀疑的……”^①但到后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强调集中就是观点和意见的一致，纲领观点、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的一致是党赖以建立的基础。只有这些观点的一致才能把党员结成一个集中的党。反过来，观点和意见的不一致必然与派别有关。这样，不同意见和观点在党内就失去了立锥之地，党内以清洗和镇压为手段对付党内不同意见的极端行为愈演愈烈。不是派别的布哈林等人也很快成了派别：“布哈林说三人团不是派别集团。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布哈林集团含有派别活动的一切因素。这里既有政纲，又有派别性的小圈子，既有辞职政策，又有反对中央的有组织的斗争。还需要什么呢？”^②

又如，列宁关于中央委员会可以开除自己委员的特殊条文也被拿出来变成了“常规武器”。尽管列宁一再强调“尽量不用它”。在1924年1月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公布了党的十大中关于中央委员会可以开除中央委员的条文，并且把这条措施作为惩治党内不同意见的基本手段。1926年7月，联共（布）中央首次动用这一条款，把候补中央委员拉舍维奇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此后，这一条款就越来越频繁地被使用起来。事实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都是首先被中央委员会剥夺中央委员资格的。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7月版，第246页。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12月版，第87页。

斯大林还把文章做到了党内民主这个词的含义上。他把党内民主与党的统一和纪律混淆起来 对党内民主作了如下解释：“党内民主是什么呢？党内民主就是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并加强党的统一 加强党内自觉的无产阶级纪律。”^①这实际上是用党的统一和纪律取代了党内民主。

缺乏民主不是完全不谈民主。斯大林时期苏共对党内民主的论述并不比列宁时期少。1928年6月苏共发布《关于自我批评》的公告 其中讲到党内民主 只有彻底实行了党内民主制度和工会的民主制度 才能建立经常性的群众监督 才能消除官僚主义、互相包庇、官场奉承、愚昧无知、忘却群众利益、庸俗的自鸣得意等现象。在党内 必须保证党内批评的自由 保证实行党的机关的完全选举制。党和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当真正由选举产生，任何一级的书记、常委会、委员会等都完全能够撤换。但是 对党内民主的抽象肯定 往往在实践中被具体否定 根本落实不到机制上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譬如，斯大林不反对党内讨论。但是他又认为 党不能沉溺于争论 上层所发生的每一个小争执都会在国内引起对我们不利的影晌。既然哪怕是微小的争执都必然“不利”，那么最好就连党内讨论也不要。斯大林就是这样理解问题的。1934年2月联共（布）十七大通过的党章对党内辩论明确加以限制 规定只有在以下三个条件下辩论才有必要 第一 若干省、共和国一级的地方党组织提出要求 第二 中央委员会内部在党的政策的各项最重要问题上没有十分稳定的多数 第三 虽然有稳定的多数 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符合这种限制的辩论太少了 事实上在整个斯大林时期也从来没有过。类似这种情况是很多的。叠加起来，就架空了党内民主，使它变成了毫无实质内容的空洞言辞。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 人民出版社1954年9月版 第131页。

党内民主既然已经完全成为形式 那么 随意践踏一下这种民主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斯大林做了。米高扬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1934年，党的十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当斯大林看到选举结果是基洛夫只得了3张反对票，而他的反对票达292张时，竟毫无愧色地要求把他的反对票也降低到3张。

民主流于形式的另一个例子是中央委员会的扩大。列宁原来设想扩大中央委员会是用来防止党内分裂的。但后来这逐渐被看做党内民主的一种表现。所以，后来中央委员会的人数逐年增加：1924年十三大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57名，到1934年十七大已有139名。但形式上的扩大恰恰掩盖了越来越集中的趋势。一方面，由于中央委员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召集全会也就越来越困难，次数越来越少。从1934年到1953年，20年只召开过23次全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组织方面完全依靠书记处，书记处则依靠组织局，政治方面依靠政治局。到后来，政治局又被斯大林分成若干个专门问题委员会（通常称为小组），这样实际上许多重大问题连政治局都不讨论，而只是由个别委员来决定。例如外交问题就是由政治局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六人小组”来讨论决定的。或许是托洛茨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当年列宁主张扩大中央委员会的时候，他是表示反对的。在他看来，“中央委员会必须保持它严格的形式和能迅速作出决定的能力。由于这个原因，没有再扩大的必要”^①。

另一方面，由于变相任命制已经侵入到中央委员的选举，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取代了选举制，中央委员的人选实际上越来越由组织局和书记处（1952年十九大撤消组织局，其职能归并书记处）

^① [美] 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298页。

确定 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书记处的关系被完全颠倒了 本来政治局、书记处应当向中央委员会负责 实际上却是中央委员会向政治局、书记处负责。在这种情况下 中央委员会完全失去了决策的能力 逐渐变成了批准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决策、为这些决策叫好的机构。

无论如何 党内民主并没有随着中央委员会的扩大而增强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对党内缺乏民主的现象及其后果，最初并非没有人提出批评。早在 1923 年 10 月，在托洛茨基给中央的信和“46 人声明”中就提出了批评意见：“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一切基本上就已形成而在代表大会以后完全形成和固定下来的那个制度，比起军事共产主义最严酷时期的制度来 距离工人民主制要远得多。”党内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忍受的 它扼杀党的独立自主精神 以特选的官僚组成的机关来代替党……这种情况的造成，是因为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客观上形成的党内派别专政制度已过时了。^①托洛茨基把党的机关的日益官僚化，看做党内不同意见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强调：“不错 如果我们的党分裂成为派别集团 它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 只有发展、加强和巩固工人民主制这一方针，党才能胜利地清除派别活动的危险。派别活动产生的极重要根源之一正好是机关的官僚主义。它压制批评，使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它总是喜欢给每一个提出批评或警告的个人或集体戴上一顶派别的帽子。机械的集中制必然与派别活动相伴而生，而派别活动则是对党内民主的恶意讽刺和可怕的政治威胁。”

但是 由于这种批评和党内的权力斗争搅在一起 托洛茨基的这类警告 往好的方面说 是杯水车薪 无济于事 往坏的方面说，

① 《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 人民出版社 1954 年 12 月版 第 140 页。

② 《真理报》1923 年 12 月 28 日。

则无异于火上浇油。

作为传统党建模式根基的任命制

尽管在列宁时期就形成了任命制，但把这个制度发展得登峰造极的 还是斯大林。

早在俄共(布)十二大上 斯大林就明确强调：“在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 还必须挑选工作人员 把善于执行指示、能够理解指示、能够把这些指示当做自己的东西并且善于贯彻这些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种工作岗位上。”^①他在报告中指出，登记分配局具有重大的意义。它的工作不应局限于登记和分配县委员会、省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的同志，而应“毫无例外地包括一切管理部门和党赖以掌握我们的经济机关并实现自己的领导的全体工业指挥人员”^②。也就是说，不仅要对党的委员会实行任命，而且要用任命制来实现对国家和经济等部门管理机关的领导。由于列宁是赞同当时实行任命制的，因此，任命制迅速发展起来。从 1923 年年底开始，书记处所属的登记和调配处取得了对政府部门的官员进行任命的权力。所有任命从最高到最低都列入某一专门组织或有时是几个组织的职权范围。

列宁去世后 委任制被逐步固定下来 形成了分工细密的委任机制。根据斯大林在 1924 年 5 月十三大上的统计，1923 年登记的负责工作人员约 5000 人，1924 年 5 月就已经有 1.5 万人。1926 年制定的条例规定，最高级党组织有权任命的人数为 5 500 多人。其中 1/3 是要害部门的官员，其分配权限分别属于政治局、组织局或书记处；另外 1/3 完全属于中央委员会的某一书记，他有权提请

① 《斯大林全集》第 5 卷 人民出版社 1957 年 11 月版 第 171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 5 卷 人民出版社 1957 年 11 月版 第 172 页。

中央委员会决定 还有 1/3 官员“由选举产生”但这应由中央委员会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决定。

斯大林对于苏共任命制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他彻底放弃了列宁关于从任命制转向选举制的重要思想，把干部任命制变成了党的领导的基本体现。在联共（布）七大上 斯大林指出：“在正确的路线提出以后 在对问题作出正确的决定以后 事情的成功就取决于组织工作。”中央在这里所遵循的是列宁的英明思想 组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挑选人才和检查执行情况。^①打开列宁的著作 把斯大林的说法和列宁的有关论述作一对比 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重大不同 列宁当时着眼的是党刚刚取得政权、党内缺少懂管理的人的现实 所以他强调“当前”、“最近”工作的关键是挑选人才。斯大林则完全不再使用时间限制词。

斯大林把任命制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 而由于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 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②到 1939 年 斯大林进一步提出把挑选、提拔、配备和考查干部的工作集中起来 归口由党中央干部局以及每一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的干部部统一负责。党章规定的选举制度，实际上无法真正实现。

到 50 年代，任命制进而发展成家长制的决策形式。斯大林在十九大之后亲自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建议成立 25 人的主席团。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些文件，向会议宣读了名单——新的主席团人选。建议与提名没有讨论就通过了。至于这个名单是谁提供的，直到最后都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③。

作为组织分配局的一项重要工作，1933 年在一系列重要部门

① 《斯大林选集》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 4 月版 第 326 页。

②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269 页。

③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397—399 页。

设立了政治部，这也是任命制的一个体现。政治部的地位不仅在党章中得到确立，而且其实际上对应由选举产生的党委员会（尽管已经徒具形式）的取代也得到党章的确认：中央委员会有权设立政治部、派遣组织员，“并且在政治部完成自己的突击任务以后把它们改变为按生产和地区的原则建立普遍的党机关”。^①政治部的职权相当于这个生产单位的党委员会的职权。^②就在这年年底，拖拉机站政治部和党的区委会合并了。

毫无疑问，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是官僚阶层形成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任命者和被任命者之间的依附关系，使得相互之间的利益息息相关。萨哈罗夫对此有过描绘。他是这样写的：“有一种人事政策方面的传统，它被称为人事登记。在这一制度里面，某人的被提升和他在工作岗位上的前程是和某些关系紧紧地联在一起的。一个重要干部周围总是有着一群和他个人连在一起的人，这些人和他一起从一个岗位升到另一个岗位。只能如此，决无例外。这是这个制度的一种规律。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独立的，范围多多少少比较明确的和行政机构有着特殊关系的集团。这些人当然都是党员。然而就是在党内一集团和另一集团也是界限分明的。”

对于干部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布哈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描绘道：“支部书记通常由区委会任命……区委会可以任意地提出人选，选举通常按照既定的方式进行。问问到会者‘谁反对’由于人民多少有些害怕说反对，于是被提名的候选人就被任命为支部书记。”^③任命制如此露骨地取代党内正常选举，以致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402页。

② [德]沃尔夫冈·莱昂哈德：《是一次新革命的前夕吗？》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0—121页。

③ [美]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349页。

1937年2月中央全会也不得不承认，“党章所规定党委会的书记要由上级机关批准的制度，在许多党组织中实际上变成了委任制度。党委会的书记往往在他在地方组织中当选以前就被批准了”。此外，“投票时采取按整个名单一次表决而不是按候选人名单逐个表决的方法”^①。

但是 批评归批评 要废除已经根深叶茂的任命制 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原因在于，任命制不仅仅是一项随时可以变换的政策。一旦任命制形成 由此决定的人们之间的那种依附关系、利害关系也就随之形成了。俄罗斯学者布坚科对此有不失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官员花名册原则（方法或体制）即按照党和国家等级制的‘上层’的意志 或者直接按照‘领袖’的意志（权力异化的主要方式）任命和调动领导干部，是行政命令管理体制中主要的反民主的 因而也是反社会主义的轴心 因为正是这个原则决定了由管理金字塔上层任命的干部个人的依附关系，决定了他们完全不用向劳动者报告工作。这种管理模式的实质本身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对处于等级制最高层顶端的领袖或领导人的‘天才’的顶礼膜拜 因为对‘天才’的顶礼膜拜和崇拜是下级人员的直接的个人依附关系的必然结果 他们的升贬不取决于自己工作的成果 而取决于领袖的青睐 因为领袖会任意惩罚或赦免自己任命的人 随心所欲决定他们的命运，决定他们的升降沉浮。由于这种体制的存在和运作，一切‘不要崇拜’领导人的号召都是徒劳的 正如由于对当权者们缺乏监督，不要滥用权力的号召也毫不起作用一样。世界社会主义的现实历史过去和现在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祸根不在于领导人本身的善心或恶意，而是上述体制的本质所客观固有的。只有打破这个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行政命令的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4分册 第466、467页。

官员花名册体制彻底摧毁它 才能谈得上克服对领导人、领袖个人的顶礼膜拜、个人崇拜这一现象。”^①

谁是被监督者？

如果说 在列宁时期 监察委员会地位和任务的矛盾是由于列宁的探索尚未得出明确的结论 那么 到斯大林时期 监察委员会的地位和任务则被按照集权的需要明确化了。党内监督不再是对权力行使者的监督 而是和掌权者一起 对向权力提出挑战的人采取压制措施。监察委员会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工具，而不是监督中央委员会的工具。确切些说，成了名副其实的加强集权的工具。

朝着这个方向，监察委员会的地位逐年下降。

在列宁因病未能参加的 1922 年 8 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会议上 新通过的党章删去了十大、十一大通过的决议和条例中关于监委与同级党委权力平行的规定，并将“监委的决议本级党委必须执行 不得加以撤销”的规定改为“监委的决议 本级党委不得撤销 但须经党委同意后才能发生效力 并由后者付诸实施”^②。

1923 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规定 中央候补委员可以兼任中央监委委员，中央委员会派遣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委的独立性开始受到削弱。

1924 年颁布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职责条例强调，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包括“同党内各种派别和宗派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③，广泛而系统地研究党内思想领域中的不健康现象”并“将

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394—395 页。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2 分册 第 227 页。

思想上的异化分子、危害分子和堕落分子清除出党”^①。担任监察委员会主席的索尔茨解释：“监察委员会肩负着严肃而重要的任务 谨防各种阴谋活动和派别的形成 并与之展开斗争。”^②

1926 年 11 月 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由奥尔忠尼启则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并兼任政治局候补委员。这形成了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之间实际上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1934 年 1 月党的十七大决定中央监察委员会更名为党的监察委员会 并由中央委员会委派一名书记担任其领导人 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不得兼任中央委员的规定。至此，监察委员会对中央委员会的隶属关系正式确立。

1939 年十八大进一步确定，监察委员会不再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由中央委员会直接任命。并强调它是中央委员会的下设机构，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工作。监察委员会相对权力机关的独立性完全丧失。

1952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再次修改党章的有关条款，索性完全取消了实际上已经无法履行的监督党和中央委员会决议执行情况的权力 只把检查党员遵守党纪情况、对违反党纪的行为追究责任的权力保留下来。

监察委员会放弃了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作用，强化了作为掌权者实施压制的工具的作用。这就难怪反对派要对它进行猛烈的抨击：“中央监察委员会已成为一个纯粹的行政机构。它支持由其他官僚机构推行的高压政策 承担了它们的工作 甚至采取了一系列惩罚措施 并压制党内出现的各种独立的思想、各种批评

① [英] 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 东方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349 页。

② [美] 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革命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258 页。

的呼声、对党的命运深表忧虑的任何情感和对某些党的领袖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①

失去监督的干部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斯大林是清楚的。在1928年5月的一次演说中，他曾深刻地抨击过党内官僚主义事件对其原因、严重性和铲除办法都讲得十分到位：“试问这是偶然的吗？为什么在我们党组织的某些环节中会发生这种腐化堕落的可耻事件呢？这是因为有些人把党的垄断弄到了荒谬的地步，压制了下层的呼声，取消了党内民主，培植了官僚主义。怎样来消除这种祸害呢？我认为要消除这种祸害，除了组织党员群众自下而上的监督以外，除了发扬党内民主以外，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任何办法。”^②但是，斯大林没有意识到，他说的这种情况，已经不仅仅是个别事件，而是整个苏共状况的写照。

解不开的党内矛盾之结

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任何前人的经验可寻的情况下，党内存在不同意见是十分正常的。由意见的不同而引发党内斗争的情况也并不罕见。因此，如何处理党内矛盾，是共产党需要认真探索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

斯大林时期对党内不同意见和矛盾斗争的处理是非理性的。在苏共那里，如何处理党内矛盾问题，是一个始终没有解开的死结。

随着地位的日益巩固，斯大林也越来越难以容忍任何不同意见。他干脆把在社会上对付敌对阶级的那一套做法搬进了党内。

① [美] 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革命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46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7月版，第60—61页。

按照他的思维逻辑，党内不同意见和矛盾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用这种思维指导解决党内矛盾问题，带来了一系列有严重后遗症的结果。

首先是党内不同意见的销声匿迹。

既然任何思想斗争都被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反映，那么用处理阶级斗争的办法来对待党内的不同意见，显然是合乎逻辑的。我们知道，斯大林在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斗争中，采用惊人地相似的办法：先是就事论事，然后开始上纲上线，扣上阶级倾向的帽子，继而揭历史的疮疤，特别是把被打击对象与列宁意见相左时的所作所为都抖搂出来，接着就采取组织手段，剥夺职权。现在，为了改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又用同样的办法向布哈林开战了，而且还加上了最后从肉体上消灭的残酷手段。

布哈林和列宁一样，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努力想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所以，他的观点并非首尾连贯，有时相互矛盾，包括和列宁有过激烈的争论。这也正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斯大林却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一方面，他把列宁的思想神圣化，力图把它塑造成一贯正确的神谕，而对他思想中不太正确的、明显过时的观点蓄意掩盖；另一方面，他又抓住布哈林的上述特点，来作为打击的重点。在这方面，斯大林确实要比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做得无懈可击得多——他没有和列宁论争的功底和资格，对列宁思想中他不同意的部分只能保持沉默。而现在，这成了他始终与列宁站在一起的例证。即使布哈林认了错，斯大林也仍然穷追猛打。他把认错的声明称为托洛茨基分子的“退却”手腕。

思想、理论的进步，不经过争论、探讨、切磋，是不可能实现的。把党内正常的争论夸大为思想路线斗争，似乎非要辩出个对与错、进步与反动，必然使探索无法进行，理论无法前进。而党内斗争的这种模式，使得任何平等的探讨都不再可能。事实上，对一个领导

社会主义建设的党来说 这种探讨 又恰恰是极其必要的。

其次是党内关系的敌对化。

由于混淆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本质区别，和对待社会一样，斯大林在党内也大开杀戒。根据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统计 仅从 1934 年联共（布）十七大选出的代表及组成的中央领导机关成员后来的命运 就可窥见其中一斑 这次大会上 有表决权 and 咨询权的代表共 1 966 名 其中有 1 108 名被当做反革命逮捕 约有 80% 的代表被镇压。大会选出的 139 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83 人被逮捕和从肉体上消灭，只有 7 人是自然死亡，3 人自杀。十七大选出的 71 名中央委员中，有 51 名被处决，2 名被迫自杀，68 名候补委员中，有 47 名被处决；11 名政治局委员中，1 人被迫自杀，2 人被处决；6 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有 3 人被处决。至于遭到镇压和迫害的普通党员，那就更是无法准确统计了。党内关系的这种状况，对任何一个正常的政党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

在有幸未被归到敌人范畴中去的人们之间，斯大林也把党内本应坦诚的同志关系弄成了相互提防、相互警惕的关系。对此 赫鲁晓夫深有体会。他在回忆录中讲道：“我们这些在斯大林身边的人都是昙花一现的人物。只要他对我们有一定程度的信任，我们就得以继续生存和工作。但是，只要什么时候他对你的信任中止了，斯大林就要开始对你注意审察，直到他的不信任不断上升，终于超过饱和点。于是就轮到你追随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人们去了。那就是一切为了党的利益、并在党的队伍中同他一起工作、同他并肩奋斗的人们的处境。”布尔加宁的说法大概表达了大家的共同想法：“你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到斯大林的席间 然而你从不知道你自己能否回到家里去还是要被车子接走——送到监狱里去！”^①这和封建社会的“伴君如伴虎”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在这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 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367 页。

里，我们看到了苏联模式的浓重的封建专制色彩。

再次是党的整体水平的下降。

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众心理的增长。党内关系的上述异变使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不愿再思考问题，也不敢再思考问题。他们放弃思想的权利，只是一味地人云亦云，说言不由衷的话。例如，当党和农民发生尖锐矛盾时，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党内对党的现行政策的思考。但是，这种正常的思考由于理论的逐步僵化而变得困难和危险，谁要求稍微转变一下对农民的态度，谁就会被认为同情富农，就会出现立场问题。这迫使广大党员和干部放弃思考和选择。如同一个州委书记所说：“党不需要有才干的人，而是需要忠实的人。”这样做导致的重大后果就是造就了一大批惟命是从、失去创造性，也即失去先进分子作用的党员和干部。苏联人形容这些人为“传声筒式”的干部。这些人只知机械地执行上级机关的命令，例行公事，缺乏使命感和责任心，只关心保住自己的位置。他们是很难像所要求的那样，走在时代的前列的。所以，有学者认为，20年代后期开始苏共本身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党的成员在数量上增加了，在质量上变坏了。党内多数人在解决社会问题和领导社会时是被迫起消极作用的。尽管国内发生的一切都以党的名义进行，但一般党员不能对此负责。通常什么事情都从不询问普通党员，他们只是举手投票，而且是根据意见一致原则和党的统一的要求。从30年代初起，任何政治或理论问题的民主讨论实际上已经中止，党员的积极性和能力都陡然下降。

丑陋的政治怪胎：个人迷信

党内缺乏正常意见交流的一个必然的、逻辑的结果，就是个人迷信这个政治怪胎的出现。既然不允许广大党员和干部用自己的头脑独立地思考问题、有所作为，既然社会必须服从一个人的思

想，那么把这个人 and 这个人的思想神化就是绝对必要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便由此产生了，并且会越来越狂热。苏共的情况显示了这一规律。

建立在集权基础上的体制必然产生个人崇拜。在党的报刊上越来越经常地出现这类肉麻的词句：“斯大林就是希望，他就是我们未来；他是指导全体进步人类的灯塔。斯大林是我们的旗帜！斯大林是我们的意志！斯大林是我们的胜利！”就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对社会发展迫切问题的争论也让位于对斯大林个人的无休止的颂扬。联共（布）十七大在这方面算得上是一个标志。在这次大会上，所有发言人，包括过去的反对派分子，都争先恐后地歌颂斯大林，比赛谁使用的赞词更卓越、更肉麻。斯大林时代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您，各民族的灿烂的太阳，
我们时代的不落的太阳。
太阳也比不上您，因为太阳没有智慧……

在 20 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对斯大林的颂扬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的一切成就都被说成是在斯大林的关怀鼓励下取得的。他的名字事实上已变成国家、人民、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概念的同义词，就像战争时期前线将士高呼“为了斯大林，为了祖国”那样。到后来，斯大林自己也乐此不疲，对“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之类的提法欣然接受。他的名字、言论以及所谓的功绩传遍了全国的每个角落，对他的歌功颂德从未间断过。到处有他的肖像、画像、铜像和塑像。斯大林原来的称号“今天的列宁”在 30 年代很快就被另一些至高无上、一贯正确的称号所取代：苏联各族人民的父亲，人类的天才，历史火车头的司机，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的最大伟人。随着崇拜膨胀为神化，用人这个字眼来形容斯大林

看来已经不够了：“啊，伟大的斯大林，啊，各族人民的领袖，是您给予了人类生命，是您使大地肥沃富饶。”^①

1929年，斯大林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对他50岁寿辰的祝贺，因为“我把你们的祝贺看做是对按照自己的形象诞生了我和培育了我的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祝贺。”^②

在这样的氛围中，有谁还敢讲真话，特别是居然敢向斯大林汇报不好的消息？30年代初，由于强行集体化，乌克兰发生了大饥荒。其状之惨，前所未有。当乌克兰中央的一个书记向斯大林反映饥荒问题时，斯大林却粗暴地指责和挖苦他：“您编造了关于饥荒的故事，以为可以吓唬住我们，但这是行不通的，您最好放弃州委书记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参加作家协会去，到那里编故事，供傻子们阅读吧……。”^③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不得不讲明饥荒的真实情况的时候，作为乌克兰政治局委员的基辅省第一书记却不敢自己去见斯大林，只好去求米高扬：“斯大林同志——或政治局里任何人——是不是知道乌克兰目下正在发生的情况？如果还不知道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个大致概念。新近有一列火车开进基辅，上面装满了饿死者的尸体。这列火车一直从波尔塔瓦到基辅沿线收集尸体。我想，最好能有人把这个情况告诉斯大林。”

在一片失去理智的歌颂声中，迅速减退的是全党的智慧。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则被视为异己，成为日后反对派的重要支持基础。可以说，日益强大的反对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苏共自己促进形成的。

[美] 斯蒂芬·F. 科恩：《苏联经验重探》东方出版社 1987年版，第11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 1955年12月版，第125页。

③ [苏] 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167页。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1988年版，第106页。

第九章

沉重的思想道德代价

苏共 20 世纪 90 年代的失败，表明这个党的意识形态最终被社会所放弃。作为一个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这个变化早在斯大林时期就开始了。尽管在这一时期，苏共致力于使社会的大多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苏共不但未能达到这一目标，而且在这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对这一理论日益怀疑和疏远。其原因，在于理论本身被“左”化了。斯大林时期以“左”为突出特点的意识形态 不但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重大失误 而且导致引起了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的畸形化。

打个比方

政党的领导不同于国家的管理 其中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 政党必须有一个为社会大多数所接受的意识形态。一个党被人民所抛弃，首先在于它所主张的意识形态被抛弃。对苏共来说亦是如此。苏共失败的深层原因在这里。

现在的问题是 苏联老百姓抛弃的是哪个意识形态 是苏共改革后产生的被称作“新思维”的那套理论体系 还是改革前的那套

传统理论 抑或两者都是？

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可以有几种不完全相同的答案。

第一种答案是：改革以前，苏共坚持或基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改革以来的这一套理论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人民群众看到苏共变了，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于是纷纷抛弃这个党，从而导致了苏共威信全面下降，执政地位丧失。

第二种答案是苏共长期以来，特别是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放松人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各种非共产主义、非社会主义的思潮一直在传播，侵蚀了人们的思想。是人们思想上的演变，为整个剧变准备了思想基础。苏共性质的渐变早已开始了。

第三种答案是苏共理论脱离实际，思想僵化，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党很难适应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在和西方各种思潮较量的过程中，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要吃败仗。

对问题的回答，还可以有许多方案，但归结起来，实际上就是一个基本问题：从思想理论方面而论，到底主要是右的东西，还是“左”的东西葬送了苏共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我们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个产品。如果卖不出去，生产这个产品的企业就要垮台。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危机，那就需要我们探索产生这个危机的原因。我们请来专家进行分析。

一个专家说，产品卖不出去，是因为它本身已经过时，必须换一种全新的产品。整个企业应当破产，全部设备，甚至包括生产者在内，都必须更新。

第二个专家说，产品卖不出去，是因为产品的质量有问题。应该想方设法提高产品质量，使它从人们不喜欢的东西变成人们喜爱的东西。

第三个专家说，产品卖不出去，不是产品本身的问题，而是销

售渠道不畅 销售方法不科学。人们对你强买强卖的方式反感 对你言过其实的广告持怀疑态度。应当改变形象。

第四个专家说 产品卖不出去 是因为别的产品挤占了你的地盘。你应该用强制手段把它们消灭或赶走，保持你的垄断地位。

第五个专家说 产品卖不出去 是因为人们不愿意买 是因为人们没有认识这种产品的重要性。因此 要加强教育 大力强调它的价值和意义。

对苏共来说 有三种观点是无法接受的 完全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产品 就等于使自己退出市场 让别的党来干 用强制的手段推销产品 对思想这种特殊的市场几乎难以奏效 加强教育则已几乎没有什么余地 因为苏共进行思想教育的力度之大，一如所有执政的共产党一样，任何其他类型的政党都自愧弗如。因此，第一、四、五位专家的建议属于无效建议或有害建议。

剩下的还有两条，即产品的质量问题和推销方式问题。苏共的问题正是出在这两个方面。

首先，苏共向苏联老百姓宣传并希望他们接受的理论本身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问题。这里指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共产主义信仰，而是苏共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演绎出来的那套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理论。这套理论的基本特点是“左”。苏共党内的‘左’早已存在 但把它变成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指导思想，使之有了完整体系的 是斯大林。

其次 这套‘左’的理论在斯大林时期占了上风 被强行推销给社会。把这套理论与苏联的实际结合，同时又要求实践服从理论 而不是根据实践的变化修正理论、发展理论 结果产生了一系列怪胎和异化现象。正是这些异化现象，不是巩固和坚定了人们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而是使人们对它的科学性产生了怀疑，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生了怀疑。

“左”——道德堕落之滥觞

如上所述 苏共党内的‘左’的思潮由来已久。在夺取政权时期 在列宁时期 这种思潮都曾经形成过一定的气候 对党的方针政策发生过影响。可以这样说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左’的产品一直有不少的市场和销路。虽然在列宁时期,列宁有效地遏制了“左”的思潮的泛滥 但是 离这种思潮和思维方式被清除 被多数党员放弃 却还远得很。在斯大林时期,‘左’的思想终于获得了大发展的契机。对此,苏联著名学者齐普科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不妨大胆地说一句 在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 斯大林比号召人们学习经商和进行有盈利的工作的列宁更能讨好大多数党内积极分子、大多数新的苏维埃知识分子。要知道 列宁在晚年抛弃了对纯洁社会主义的天真信念,党内大多数理论家因而大失所望。”^① 斯大林的优点在于 他能够把列宁的思想接受下来 不急于推翻列宁的设想 这使他能够战胜托洛茨基的挑战 同时他又特别强调列宁思想的临时性,许诺将随时从这种状态中转变过来。所以到了 20 年代末,斯大林能够迅速放弃新经济政策。这一切,靠的都是在全党普遍存在的‘左’的思维。

斯大林把有关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左’的思维 系统化地构建成了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完整体系。通过 1925 年的《论列宁主义基础》,1926 年《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以及 1938 年他审定的《联共布 党史简明教程》等一系列著作及其他一些文章 斯大林确立了“左”的思维的核心内容和价值取向。这里仅举其要。

例如,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 斯大林坚

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317 页。

持认为，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这个结论对于树立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真理多跨出一步就会变成谬误。由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出发，斯大林进而得出了一国可以建成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可以建成共产主义的结论。1946年斯大林在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一个国家的共产主义”特别是苏联这样的国家的共产主义是完全可能的。”^①这显然是把共产主义的实现看成了指日可待的事情，因而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后来苏共越来越迫切地提出多少多少年内“建成社会主义”再过多少多少年开始“建设共产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豪言壮语，都无疑与此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又如，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剥削阶级，但阶级斗争依然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不同社会阶层、集团、群体的利益之间仍然会发生矛盾，需要协调和解决。两者相比，后者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斯大林却完全颠倒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用革命战争时期的那套思维方式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一方面仍然把无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矛盾看做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又把各种矛盾都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反映，把由于党采用“左”的错误政策而引起的普遍不满归结为阶级敌人的反抗。由此，斯大林得出了随着社会主义的前进，阶级斗争必然尖锐化的结论：“随着我们的前进，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这一结论还被运用到了党内矛盾的处理上。

再如，简单、教条、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把自己称作列宁的忠实学生，并以这种身份和反对派对垒。作为斗争的结果，在斯大林时期，“列宁主义”的概念得以形成，并被赋予了特定

^① 《斯大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78页。

的内容。然而也正是在这时 作为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被僵化、教条化 变成僵硬的、失去生命力的东西。就许多方面而言，斯大林所说的“列宁主义”看上去是使用了列宁的观点、提法 实际上却抽去了这些观点、提法的客观环境、时代背景和具体条件。因此“‘列宁主义’更大程度上是按照‘左’的思维对列宁思想进行取舍的产物。僵化导致绝对化，而绝对化又必然导致不宽容。斯大林所说的‘列宁主义’显然具有惟我独尊、排斥一切不同意见的特点。这和真正的列宁主义的精神本质恰恰是相违背的。被重新组合之后的列宁思想突出了‘左’的特征 成了斯大林用来推行错误路线方针政策的工具。

此外还有国家观念 对农民的看法 对商品货币的认识等 无一不来自‘左’的思想和思维方式 并构成了这一体系的要素。这些内容 我们前面已有提及。

斯大林时期党的指导性理论的全面‘左倾’化 带来的不只是工作中的失误。以往人们比较关注的往往是这一点。但是实际上“‘左倾’化给政治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产生的消极后果 绝不在因工作失误造成的损失之下。“左”并不仅仅是一种可供选择的主张，一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看法，一种用现实诠释理论的思维方式。“左”的东西一旦与权力结合，通过国家权力强制推行 就会变成一种可怕的、使人异化的力量。例如 它本身造成的理论和实践的脱节 迫使人们生活在空幻的未来 而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视而不见 百般掩饰 它强求思想的“纯洁”统一 不允许思想的多样性 实际上也就是不允许人们有自己的思考 只能用一种声音说话 用一种思维方式认识问题 它把目标和手段的关系绝对化 似乎只要有助于目标的实现 任何手段 包括各种卑鄙手段 都可以采取。

这样 就出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结局 即几乎在所有方面 理论和欲通过它达到的目的都适得其反 想建立人人相亲相爱、消除

了利害冲突的人际关系，实际上却加深了人们之间的相互戒备和敌视。想倡导共产主义道德，却使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急剧下降；想把人们都改造成“苏维埃人”、共产主义新人，却使撒谎、背信弃义等资本主义社会都不齿的恶行在社会上习以为常；想用曾经指导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的理论继续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却发现人们对被奉作“革命圣经”的马克思主义怀疑日增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持人们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信任是非常困难的。斯大林时期造就的，就是体现了这样一些特点的政治文化，就是这样一种作为领导者的党所不愿看到、无意为之、却又实际存在的政治文化。

畸形化的思维

由于“左”的意识形态的强制而导致的社会关系、社会心理、社会道德和人的思想的畸形化，体现在许多方面。

首先，它毒化了政治气氛和人际关系。斯大林几乎使用了所有的手段，来消灭党内和社会上的不同意见。关于几次大的路线斗争，如反对托洛茨基、反对布哈林、反对联合反对派等斗争，在这些斗争的过程中使用的手段，以及由此带来的消极后果，已为我们所熟知。窒息党内和社会的思考空气，除上述斗争之外，还包括斯大林掀起的其他一系列思想、理论领域的斗争。例如，1928年在工业部门追查“沙赫特分子”；1929年在“乌克兰解放联盟事件”中，把一批历史学家、科学院院长打成“民族主义者”，给他们扣上在“发展乌克兰语言学、术语学、正字法和字母表方面从事破坏活动”的罪名；1930年发难“劳动农民党”事件和“工业党”事件，打击党外新老知识分子，对他们的理论观点和著作进行讨伐，并据以掩盖工业化过程中的失误；1931年审判“联盟局”案件。30年代后，打击的矛头指向党内。斯大林通过《致无产阶级革命杂

志编辑部》的信，强迫共产主义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开展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卢森堡主义、孟什维克匪帮的斗争。由这场斗争引发了一系列相关的斗争，如反对“孟什维主义的反革命鲁宾派”的斗争，反对“布哈林的波格丹诺夫机械主义理论”的斗争，反对哲学中“孟什维主义的唯心主义”的斗争，反对文学中“沃龙思想”的斗争，反对生物学中方法论的“莱科夫思想”的斗争，等等。3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禁止一切领域中的自由学术讨论。相对论、遗传学、和谐振动学等被说成是唯心主义，控制论、数理逻辑等被宣布为伪科学。这一系列斗争人为地加剧了人们之间的相互敌视。“斗争”居然成了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字眼，一种引以为荣的价值取向。就连苏联社会科学院各部门的划分，也引进了“斗争”一词，像“哲学斗争部”、“经济学斗争部”等。

所有这些造成的后果就是，在最需要理论创造的时代，理论创造却失去了基本的前提。一个苏联学者形象地指出：“我们在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做普罗克鲁斯特的床（普罗克鲁斯特是希腊神话中的强盗，他强迫过路人躺在他的一张床上，比床长的就砍掉其足，比床短的就把他拉长）以至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与思想。”^①人性的扭曲，使一些理论工作者堕落成为窒息人们思想的杀手，僵化体制的卫道士，“斯文”真的是“扫地”了。遗憾的是，“斯文扫地”不是什么可以称道的现象，不是什么荣耀，而是一个社会走向没落的重要标志。

由国家权力机构，而且还是镇压机器！介入思想领域，是斯大林的独创性发明。国家安全机构培植了一个巨大的告密网，来体现这种“斗争”哲学。这就进一步把人们之间的关系弄到了人人自危的程度。赫鲁晓夫谈到：“在那些日子里，要除掉某一个你

^①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 1980 年出版，第 186 页。

所不喜欢的人是够容易的。你只消打一个报告，告发他是人民的敌人，地方党组织看一下你的报告，义愤填膺地捶胸顿足一番，就会把这个人处理掉。”^①赫鲁晓夫讲了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幸免于难的特殊例子。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有一个妇女起来，用手指着麦德维德，某省卫生部的一名副部长说：“我不认得那边的那个男人，但从他眼睛的神情看来，我敢说他是一个人民的敌人。”幸亏麦德维德没有惊慌失措，立即反驳：“我不认得刚才告发我的这个女人，但从她的眼睛的神情看来，我敢说她是一个妓女。”深知当时这种可怕情况的赫鲁晓夫评价，是麦德维德的反唇相讥挽救了他的生命。如果他让自己处于防守地位，开头就争辩自己不是一个人民的敌人，他就会引起更多的怀疑，而这个告发他的女人，因为知道自己不必对后果负任何责任，将会更加大胆地加紧对他的控告。

在这种人与人之间失去了起码的信任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都无疑于天方夜谭。

误读恐怖

“左”的思维导致的人们心理的严重变形，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对待恐怖的那种畸形心态。

阶级斗争有许多形式。实行恐怖手段是其中的一种。该不该采用恐怖手段，完全取决于斗争的进程，而不是主观的好恶。所以，问题不在于该不该实行恐怖。问题在于，社会主义既然是为了人的事业，就应该对实行恐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革命不等于恐怖。更不能把革命同人道对立起来。应当说，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的认识是正确的。例如加里宁有一次谈到：“我们时常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121—122 页。

被迫诉诸恐怖手段，但是永远也不要歌颂它。我们不得不采用恐怖措施 这是我们的悲剧。但是我们大家最渴望的事情 莫过于废除恐怖。为了这个缘故 我们应该做的 不是歌颂契卡的冷酷无情 而是希望我们不需要这只‘惩罚之手’的那一天早些到来。”

遗憾的是 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道路的特殊性 由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敌对势力所包围这样一种环境的特殊性，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内不少人的认识是有偏差的。颂扬暴力 颂扬恐怖手段 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甚至更远些 在俄国的历史上——就有传统。关于这一点，我们前面已有论述。对被击败的政敌进行镇压乃至肉体消灭，被认为是合理的做法。托洛茨基等人都曾有这种主张。布哈林甚至也在俄共（布）七大上说：“在必要时 我们可以而且应该牺牲数以百万的工人。”结果到后来 如我们所知 他们自己也成了这种‘恐怖合理’论的牺牲品。

一个曾是恐怖时期当事人的老共产党员，后来对此有很清醒的反思和总结。他写道：“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必须进行革命。而这场革命不能不使用暴力。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恐怖行动，不对军官和富农使用暴力，那就不能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真正你死我活的斗争十分激烈 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取得胜利 那么白卫分子就会把我们统统杀死。但我们作为一个革命政党犯了一个错误，不是把革命暴力当做一种迫不得已的措施而是当做一种功绩。大规模的暴力、恐怖行动，即使是‘红色恐怖’ 反正都是恶行。就算这种恶行出于一时的需要 但毕竟仍是恶行 可是很快人们却开始把它当成了好事。我们开始认为并且开始告诉人们，凡是对革命有益的和必要的 都是好事 都是道德的。对这种对事态的评价在原则上是错的。革命不仅带来好处，也会产生恶行。在革命中避

① 《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111 页。

免使用暴力是不可能的 但是应该明白 这指的是我们的实际社会中出现恶行只能是暂时的。而我们却把暴力美化了，延长了它的生命 把它一直保存到它已完全多余 成了绝对的恶行的时候……不用暴力抵抗邪恶，这不是我们的哲学。这种哲学在许多情况下只会助长邪恶势力的得逞。对我们在使用极为强硬的手段时，不应该改变对这些暴力行为的道义上的评价。”

如果说，苏共党内对这个问题的不正确认识不在少数（至少在斯大林时期是如此）那么 斯大林本人可以说是这些人的典型代表。对斯大林采用恐怖手段来推行自己政策的程度和范围究竟是否合适 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这里要说的是 斯大林不仅实行了恐怖，而且非常热衷于恐怖。斯大林自己就直接参与了镇压。这在许多书中都有描述。例如《斯大林秘闻》中的记录：1938年11月12日 叶若夫在一小片脏纸上 枪决昼夜进行 没时间找公文用纸 匆匆写道：“斯大林同志 将应受一类判决 枪决 的被捕者名单呈上。”得到的批示是：“批准枪决全部3 167人。斯大林、莫洛托夫。”书中还提供了这样一个数据 在大审判时期 在 366 份处决名单上发现有斯大林的签名，这涉及到44 000人。

恐怖甚至被斯大林当做革命的最高境界来颂扬。斯大林称，“高压手段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是进攻的必要因素”^②。说到这里 不能不承认 斯大林个人品质中确实有一些很难作为优点来称道的东西。有一件事情能说明一些问题 在索契休假时 斯大林穿一双皮靴。他向其他人解释爱穿这双皮靴的理由：“这很方便 可以一脚踢得某些同志满口的牙全飞掉。”^③在同加米涅夫、捷尔任斯基的一次闲谈中 斯大林酒后吐真言 声称“最大的乐趣是留心

麦德维杰夫《论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目的和手段的相互关系》，《哲学问题》杂志 1988 年第 8 期第 169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 人民出版社 1955 年 12 月版 第 271 页。

[美]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 新华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44 页。

你的敌人 作好一切准备 彻底报复一下 然后就去睡大觉”。

对恐怖手段的过分宣扬，使社会上对于恐怖的畸形心态得以产生。一个当时的经济学家就在一本专写革命暴力的书中，建议以牺牲的人数、以历史形成的社会结构被破坏的程度和非无产阶级被消灭的程度来作为测量革命的道德水准。他声称：“无情的阶级排他性和对剥削阶级实行社会性灭绝是高度道德的源泉，是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者的高度热情的源泉。”在他看来，“剥削阶级出身的烙印所开辟的道路只能是进集中营、坐牢房和在最好的情况下住进无产阶级迁入好房后丢弃的破屋子里去”^①。

大规模使用恐怖手段带来的心理畸形不仅体现在当时那代人身上。文学家维诺格拉多夫写信给高尔基 谈到一件事 并表示了对由此产生的长久后果的忧虑：“两名生产突击手的儿子——小学生 把自己的同学推到电车下 因为他是医生的儿子 是阶级敌人。这说明灭绝人性的自发势力猖獗盛行。”^②但是 后来的实践表明 对恐怖的畸形认识不去除 诸如此类的事情就很难绝迹 相反会变得更加放纵。

对于斯大林对党内同志的杀戮，有人认为是一种必要的代价，似乎用牺牲一批革命家的代价来保住一个哪怕是变了形的社会主义是值得的。先暂且放下建设社会主义是否必然要用革命者自己的鲜血作祭品这一点不论 这种议论 显然没有把由此产生的道德堕落计算在内。但是，以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为重要目标的党居然可以忽略人们的道德状况不计，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离开了人，离开为了人这个目标，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意义？

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308 页。

② [美] 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 新华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256 页。

心理、道德的毒化

“左”的思维对人们思想产生的消极后果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就是对社会道德和党的道德的毒化。在斯大林模式下 不可否认，苏联经济有很大的发展。行政命令的方法产生了一定的成效。1934 年，取消了面包和其他一些食品的配给制。到 1937 年，集体农庄庄员在完成交售任务之后，按劳动日得到了约 20 亿普特谷物和其他粮食 在个人经济中 他们拥有 825 万公顷的庄稼地 70 多万匹马和骆驼，超过 2 670 万头牛（其中奶牛 1 230 万头），1 700 万头猪，约 3 000 万只绵羊和山羊。在工业方面，总产量从 1928 年到 1940 年增长了 6 倍 重工业增长了 9 倍^①。但是，如果认为 经济的发展等于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人的尊严的增长 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 如果经济发展了 却没有带来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尊严 那么 经济的成就是要大打折扣的。传统党建模式的一个巨大缺陷，就在于它忽视了这方面的问题。

在这个模式中，人的品质的恶劣的一面得到鼓励。一些人出于自我保护和政治投机的需要，干起了用出卖甚至诬陷别人来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行当。最典型的恐怕是贝利亚。贝利亚一开始从格鲁吉亚来任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的副职时还常说：“这里发生的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正在到处抓人和关人，甚至包括一些省委书记。整个事情搞得太过头了。我们必须及早制止它，免得太迟了。”^②然而，就是这个贝利亚，后来却变得极其无耻。据说

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720—721 页。

② [美] 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 新华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139 页。

他接替了叶若夫成为国家安全部门的头头后，在谈到任何一个嫌疑犯时常说一句话：“你听着，只要把他交给我一个晚上，我会叫他供认他是英国的国王。”^①

古比雪夫州委第二书记揭露的第一书记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一个典型：“在波斯特舍夫同志身上出现了一种新作风。他开始到处大喊大叫说，哪里也没有正派人，敌人却很多……波斯特舍夫经常把区委代表叫来，然后便拿出放大镜仔细观察他们用的学生练习本。所有练习本的封皮都已被撕掉，因为波斯特舍夫曾在一个封皮的图案上认出了法西斯德国纳粹党党徽。所有的市委书记和区委书记都配备了放大镜。”

党的道德的堕落使一些没有什么信念、道德品质低下的人在党内官运亨通。卡冈诺维奇无疑就是其中的一个。布哈林对这个人的评价是非常辛辣的：你只能遗憾为什么老天爷把这么多的聪明才智赋予了这么一个道德品质为众人所不齿的人。在党内这个人是以言而无信著称的。他的诺言从来靠不住，自食其言、睁眼赖账和许愿保证来得同样容易。这也许应当由他上台的时代环境来负责。但从另一方面说，对于这种口是心非风气的盛行，他的贡献比谁都大^②。

在人的品行方面，叶若夫怕是更比卡冈诺维奇有过之而无不及。说到叶若夫，布哈林的评价中充满义愤：“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从没遇见过比叶若夫更叫人讨厌的个性。我看见他，禁不住想起拉斯捷拉也夫大街上的小无赖。他们最爱干的营生就是把一张蘸了石蜡的纸系在猫尾巴上，把它点燃，然后兴高采烈地看着这只吓坏了的小动物，溜烟窜到大街上，绝望而徒劳地躲避愈烧愈近的火苗。我确信叶若夫小的时候一定爱用这种方式取乐，他现在

[美]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 新华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151 页。

② 《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128 页。

不过是用另外的形式继续干同样的事而已。你只要观察他一遇机会就怎样欣喜若狂地整治任何一个老反对派分子就明白了。曾有好长一段时间，他在党内的官运似乎并不那么亨通。他遭人厌恶，遭人藐视。他对那些原先在党内身居高位的人——有能言善辩的知识分子（而他自己不会演说）有出名作品的作家（而他自己除了打小报告，别的不会写）有光荣历史的老革命家（而他自己地下时期还没有参加工作）——蓄积了一肚子的怨恨。到了打出使布尔什维克党‘年轻化’的正式旗号对老布尔什维克进行迫害的时期，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在这方面大显身手了。大自然绰绰有余地赏赐给他的惟一才能，就是在幕后施展阴谋诡计。凡有发挥这种才能的机会他从不错过。在组织局和中央监委机关将近十年的工作，使他对党的机器中的主要干部的个人特点了解得十分透彻。他天生嫌恶有丝毫独立见解或坚持自己看法的人，一个一个地撤掉这些人的职务，换上那些惟上司之命是从的人。’^①以布哈林这样的思想理论道德素养，恐怕不能说布哈林表达的只是个人受委屈后的不满和怨恨。

“左”的东西也需要“事实”的支撑，尽管这些“事实”实际上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这样，撒谎、说假话就成了党内和社会上的流行病。个人迷信的泛滥和国家权力的滥用极大地加剧了这一病症。对此布哈林有深切的体会。他描述了高压政治下自己的心情：“要做个忠诚的人吧，党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就等于要当情报员。偶然听来几句反对派的言论，碰巧发现一份反对派文件，你就赶紧跑到中央监委去报告吧。一个要求它的党员做这种事情的党，绝不能要求人家把它看成是一个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团结在一起的相同观点的人们的自由联合。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撒谎，否则混不过去，然而撒谎也不应超过一定

^① 《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128—129 页。

限度。”^①

大家都讲假话的政治是“泡沫政治”，如同大家都不顾效益的投入是泡沫经济一样。这种泡沫政治，迟早要导致人们对政治的幻灭。列宁绝对反对向人民掩盖真相。他强调：“用美好的词句掩饰令人不快的真相，对无产阶级事业来说，对劳动群众的事业来说，是最有害最危险的事情。不管现实如何令人痛心，必须正视现实。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政策是自取灭亡的政策。”^②他认为：“迄今那些已灭亡的革命政党，它们之所以灭亡了，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起来，不知自己力量之所在，因为它们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可是我们不会灭亡，就是因为我们的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且能够学习克服这些弱点”。

但是在斯大林时期，掩盖、欺骗和粉饰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手段。在全世界享有盛名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6—7月曾应高尔基之邀（实际上也是斯大林的邀请）对苏联进行访问。尽管访问期只有短短的一个月，但凭着作家的敏锐观察，他还是看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当然他只讲到了一方面，即如何看待超出苏联国界的外部世界方面），并正确地预见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写道：“不仅工人的个人自尊或者工作自尊，而且苏联公民的自尊，都以歪曲真相的代价而得到强化。来自国外的消息本来能使苏联劳动者对他们国境之外的世界上的事态具有正确的概念，但这种消息却遭到系统的隐瞒和歪曲。我确信，他们倾向于低估，并且有时甚至过分低估其他民族的生命力。即使资本主义政府和制度是他们的敌人，也不能低估它们的生存力。千百万正直的苏联劳动者坚信，他们拥有并且亲自创造了一切最美好的东西，而其余的世界丧失了这些美好的东西（学校、卫生设施等），青年

《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134—135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0 卷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6 页。

不可能自由地将自己的智力成就和思想与他们的西方朋友的成就相比较。真担心有朝一日突然发生这样的事，就会产生动荡。”^①罗曼·罗兰毕竟是世界级的大师，对人性把握得极其深刻。我们看到后来在整整 50 年之后，这种动荡果然发生了。

到此，似乎有必要谈谈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关于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可以写一整部的著作。但是无论什么价值观实际上都不能离开人这个核心。资产阶级价值观之所以进步，就因为它一反以前社会使人从属于封建专制的状态，把人树为整个社会的中心。无产阶级理应比资产阶级更进步，因为它能够把资产阶级说了但做不到的东西做到、做好。如果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把人放在应有的地位 忽视甚至轻视人的价值 忽视甚至轻视人的尊严的价值 那么 这个社会主义至少要打一半的折扣。而这正是斯大林模式的重大缺陷所在。如果社会主义连人性都不放在眼里，那么这个“社会主义”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党 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只是时间的长短先后而已。一个实际上鼓励党员说假话的党，道义上首先就已经灭亡。

布哈林对“左”的思维对人的心理和道德的毒化给予关注。他曾尖锐地评论了斯大林时期的党内状况给政治道德带来的消极后果。一位会见过布哈林的民主党人谈到这方面的情况。他讲到布哈林的观点：最坏的演变还不在于集体化当中那些可怕的事。最坏的演变在于那些参加了这个运动没有发疯而变成了职业官僚的共产党员们心理面貌的变化。从此以后，在他们眼里恐怖手段成了正常的行政方法，对上的惟命是从变成了最大的优点。“他们不再是人，他们真地成了一部可怕的机器上的齿轮。”他认为，现在正发生着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们的真正的非人道主义化，一

[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3 页

个把苏维埃政权变为‘铁蹄’帝国的过程^①。布哈林的目光是忧虑而深邃的，但他无法扭转这种状况，因为连他自己在这种已经成气候的毒化气氛中都自身难保。

鉴于上述情况，党本身的性质、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都变得十分可疑。历史已经表明，对人的尊严的侵犯，往往会使社会主义取得的所有成就都相形见绌，变得次要，甚至付诸东流。

斯大林的镇压政策使得一些老革命家忧心忡忡地看着局势的变化，有些人想通过非常的手段把斯大林从领袖的位置上换下来。例如，布哈林就曾经与加米涅夫等人秘密商量过这类事情。议论布哈林等人是不是在搞阴谋、搞派别活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斯大林的高度集权已经使得任何通过正常的渠道辩明是非的设想都成为不可能。

不过，这种尝试还是失败了。

综上所述，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这套传统党建模式及其难以克服的种种弊端，显然成为后来苏共发生党内危机和党的执政地位受到挑战的根本原因。实事求是地描述传统党建模式的这些弊端，不是刻意要贬低苏共作为一个伟大的党取得的成就，不是要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暴君，更不是要否定已有的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描述这些，是为了让今天仍在探索的我们牢记历史的惨痛教训，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不难得出结论，对于列宁的建党思想，斯大林主要是继承了其中强调集中的一面。在实践中，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高度集中、缺乏民主为主要特征的党的建设模式。这种过度集中的模式是与党执政的要求不相适应的。它没有摆脱党领导革命暴动时形成的那种机制的窠臼。尽管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在为

^① 《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92 页。

防御外来干涉加速建立国家工业基础时期 在卫国战争时期 这个模式都有值得肯定的历史功绩 但总的来说 这个模式和计划经济模式一样不适应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其弊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它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党的建设实践都带来了严重的、消极的后果。斯大林为苏共建造了一个外表强大、内部却问题成堆的大厦。这座大厦会不会坍塌 要取决于时间 取决于有没有政治地震。

而时间是要无情地前进的，政治的运作也不会始终一帆风顺，一如地壳运动是地球生命力的所在一样。

第三编

改革的轨迹

斯大林死了。但是 斯大林留下的那套传统党建模式 却在苏共身上牢牢地扎下了根。这套模式曾使苏共得到了许多，但也使它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基本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怎样利用这套模式来推动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二是怎样利用这个模式继续保持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因为实践证明，在这两个方面，传统党建模式都越来越显露出某些严重的缺陷和难以胜任的征兆。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不得不正视现实，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 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改革的道路。但是 和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样 确切些说 还不如经济领域的改革)这种探索总体说来都没有成功。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终还导致了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和党本身的解体。这种流星陨落般的改革轨迹 是苏共自己所不曾预料到的。不过 它留给其他政党、特别是执政的共产党的，却是极其深刻而丰富的教训。

第十章

难逃束缚的改革

赫鲁晓夫时期苏共进行的改革，本意是想改掉传统模式中已经出现问题的方面。赫鲁晓夫本人也并非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演变党的罪魁祸首，而是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人物中的第一个改革家，也是尝试对传统党建模式进行改革的第一人。但是赫鲁晓夫的改革并不成功。不成功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放弃了传统模式，恰恰是因为他不能跳出传统模式的窠臼。在传统党建模式的改革方面，亦是如此。总的说来，赫鲁晓夫在党自身的改革方面，起点不高，立意不深，没有完整的理论作指导。靠这点东西，他是无法制服传统模式的巨大风车的，相反，他自己倒是成了被这架风车弄得遍体鳞伤的堂吉诃德。

新的出发点 利益原则

关于赫鲁晓夫要改变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某些东西的起因和动机，大概是一个有趣的、值得认真探究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没有篇幅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过，说赫鲁晓夫想改掉斯大林制度下那些令人不舒服、不愉快、和人的本性相脱离的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赫鲁晓夫出身农民，本人又长期当工人，这使他有一个很大的优

点就是对工农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有一种直觉。看问题、想事情都比较能够从工人和农民的角度出发。从执政的观点看，这实际上涉及到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十分重要。正是看到党和群众关系的种种症候，促发了赫鲁晓夫强烈的改革愿望。接替斯大林成为党的领袖，给了他一个难得的机会。

赫鲁晓夫的出发点简单而明确。他在回忆录中一再讲到，应当使人民有更好的生活。人民要吃得好些、住得好些，这都不过分。他甚至讲了一个苏联人缺肉吃的笑话：一个熟人遇到赫鲁晓夫，突然问他，一头骆驼是否能从莫斯科一直走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赫鲁晓夫不解其意，小心地回答：“骆驼是有很强耐久力的强壮的动物，因此我想它大概能一直走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那人却说他错了，说这头骆驼能走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就算走运。

“因为假定它能走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那里的人就会把它吃掉。”赫鲁晓夫由衷感叹：“我期望有一天，一头骆驼能从莫斯科一直走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不致被沿途的饥饿农民或乡下人吃掉。”^①作为执政党，不能不考虑工农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这是被赫鲁晓夫强化了的一个理念。这是一个关于执政党责任的理念。

正是基于这一基本理念，赫鲁晓夫把利益原则作为改革的基本依据提了出来。赫鲁晓夫认为，不讲利益原则，劳动群众即使成了国家和集体的主人，也仍然会缺乏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他举例说：“我们从城市里派了成千上万的人到集体农庄去收获马铃薯，而集体农庄庄员自己却不动手收获。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情况呢？是的，有过的。为什么集体农庄庄员不愿意收获马铃薯呢？因为在采购马铃薯的时候我们付出的价钱非常低。集体农庄光是向采购站运送马铃薯的费用就比他们卖马铃薯所得的代价要高。我们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 三联书店 1975 年版 第 232 页。

不得不改变这种情况，定出一个恰当的价格标准从物质上鼓励集体农民关心农产品的生产。在这件事情上不从物质上鼓励集体农民 那就不会有多大的进展。”^①赫鲁晓夫的看法，和斯大林时期动辄把人们维护自己利益的行为看做“狭隘的小农意识”甚至“阶级敌人的反抗”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对斯大林错误的反思中，赫鲁晓夫的认识甚至达到了这样的深度。当然这是后来的事情（波兰 1970 年导致哥穆尔卡下台的事件看上去使他思考了许多问题）在他看来，社会主义要胜过资本主义，要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的信仰，不是靠宣传，而是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靠实实在在地体现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优越性。他认为：“一个人从事劳动和活着，为的是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如果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好地满足这些需要，那么要宣传我们的观点和巩固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最后，我们将有丧失一切——以至于崩溃——的危险。”^②如果联系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发生的事情，赫鲁晓夫的话听起来与其说是一种观点，倒不如说更像是在预言。赫鲁晓夫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教导不能单靠课堂、报纸和政治大会硬灌到人们的脑子里去；以苏维埃政权名义所进行的鼓动和宣传也应该在饭店和食堂里进行。如果我国人民最终接受我们的制度和拒绝资本主义，他们就必须能用自己的工资买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出来的优质商品。”简言之就是：“你不能用思想来烧汤。”^③用赫鲁晓夫特有的语言风格表达出来的这些见解，在当时可以说是鞭辟入里、相当深刻的。

赫鲁晓夫试图根据利益原则合理地解释人们经济行为的动

《赫鲁晓夫言论》第 7 卷 第 129 页。

② 《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 三联书店 1975 年版 第 236 页。

③ 《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 三联书店 1975 年版 第 238 页

机 而不是简单地划分行为的好与坏。例如 他在评论人们常说的格鲁吉亚的投机倒把行为时认为，人们总有一种试图搞点额外收入的诱惑力。那就是投机活动的根本原因。为此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 如果格鲁吉亚人搞蔬菜的投机买卖 国家应该马上就在温床和暖房里种植那些蔬菜，那么从格鲁吉亚把这类产品运到莫斯科转售的投机商人就无利可图了。这些产品由国家企业来生产，价格就会比较便宜些。他批评斯大林从未想到这样一种合理的、积极的解决办法，而是简单地采取行政措施，亦即逮捕和流放人^①。这听起来很像是用经济杠杆来实现宏观调控的主张。

可以这样认为，赫鲁晓夫看到了人民利益得不到满足与党群矛盾之间的直接关系 试图用市场 而不是单纯的行政命令作为手段，来消除这种矛盾。这就把党对于人民的责任放到了一个比较实际的位置上 对于比较正确地处理政党、国家、人民之间的关系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但是 苏共能在这个基础上走多远 特别是 能在多大程度上用于思考和解决党的建设中的问题，就只能看赫鲁晓夫个人的造化了。

突破点 反对个人迷信

在斯大林时期 党和群众之间形成了不正常的紧张的关系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赫鲁晓夫认为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是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以这一思想为指导，苏共把解决党的建设问题的突破点选在了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上。

在 1956 年 2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

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报告引用大量未公开的材料向人们揭示了斯大林违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大搞个人崇拜的事实，揭露了与斯大林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大量导致党的干部、党员被监禁、刑讯、流放和处死的冤假错案，指出了斯大林领导的葬送大批指挥员前程的肃反运动给军队带来的不可估量的损失。报告对在卫国战争中斯大林的个人专断使苏军遭受重大挫折提出批评，对斯大林违反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强行进行集体移民，迫害少数民族等错误进行了谴责。报告认为，个人崇拜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违背了党的领导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使革命的社会主义法制秩序遭到破坏，必须坚决予以肃清。但赫鲁晓夫的报告没有对斯大林的功过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对斯大林的贡献只字不提，并且将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个人的品质和性格，这是带有很大片面性的。

苏共中央稍后几个月发表的《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比较深入一步地分析了个人崇拜能够在苏联产生、流行和造成后果的原因。决议指出，既要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具体客观历史条件去分析问题，也要从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有关的某些主观因素来考虑问题。决议认为，从客观历史条件讲，由于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受到资本主义的包围，它必须竭尽全力来加强国防，并教育全体人民始终一贯地保持警惕性，准备对付外部敌人。由于在苏联国内长期地进行着残酷的阶级斗争和解决着谁战胜谁的问题，党必须同国内阶级敌人和党内的反对派展开无情的斗争，由于党领导人民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需要克服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和障碍，因而“需要有铁的纪律，需要不懈地提高警惕性，需要有极其严格的集中领导，这不能不对一些民主形式的发展起不好的影响”^①。个人崇拜

^① 《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第一辑 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 第 165 页。

就是其中一个消极后果。

从主观因素讲，决议首先肯定斯大林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大理论家和大组织家，认为他“领导了党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斗争，以及反对资本主义包围阴谋的斗争。在这个政治和思想斗争中斯大林获得了巨大的威信和声望”。同时决议也指出，由于取得的成绩，由于所有伟大胜利都不正确地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起来，对成就的赞扬变成了对斯大林个人的颂扬，进而开始形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这之中，“斯大林的一些个人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个人崇拜的发展”。他“太过分地高估了自己的功绩，相信自己不会犯错误”。他把国内外严酷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对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的某些限制“变成了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准则”^①。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苏共对斯大林的评价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带来的既有消极的因素，又有积极的方面。由于苏共没有考虑到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不同情况，各国共产党也没有作好充分的思想和理论准备，所以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迅速传开时，许多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下子就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地位。一些执政的党内部矛盾尖锐化，并同人民群众发生冲突，另一些在资本主义国家活动的党出现党员纷纷退党的现象，党的群众基础遭到严重削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敌对势力则兴高采烈，乘机掀起反苏、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浪潮。

但是，尽管苏共批判斯大林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对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其积极意义仍占主导地位。一方面，批判个人崇拜推动了各国党解放思想、摆脱教条主义束缚的努力。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实践有

^① 《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第一辑 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 第 166、167、168 页

机地结合起来。在东欧各国建国初期，一些比较有远见的党的领导人看到了这一点，作了不少寻找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益尝试。但是，由于当时苏联道路被描绘成惟一正确的道路，斯大林的思想被看做惟一正统的思想，所有这些尝试都遭到了蛮横的压制和打击。在一次次的批判和镇压下，各国党都被迫向苏联模式和苏共模式靠拢，脱离了本国的实际，也脱离了本国的人民群众，导致了普遍的思想僵化，教条主义泛滥。这是 50 年代中期东欧各国及其执政党出现问题和危机的根本原因。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使各国党有机会重新思考本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状况，肃清教条主义给党的事业带来的危害，探索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另一方面，批判个人崇拜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高度集权、个人专断的现象，为各国党发展党内民主提供了可能性。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各国党都有消极的影响，表现在各国党内家长制作风盛行、党员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党内不同意见受到压制、民主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等方面。苏共发起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后，东欧各国许多搞个人专断的领导人失去了靠山，纷纷下台，大量冤假错案得到纠正，一些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得到平反。一些党的领导人有感于高度集权的危害，上台后十分强调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例如新当选的波兰党领导人哥穆尔卡提出，党应当进行改革，改革的根本方向应当是民主化。“党是我们人民国家的领导力量，没有党的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就不可能有国家生活的民主化。这是整个民主化过程正确发展和保证党在这一过程中起领导作用的条件。”^①批判个人崇拜为当时各国党摆脱教条主义束缚、探索本国道路提供了比较宽松的气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在各国党那里都受到了关注。

^① 《波兰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理论观点摘编》第 52 页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引起了共产党内（几乎包括所有执政的和执政的共产党）深刻的信仰危机。如有的苏共党员所说的那样“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破坏了我们的信仰 揪掉了我们世界观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斯大林’”^①。这种说法大体上是正确的。关键是我们今天应当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在很长一个时期，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被看做赫鲁晓夫的一大罪状，似乎由于赫鲁晓夫的这种做法 才引起了苏共内部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思想大混乱，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进入了低潮。如果不是赫鲁晓夫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乱子。甚至还有人认为 赫鲁晓夫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演变的始作俑者，他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是有意而为之，与后来戈尔巴乔夫毁掉苏共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观点有无道理？

如果从更深的层面上去看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我们就应当明确地看到，这种说法缺乏深度。主要问题不在于赫鲁晓夫怎样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在于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批判它，该不该批判它。和列宁时期相比 斯大林时期一个显著的转变 就是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逐渐转化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种转变使真理变成了谬误。不纠正这种谬误，社会主义就无前途可言 而纠正这样的谬误 又是必然要付出代价的。在中国共产党把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变成了对毛泽东本人的个人崇拜后，中国共产党也不得不花费很大的力气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轨道上来 其间同样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危机。所以，我们绝不应该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历史中得出这样的教训，似乎对个人崇拜不应该展开如此无情的批判。恰恰相反 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 共产党人在自己的实践中 特别是在掌握权力之后 万万不可人为地把对思想

[美] 斯蒂芬·F. 科恩：《苏联经验重探》 东方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11 页。

的信仰变成对领袖个人的迷信。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轻者，等于把自己的理论体系、指导思想等一股脑儿地推上了一条独木桥，系千钧于一发，使理论面临破产的危险；重者，等于把共产党的“主义”领进了一条有来无回的死胡同。面对这样一种状况，无论由谁来充当领路人，他的面前都是布满荆棘的。我们只能防患于未然，避免走到这条道路上去。

所以，与其说对个人崇拜发起批判是赫鲁晓夫的失误，毋宁说是他的一个功绩。这种批判无论如何是必要的。赫鲁晓夫的失误在于他的批判不彻底。他把个人崇拜这样一种高度集权体制的必然结果当成了一切问题的原因，这就本末倒置了。

着眼点 建设一个“全民党”

赫鲁晓夫对于利益原则的明确认识，和在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方面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对于改革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兆头。然而改革绝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实际上，一触及政治体制，特别是一触及到执政党这个核心问题，赫鲁晓夫那种改革的锋芒似乎立即就减弱了许多。

赫鲁晓夫对改革本身充满顾虑。在回忆录中，他对这种忧虑心情作了一些描述：“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是赞同解冻的，但……我们有点慌张——确实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怎么能把我们淹死呢？洪水会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并形成一股会冲破我们社会的所有堤坝的浪潮。从领导上的观点来看，这将是一种不利的发展。我们要引导解冻的发展，以便它只去激发那些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力量。”^①这可以说道出了大权在握的改革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三联书店 1975 年版 第 138 页。

者们的共同想法。

这种顾虑，加上当时在认识上尚未把根本制度与具体体制区分开来，就决定了改革的命运。决定了赫鲁晓夫只希望把改革限定在原有体制框架的范围内。他看到了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党内运行机制带来的种种弊端，看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但是，正如许多著作中公正地讲到的那样，他并没有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到整个党的运作机制渐渐失灵的原因。更多地，他是想用党的系统取代过去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警察系统。倒是在他退休之后反思过去的时候，反而对党的作用的认识要深刻得多。他认为：“党应当纯粹起政治上的作用，技术问题应该留给专家们去解决。”^①

由于缺乏整体改革思路，在对党自身改革方面，赫鲁晓夫的想法显得随心所欲，杂乱无章，有时甚至充斥着矛盾。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轩然大波的“全民党”问题，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

从60年代开始，苏共开始提出“全面开展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斯大林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没有对国家的性质、国家发展所处阶段等重大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苏共总结这一教训后认为，正是斯大林关于随着苏联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将越来越尖锐的错误论点，给社会主义事业，给党内国内民主的发展，给人民的利益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害，成了破坏革命法制，进行无端迫害的理论基础。从这一认识出发，苏共和赫鲁晓夫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在这基础上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主张。

1961年6月苏共全会通过的决议称，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建设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苏共认为，在苏联，剥削阶级早已被消灭，社会主义不再分裂为反动的阶级和进步的阶级。在这

《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 三联书店 1975年版 第224页。

里，人与人之间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发展和巩固了，社会对抗永远消失了，人民在社会政治和思想上的统一形成了。因此 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已经实现。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停止 发生了以往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局面 国家终于不再成为阶级的统治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了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民主变成了全民的民主。全民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新阶段，是社会主义国家组织转变为共产主义自治的道路上的极重要的里程碑。历史上第一次在苏联形成了这样一个国家，它不是某一个阶级的专政 而是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的工具。苏共对苏联由阶级的国家发展成全民国家的过程明确划分阶段，并进行了论证 在 30 年代中期以前，苏维埃国家具有鲜明的并为法律所确认的阶级性质，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在 30 年代中期到 50 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始逐渐改变其性质，越来越从阶级的国家变为全民的国家。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两次代表大会之间，苏联完成了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全民国家的过程 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发展的第三阶段 向国家的完全消亡又跨出了一步。

“全民国家”的理论给苏共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这个国家怎么办，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共产党怎么办？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 在共产主义条件下 阶级完全没有了 国家的主要职能——镇压的职能没有了，于是国家就要走向消亡。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的存在也就失去了合法的理由。苏共当然不希望得出这样的结论 它不可能取消自己的存在。既然如此 那就需要对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给予新的解释。赫鲁晓夫和苏共是这样自圆其说的：随着苏维埃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建成和向建设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的过渡，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转变为依靠社会所有阶级和阶层的社会主义的全民的国家，作为社会全体劳动阶级和阶

层利益体现者的苏共的人民性愈加强烈地表现出来了。由于消灭了剥削阶级和逐渐地消除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社会差别，在苏联形成了人民紧密的、牢不可破的社会政治和思想上的一致，工人阶级的思想就成为全体居民阶层的思想，而工人阶级建成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也变成了全民的任务。作为工人阶级政党而产生的共产党，如今已成为全体苏联人民的党，它在自己的队伍中联合着先进的、最有觉悟和积极性的人们，是所有居民阶层的代表。这就是“全民党”理论的由来。

可见，“全民党”的提出，并非像以前我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在故意抹杀党的阶级性，取消党的先进性，是要改变党的性质。相反，“全民党”是苏共在对苏联发展阶段“左”的估计基础上为继续保持党包揽一切的地位所寻找的一个理论依据，是为继续强化党对整个社会的控制、维持以党代政体制的合法性寻找的一个理由。因此，“全民党”不是像它的字面意思所表达的那样，是要贬低和淡化党的概念，是“右倾”，而是“左”的思想的典型表现。它表明，赫鲁晓夫在思考党的建设问题时，并没有摆脱在传统党建模式中一以贯之的那种“左”的思维，很难说是什么创新和突破。

当然，“全民党”理论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理论缺陷，给党的建设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这也是事实。它客观上淡化了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忽视了党内斗争和党内矛盾，并使党赖以存在的理论根基发生了动摇。这种消极影响也反映到了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中。但是，过分夸大这一观点在苏共走向衰败中的作用也是不对的。在实践中我们看到，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决定性地位并没有因为使用“全民党”的提法而发生丝毫动摇。对于苏共变成“全民党”之后是否还在苏联社会中起领导作用和先锋作用的问题，赫鲁晓夫和苏共的回答是肯定的。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纲党章都进一步明确规定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并且强调，由于共产主义建设任务日益复杂，由于更多的劳动

者参加国家事务和生产管理，由于社会组织和地方机关的作用不断提高，由于新的任务要求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党的领导不能削弱，只能进一步加强。这四条理由比斯大林时期关于加强党的领导解释还多了一条。因此，说苏共最后变质与‘全民党’理论有必然的联系，缺乏足够的有说服力的依据。

落脚点：加强党的领导

赫鲁晓夫不认为苏共在斯大林时期发生的问题和错误很大程度上是党过度集权、党政不分和党内缺乏民主造成的，而是把问题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国家安全机关凌驾于党之上削弱了党的领导。这讲出了一部分真理，但深究起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是因为权力过度集中的体制。赫鲁晓夫没有深究一步。因此，他把解决问题的落脚点放在了加强党的领导上。

赫鲁晓夫和苏共提出了旨在强化党的领导的一系列措施。

第一 强调集体领导制度。鉴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教训，赫鲁晓夫和苏共强调在党和国家各个环节中实行集体领导原则，认为这是防止个人崇拜的可靠保障。苏共二十二大把“苏共的最高组织原则是集体领导制”明确写进了党章。作为集体领导制的一个体现，此后的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主席团会议都做到了如期召开。苏共二十二大指出，党的领导最高原则是领导的集体性，它保证党及一切党的机关不致采取片面的、主观的决定和行动。只有集体领导才能为发挥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创造条件，保证正确地教育干部。当然，集体领导不等于个人可以推脱职责。苏共强调，领导的集体性丝毫不削弱工作人员对委托给他的工作，对执行集体通过的决议的个人责任。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领导集体性的原则、经常地更换党的机关成员，能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在个别工作人员手中的可能性以及个别工作人员脱离集体监督

的情况 保证新生力量源源不断地注入党的领导机关 把老干部和青年干部正确地结合起来。

要保证集体领导，就必须加强监督。苏共二十二大决议指出了监督的重要意义：监督制度是在真正民主原则基础上完善共产主义建设的领导工作的有效手段 是同官僚主义、拖拉作风作斗争的可靠武器，是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学校。为了加强监督工作，必须建立地方党机关向上级党机关和党员群众汇报党的决议执行情况的严格报告制度。当然 文件的规定是一回事 能不能做到又是另外一回事。问题的关键在有没有形成相应的体制和机制。在赫鲁晓夫时期进一步得到完善的无所不在的监督，从本质上说和斯大林时代的监督没有区别 仍然是自上而下的监督 而非自下而上的监督 因而仍然是加强集中的工具。例如 由仍由中央全会选出的监察委员会来监督中央委员会，任何时候都会是一张空头支票。

第二 推行领导干部定期更换制。苏共认为 干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实行定期和按比例更换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发展规律，是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好办法。赫鲁晓夫强调 经常更换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应成为一种制度 政府和社会团体由选举产生的机关组成也采取更换的原则。向这种制度过渡，将是发展民主制的一大步骤 在这基础上 为更彻底地实现集体领导制原则创造新的可能性。为此，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在第 25 条中对每次选举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基层党组织书记的更换率、任职届数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领导干部定期更换制有如下主要内容：“在选举党的机关的时候，应遵守经常更换其成员同时又保持领导的继承性的原则。在每次例行选举的时候，苏共中央委员及其主席团的成员至少更换四分之一。主席团委员一般最多只能连续当选三届。某些党的活动家 由于他们享有公认的威信 具有高度的政治品质、组织者

品质和其他品质，可以在更长的时期内连续选人领导机关。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关的候选人在不记名、秘密投票方式下至少有四分之三的参加者投票赞成方可当选。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边疆区委会、州委会的成员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至少更换三分之一，党的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组织的党委会或支委会的成员至少更换一半。同时，这些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过三届。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过两届。全体大会、代表会议、代表大会根据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可以更长期地将某一工作人员选人领导机关。在这种情况下，至少须有参加投票的四分之三的共产党员投票赞成，方可当选。由于期满而不再是党的领导机关成员的党员，可以在以后选举时重新当选。”

任期制的确是赫鲁晓夫的一个重大举措。根据任期制，赫鲁晓夫时期的干部更新率是相当高的。据统计，这一时期中央委员的更换率，二十大为 37.6%，二十二大为 50%。1952 年当选的中央委员 125 人，到 1961 年二十二大只有 31.2% 的人继续当选。中央部一级领导干部在这个时期更换率高达 81.7%。基层党组织书记的更换率最高，每年更换 60%。根据苏共 1962 年的统计，在党的州委员会和加盟共和国第一书记中，担任这一职务不到三年的占 70.5%，党的区委会和市委会的书记，工作不到三年的占 78.8%。干部大规模更新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使干部知识化、专业化水平有了提高。据统计，1962 年，半数以上的集体农庄主席和 90% 的国营农场场长受到专门教育。到 1963 年，在边疆区和州一级，有 98.6% 的工业书记、96.2% 的农业书记受过高等教育。不过，赫鲁晓夫的这一着棋也产生了负效应。它明显侵犯了干部们的特权，在干部中产生了强烈的不稳定感。受这一条款打击最重

的是中层干部。因为党的代表大会每 5 年召开一次，因而任何中央委员或中央主席团委员的最长任期都有 15 年之久而区委、市委和州委的改选按规定每 2 年举行一次，因此这些机关及其下属组织中的任职期限最多只有 6 年。这导致了这层干部的不满，是促使他们起来推翻赫鲁晓夫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 赫鲁晓夫改革了任期制 却没有触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变相任命制。这使得改革不配套，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效的机制。所以有人把赫鲁晓夫称做“穿歪鞋走路的人”。

第三，改组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赫鲁晓夫和苏共不觉得党直接管理经济有什么不对。在他们看来，关键在于要管得具体和科学。只是从这个角度认识 苏共才认为 旧的党组织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党领导生产的障碍。苏共认定，为“保证对工农业生产的更具体的领导”，应当以生产原则为基础自下而上地改组党的领导机构。

根据这一思路，1962 年 11 月 苏共中央召开全会 决定对党的领导体制进行改革。全会认为，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条件下 党的作用无比增长 对国民经济的领导进行组织上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此，“必须过渡到自下而上地建立党的领导机关的原则”；“自下而上地改组党的领导机构”。这项改革的具体内容是在边疆区、州的范围内成立两个独立的党组织——领导工业生产的党委会和领导农业生产的党委会。在苏共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则成立相应的中央工业生产领导局和农业生产领导局。为了解决具有全共和国意义的问题和协调两个专业局的工作，在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选出中央主席团。这一改革的中心内容是为了便于对经济进行直接的具体领导，仅仅按生产的原则建立党的领导机构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 党的机构要兼管某一地区的全部行政和生产工作。在原各级党组织基础上分别设立领导工业的党委和领导农业的党委后 党组织被人为地分成了“工业党”和

“农业党”两个部分。

这种设置使领导工作完全乱了套。它至少带来了如下问题：第一 造成了难以克服的不协调。集体农庄自然归农业党委管 随之而来，农庄里为它们提供服务或加工农产品的工厂党组织和党员也要归农业党委管。与此同时 既为农庄农场、也为城市提供师资的师范学校 以及既为工业、也为农业提供用品和服务的工厂则要归工业党委管。一旦涉及双方的问题，只有两个党委进行协调才能解决。第二，机构不可避免地臃肿起来。跟着两个党委的建立 也建立了两个苏维埃执委会。下面的附属机构随之产生 两个卫生局 两个教育局 两个财政局 两个文化局 甚至还有两个民兵指挥部等。各州党政机关和干部的数目大量增加，工作程序更加繁琐。两套机构运作不是给工作带来了效率，而是使官僚机构相互扯皮的现象更为严重。米高扬在回忆录中谈到这种情况：一个人要办工作证或其他证件，需要乘车到设在很远的生产管理处去；一个人病了，由于管辖部门不同而不能就近治疗；在某个地方居住 但所属单位不在本地 享受附近的文化设施就要受到限制 甚至有了事情也不能找不是本系统的民警；等等。

用这样一个所谓重大措施来加强党的领导，其效果只能适得其反。

改革 还是沿袭？

如果说 在上面所述的若干方面 赫鲁晓夫想改变斯大林时期的某些做法 却没有找到更科学的替代物的话 那么在另外许多方面，赫鲁晓夫则完全没有摆脱传统模式的束缚。其思路仍然是斯大林式的。

例如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问题上 赫鲁晓夫和苏共没有得出新的结论。正是在批判斯大林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依然

对斯大林工业化和集体化路线持充分肯定的态度。他强调：“试想一下 倘若 1928—1929 年指望靠‘印花布的工业化’、依靠富农的右倾政治路线在党内取得胜利，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那我们就不会有强大的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下就会手无寸铁、束手无策。”当然，赫鲁晓夫也对斯大林的某些过火行为进行了纠正。例如，他指出，由于农业领导中的缺点，违反了物质利益的原则，农业的发展速度显然落后于工业发展和居民对日用品需要的增长速度：1940 年到 1952 年，工业产量增加了 1.3 倍，农业总产量只增加了 10%。因此他提出要重新确定一系列重要原则来保证农民的利益，如“在集体农庄内，除主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公有经济外，每一个集体农户都有权保有小规模的经济作为个人财产”；提高畜产品、马铃薯和蔬菜的征购和收购价格，并降低义务交售的定额等等。他甚至认为，斯大林时期的粮食收购政策带有“余粮收集制的性质”，对农村经济起着破坏作用。

在用行政命令方式领导经济方面，赫鲁晓夫没有离开斯大林的基本观点。国家制定计划，农民完成计划，仍然是赫鲁晓夫思考农民问题的基本思路。所以，到后来农业形势稍有好转的时候，特别是 1956 年和 1958 年农业取得大丰收之后，他就头脑发热了，一味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当高指标变成了对各级党组织的死命令后，弄虚作假的现象便愈演愈烈。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梁赞州的州委书记拉里奥诺夫，为了迎合赫鲁晓夫，提出了比计划要求更高的指标，保证州内各农庄将肉类产量提高 5 倍，其中国营农场提高 4 倍，出售给国家的肉类增加 3 倍。为了达到目标，州党委下令，不仅肉用牲畜，而且奶牛和种畜也一律宰杀。从农民手里买牲畜，只打欠条，不付现金。各农庄和国营农场在这种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到别的州购买牲畜，然后低价卖给政府。其他州起而仿效。梁赞州通过这类办法完成了高指标，拉里奥诺夫为此获得了社会

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和列宁勋章。然而，到 1960 年，梁赞州黔驴技穷再也无法完成任务 拉里奥诺夫被迫自杀。

在对农民的基本估计上，赫鲁晓夫的偏见与斯大林一脉相承。他说过：“说实话 如果我们主要指望个体交售者 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无能。如果拥护这种‘理论’ 这种‘理论’就要掉过头来危害集体农庄 危害集体农庄制度。”一再强迫集体农庄庄员发展自己的个体经济，一再要求他们向国家交售畜产品 这终究不是个办法。应该首先发展并且主要是发展公共经济。”^①所以 当农业状况稍有好转时 他便雄心勃勃 取消了农民的自留地 提出建设大农场和农业城的计划 急于向更高的生产关系形式过渡 这显然是对斯大林单一所有制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他要“到 1980 年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社会”。1961 年苏共二十二大宣布，苏联已经进入了全面进行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

不能否认，赫鲁晓夫在政治运作的合理化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在斯大林时期 内务部的权力甚至高过了所有党的机关 横行于斯大林一人之下、所有机构之上。赫鲁晓夫削弱了这种势头。他把内务部和克格勃的权限规定在进行犯罪调查的范围内，并且在检察院中专门设立了一个处 监督这两个机构的活动 总检察长本人只向党中央委员会负责。赫鲁晓夫还企图对引起人们愤怒的特权制度作一些改变。他停止了发放‘工资袋’的制度 减少了享受额外待遇的人员，包括到克里姆林宫医院和中央医院就诊的人，在“食疗餐厅”就餐的人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的专车等。但是由于他对传统党建模式缺乏系统的认识，他的这些措施具有明显的零打碎敲的性质 老百姓不满意 普通党员不满意 当然也引起了既得利益阶层的不满。结果是，赫鲁晓夫逐渐失去了各个方面的支持。

^① 《赫鲁晓夫言论》第 5 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 年 4 月版 第 178 页。

怎样才能对赫鲁晓夫的党的建设改革有一个全面的评价？

总起来说，赫鲁晓夫是一个不高明的改革家。他没有能够改变斯大林留下的传统党建模式和体制。在这方面的改革，实际上远远未能触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党的建设模式本身。相反，他一如既往地利用着这套机制。结果是，尽管赫鲁晓夫主观上是想克服斯大林时期党的活动的弊端，这些弊端到后来却又统统复活了。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个人崇拜现象。传统党建模式本身就是一个制造个人迷信与个人崇拜的体制。赫鲁晓夫把反对个人崇拜作为自己改革的突破口，多次发起反对个人崇拜，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个人崇拜中，只是用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代替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从赫鲁晓夫权势日盛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权力由“三驾马车”向赫鲁晓夫个人的集中。这同由列宁逝世初期的“三驾马车”向斯大林个人集权的发展如出一辙。到赫鲁晓夫权力达到顶峰的时候，他已经一言九鼎，没有人敢提出与他相左的意见。相反，一大批应声虫式的人物往往使事情变得更坏。例如赫鲁晓夫把党委一分为二时，不但没有人表示反对，反而马上有人断言其重大意义。麦德维杰夫是这样描述赫鲁晓夫后期逐渐走向专断的：“以往凡属大规模的组织变动，哪怕是为了纯粹走个过场，也还要经过全国范围内的广泛讨论；可是最近这些改革却连个招呼都不打，不经全国协商人民首肯便开始实施，所需要的只是同党中央主席团委员简单交换一下意见而已，而且这种意见交换也只不过是摆摆样子，因为很少有人愿意斗胆同赫鲁晓夫争个长短是非。”^①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的苏联舆论中，颂扬、吹捧之词和斯大林时期一样充斥其间。这种状况，不但使赫鲁晓夫无法清醒地看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甚至连一些人串通起来反对他，试图从组织上

罗·亚·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300 页。

罢黜他的迹象也无法觉察到。这是很具讽刺意义的。

由于没有看到个人崇拜产生的体制性根源，赫鲁晓夫也就无法根除由此产生的种种弊端：他的集体领导制对于防止个人专断无异于杯水车薪，而没有成为“可靠的关卡”。他的干部更换制可谓用心良苦，但干部由于更换过于频繁失去安全感，转而反对他，并导致了他的最终下台。至于把党组织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则纯属草率的和脱离实际的决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多头领导，使党组织更加具体地管理生产，加重了党政不分的弊端。赫鲁晓夫本人也没有把握好改革的分寸。一方面，他在某些方面做得很冒险、很不周到，如对斯大林的评价、干部任期制的改革等；另一方面，他又谨小慎微，固守旧的教条和体制。在他的呵护下，赫鲁晓夫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党的建设模式仍然延续了下来。

第十一章

“停滞时期”的苏共

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接受教训，停止了赫鲁晓夫开始的在党的建设方面进行的改革。同时，为避免重犯斯大林时期的错误，苏共新领导也对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作了一些探索。总的说来，这些探索不但没有超出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模式的基本框架，而且也没有超过赫鲁晓夫时期的党的建设实践。这一时期的苏共实质上是在剔除斯大林党建模式中的极端部分（如阶级斗争扩大化、领袖个人权力绝对化等）的前提下，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这一模式。旧弊端加上新弊端，终于结合成了苏共难以治愈的沉疴。

平平淡淡的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

勃列日涅夫也意识到，要改善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就不能不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方面作某些改进。所以，这一时期，对传统模式所有值得改的方面，苏共几乎都作了强调：科学地选拔干部，建立严格的监督制度，处理好党政关系，党不要包办政府的工作，发扬民主，扩大公民权利，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苏共特别表示了对人的地位的重视。勃列日涅夫在 1974

年一次对选民的讲话中讲道：“一切为了人的幸福 为了人民的幸福，这两句简短的话包含着极其深刻的意义和共产党活动的目标。”“它把提高苏联人的福利置于党的实际政策的中心。”甚至可以说 在意识形态方面 和过去相比 也有相当程度的开放。例如《真理报》为康德 250 周年诞辰发表文章。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但是由于计划经济的思路没有变 由党作为绝对正确的力量代替人民做一切事情的思路没有变，这些方面更多的只是强调强调而已，并非真的要付诸行动。这一时期的苏共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总体说来 显得清汤寡水 平淡无味。

在这平淡无味之中 有两个方面算是有点特色 因为它对赫鲁晓夫的思路作了改变。

其一，进一步强调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苏共继续沿用赫鲁晓夫的“全民党”观点 同时也给党的阶级性以醒目的位置。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把所在阶段确定为“发达社会主义”时期。与此相应 对党的定性也有了一个稍加改动的说法：“在发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 在共产党已成为全民党的时候 它决没有失去自己的阶级性。就其性质而言 苏共过去是 现在仍然是工人阶级的政党。”1965 年苏共二十三大强调，“党把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代表团结在自己的队伍里”党的社会成分中 工人阶级仍应占主导地位。1976 年二十五大更明确地指出：“在发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 在共产党已成为全民党的时候 它决没有失去自己的阶级性。就其性质而言 苏共过去是 现在仍然是工人阶级的政党。”^①在 1977 年通过的新宪法中，苏共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写进第 6 条：“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体制以及国家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核心。”苏联共产党规定社会发展的总的前景 规定苏联的内外政

^①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 12 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 3 月版 第 94 页。

策路线 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伟大的创造性活动 使苏联人民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具有计划性 并有科学根据。”

勃列日涅夫纠正了赫鲁晓夫的所谓改革，把赫鲁晓夫的工业党、农业党重新合并成了统一的党组织。1964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 决定恢复统一的边疆区和州党委会。《真理报》发表的社论指出：“两年前 根据所谓生产原则 对党组织进行了改组，结果把绝大多数边疆区和州的统一的党组织分为两个党组织：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各自成立了自己的领导机构。成立了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党委和工业生产（地区）党委来代替农村区党委。后来 对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组织进行了同样的改组。生活并没有证实这种改组是适宜的，这种改组是在缺乏应有的准备、不考虑它的全部后果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地匆匆忙忙地进行的。……把党组织分为工业的和农业的，引起了许多困难和麻烦。改组同生活发生了矛盾。生活表明，实际上不可能划清工业党组织同农业党组织的活动范围。用所谓生产原则代替按地区生产特征建立党组织的原则，客观上使党政机关和经济组织的职能、权力和义务相互混乱，使党委会代替了经济机关。改组的结果 作为行政经济单位的区 在党和国家的关系上应付不过来。”^①这里讲的是事实。

其二 废除干部更换制 形成了事实上的干部职务终身制。赫鲁晓夫确定的定期更换干部的制度危及了干部的切身利益，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根据这种情况，苏共二十三大简单地删去了党章中规定领导干部任期制的第22条 把它简写为 在选举一切党的机关时，必须遵守经常更换其成员和领导继承性的原则。抽去了具体内容 抽去了任何可操作的东西，“经常更换”就变成了一句典型的空话。这是屈从于党和国家机关中官僚阶层利益的一个

^① 《真理报》1964年11月18日

典型例证。这样做的结果是，干部队伍更新的速度明显减慢，更新比例越来越小，干部结构日益老化。许多人只要不犯大错，就可以一直呆在领导岗位上，事实上就是终身制。干部队伍的老化对党的事业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这一点，在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从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的建设的基本思路：不是要在赫鲁晓夫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对赫鲁晓夫已经改了但却不成熟、需要再改的方面），而是继续奉行革命时期形成的那套高度集权的模式。当然，至少在字面上，勃列日涅夫不能不顾及全党的情绪，保留赫鲁晓夫改革的某些成果。例如，勃列日涅夫在不少讲话中都肯定苏共二十大的地位，谈到要继续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等。但是，党的建设方面的真实情况是，勃列日涅夫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恢复被赫鲁晓夫改掉的东西上。而在恢复原来领导体制的同时，也恢复了原有体制的弊端。就好比赫鲁晓夫认为现体制不行，应该改，但却没有改成功，于是勃列日涅夫就说你改错了，说完就又恢复了原来的那套东西，就好像它本来就是正确的。大体上看，勃列日涅夫在党的建设方面所做的事情，仅限于此。这就使党的病症进一步加重了。

传统党建模式的固化

勃列日涅夫时期伊始，苏共似乎下定决心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但是，今天看来，这个改革远不是针对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就是这样一个改革，后来也停了下来。在这种基础上，可想而知，经济体制改革的毛毛细雨，真正落到党头上的，几乎觉察不到。相反，既然体制和模式都是旧的，那么这套模式在形成之初就逐渐暴露出来的弊端就无法得到克服，并且愈演愈烈。像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官僚主义、党政不分、不正之风盛行等，都在不断地定期重复。

且形成恶性循环。它使苏共与人民的隔阂日益加深，越来越难以担负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这也正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一提改革就能够得到八方呼应的根本原因。

在这一时期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状况继续发展。和赫鲁晓夫时期一样，这一时期的苏共也一开始就反复强调列宁关于党政分开思想的重要性，并就党政职务分开作了具体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党具体干涉行政事务的现象有增无减，越来越严重。到 70 年代末 苏共中央共设置的职能部已达 25 个 与政府各部相对应，进行具体领导。其中就包括像农业部、化学工业部、建筑部、重型机械制造部、能源部这类的纯经济职能部。党的干部兼任行政和经济组织的官员、党组织代替这些机关行使决策权的做法也越来越普遍。

至于党内民主，可以说是对扭曲的形态习以为常。1964 年《共产党人》杂志第 10 期发表的一篇社论 把“共产党员要遵守严格的纪律 要有责任心”说成是“党内民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共产党要强调纪律 这毫无疑问。但是 纪律是纪律 民主是民主，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因为纪律重要，就认为它可以代替党的活动的其他所有方面 正是集权体制赖以建立的一个重要借口 是典型的斯大林式的逻辑。党的权威性杂志的认识尚且如此，党内民主的稀缺程度可想而知。麦德维杰夫正确地描述了当时党内已经形成的状况，给党内的选举制蜕变成变相的任命制作了生动的注脚：“党的区委会的选举实质上早已是形式主义的、不民主的行动。在基层党组织的总结选举会议上，一般是普通党员详尽地讨论所提出的支委会的候选人 而在选举苏共区委会的时候 情况就不是这样。众所周知，这样的选举在党的区代表会议上两年进行一次。这种会议不会用民主方法提出候选人。代表会议的一个代表宣读一份区委机关早已准备好了的、上届区委常委会和苏共市委机关赞同了的区委会成员候选人的长名单。通常，另一个代表接着宣

读党的市委代表会议的代表候选人名单。按莫斯科区的范围，这两份名单包括 150 个人名，在其他城市和农业区中则有 100 个人名。尽管代表会议的普通代表对这些候选人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但谁也不对所提出的候选人作介绍，不对他们进行任何讨论了。如果考虑到名单是如此之长，即便进行讨论也是不可能的。秘密投票的名单确定之后，代表会议的每一个代表都得到预先铅印好的区委会和市代表会议候选人的名单。代表会议的代表匆忙浏览一下这两个名单之后，就把它们投进投票箱。从与区代表会议的参加者们的谈话中，我们了解到，莫斯科最近十年来，在无论哪一次党的区代表会议上，从来没有人对预先准备好的区委会候选人名单做过增补或者把某个候选人从这个名单中除去。”

任命制完全被固定化了。每一级党委可以任命的范围和权限，都形成了具体详细的规定。区委、州委、共和国党中央、书记处、政治局都有自己的主管干部，连工厂厂长或国营农场场长的任命都要由区党委会批准。政治局主管的干部包括州委、边疆区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所有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副主席、各部部长、《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主编、意识形态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高级军官、克格勃各部门领导人、军工企业领导人、苏联驻外大使及其他一些职务。苏联学者布坚科指出：“官员花名册原则（方法或体制）即按照党和国家等级制的‘上层’的意志，或者直接按照‘领袖’的意志，权力异化的主要方式，任命和调动领导干部，是行政命令管理体制中主要的反民主的，因而也是反社会主义的轴心，因为正是这个原则决定了由管理金字塔上层任命的干部个人的依附关系，决定了他们完全不用向劳动者报告工作。这种管理模式的实质本身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对处于等级制最

①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 1980 年出版，第 72 页。

高层顶端的领袖或领导人的‘天才’的顶礼膜拜 因为对‘天才’的顶礼膜拜和崇拜是下级人员的直接的个人依附关系的必然结果，他们的升贬不取决于自己工作的成果 而取决于领袖的青睐 因为领袖会任意惩罚或赦免自己任命的人，随心所欲决定他们的命运，决定他们的升降沉浮。由于这种体制的存在和运作，一切‘不要崇拜’领导人的号召都是徒劳的，正如由于对当权者们缺乏监督，不要滥用权力的号召也毫不起作用一样。”

干部职务终身制再度泛滥。而且成为勃列日涅夫控制干部的手段。关于这一点 利加乔夫描述道：“在勃列日涅夫时期 党的领导干部是否退休，主要取决于与某些政治局委员和列昂尼德·伊里奇本人的关系。这种程序（确切些说是无程序）必然要加重地方领导人对中央和莫斯科领导机关的依赖性。就问题的实质来说，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好恶程度 换句话说 是否退休问题在于主观方面。”^②

群众对党的疏远继续加剧。在处理党和群众的关系方面，斯大林模式本身就存在在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 由政权所自我认定的性质决定 它不能不把人民是主人的意识反复加以强调 这大大刺激了人们民主意识的增长 另一方面 体制本身又难以为人们提供足够的民主表达的渠道和途径 高度集权，一党专制 群众组织降低为传送带，等等。这就使人们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在爆发时机不成熟时 这种不满情绪转化为两种储存形态。第一 对政治极其冷淡 极端不信任 冷嘲热讽的政治笑话俯拾即是 第二 通过非法渠道寻求表达，持不同政见者的数量迅速增加。勃列日涅夫时期就属于这种状况。工人用这样的冷嘲热讽看待政府和群众

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394—395页。

〔俄〕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第23页。

的关系：“他们假装付工资给我们，我们假装劳动。”这实在是对主人翁地位的莫大讽刺。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悄然下降。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封闭程度降低，人们有了更多的与西方人接触的机会。但这并没有起到使苏共更加实事求是的作用。相反，倒是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一方面，统治集团仍然固守着传统的说教，教育人们不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另一方面，西方人的生活水平又真真切切地摆在人们的面前，而且党的各级干部乘机享用。这在人们思想上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从这个角度看，应当说，给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衰败埋下伏笔的，主要不是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是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是西方的价值观念销蚀了人们的斗志，而是现有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这种巨大的脱节和反差。被大肆宣传着的那种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一旦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就首先在思想上破产了。罗·麦德维杰夫对此这样评价道：“当前，党的宣传所依据的是教条主义化的、歪曲了的和极其简单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的这种思想体系不能回答当代生活的许多复杂问题，因而也就不能成为大多数思维健全的人们的思想指南。当然，我们的宣传对消息闭塞的人们还是颇有影响的，但是这种影响也在不断削弱。党的庞大而代价昂贵的宣传机器越来越经常地进行着徒劳无益的工作，它采取的许多措施，在苏联人民的心目中并没有起什么作用。”^①毫无疑问，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①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 1980 年出版，第 35—36 页

特权者的党

如果错误只是失误，那是无须大惊小怪的。因为哪个党也难免会有失误，况且失误是可以纠正的。但是遗憾得很，问题不止于此。长期的体制性的错误不但经常导致决策和运作的失误，而且还使一个庞大的寄生物——官僚阶层得以形成。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在党内业已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已经具有使所有的政治运作（包括改革）按照这个阶层的意志来进行的能力。在这种力量的影响下，任何改革都很难保证正确的方向，反而会经常出现变形。从这个角度讲，苏共后来的改革失败虽有大量偶然性，却也包含着某种必然的因素。

勃列日涅夫时期，被赫鲁晓夫一度削弱的特权现象重又发展起来，而且其发展速度之猛，是以前的类似情况所无法相比的。勃列日涅夫不只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取消或限制的规定，而且实际上还建立了新的庞大的系统。在“食疗餐厅”就餐的人数迅速膨胀，以致在这里和在大街上一样，也排起了购物的长队。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回忆：“当时在各共和国首都和某些大城市都有类似的餐厅和内部商店。为了仿效建立这种制度的经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曾派人到我国取经，他们参观了位于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餐厅，赞扬餐厅的供应原则，只是提出一条意见，看来俄罗斯人确实有民族特点——甚至在内部商店也排队。当时情况的确如此。为了买半公斤香肠或小灌肠，有时不得不排上一个小时的队。我亲眼看见排队的人群中有全国著名学者、设计专家、著名演员及一些科研和文化界人士，他们的时间极为宝贵，把时间浪费

在这类特权上简直是犯罪，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上班时间内。”^①他证明“高级领导人的特权制度不只限于免费食品。他们的住房、别墅、汽车等很多的费用也都由国家或党的预算负担。他们的住宅通常在设备齐全的高档楼房里，必要时配备警卫和各种服务人员”^②领导人们的“别墅位于首都西部，在莫斯科河沿岸地区，一般都是现代豪华别墅，通常坐落在松林地带，占地达 50 公顷。别墅区有温室、家禽放养栏和其他小动物栏。最近又在别墅旁边修建了游泳池和芬兰蒸汽浴室。这些别墅都是建筑杰作。别墅均是几层小楼，有很多房间、卧室、浴室、卫生间。楼内有宽敞的餐厅，可容纳 40—50 人，既可打台球，又可看电影。通常别墅旁边设有储藏室、冷冻室、厨房。院子里有保温车库，昼夜可以停放专车。大概所有的家眷都在这样的别墅里靠党和国家的经费生活”。 “为国家别墅服务的工作人员很多，如厨师、服务员、清洁工，当然还有花匠和警卫员。”遗憾的是很多人很快习惯了这种奢侈，他们开始感到自己的身份，在外表、举止、言谈话语中不时地表现出一副官气，他们与过去同事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③

勃列日涅夫时期，被赫鲁晓夫废除了的“工资袋”重又发展起来了。部长会议规定，部长及主管部门的领导人每人可拿 350 卢布个人津贴；高级干部还可得到价值达 300 卢布的免费疗养证。开设了专供高级干部购货的莫斯科国营百货商店“200 号”秘密售货部以及为其他官员设立的中央百货商店“45 号”售货部。80 年代，一名苏联问题专家推测，如果把法定特权计算在内，苏联一名

①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56 页。

②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58—259 页。

③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59 页。

部长或科学院院长的开销能力，至少是普通工作人员或体力劳动者的最低工资的 60 倍。

党的机关干部拥有的令人羡慕和嫉妒的特权，像花儿招蝶一样吸引了大批有改善自己处境和地位的强烈愿望的人。作为一个体制中人 特权现象的受益者 曾做过党的幕僚的学者阿尔巴托夫这样描述机关干部的生活方式：“许多人主要是由于受追求权力和进入一个特殊圈子的思想的驱使而进入中央机关的。在封皮上印着苏共中央委员会字样的红色工作证就是属于这个圈子的证明。这种工作证被称为‘随处可去的通行证’，拿了这个通行证你几乎可以进入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很难说人们对党中央的干部主要抱的是什么态度，是尊敬，是拍马屁，还是恐惧。人们从幼年就开始被灌输要对执政党的成员表示尊敬的思想，因为党一直教导我们要在他们身上看到‘我们时代的光荣、智慧和良心’（这是印在党证第一页上的列宁的话）。掩盖在这个表层底下的却是恐惧和奉承。”^①

关于特权与高度集权体制的关系，阿尔巴托夫的观点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他认为：“革命以后，由于我们的困难的生活条件，特权一直是保持极权统治的有效工具。极权不仅仅是收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一种手段。存在特权这一事实本身也使党政军领导干部害怕失去特权，并大大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特权是保证服从和上层的一致的十分有效的办法。他们的负面是容易引起得不到特权人的嫉妒和仇恨。特权只有在保密的情况下至少是作为生活中不受注意的一个方面，才得以存在下去。”^②

特权阶层一旦形成，就要拼命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决不允许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112 页。

②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115 页。

任何人（包括这个阶层内部的人）改变已有的规矩。利加乔夫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在他被任命为苏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第二天 按照惯例“赠送”了一辆海鸥牌轿车。利加乔夫不喜欢这种体积大的、特别豪华的轿车 就写纸条给苏共中央事务局局长 要求换一辆伏尔加牌的。然而这一要求遭到了非常严肃的拒绝：“你想另搞一套吗 所有的人都要‘海鸥’ 你同这些人不一样吗？……不要另搞一套，使别的部长处于难堪境地。你这一级的工作人员应该怎样 我们就怎样做吧。”

业已形成的官僚制度窒息了任何改革的意图，使苏共失去了许多次改革的机遇。苏共内部不是没有人看到存在的问题。实际上 在很早的时候 苏共党内就有人在研究、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60年代的一封党员来信这样写道：“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 毫无疑问地是同我国的组织机构、同党和国家相互联系的现存的结构相联系的。不妨指出，早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就已经指出，在俄共已产生了组织上的极端集中制和党组织的集体机关的紧缩。代表大会指出，这种集中制尽管对某个历史时期来说是正确的 但是它‘造成了臃肿的官僚主义机关 并使这种机关产生特殊化的倾向’。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列宁式的英勇气魄规定，这种集中化的严重后果是‘削弱了党的精神生活，如此等等。这一切引起了党内的危机’。因此，代表大会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引起，采取了改造党和国家的全部制度的坚决方针。应该懂得什么是军事集中制。它是在军事共产主义条件下执行的、有官僚主义的集中制。在斯大林时期，我国生活就是建立在这种集中制之上的。但是 还有民主集中制 它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的不可动摇的准则。斯大林死后，我们经历了党的危机。这也

① [俄]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第41页。

是从官僚主义集中制向民主集中制过渡的危机。……这种危机并没有结束。改造却停止了。”^①应当指出的是 这种改革的呼声到了 70 年代已经不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这种呼声是如此强烈，以致在得不到官方反应的情况下 逐渐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但是在既得利益者们眼里，改革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切。改革会使他们失去得到的东西。因此，他们对改革的要求置若罔闻 对所有与改革有关的主张都予以棒杀。这样 经历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简直成了一个百病缠身而又讳医忌药的老头。

从根上烂起的腐败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还有什么方面的发展引人注目的话，那就是腐败现象。它和特权现象几乎是孪生兄弟。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腐败发展到了极致。如阿尔巴托夫所说：“这个停滞时期对于机关和官僚制度说来，可以说是真正的黄金时代。斯大林偶尔用残酷的镇压‘整肃’过机关 赫鲁晓夫也折磨过它 不断地在上层调换人们的岗位，进行无穷无尽的改组。勃列日涅夫提出‘稳定’的口号 成为稳定的化身和形象 如果我们把稳定理解为静止不动的话。”事实上 负责的岗位都成了终身的岗位 而官僚们成为不可替代的人。很多州委书记、部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负责人占据自己的职务有 15—20 年之久。想出了一套很高超的保护十分无能的官员的办法，使他们不为自己的行动承担任何责任。例如 如果发现州委书记在本州换届选举中有可能落选 就把他调回到苏共中央组织部担任视察员职务，两三年后又推荐他（实际上是任命他）到另一个州去担任州委书记。不称职的部长

^①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 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 1980 年出版，第 182 页。

从一个部调到另一个部 或者‘为他’建立某个新的部。为完全垮掉的干部寻找或建立清闲但待遇优厚的职务，往往派到某个国家当大使。”^①“在停滞年代，就这样使负责干部和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人最终形成一个特殊阶层 共和国、州、区的干部则形成自己的‘小阶层’）。这有点类似某种贵族制度。与荣誉相联系的终身制 享受高生活水平 至少按照苏联标准来看是如此 和各种特权（用品的供应、住宅的保证、医疗和休假 甚至丧葬……）这个阶层和社会上其他人的鸿沟不断扩大。这是一个真正的越来越脱离社会的阶层 他们孤立地生活、治疗、休养 在这个阶层中往往形成自己的家族、氏族关系——须知这个阶层的子女们在一起度时光，互相认识 往往通婚。不仅如此 正是在停滞年代 迈出了下述合乎逻辑的一步 试图建立交权制度 或者叫做特权继承制度。也就是通过建立专收这些子弟的教育制度，然后通过一套任命和提升职务的制度来达到继承权力的目的。”

如果说，是苏共不能正确认识群众和群众的利益造成了党群之间的严重隔阂 那么 腐败现象所起的作用就是进一步加深这种隔阂，使之走到恶化的地步，并且最终造成了党和群众的严重对立。腐败现象是埋设在苏共内部的、足以炸毁苏共全部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的炸弹 而‘民主化’、‘公开性’则是这枚巨型炸弹的引爆器。

苏共党内的各种腐败现象有以下两个共同特点：

第一 腐败在公有制的前提下发生 表现为腐败分子对国有财产的贪污、盗窃和大量侵吞。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作“谢洛科夫现象”因为它以著名的“谢洛科夫贪污案”最为典型。谢洛科夫是

①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 1998年版 第 309 页。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309—310 页。

苏联大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任内务部部长。同时他又是勃列日涅夫的私人朋友。仗着这层关系和手中的权力，谢洛科夫的腐化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他把内务部从国外进口的 9 辆豪华车中的 5 辆留给自己，分别给自己的儿子、女儿、儿媳和老婆使用。他把一桩重大投机倒把案起获的赃品据为己有，价值 25 万卢布。他在全国各地盖别墅无数，分给自己的亲属享用；他在家中雇用裁缝、厨师、摄影师、建筑师、按摩师、传记作者，为女儿雇家庭佣人，所有开支均从内务部报销。类似谢洛科夫这种无所顾忌地侵吞国家财产的腐败现象，在苏联具有普遍性，只是在腐败者的官职、侵吞的数额、侵吞的具体方式方面有所不同而已。

第二，腐败在干部委任制的前提下发生，表现为腐败分子的不法行为有组织地进行。苏联干部制度中的委任制和变相委任制，造成了广泛的任人唯亲和结党营私现象。这是不可避免的。勃列日涅夫本人就喜欢任用和他一起在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工作过的人，以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盘根错节的联系，被老百姓称为“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帮”。这种制度，促成了一个官官相护、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使得腐败现象也带有组织性。这里同样有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即乌兹别克贪污案。该加盟共和国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卷入其中：上至共和国党中央书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最高苏维埃副主席、内务部部长和副部长，下至州、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企业的领导人。这些人串通一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虚报售给国家的棉花数量，将因此而获得的金钱中饱私囊。据统计，该案揭出的卢布金额为 20 亿。更有甚者，这些人不但用贪污的金钱过糜烂生活，而且用来发展地下企业，乃至发展黑手党来保护自己。这种有组织的腐败和官员犯罪在苏联同样为数不少。

党内腐败现象的揭露对苏共具有毁灭性的影响。因为，这些现象过去多数是被掩盖起来、不为人知的。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开始后，在“民主化”、“公开性”的压力下，这些现象都集中在短

时间内暴光，很容易造成冲击波，似乎苏共罪大恶极。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共党员大量退党，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这种情绪。

道德的失落

我们很少对执政党错误施政在道德方面造成的消极后果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这是十分奇怪的事情。因为归根结底，评价一个党对社会的统治的好坏、成功与否，除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外，还必须加上社会文明程度。而体现社会文明程度的不仅仅是、而且不主要是人民的政治意识，而应当是基本道德水平。从这个角度讲，现实社会主义的挫折是显而易见的。大概勃列日涅夫时期最为典型。

第一，言行一致问题。我们前面列举了苏共的种种特权现象。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机关的特权绝非苏联所独有。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把领导人和一般公民同等看待。而且，众所周知，比起西方发达国家来，苏联领导人在这方面的享受并不特别值得羡慕。许多西方人士都谈到这一点。问题在于，为什么这种特权往往被老百姓如此看重，引起如此强烈的反感？在众多原因中，恐怕有一个原因是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在共产党的理论中，没有这些特权的合法地位。这些特权恰恰是被批判的对象，不存在这些特权被认为是共产党领导和其他政党的领导相区别的本质特点之一。就是说，在苏联，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特权是否存在，而在于它确实存在，却被有意掩盖了。在于党的理论对这种特权没有一个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和解释。人们从这里得出的结论，不是执政党是不是一个有特权的党，而是执政党是一个虚伪的、不承认事实的、说一套做一套的党。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党掌权的道义基础。

第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问题。我们仍然用特权现象作例子，把它和工资问题联系起来作一些思考。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 工资收入的差别是官员与群众产生隔阂的重要原因。因此 当巴黎公社在工资问题上率先提出国家公职人员与工人同工资时，马克思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认为从公社委员起 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后来的列宁也十分津津乐道于此。现在 我们不能不承认 这里面含有不少空想的成分，因为它的前提是“一个普通的厨娘也能管理国家”。在这里存在一个误区。其实，问题并不在工资本身。合理的工资，甚至不合理的工资 引起的愤慨也远不及表面上不体现为工资、实际上拥有特权来得猛烈。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这样说 工资体现的是事实上的不平等 而特权则无论在形式上 还是在事实上 都是不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这个问题上都忽视了这一点。特权问题的核心不是国家公职人员该不该按劳取酬，而在于它和执政党举起的‘平等’、‘公仆’的旗帜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正因为如此 在进入改革时期后，《真理报》上有人提出 可以提高高级领导干部的工资 但是要取消他们享有的大部分特权 让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排队买东西。人们不会去详细地计算特权到底造成了多大的不平等。只要人们意识到自己所在的这个国家实际上的平等程度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如，那就已经具备了导致领导这个国家的党垮台的基本要素。

第三，形式主义问题。当执政党不能把自己的理想转化为大众的理想 又想利用强制力量来达到这个目的时 形式主义就会不可避免地泛滥起来。无数教训表明，不能简单地把形式主义看成只是一种作风。形式主义对共产党道义上的损害是极其巨大的。在这方面 博尔金的看法非常正确：“也许玩弄数字可以哄骗某个人，但是形式主义给党造成了不可补救的损失是有目共睹的。最具创造性的那部分社会力量同苏共的疏远，大量不相信理想但却

很有能量的人拥入苏共，不仅破坏了而且瓦解了党的队伍。不道德行为、贪污受贿、入党收费、出卖党证等事越来越多……这个曾几何时不大的、坚如磐石的、以自己的领袖和进步思想闻名全世界的党，如今人数发展到反常的规模，变得臃肿笨重，染上了难以治愈的疾病。”^①

第四 党内风气问题。由于党本身的不正确导向，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出卖良心、糟蹋人格的现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又有一个大的发展。个人崇拜重新泛滥，一大批吹牛拍马者、阿谀奉承者、投机钻营者在这个时代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有一个很荒唐的例子：一些人投勃列日涅夫所好，帮勃列日涅夫写了几本小说体的作品。这还不算，他们还精心组织了捧场和叫好的队伍和场面。这几本书不仅被连载，而且出了单行本，几乎成了党的教育系统的必读书。作家协会立即将小说提名候选列宁奖金，并匆匆授予。阿尔巴托夫评价道：“这一文学事件本身，比起其他为了满足领导古怪要求而破费的大笔款项来，大概不算昂贵。但是我认为公众意识和社会道德蒙受的精神损失是巨大的。全民演出了一出荒诞可耻的戏，不论演员‘演’主角的人——‘作者’除外，还是观众都并不信以为真。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至于说其他方面，如勃列日涅夫酷爱勋章，喜欢汽车，乐于向人们显示自己的享受等，则早就被苏联人编成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笑话，并广为传播。禁止这些东西的传播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制造这些政治笑话的原料不复存在。

宏观地评价勃列日涅夫时期，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就苏共本

①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3页。

② [俄]路·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页。

身而言，执政党究竟如何运作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已经出现的问题还在恶化。到了 80 年代，苏共已经进入了一种危机四伏的状态，尽管表面看上去，这个党仍然有一个不可一世的外观。对整个国家和党本身进行彻底改革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第十二章

苏共的“根本革新”之路

面对这个党种种令人忧虑和困惑的现象，以 68 岁高龄接任勃列日涅夫的安德罗波夫开始摸索改革的道路。不过，岁数不饶人。虽然在继任总书记的这段时间里，安德罗波夫口碑甚佳，但毕竟只有短短的 15 个月。党的建设，作为整个体制中最核心、最深层的问题，安德罗波夫的改革触角远远没有、也不可能探到它的症结所在。至于接下来的契尔年科，本来就是那套已经不适应的体制的积极维护者，甚至连改变一下的念头都没有过，更不可能在这方面有什么建树。所以，这两个人当政的时期，是名副其实的过渡时期。

到戈尔巴乔夫当了总书记，苏共才真的进入了一个和过去迥然有别的改革时代。但对苏共来说，这同时也是走上了一条衰亡的不归路。

举起“根本革新”的旗帜

戈尔巴乔夫深信，苏联必须改革。否则，苏联作为一个大国，下个世纪会从世界上消失。早在 1984 年年底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就透露了这方面的思想：“除非我们把国内的事处理

好，否则我们就不能在世界事务中保持大国地位。^①

在描述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遇到的麻烦时，尼克松的眼光无疑是敏锐的。他认为到了戈尔巴乔夫掌权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吸引力。“20世纪50年代，第三世界的许多非共产党人向往苏联经济发展模式。今天，第三世界没有哪个政府愿像苏联那样成为文牍主义盛行、经济停滞不前的可怕的官僚机构。30年代曾有美国人出于意识形态信念为莫斯科充当特务。今天为苏联人当特务而被定罪美国人则是为了现钞。”^②为什么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缺乏吸引力？就经济而言，“莫斯科的经济犹如一个竹篮子。增长率几近于零。生产率下降。旷工、腐化、装病逃差、酗酒盛行。生活水平有所降低，以致苏联人的平均寿命实际上缩短了。为了赚钱买部汽车，一个苏联工人要比一个欧洲人多工作7倍的时间。苏联的工业电脑比先进的西欧国家少15倍比美国少45倍。近年来苏联主要经济指标中增长项目寥寥无几，而这些还是由于克里姆林宫对其经济统计数字做了手脚。”^③这些说法听起来十分刺耳，但反映的却是真实情况。

到20世纪80年代，以苏共党的建设模式为核心的僵化的政治经济模式对苏联社会发展起妨碍作用，已经成为人们普遍感受到的事实。苏共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日益疏远，党内思想僵化，党员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下降，信念动摇，组织活动表面化、形式主义化，缺乏凝聚力，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和特权腐败现象泛滥，都表明苏共和整个苏联社会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便提出改革，应当说是顺应了历史潮流。

① [美]《时代》杂志编辑部：《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夫人》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19页。

② [美]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7页。

③ [美]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但是 对于党的建设来说 改革究竟应当怎样进行 改革的内容是什么？改革的方向朝向哪里？革新后的党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所有这些问题，都至关重要，因为能不能正确回答这些问题 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戈尔巴乔夫对这些问题作了回答，并将其付诸实践。他为治愈苏共的痼疾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药方。苏共吞下了这服苦药 本来指望重新焕发活力 结果不但未能如愿 还赔上了身家性命。导致这个不幸结果的原因错综复杂，很值得认真剖析。

让我们来看看苏共由改而亡的具体过程。

戈尔巴乔夫对党的改革不是一开始就指向传统苏共模式本身。由于改革最初的重心被放到经济发展战略上，与此相应的党自身的改革 就被归结为“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和方式方法”。名副其实的、与后来苏共的垮台失权有直接关系的“根本革新”是从 1987 年年初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表《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的重要讲话开始的。在这次讲话中，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矛头比较明确地对准党的整个体制，从而启动了对党的“根本革新”。

戈尔巴乔夫对苏共进行改革，起点和立论的前提是民主。在这个讲话中，戈尔巴乔夫把民主问题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指出：“民主的实质是劳动者的权力 这是实现他们的广泛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是他们关心和实际参加改革工作的形式。”他解释道：“在社会意识中 这样一种简单、明了的观点在日益更牢固地确立起来 即家里的秩序 只有感觉到自己是主人翁的人才能够做得井井有条。这不仅在日常生活上是正确的，而且在社会政治意义上也是正确的。这一真理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到实践中去。”“只有始终不渝地发展社会主义固有的民主形式 扩大自治 才能使我们的生产、科学、技术、文学、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各领域向前发展 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保证人们自觉地遵守纪律 只有通

过民主和发扬民主，才有可能进行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给社会主义的强大建设力量开创广阔的天地”^①。他强调：“真正的民主不存在于法律之外和法律之上。”^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对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进行了重新认识。由此而引起的转变，和以往的思路有很大的区别。

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戈尔巴乔夫引出了发展党内民主的结论：“很自然的是，在苏联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总潮流中也必须讨论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③他强调：“党内民主是实现党的战略方针、完成改革任务的主要保证。”^④

戈尔巴乔夫对党内民主化的含义进行了实质性的充实。他认为，党内民主必然提出监督的问题，要求加强自下而上的对党、苏维埃和经济机构的工作的监督。这不仅是指对业已组成的机关的监督，而且还指对这些机关组建过程的监督；“进一步民主化这一工作也应当触及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组建”和基层党组织经选举产生的机构的组建^⑤。戈尔巴乔夫称：“政治局认为，经选举产生的机构的组建工作进一步民主化，是加强党的活力、吸收新生力量、使党组织积极工作、保证不重犯过去的错误的一个重要条件”^⑥。在这里，已经可以明显看出，他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作为整个传统党建模式基础的干部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

提出党的各级机构组建过程民主化的问题，实质上是把干部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看做传统党建模式的基础，用干部选举制取代这一基础。这就赋予了这一步骤以重大的意义。在具体操作

① 《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 1987 年中文版第 23 页。

② 《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 1987 年中文版第 32 页。

《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 1987 年中文版第 28 页。

《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 1987 年中文版第 43 页。

《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 1987 年中文版第 28 页。

⑥ 《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 1987 年中文版第 29 页。

上 这一步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落实基层党组织的选举制。在选举党支部、党委会书记时 要广开言路 让全体党员都毫无例外地发表意见，提高书记对选出他们的党员应承担的责任感。第二 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地方党组织书记 同时在党内仍应遵守下级党委会执行上级决定的规定。第三，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组建也应进一步民主化。除此之外，党内民主化也涉及了其他方面 给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以更多的自主权 扩大党员的民主权利 保证党员有最大可能参与制定、执行党的决策 参与建立党的机构 利用公开性为基本手段 加强对党的机关的监督 等等。可以认为，这篇讲话吹响了对党本身进行改革的的号角。

最初几年的改革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改革热情。人们关注改革 积极参与改革。例如 在 1988 年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前两个月，公布了《苏共中央关于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提纲》，征求意见，这引起了全国范围的热烈的讨论。仅《真理报》就收到 7.5 万封读者来信。在代表会议期间，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大门口附近排起大队，不是在抢购物品，而是争相在体制改革的建议上签名。在“群众向会议提出建议处”，屋里屋外挤满了提建议的人。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外国记者形容莫斯科人几乎在为得到当天的《真理报》而“进行战斗”因为谁也不想漏掉有关会议坦率辩论和口头交锋的报道。一个女工程师这样谈论自己的感受：“在过去的 20 年里 我们好像变成了果戈理和奥威尔的‘死魂灵’、‘兽园’里的什么。现在出现一个活人。每个人都能清醒过来吗？我就像一个猛然能步行 10 米的伤残人 我发现了自己的希望 但我仍不能相信它。”^①

^① [德 克里斯丁·施米特·霍尔：《戈尔巴乔夫——通往权力之路》，沈阳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121 页。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

以戈尔巴乔夫在一月全会所作的《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的报告为标志，对苏联党和国家政治体制的探索开始升温。党的作用问题、党的组织运作问题、党政关系问题等 都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 1988 年 6 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 苏共试图回答和解决这些重大问题 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改革方案。由于这些问题在整个国家的改革中所占的地位，这次会议作为苏共把改革重点从经济体制全面转向政治体制的标志是当之无愧的。

在这次会议上 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 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关键问题。他陈述了作出这种论断的理由：“在某一个时期 由于十月革命胜利而形成的政治体制发生了严重的变形。结果不仅使斯大林及其亲信的独裁，而且使大批镇压和目无法纪的行動的出现成为可能。”现在我们遇到的许多困难 其根源也可以追溯到这种体制。”在他看来 经济改革虽然需要 但如果现在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那么所有这一切都会付诸东流。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不可逆转的极其重要的保证”^①。

把重点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大转折。当时苏联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所长米·基塔连科对这次代表会议的转折作了如下解释 前几年的实践说明 靠小修小补不行 需要根本的改革 因为积累的问题太多。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以来更多的是思想上的准备 这次会议后走向实践 因此可以称为革命性的转折^②。

①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8 年第 5 期 第 17—18 页。

转自《人民日报》1988 年 7 月 1 日。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对改革重点的转移提出忠告。例如经济学家阿巴尔金就曾在会上发言提出这个问题。但戈尔巴乔夫立即对他进行批评，认为他的发言有强烈的经济决定论的味道，对我们决定进行改革的上层建筑根本不够重视。

在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由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进而说到党，对党本身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党本身、党的活动内容和党与劳动者的联系发生了某种变形，使党一开始就固有的和列宁及其战友通过多年努力逐渐培养起来的许多民主的布尔什维克传统丧失了”。“作为苏共的建设和活动的基础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一定阶段在很大程度上被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所取代。”随着行政命令体制的确立，党内的同志关系气氛就逐渐让位于以命令与执行、党员分为首长和下属、违反党员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关系。”^①

所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推进党本身的改革。为此，这次会议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在这个方面，会议在改革思路上有两个明显的突破：一是党政分开，二是选举制度的改革。关于第一个问题，苏共认为，分开不是简单的分权，而是党把不属于它的那些权力和职能统统归还给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据此苏共在这次会议上重提“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关于第二个问题，苏共进一步对传统的干部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发起攻击。会议特别强调要放弃过去候选人由书记提名的老办法，强调“各级选举要民主，保证候选人经过广泛讨论，保证实行竞争，其结果是保证真正忠于事业、有才华、受尊敬、享有崇高威望、有能力执行改革政策的人当选”^②。这是继在党内放弃任命制以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放弃任命制的进一步尝试，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党建模式和

①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8年第5期第35页。

②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党的领导方式的根基。

把党的权力归还给苏维埃后出现的一个问题是，苏维埃由于过去行使权力不够，因而在能力方面显得比较薄弱。为解决这一问题，戈尔巴乔夫建议由党组织领导人兼任苏维埃领导人。“在当前条件下，提出了提高经选举产生的机关和代表的作用的使命，有些同志因此认为 考虑到新的任务 用党的威信来加强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苏维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最现实的途径是，一般推荐同级党委会的第一书记担任苏维埃的主席。由他们来领导苏维埃及其主席团，将能最积极地促进人民代表机关的各方面活动的改进。”如果党委第一书记当选为苏维埃主席 那么这将提高苏维埃的威信，加强对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的活动的监督 在管理活动的重心转移到苏维埃的条件下 将能更明确地划分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职能。”当然 他强调“这一切必须在严格遵守法律的基础上进行”。他认为，推荐党组织的领导人担任苏维埃主席 就把他们置于劳动者的更加有效的监督之下 因为苏维埃主席将在苏维埃会议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这意味着 共产党员交给党组织领导人的委托书 每一次都要受到苏维埃系统各级人民代表的检查和认可”^①。

根据改变党的职能的要求，苏共变更了自己的组织机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完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七月全会。会议作出《关于党的机构改革基本方针的决议》 决定改组苏共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关于苏共中央机关，决议规定不再按生产部门原则建立苏共中央机关，而是在苏共中央设立研究内外政策基本问题的委员会。据此，苏共中央撤销了与政府机关重叠的 7 个经济职能部 将原有的 20 个部精简为 9 个部，同时增设了党的建设和干

^①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政治对抗 1500 天》 新华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54—55 页。

部政策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社会经济政策问题、农业政策问题、国际政策问题、法律政策问题 6 个常设委员会。10 月中旬以后各地方机关也进行改革，仿效苏共中央的模式，但规模上略小。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设 5 个常设委员会，州委下属的市（区）机关，仅设组织部、意识形态部和总务部。上述改组后，到 1989 年 3 月，中央一级机关减少一半，工作人员减少 40%。加盟共和国中央机关减少 30%，州委级机关减少 20%，市区委机关减少 10%。调整后的机关不再直接决策社会事务，而集中处理党务。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是一次引人注目的会议，往往被看作苏共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但是，怎样评价这次代表会议，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学者习惯于把后来发生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确立的一些重要思想上，例如对传统模式的否定、党政分开、削减党的机构等。这是值得商榷的。我认为，这次代表会议提出的观点中，有不少内容还是正确的。例如，代表会议确认“苏共是苏联社会的‘政治先锋队’，其主要职能是‘保证对国家发展的极其重要问题的理论研究，研制改革的思想，并通过此，通过在群众中的组织工作，鼓舞和激励他们，为我们整个多民族社会的向前发展指出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党实行干部政策，通过改造后的政治体制的民主机制合理配置干部’”、“党‘通过在国家机关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工作的共产党员贯彻执行苏共自己的政治方针’”、“党的机关‘不能作出含有对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直接指示的决定’”；“所有党组织都应严格地在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范围内活动”等等。如果不考虑党别因素，不难发现，这些提法和我们党现在推进改革的许多观点有相似之处。

但是，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又确实是苏共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个转折从何而来？我认为，问题主要不在于其间提出的个

别观点，而在于改革的思路和步骤。这次会议的根本失误有两条。

首先 这次会议错误地转移了改革的重点 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 这使改革背后埋下了衰退的危机 使改革失去了成功的基础。简单地断定政治体制改革应当超前还是应当滞后都是不对的。正确的看法应当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要配套进行。所谓配套 就是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 有时是决定性的反作用 的原理 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但这个改革以不影响经济的发展为前提。

其次 这次会议的失误是 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地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特别是党自身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 改革彻底改变了过去 70 年一直奉行的传统党建模式，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从理论上讲，“根本革新”所依据的理论并不成熟 不但与传统的理论和观念相矛盾 而且自身也存在不少矛盾 显示出新旧体制在更替过程中的猛烈撞击。例如坚持党的领导作用与党政完全分离的矛盾 党内民主化与派别产生的现实性的矛盾 对党的历史的否定与今天需要党站在改革前列的矛盾等，都未在理论上得到解决。从实践来看，苏共的改革措施从根本上动摇了党发挥作用的传统方式方法，同时又未能使广大党员和党组织掌握新的活动方式，这就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混乱。

正是这些因素，促进了后一阶段苏共朝衰落的方向发展。

有步骤的改革

尼克松从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立场 描绘了戈尔巴乔夫 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将会遇到的困境：“为了取得进步 他必须允许人们有更多的自由。但是允许更多的自由却威胁着他的权力。过度集中是苏联经济的主要问题。但是，下放经济决策权则

有引起要求政治权力下放的风险。而政治权力下放将意味着共产主义制度的解体。”^①如果不把这种议论当做是诅咒，而是从有益的方面去理解的话，那么的确可以说，政治方面的改革是难度最大、失败可能性也最大，同时又早晚要进行的改革。对于这样一个改革，除了要坚持正确的方向而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正确的步骤。

在这个问题上，苏共和戈尔巴乔夫的立场最初是正确的。直至 1989 年年底，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仍然强调对步骤的控制。例如，民主派领袖之一波波夫当时提出了立即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要求。他认为：“过去 5 年已经表明自上而下的改革观念行不通，需要另找出路。中央必须准备不去全力以赴地挽救濒临倒闭的企业，而应该把扭亏工作移交给其他更了解情况和有兴趣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即各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最重要的是交给那些深受其害的人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的企业经常处在被‘淹没’的状态，并不是因为它们不懂得如何游泳，而是因为中央缚住了它们的手脚，在它们的脖颈上系上了磨石，然后再指手画脚地教其如何浮出水面。”^②“我最近发现了一份俄罗斯联邦加盟共和国的统计报告，报告显示，1987 年前 9 个月，每只母鸡平均产 182 个蛋，1989 年同期平均产 183 个蛋。或许现在该是政府停下来、并理解在一个鸡蛋丰富的国度无需决定一只母鸡该下多少蛋的时候了。”^③在指出这些问题时，波波夫是对的。但是，是不是立即放弃所有计划，完全由市场来调节经济？苏共否定了这种主张。雷日科夫在发言中说出了其中的道理：“这样设想一下吧。1990 年，我

① [美]尼克松《1999 年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8 页。

②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20 页。

③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21 页。

们告诉大家从现在起中央将不会再控制资源的分配，你们都自己找米下锅吧。接着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不想去吓唬大家，但那的确会是一场经济危机。不出两三年人民就会无工可做。’^①当时戈尔巴乔夫支持了他的观点。

在对党本身进行改革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同样持这种观点。美国大使马特洛克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很长的时间里把苏共作为推进改革的工具。这种观察是对的。戈尔巴乔夫认为：“如果我们要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就必须继续加强党，强化其组织作用和领导作用。”在他看来，“党在改革阶段是社会发展的富于创新的政治力量”，“党的凝聚作用是无法取代的”。“党才是社会正在发生的民主进程和深入变革的保证。当国家正处于自己历史的转折阶段 当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正在形成时 党作为政治先锋队的的作用在今天尤为重要。”他指责多党制的主张是“政治投机”^②。在 1989 年 5 月 30 日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 他还强调：“共产党作为改革的首创者和主要动力 今天这一革命进程的保障和保护革命进程不出现保守分子和极右分子的保障。正是共产党才有履行一体化力量的作用，没有共产党就不能胜利完成更新社会主义的事业。”^③

因此 总的说来 这一阶段的改革还是在苏共的控制下有步骤地进行的。由于改革速度上的分歧，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还曾出现了争执。从被免除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以后，叶利钦开始以激进改革者的形象出现。在 1988 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叶利钦系统地表达了自己关于党的改革的观点 党落后了 民主化已严重地向坏的方向转化了，领导机关至今仍是不受人民群众批

① [美] 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册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320 页。

戈尔巴乔夫 1988 年 3 月 29 日会见新闻界领导人的讲话。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政治对抗 1500 天》 新华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03 页。

评和监督的 选代表是按老框框进行的。他主张 重要草案应提交全党和全国讨论 并实行全民投票 选举应当是普遍的、公开的和无记名的 其中包括中央书记、总书记 自下而上的 包括各州常委会或政治局成员 由全体共产党员通过这种方式来选举 这也应当适用于最高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 在更换总书记时 也改组政治局 中央机关也要大体上进行改组 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 应当让广大党员知道 党内经费的使用应当由中央委员会来确定 取消给那些所谓“饥饿的官员们”的食品“特供” 废除社会上的等级制度 把党的州委机构裁减 1/2 或 2/3 把党中央裁减 5/6 至 9/10, 同时要取消各专业部。戈尔巴乔夫则针锋相对, 强调“反对一切假革命的脱离生活的口号 盲目冒进的过高要求 想一蹴而就改革一切的尝试”认为“任何一种极端 从科学的观点看都是错误的, 从政治角度看则是不负责任的”。他指出 有些人“逐渐地抛出了政治多元化、多党制乃至私有制的思想。还说什么通过改革挖掘社会主义的潜力似乎是不可能的。无论是这种或那种情况, 都是对我国的制度、对我国人民、对党、对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不信任”^①。

当然 理论服从于实践。理论上看来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不等于实践也没有问题。从苏共这一阶段的实践看, 党的作用事实上的确在不断弱化。

戈尔巴乔夫逐渐弱化了政治局、书记处的作用。据利加乔夫说 到 1988 年 9 月, 书记处已有一年左右没有开会。党内各种委员会建立后 书记处的会议便自动停止了 虽然谁也没有明确说过要取消书记处会议。这样 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 苏共就失去了指挥中心。

^①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政治对抗 1500 天》, 新华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79、80、88 页。

戈尔巴乔夫对事关苏共政治声誉的毁灭性舆论显得软弱，抵制不力。反对派抓住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某些错误和失误，对苏共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有人把列宁描写成暴君，说他策动了恐怖行动，建立了集中营。有人根本否定十月革命的必要性。对这些舆论，苏共由于怕压制民主而没有给予必要的反击。

削弱了组织力量的苏共，颓势渐显。1989年3月26日举行了首届苏联人民代表选举。选举首次实行竞选制。参加竞选的苏共党员干部中，大约20%的人落选。其中，参加竞选的150名党委书记中，有30名落选。在列宁格勒州和列宁格勒市，州委第一、二书记，市委第一书记，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市计委主席落选。在莫斯科市，市委第一书记和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落选。在基辅市，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落选。对于党组织在选举中的表现，利加乔夫称之为“共产党候选人自相残杀”。雷日科夫在评论这个选举结果时认为：“党在选举中输了。理由是有30个按民族区域性选区和区域性选区提名的地方党组织领导人落了选，而且败得很惨，败给了资历不深、名气不大、但自信心很足的对手。”^①从表面看，落选的只是30个人，实际上落选的是整个苏共。因为这30个人代表的是苏共。^①就选举本身而言，这句话讲得不全面。因为在竞选的条件下，落选是正常现象。没有落选才是专制体制下不正常的现象。如果因为过去从来没有过落选、现在有了便是不可容忍的失误，甚至是没有坚持党的领导的体现，这恐怕是一个观念还没有转变的问题。不过，如果这段话目的在于提醒党的领导人对苏共威信正在下降的事实予以重视，那么它是对的。

[俄]雷日科夫：《背叛的历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251页。

第十三章

从改革走向毁灭

从 1990 年开始 风云骤变。看上去有希望的改革 在 1990 年来了个转弯，使本来有可能出现的良好趋势没有变成现实。虽然这个转变原因复杂 但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两个因素 即多党制取代一党制和党内派别的泛滥。它使苏共无法担负起改革时期执政党应当担负的繁重责任，因而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在老百姓心中垮掉的苏共，最终也从组织上垮台了。

从一党制转向多党制

如果根据实际情况把苏共党的建设改革划分成不同的阶段，那么大体上以 1989 年年底和 1990 年年初为界，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阶段：1987 年 1 月至 1989 年年底是苏共探索新路的阶段，1990 年年初至 1991 年 8 月则是苏共发生剧变、迅速走向瓦解的阶段。

短短几年时间 苏共就从一个高举改革旗帜、走在时代前列的党 变成一个迅速失去党员和群众、最后被停止活动的党，乍看上去，这显得非常突然。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一结果？对这个问题的探究越深，就会发现回答越难。苏共执政 70 余年积累起来的种种弊端 改革过程中发生的错误和失误 共同造就了这段历史。苏

共的失败，体现了各种因素相互间形成合力的作用。

只是在这个认识基础上 我们才可以说 有两个方面的趋势对这一进程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一是多党制的发展 二是党内派别的泛滥。

我们先看多党制的发展。戈尔巴乔夫举起“民主化”的大旗，作为摧毁传统模式的武器。因此 他对“民主化”是不加任何限制的。这导致了成千上万个政治组织应运而生。根据苏联官方的说法 到 1989 年中 各种形式的政党、阵线、运动已达 6 万个。据《莫斯科新闻》估计 当时苏联已有 2 000—3 000 个政党。这些组织羽毛渐丰之后 进而提出了和苏共在政治上平起平坐的要求 主张实行多党制，取消宪法中规定党的领导作用的第六条。

苏共最初断然拒绝了多党制的主张。例如，早在 1988 年，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呼吁苏共放弃一党制、取消宪法第六条时 戈尔巴乔夫称之为“挑衅行为”认为在多党制条件下同样有出现专制的可能性。直到 1989 年年底，戈尔巴乔夫都是坚持一党制作为政治体制基础的。在 1989 年 11 月为《真理报》写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中 戈尔巴乔夫强调一党制的历史性 强调一党制适宜于苏联国情。

但是从 1990 年开始，面对迅速发展各种政治组织和他们提出的实行多党制的要求，戈尔巴乔夫的调子逐渐发生了变化。1990 年 1 月，戈尔巴乔夫访问立陶宛。在谈到多党制时表示：“如果多党制是一种正常历史进程的结果，并且是符合社会需要的，我们不应当像魔鬼怕烧香一样地害怕多党制。”同时他也指出 多党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 多党制的思想前进关键的一步。二月全会通过的向党的二十八大提交的行动纲领草案明确承认“我们社会民主化的同时 会产生公民的新的社会政治团体。社会的发展不排除创建政党的可能性”认为“建立政党的程序将由法律确定并在苏联宪法中得到相

应的反映”^①。全会进而表达了同其他新出现的政党合作的愿望，明确地站到了多党制的立场上。

既然承认多党制的可能性 那么 规定苏共是社会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的宪法第六条就不适宜了。这正是反对派们的一致要求。由于在“民主化”上未设任何防线，苏共不可能守住这块阵地。经过步步退却，苏共最终认可了反对派的这项“民主”要求，提出了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动议。苏共对党决定放弃宪法第六条作了解释：“党根本革新的必要条件是根本改变党同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的关系，放弃向它们发号施令和越权代行它们的职能的做法。在进行革新的社会中，党只能作为民主承认的力量而存在和起到先锋队的作用。这意味着，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自然要为取得执政党地位而斗争，但是这样做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范围内 放弃某种法律和政治优越地位 提出自己的纲领，在辩论中捍卫自己的纲领，同其他社会政治力量合作，经常在群众中工作 以群众的利益和需要为重。”

根据苏共的建议 1990 年 3 月召开的非例行的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对宪法第六条进行了修改。该条表述的关于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 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核心 关于用马列主义学说武装起来的苏共规定社会发展的总的前景、规定内外政策路线 领导苏联人民争取共产主义的胜利的斗争 以及序言中关于苏共作为全体人民的先锋队其领导作用增强了等内容都被取消。第六条的新条文是：“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组织、青年组织、其他社会组织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的被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 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 参加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与此同时 宪法第五十一条被相应修

① 《苏联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14 页。

② 《苏联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36 页。

改为：“苏联公民享有结成有助于发挥其政治积极性和主动性、满足其各种利益的政党、社会组织、群众运动的权利。”至此，多党制的基本原则得以确立。

多党制原则一经认可，政治组织便像雨后春笋一样迅速破土而出。1990年8月，克格勃主席克留契科夫在发表电视讲话时透露，非正式组织已经发展到9万多个。

苏共由坚持一党制转向多党制，逐渐放弃领导党的地位，既有主动的因素，因为苏共以为不承认多党制就会落后于时代，也有被迫的因素。关键在于，在1988年6月出现第一个准政党组织——爱沙尼亚人民阵线后，多党状况就作为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迅速形成。从这个角度看，实际上，与其说二月全会主张多党制，不如说它是对现状的承认。如雷日科夫在全会的发言中指出的：“依我看，讨论是否需要多党制的问题已经为时过晚，实际上多党制已经存在。不管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的动机如何，这一主张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反响。这首先是由于社会上对经济、社会和政治局势不满的情绪日益增长，以及由此而在一部分人中出现不相信我们党能使局势正常化和实现自己的计划。在这种条件下，党在自己的纲领中应当明确地说出自己的意见，确定自己对于这一极为迫切问题的立场，这一问题能够改变我们社会发展历史的整个过程。”^①正因为此，连被称为保守派领袖的利加乔夫，也表示不反对多党制。若干年后，他还表明，自己恰恰是提出多党制的第一人。

笼统地说苏共选择多党制就是选择资本主义是不对的。多党制也不意味着共产党必然失败。因为列宁也曾探索过在俄国实行社会主义导向的多党制的可能性。列宁不是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根据实际，试图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进行创新。

即使后来，社会主义制度中实行多党制的可能性也仍然没有完全消失。我们知道 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初 除苏联以外的东欧其他国家，都存在两个实力相当的工人阶级政党。只是由于斯大林用强力手段推行一党制模式，这些国家才无一例外地走上了一党制的道路。但是，只能根据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更适合本国的国情，但一党制和多党制不是划分资本主义政党体制和社会主义政党体制的标准。

在政党体制问题上 苏共和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在于 其没有把多党制的设想与苏联转型期的特殊国情相结合。对多党制的肯定意味着对一党制的否定，而对一党制的否定又意味着对苏共整个执政历史的否定。这样 选择苏共 还是选择多党制 至少在越来越多的人眼里成了二者择一的选择。这就使苏共在已经开始的多党竞争中处在极其不利的地位，成为苏共衰落的始端。

党的派别化

如果在实行多党制的同时，苏共自身也通过一系列相应的改革在组织上变得更牢固、更有影响力 可以断定 苏共同样能够保持执政党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或许历史真的会是另一种写法。利加乔夫寄希望于这一点。他警告不要把党变成一个无定形的组织 变成政治俱乐部。他强调 党应当在民主的基础上 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党的队伍 严格纪律。他的设想是明确的 在多党制的条件下，党应当更像个党。雷日科夫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但是，历史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

社会上的政治多元化导致了多党状况的出现，党内的多元化则导致了党内派别的迅速崛起。党内对改革存在不同看法，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然而苏共把党内民主理解成：不但这些不同观点有权公开表达出来，而且相同观点的党员之间有权离开党的组织

搞横向联合。这样 党内的不同意见开始以组织化的形式出现 最终在党内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有自己政治纲领和领袖人物的派别。

1989 年下半年开始，苏共为召开党的二十八大，就党本身的问题开展了全党性的大讨论。在讨论中，开始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在这基础上，党内横向联系的组织逐渐形成。其中最著名的是以莫斯科党的俱乐部为代表的在各地陆续建立的党的俱乐部。1990 年 1 月 莫斯科等 102 个城市的党的俱乐部联合举行“为苏共的民主行动纲领而奋斗的共产党人改革者”大会，向二十八大提出了“民主行动纲领”。这标志着苏共党内一个重要派别——民主行动纲领派的产生。民主行动纲领派称自己的倾向是“主张对苏共进行根本改革，使之成为在多党制条件下发挥作用的议会型的现代民主政党”^①。在对苏共的以往模式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后，民主行动纲领派把自己关于党的改革的目标概括为两步 第一阶段 把政权从垄断执政党手里转到苏维埃手里，实行党的民主化。这里面包括取消宪法第六条 进行意识形态改革 在民主章程基础上改革组织结构和党内关系等。第二阶段 苏共变成在多党制、法制和议会制国家条件下发挥作用的议会党。民主行动纲领派称：“我们主张维护党的领导地位 但我们认为 苏共的政治领导权只应在选举中获得 并通过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 以及建设性地解决社会所面临问题的能力来得到确认。”^②与此同时，名为“马克思主义党的俱乐部”的持另外一种观点的俱乐部也联合在一起，成立了自己的俱乐部 并于 1990 年 3 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行动纲领”。围绕这一纲领形成的派别就被称作马克思主义行动纲领派。该派主张消除长期形成的极权官僚主义制度 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主张生产自治和市场是社会民主调节 向解放人的创造性、消灭剥削

《苏联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483 页。

《苏联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490 页

和异化的经济体制过渡。剩下的支持苏共二月全会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的部分，后来就被称为苏共行动纲领派。这是苏共的三个主要派别。在这三大派别之外，还出现了一些规模明显要小的派别，如共产党人倡议行动纲领派等。在苏共二十八大会上，以绝对多数通过了苏共中央提出的行动纲领。

多党状况和党内派别化没有引起苏共的足够重视，相反被认为是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和深化。因此，苏共非但没有制定相应的对策，反而接受既成事实，甚至把它作为党的新体制的基础。1990年7月的苏共二十八大会就是在这基础上确定党的建设新框架的。这个标志着彻底放弃传统党建理论和模式的新体制有如下要点：

1. 党放弃政治垄断和特权地位而通过党员发挥领导作用。“二十八大会”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即原行动纲领）宣布：“苏共坚决放弃政治和意识形态垄断，放弃取代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机关的做法。”它“在同其他社会政治力量的自由竞争中捍卫政治领导权”。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明确提出：“苏共起着议会党作用”。

2. 推进党内民主化。声明指出：“苏共坚决放弃在行政命令体制下形成的那种硬性集中的民主集中制，坚持民主原则即坚持选举制和更换制、公开性和报告制、少数服从多数、少数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包括在党的舆论工具上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

3. 干部实行选举制和任期制。声明表示：“在干部工作中，党将放弃形式主义和圈定名单的做法。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有权作出干部任命决定，党内的干部任免权有上级机关下放给党组织和全体党员。”

4. 党内有不同意见的自由和按兴趣与问题成立横向联系组织的自由。声明强调，要“保证建立横向组织和横向组织活动的自由，这类横向组织包括党的俱乐部、党组织书记委员会以及按专项利益、职业利益和其他利益成立的其他联合组织”。

5. 监察机构与执行机构平行，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声明确认，党的监察工作也应是民主的。各级监察机关“要独立地选举产生，不受党的委员会的支配，只向选举它们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汇报工作”。

6. 尊重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声明授权“各共和国共产党可制定自己的纲领性文件和标准文件，依据这些文件自行解决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干部问题、出版问题和财政经济问题。在各共和国的国家建设、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中实行党的方针，同其他党和社会运动，其中包括同外国的党和社会运动联系”^①。

苏共二十八大的实际作用是认可了党的涣散、软弱无力和党内派别发展的状态。所以，来自激进派的和传统派的声音都对会议的结果不满意。激进派认为二十八大大迈的步子太小，以叶利钦、波波夫、索布恰克、肖斯塔科夫斯基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还因此发表声明退出苏共，但该派的大部分人表示继续留在党内为党的进一步民主化而斗争。传统派则认为，二十八大大削弱了苏共，党实际上已经不能称为一个政党。

其实，对于苏共来说，最致命的还不在于实际上产生了派别，而在于派别活动凌驾于整个党之上。二十八大大以后，党内各派各自为阵，拒绝服从统一的领导，苏共分裂的倾向加剧。造成分裂的力量大体上有三种情况：第一，一些人索性从苏共内部分离出来，另组新党，例如1990年11月部分退出苏共的民主行动纲领派成立的俄罗斯共和党。第二，一些人在苏共党内建党，如1991年7月谢瓦尔德纳泽、雅可夫列夫等人成立的“民主改革运动”、鲁茨科伊成立的俄罗斯共产党人民民主党等。第三，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员呼应这些国家独立的要求，成立独立于苏共的共产党，如

以上引文均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130页。

立陶宛共产党、爱沙尼亚共产党等。此外，新派别还在产生，如 1991 年 7 月成立的尼娜·安德烈耶娃为主席的“苏共布尔什维克行动纲领派”等。这些组织都有自己的纲领和主张，各行其是。苏共真正成了充斥着争论、无法贯彻中央主张的俱乐部。

这种情况 对一个仍然在执政的党来说是十分危险、十分有害的。因为它使本来应对改革负起责任的党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从而使国家政治经济状况不断恶化，而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国家状况的恶化归咎于党。所以，二十大以后，苏共的地位与威信直线下降。

责任何在？

对党进行改革 目的在于加强党和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 使党的执政有更加巩固的基础，使党有能力领导整个国家的发展与前进。应当说 这个目标是显而易见的。但是 苏共的改革没有达到这个目标。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我们说，一个政党的成功与否 很重要的一点 是它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历史责任。为改革而改革，毫无主动权地随着改革的浪潮漂流 就把握不住这一点 把握不住改革的正确方向。苏共对自身进行改革 失误就在于此。

作为一个仍在执政的党，苏共不能不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负责任。这里面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对人民的关切度。它使经济发展问题无论如何都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苏共却没能负起这个责任。相反 苏共领导人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权力斗争 并且十分热衷于这种斗争，以致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在苏共二十大上，一个代表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遗憾：“从政治局委员们的报告中，我没有听到那种人民常有的对国家命运的强烈担心。”

由此造成的一个明显后果就是在政治改革‘突飞猛进’的同时，经济改革进展缓慢，在许多情况下实际上是停滞甚至倒退的。在这一点上 美国大使马特洛克的说法没有错 如果只听发言 简直会断定正在发生一场工业管理革命。但实际中，一切都是老样子。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 官员提供的数字 国家订购占产量的 90% 以上。萨哈林一个大渔场的主任说，由于没有公开市场供选购，他的企业虽然在名义上有权在市场上出售 10% 的产品 但没有实际意义 因为只有接到国家订单 才能得到打渔队所需的燃料供给。乌兰乌德羊毛场 100% 靠国家订购。没有政府计划调拨，就无法得到羊毛、燃料、配件等。

仓促进行的政治改革使这种情况变得更糟。因为新的政治运作规则不允许党再像过去那样使用政府权力，而得到这些权力的政府又缺乏行使这些权力的能力。这就造成了权力真空，带来各个方面的危机。雷日科夫对整个社会危机状况的分析大概是有一些道理的：“党委开始抛弃直接命令式管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传统方法 而与此同时 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实质上却不能胜任他们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本应完成的一切任务。”他认为 这“与我们还没有真正弄清党作为政治领袖应当如何行动有关”^①。这一段话可以这样理解 在体制转换时期 苏共轻率地放弃了自己应负的责任。

由经济改革迅速转向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失衡，在 1990 年表现得最为明显。这年秋天 粮食获得了大丰产。利用这一时机 夺取粮食产量的增长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对于改革的继续深入都是一个重要的保证因素。以往在这种情况下，都是由国家和党组织出面，动员力量，进行抢收。但是这一次不是。政客们的争权夺利 使他们无暇顾及农业的严峻形势。在繁忙的秋收季节 莫斯科

《苏联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66 页。

苏维埃组织了政治示威游行，对动员人们去参加莫斯科人关注的秋收活动，却不闻不问。列宁格勒苏维埃心安理得地看着蔬菜烂在地里，对农民要求给予帮助的呼吁置之不理。“民主派”甚至利用这一点来做文章，说集体农庄无力完成秋收任务这件事本身就说明集体农庄没有好处。结果，这一年苏联丰产不丰收，国家不得不向国外购买大量粮食。

农业领域如此，其他领域也如此。改善文化设施的工作陷于停顿，环境保护问题被置于一旁，尤其是工业生产下降，商品奇缺。在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和社会劳动生产率连年下降的情况下，1991年上半年比上年同期又分别下降10%、12%、11%。1990年通货膨胀率为20%，1991年上半年达33%。据官方统计，在市场供应的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经常缺货断档的占95%以上；在211种食品中，经常缺货断档的占188种。为了一天的生计，苏联老百姓不得不排起长队。可以这样说，苏共的威信，人民对苏共的信任，就在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漫长等待中逐渐地消耗殆尽。

一些人民代表准确地表达了人们对戈尔巴乔夫和苏共的这种失望情绪。摩尔多瓦人民代表萨福诺夫在发言中对戈尔巴乔夫说：“从您1985年在党的全会讲台上宣布改革政策算起，已经过去了不平静的、充满动荡事件的5年。人民相信了您。在那个时候您被选为总书记，后来被选为国家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在1989年举行的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使您当上了最高苏维埃主席。人民又相信了您。国家动荡不安，于是您说，为了遵守苏联宪法，为了在被争执的火焰吞没的强大国家中保障法制和秩序，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也就是总统政权。日益陷入绝望境地的人们不得不再一次相信您，结果您当上了总统。可是希望又一次落空了：您没有采取整顿国内宪法秩序的实际措施。作为一个加盟共和国，至少目前还是加盟共和国的议会代表，我今天鼓起

勇气直截了当地说：‘您在社会经济领域、对内对外政策领域、民族间关系领域中奉行的方针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它正在导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解体。’”

一些忍无可忍的普通老百姓也利用多种渠道，表达自己的不满。一个工人党员在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写道：“我是一个有多少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大胆地走上群众集会讲坛，想坦率地和按照党性原则呼吁与会者要理智些。可是我的话湮没在一片口哨声和谩骂声中。从四面八方发出了喊声，要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人。我感到胆颤心惊，因此我至今尚未苏醒过来。在我们这个正在解体之中的国家里出了什么事呢？我们向何处去？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全国的领导，不是到了趁早认真考虑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诚实的劳动人民的命运、并采取最刻不容缓的根本性措施的时候了吗？千万不要放过时间和丢掉社会主义的一切经过千辛万苦才取得的成就。人民是永远不会原谅您这一点的。”^②苏联学者亚历山大·齐普科的说法更加一针见血：“当人们看到少数黑手党发迹，而自己却要和家人吃上点肉而拼命奔走时，他们对戈尔巴乔夫恨得要命。”

党的责任感下降，给整个社会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社会的责任感也急剧下降。例如舆论的作用，利加乔夫比较准确地描述了隐藏其后的变化：“起初，对过去发生的总是进行了分析，要建立这样一种正确的机制，它将永远根除重新出现镇压的可能性。在论及过去年代的悲剧性错误时，人们都是以痛苦心情、深切体验来描述的。这种旨在从过去汲取教训的执著关心态度，只能予以欢迎。但是，后来强调的重点发生了变化了。在谈到过去的无法无天时往往是讽刺挖苦、幸灾乐祸、大张挞伐、庸俗地唠叨老一辈遭

①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政治对抗 1500 天》 新华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232 页。

② 《苏联问题资料》 东方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311 页。

受的命运 而不是为了医治它 给当代和后代人留下教训。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把读者引到一点上 即整个社会制度都是错误的 就是说应该替换它。”

使苏共退出历史舞台的政治氛围，就在这种不满中形成了。

走 向 毁 灭

二十八大带来的实际结果不是马上就显示出来的。对二十八次及以前党的建设改革也评价不一。

一位基层代表在听了戈尔巴乔夫的报告之后说：“会前我来的那个地方的人们问我是否赞同戈尔巴乔夫再次当选，我的回答是不知道 因为我有各种疑问。现在我要说 我赞同。如果可以举双手 我双手赞同。因为我从他身上看到了革新的标志 看到了从下面来的情绪 尽管可以批评他 但这正说明人们在注视他 人们听他的。”^②这种想法 在二十八次上有一定的代表性 能得到不少人 虽然不一定是多数 的认可。

同时也有人激烈指责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这种指责来自左右两个方面。例如苏联驻波兰特命全权大使布罗维科夫认为，“现在的改革在不满 5 年的时间内把国家推向危机的深渊”，“使国家濒于直接面临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经济衰退、道德普遍崩溃和败坏等丑恶现象边缘”。究其原因，是由于党的领导人片面强调民主化 不敢强调纪律 把制止反国家、反社会行动中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无力冒充为对异己思想、意见及行动多元化的宽容。这表达了传统派的共同观点。而叶利钦等人则认为，出现危机的原

[俄]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145 页。

② 《真理报》1990 年 7 月 6 日。

因是改革不彻底 犹豫不决 总是试图调和、妥协 立场模糊。

实际情况是，苏共的衰退在继续加速。也就是在这一年多时间里 苏共的威信迅速下降 和三年前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统计 到 1991 年 7 月 1 日 苏共党员人数已由改革开始时的 1 900 多万下降到 1 500 万 与 1973 年的数字相同。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苏共党员人数减少了 420 万。其中大多数退党者脱离了政治生活 只有 2%—3% 的人转入了其他政党和运动。这表明，大多数人不是因为政见不同而退党，而是对党感到失望。一项对苏共党员退党原因进行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这项调查显示 因对共产主义理想失望和对苏共不信任而退党的人 占退党总人数的 36% ，因不愿对过去的错误承担责任而退党的占 30% 因担心苏共身份使自己受伤害而退党的占 23% 三项合计共占退党总人数的 89% 。

到苏共被停止活动时这种衰退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通过 1991 年 8 月公布的苏共纲领草案（这也是苏共的最后一个纲领草案）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纲领草案是应苏共二十八大的要求起草的。从草案的内容看，它显然不是要设法阻止苏共衰退的势头，相反是在朝这个方向推进。如我们所说，本来苏共二十八大的纲领就已经是对苏共涣散状态的承认，没有起到凝聚全党的作用。与苏共二十八大的纲领性声明相比，这个纲领草案在这个方向上又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其一 有意淡化马克思主义的地位 规定“对我们来说 主要的思想价值就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在恢复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说中起始的人道主义原则的同时，也把本国和世界的社会主义与民主思想的全部财富纳入我们的思想宝库”。而二十大还曾明确地说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其二 淡化一切与党的集中和纪律有关的内容。例如民主集中制原则，二十大还有提及 草案则只字不提 保护少数权利、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独立

性、不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的权利等一再得到强调。其三 片面强调党员的个人自由，规定“ 党员在选择与其能力和知识最大限度相适应的党的活动范围方面是自由的 ”；党员有权就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任何问题公开表示自己的立场，有权直接参与苏共政策的制定，有权保持无神论信仰或者宗教信仰 ”；党的影响和威信直接取决于党员群众思想上的一致、主动精神和积极性，取决于每个党员的组织性、自觉纪律和道德立场 ”。这不可避免地使已经非常涣散的苏共更加涣散，更加软弱。

正是在苏共地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发生了 1991 年的“ 八一九 ”事件。就事件本身而言，它是一部分领导人在看到国家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用非正常的手段来扭转局势的一个尝试。自然，这种尝试是很仓促、很不成功的。采用非正常手段已属下策，权力在手之后又提不出任何有效的措施，更使事情显得被动。同时，由于不少共产党党员和干部的介入，使苏共被反苏共的力量轻而易举地抓住了把柄。这几个方面合在一起，使百姓对苏共的任何信任都烟消云散了。

所以，1991 年“ 八一九 ”事件后苏共被解散，只是苏共威信扫地、群众对苏共完全丧失信心的一个明显标志而已。

第十四章

几个重大问题的评说

苏共失败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现象。在苏共走向垮台的过程中，有一些问题始终处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对苏共每往前走一步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否透彻，往往影响对整个政治现象的评价。因此，在我们对苏共失败的整个过程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后，有必要拿出一些篇幅，专门探究一下其中几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关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关于“民主化”、“公开性”关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关于戈尔巴乔夫对苏共失败应负的责任。

关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把自己的目标定义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人在“新思维”中占着特别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是这套理论的核心。他批评过去对人的忽视：“为了虚构的集体主义精神，忽视了人的个性，阻碍了个性的发展，在大众优于个体的借口下大大缩小了自由的合理界限，阉割了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人道本质。换句话说，从社会主义理想中抽掉了主要的东西——人本身，人的需求、利益、人的活生生的生活。”戈尔巴乔夫强调突出社会主义

的人道特点 就是要把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都变成一种手段 而人本身则是要达到的目标^①。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先不要说戈尔巴乔夫是受了社会民主党理论的影响(当然不能否认这一点)也不要把事情简单地归结为对西方式民主的推崇。正是长期以来实施恐怖、镇压政策 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证 人性被扭曲 反过来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人道”、“民主”这两个词对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吸引力。苏共抓住了传统模式的致命伤,把人道、民主等概念作为改革的旗帜打出来 应该说 对企望自己的尊严受到维护、企望自己的人格得到别人尊重的普通党员和老百姓来说,是有强大的召唤作用的。

把人道作为共产党纠正错误的一个途径、吸引人民群众的一面旗帜 不是戈尔巴乔夫的发明 也不是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新现象。在 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中,捷共也曾提出了一个极为相似的口号:“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捷共认为新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特点之一是“应该以其资源财富能够过着体面的文化生活的、在人们相互关系中建立起了同志关系的、为人的个性发展逐步开辟着活动天地的社会”强调“党从满足人的物质的、文化的和伦理的需要中,从全面发展人的个性的可能发展中,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而且我们看到 到后来 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提到改革 人道、民主等问题总会随之出现。很有必要思考这种现象的原因。归根结底,这恐怕与以往的社会主义模式忽视人本身、忽视老百姓的基本权利有关。

所以 就“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对过去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而言,它有合理的内容。这也正是这个口号和主张能为大多数党员、干部和群众所接受的原因。

^① 《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真理报》1989 年 11 月 26 日。

当然 作为一个概念“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缺乏科学性。其含义实际上是含混不清的。戈尔巴乔夫在这个概念里不时地加进一些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成熟、有时还互相矛盾的内容。如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尼基金在 1990 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所指出的：“我们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是什么含义呢？草案中所作的描述是如此包罗万象，以至于它对任何现代社会，甚至不是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社会也是正确的。”^①这样一个概念的缺陷带来的是政治性的后果，因为正是由于它的抽象、不确定性，这个概念可以被随心所欲地诠释和使用。甚至可以反过来被反对派用做攻击苏共的武器。多党制 三权分立 意识形态多元化 党的指导思想多元化 党改变成议会党 武装力量非组织化等 后来都被塞进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即使仍然保留一党体制 用这样一个庞杂的理论来指导党的活动 这个党能不能起到领导作用 也是大可怀疑的。在多党制条件下 党的状况就更可想而知了。

关于“民主化”、“公开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民主化”、“公开性”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的最基本内涵。在他看来“没有公开性和民主化 改革进程就是不可思议的”^②。

为什么要民主？因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人的积极性，而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需要通过民主才能动员起来。戈尔巴乔夫指出：“人的因素 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 是我们的主要潜力 而

^① 《苏联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159 页。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57 页。

把这种潜力变成现实的途径则是民主化。^①“既然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加强人的因素来揭示和发挥社会主义的潜力，那么，除了民主化——包括改革经营机制和管理——之外就不可能有其他途径。”

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显然首先是针对过去的缺乏民主而言。“恢复和加强苏联人对国家命运负责的主人翁感和亲身参与并关心公益事业的感情，这是改革条件下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甚至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②所以，“民主化”是一个极其广泛的概念，包含了从党政关系、政府运作、政治参与、选举制度、干部体制、党内生活到党员义务和权利等方面的内容。

要推进民主化，没有人们对党和政府活动的了解是不行的。所以，“公开性”是戈尔巴乔夫打出的又一面旗帜。戈尔巴乔夫这样强调公开性与民主的关系：“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

俄文中的“公开性”一词既有通常所说的知情权的意思又有党和政府的政治活动公开的意思。前者强调人的民主权利，后者强调党和政府在向人民公开自己活动方面的积极主动作用。戈尔巴乔夫对公开性作了解释：“选举出来的机关和领导人必须公开活动，让群众都能看到。”^⑤他宣称：“我们力求在社会生活的一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 新华出版社 1987年版 第125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 新华出版社 1987年版 第31页。

③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 新华出版社 1987年版 第125页。

④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 新华出版社 1987年版 第95页。

⑤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 莫斯科新闻出版社 1987年中文版 第30页。

切领域有更多的公开性。人们既应知道好事 也应知道坏事 以便扬善除弊。’^①“公开性是社会正常精神道德气氛不可分离的特征，这种气氛可以使人更深刻地了解我们过去如何，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在努力干什么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因而能够自觉地参加改革。”

戈尔巴乔夫对‘公开性’的作用是十分看重的。“公开性应该巩固我们的社会。”^②“公开性是对毫无例外的一切管理机关的活动进行全民监督的有效形式 是纠正缺点的强有力杠杆。”^③“发展公开性是集中各种各样的意见和观点的方法，这些意见和观点反映了苏联社会各个阶层和各行各业的利益。”^④戈尔巴乔夫提议：“已到制订保证公开性法案的时候了。他们应当保证国家和社会组织活动的最大公开性，给劳动者提供其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的现实可能性。”^⑤根据这一提议，苏共起草了名为《苏联全民讨论国家生活重要问题法》，在 1987 年 6 月中央全会上讨论和交最高苏维埃通过。

戈尔巴乔夫甚至设想把公开性作为西方多党制的代用品。在一次秘密会议上他这样讲：“我们没有反对党。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管住自己呢？只有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最主要的是通过‘公开性’。没有‘公开性’民主制是不存在的。同时 无限制的民主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 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88 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 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94 页。

③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 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89 页。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 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92 页。

⑤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 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31 页。

是无政府状态。”^①在这里，戈尔巴乔夫既给予了公开性以足够重要的地位，又表示了对无限制民主的不赞同。

很难说“民主化”、“公开性”的概念本身有什么严重的缺陷。而且这两个概念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有些领导人早就提出过。例如，波兰的哥穆尔卡在1956年上台后曾多次谈到党的“民主化”匈牙利的卡达尔在论述发扬党内民主时提到过“公开性”这个概念。其实，“民主化”也好，“公开性”也好，都是针对党内长期缺乏民主、普通党员和群众无法参与决策的状况提出的对策，目的在于增强党员、群众的主人翁感。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公开性”，目的也在于此。他的错误不在于主张了“民主化”和“公开性”而在于他对“民主化”、“公开性”的迷信如同过去的领导人对权力的迷信那样。戈尔巴乔夫相信，“人总是有健全的理智的”^②。既然如此，那么，只要给人们以民主，他们就会自觉负起责任来，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健康发展。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苏共在改革中放任自流，对动摇苏共领导地位的主张、报刊、组织一概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实际上放弃了党的领导作用，放弃了作为执政党所应当担负起来的历史责任。澄清这一点，是为了说明，没有必要因为苏共改革导致了失败，就把“民主化”、“公开性”的概念本身都作为垃圾抛弃掉。共产党需要把民主化的旗帜抓在自己手里。

关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

苏联共产党执政的失误 从根本认识上说 来自对社会主义和

① [美]《时代》杂志编辑部：《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夫人》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28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

资本主义的认识不正确、有片面性。改革前的苏共 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导致了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失误。戈尔巴乔夫反思了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阐发了不同于过去的新的观点。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思想，是建立在这些认识基础上的。这些认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思想的评价。在 1989 年 11 月 26 日发表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戈尔巴乔夫一反过去苏共只有称颂没有批评的文风，指出了他们思想的不足点。文章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可能性估计不足”；他没有预见到未来的科技革命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源泉”。从实际情况看 这个评价 大体上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确实没有很快出现、并且至今仍未出现灭亡的迹象，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尚未走到尽头。关于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 戈尔巴乔夫声称“过去曾普遍认为 列宁似乎有一个完整的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其实他根本没有一个这样的完整纲领”。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他又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给我们留下了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的和本质的论述。他们没有陷入繁琐的细节，没有对社会主义的面貌作详细的描述。”戈尔巴乔夫在这里的点评有不当之处。例如说列宁“根本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有些过于绝对。但话说回来，也应当承认，列宁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纲领的确是不完整的。关于这一点 我们已经作过详细的分析。

（二）对当今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关系的看法。在对马克思、列宁进行评价的基础上 戈尔巴乔夫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内容十分相似的进程”。戈尔巴乔夫的这个观点，主要来自欧洲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有关思想。在此我们不简单地判定这些思想的对与错。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

戈尔巴乔夫称“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 列宁从理论上和政治上论证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时 善于高瞻远瞩 能超出革命任务的阶级范畴。他曾不止一次地阐述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的思想”。戈尔巴乔夫由此推演出了“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观点 提出“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 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人们迫切需要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①对这些观点，只从字面上去理解是没有意义的。读懂它们的真正内涵，才能弄清问题出在哪里。戈尔巴乔夫所说的“阶级利益”实际上指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按照苏共的传统观念，苏联是舍我其谁的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体现者。而“全人类利益”戈尔巴乔夫更多的是从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得出的概念。在他看来，随着普遍的、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的出现“第一次出现了‘对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今天的而不是遥远的全人类的利益’的威胁。因此 理想中的‘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外化为实践 实质上变成了：一切服从于和西方国家搞好关系。戈尔巴乔夫后期苏联向西方国家乞求援助，被称为“国际乞丐”无疑是这种实践的一个明证。

（三）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识。戈尔巴乔夫对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是肯定的。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界性进程”在这个进程中 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外“占有一席之地的还有世界其他部分社会主义思想的各种流派”。因此，要给社会民主党以应有的评价 研究和利用其所积累的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 新华出版社 1987年版 第183、184页。

按照这一思想 苏共在自己的纲领性声明和党纲草案中 都大量吸收了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主张，并把改革的目标明确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按照社会民主党的模式改造党 给苏共带来了致命的危险。它等于对列宁创始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和实践提出了质疑。人们就会问，列宁对以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进行改造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意义，那么是不是说，从列宁开始 苏共就走上了—条错误的道路 这些问题本身 毫无疑问都是对苏共合法性的动摇。所以，尽管戈尔巴乔夫口头上一再强调 不能否定列宁 不能否定十月革命 但—旦出现了这样的思潮，苏共是很难控制局面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点。

关于戈尔巴乔夫对苏共失败的责任

领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曾经实行高度集权体制的党来说 尤其如此。所以 对于苏共的失败 戈尔巴乔夫无疑负有很大的个人责任。

但是 对领袖个人的责任作什么样的估计才准确 往往不只关系到个人，而且关系到对苏共党的建设的总体评价。过高或过低估计个人的作用，都不利于我们正确地总结苏共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有些学者夸大个人因素的作用，认为苏共的失败主要是戈尔巴乔夫等一小撮人制定了一条错误的政治思想组织路线 把党引向了毁灭。依照这种观点 苏共与其说是作为一个政党在起作用 不如说更像一个任人摆弄的玩偶 似乎无论是谁 不管用什么样的思想 都可以随意支配这个党 牵着它的鼻子走。这显然是讲不通的。它很难使人们相信 就是这样一个党 曾经有过领导十月革命、战胜德国法西斯、在超级大国执政的辉煌业绩。

在描述苏联剧变的著作中，前美国驻苏大使小杰克·F·马特洛克的《苏联解体亲历记》是一本十分引人注目的书。在这本书

中，作者强调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苏联剧变中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还特别强调这样一个观点：戈尔巴乔夫在按美国的意图办事他的失败不是因为他按美国的意图办事而是因为在许多方面很勉强地、很不情愿地按美国的愿望办事，有的方面做得不彻底。我们国内有些人以此为据，来说明葬送苏共是戈尔巴乔夫等人事先就设计好的预谋。我十分怀疑这种看法的正确性。我倒是以为，如果戈尔巴乔夫真的完全按美国的意图去做，事情只会更糟。任何一种别国的体制都不能照搬到另一个国家。即使这种体制在这个国家十分成功，照搬过去都只能成为蹩脚的赝品。这是在人类发展史上屡试不爽的真理。马特洛克为戈尔巴乔夫未能完全照搬美国而心怀怨意，固然可以理解，但把自己的药方看做拯救苏联的惟一选择，未免有些过于高看自己。

苏共的失败，首先是因为党本身出了问题，得了难治之症。就在苏共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掌权了。他决心医治苏共的疾病，并且想通过治好苏共的疾病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留下美名。但是，戈尔巴乔夫医学造诣欠佳，在临床诊断、手术方案、用药配方等方面都连连失误，造成了苏共病危。最后，戈尔巴乔夫宣布停止抢救，拔掉了苏共借以苟延残喘的输液管。我以为，这就是苏共失败的全部真相。

戈尔巴乔夫扮演的是这个医生的角色。从作为抢救者的医生到作为拔病人输液管的医生，有一个过程。

在改革的第一阶段，戈尔巴乔夫无疑还想保留更多传统的东西。正因为此，西方多数政治观察家都不认为他向往多党制。美国历史学家莫什·卢因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目标不是设置西方式的多党共和制度，而是使百姓多参加政治生活，增强政治的和其他方面的自由，使党重新成为一个政治的党，而不是一个基

本上官僚行政的党”^①。这个分析，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这一阶段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特点。

在第二阶段 戈尔巴乔夫明显地由此前对苏共地位的维护 转向对“革新”的强调。他认为：“如果党本身能够进行自身的根本改造 掌握在现代条件下做政治工作的艺术 善于成功地与一切改革力量协作，它就能够完成政治先锋队的使命”^②。从 1989 年起，戈尔巴乔夫越来越多地批评党自身 认为它落后于社会 落后于改革，实际上已经有了把苏共看做绊脚石的苗头。为了彻底改造苏共 戈尔巴乔夫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行了大踏步的退让 如允许党内横向组织存在，把苏共放入多党制的环境中等。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根据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强调，认定他的下一逻辑步骤将是在党外为自己建立一种权力基础，然后再迫使党跟他走。如果失败了，他最后也能挣脱出去而不至于自动丢掉事业。不管这个设想是否合理，戈尔巴乔夫在这一时期不断淡化作为党的领袖的形象而强化作为国家领袖的形象，却是千真万确的。

对于苏共的失败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有人从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原因方面进行过分析。例如，戈尔巴乔夫的前办公厅主任博尔金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主要原因首先是戈尔巴乔夫的世界观和性格，是他的优柔寡断和热衷于他年轻时就形成的那些公式。实质上总书记依然是自己那个时代的产物，是培养他并把他推上权力顶峰的那个结构的产物。一方面他看到了现存制度的缺点 想给社会生活带来一些变化 另一方面他又忠实于旧模式和旧方法。戈尔巴乔夫高喊民主化并谴责自己战友的斯大林主义，但实际上他独揽党和国家大权 独断人们的命运，一个人根据自己的

① [美]《时代》杂志编辑部：《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夫人》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89 年版 第 144 页。

② 《苏联问题资料》 东方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35 页。

偏见、好恶决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组成、各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及各州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人选。他大谈集体通过决定、遵守协商原则，但却独断专行，一人通过或发布国家重要决定，排斥异己并清除自己的竞争者。总书记—总统主张扩大公开性，但却不仅对人民和党，而且对自己的战友隐瞒关于政治局过去活动的重要消息，以撤职威胁那些在报刊上发表不利于他的东西的主编。总书记—总统多次同外国政治活动家谈判，却从不向安全会议和最高苏维埃成员通报谈判结果。他宣布司法机关独立，却常就某些案件的审理对总检察长指手画脚。戈尔巴乔夫要求取消行政命令管理方法，但却紧紧抓住各部委不放，由中央决定所有经济政策。他口头上宣布给地方放权，但却将无限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他既是苏共中央总书记，领导强大的人数众多的党，又是苏联总统、国家首脑，主持会议，实际上使总理有名无实。他还是苏联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国防委员会主席，是克格勃、国防部、内务部、外交部、军工委员会等的直接的和唯一的主管人。他拥护精简管理机构的原则，却不断扩充身边的官僚随从。他主张生活俭朴并以反对特权闻名，但却为自己保留停滞时期的全部免费和优惠的待遇^①。

利加乔夫则把原因更多地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犹疑、迟钝，以及为一群一心想把苏共搞垮的“民主派”人士所包围，离开了党和人民。“了解国内实际生活的人渐渐远离戈尔巴乔夫，而代替他们的则是些经院式思维的学者。”^②利加乔夫指的当然首先是叶·雅科夫列夫。

可以这样说：由于所处时代的影响，在戈尔巴乔夫的头脑中，求实的态度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兼而有之。据和戈尔巴乔夫同宿舍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412—413 页。

② [俄]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104 页。

的捷克留学生、后来在‘布拉格之春’中成为党的领导人之一的兹德涅克·姆利纳日回忆，戈尔巴乔夫非常欣赏黑格尔“真理永远是具体的”这个警句。“每当某个老师或学生胡诌什么总原则而不顾它们同现实生活有多少共同之处时，戈尔巴乔夫总是重复这句话。同许多苏联大学生大不一样，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做是必须牢记的一堆原则，而是把它当做理解世界的有价值的工具并且是一种无须 30 年就可溶进政治实用主义的信条。”^①遗憾的是到后来无原则的实用主义态度在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方法上占了上风。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由于苏共没有及时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后来的危机。这是苏共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戈尔巴乔夫有机会领导苏共摆脱危机，但他的无能使苏共与这个机会擦肩而过。从这个角度讲，戈尔巴乔夫对苏共失败负有重大的责任。

在《苏联高层决策 70 年》一书中，有一段话用形象的比喻说明苏联最高决策层的失误。我想，用这段话来说明戈尔巴乔夫对于苏共失败应负的责任，也是很贴切的。故此照录如下：

—— 在修理苏联模式这部机器时，戈尔巴乔夫在要求严禁烟火的地方使用了明火；

—— 苏联最高决策层以前不知道饺子好吃，但得知饺子好吃之后却亟不可待 以至于缩去‘煮’的程序 直接生吃饺子 造成了肌体不适；

—— 苏联最高决策层在建造新的机制大厦时，僵硬地、简单地将西方‘预制板’和‘构件’径直移植过来。戈尔巴乔夫将西方

① [美]《时代》杂志编辑部：《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夫人》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89 年版 第 49 页。

的钢板和苏联模式的木制板一起加以焊接，其结果是木制板被焊穿。”

启 示

苏共的失败是一个悲剧，一如这个民族也常常为人类历史提供悲剧一样。90 多年前，俄罗斯哲学家恰达耶夫在自己的《哲学信札》中作了一个惊人的预言：“我们是被以某种方式开除了的民族。我们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民族 这类民族不在人类之列 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给世界提供某种重要的教训。当然，我们提供的教训是不会被人抛弃的 但是又有谁能说得出来 我们何时才能成为人类的一员，我们究竟要经受多少磨难才能实现我们的使命？”^① 苏共的失败 是这个民族为世界、为政党政治提供的又一个重要的教训。它给我们许多深刻的启示。

启示之一：必须跳出党政不分的怪圈

讲到苏联模式的失败，苏联学者利比茨基有一句话说得不失深刻：“斯大林模式的寿终正寝与其说是强力摧毁的结果 不如说是它耗尽了内在的潜力。”^② 我们同样可以认为 苏共的失败 与其

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337 页。

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册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791 页。

说是由于外力的摧毁，不如说是由于内力的消耗殆尽。

党直接掌握国家权力 以党代政 把党的力量强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最后结果却是党本身失去力量 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悖论。其实 这一结果 有着它内在的逻辑。可以说 苏共全部症结的核心在于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与政党运作的一般规律相违背的。它不是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而是销蚀了党的力量。

从最初执政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 我们看到 苏共始终没有把执政党和政府区分开来 没有能够跳出党即是政、政也是党的框框。这导致了政治体制诸因素之间法理关系的混乱：党的机关未经授权而行使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 政府名义上接受人民授权而实际上听从党的机关的命令；官员行使人民授予的权力而只向任命他们的党的机关负责；人民是主人而不具有主人的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罢免权 等等。党融入国家机器 带来的一个最大消极后果就是国家机器失去监督和制约，党脱离了它赖以存在的基础，变成了高高在上的力量。历史上各种各样成功的和不成功的政党执政模式已经证明 不管什么性质的政党 不管什么类型的政党体制 如果政党凌驾于国家之上 往往会使国家机器的运作规律受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避免所有国家权力机关都具有的那些弊端 官僚主义 脱离民众 效率低下 贪污腐败等。政府活动不正常、低效率 反过来执政党也难辞其咎 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就会因此遭到削弱。苏共的全部执政实践，画出的就是这样一条轨迹。它告诉我们 执政党应当掌握政党执政的一般规律 并且努力适应和遵循、而不是违背这些规律。共产党的优势不在于它可以随心所欲地违背规律 凭主观意志行事 而在于它具备按规律办事的最大可能性。离开了这一条 优势就会变成劣势 优点就会变成缺陷。违背规律，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苏共的教训即在于此。

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执政方式不可避免地使官僚主义泛滥，使一个不受约束的官僚特权阶层得以产生。这也是苏共失败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教训。执了政的共产党应当高度警惕党官僚化的可能性。党政不分、党手中掌握了不受约束的权力，很容易使这种官僚化从可能变为现实。过去我们往往认为，官僚主义是阶级社会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官僚阶层产生的土壤。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实际上，官僚的存在是社会分工不同所致，是存在国家的前提下管理者的利益不同于被管理者利益的一个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僚阶层与其说有明显的阶级属性，不如说它只与权力相关。但反过来，官僚化却能引起社会、政党、以及政党所从事的活动的变质。腐败现象只是官僚化发展到极致的结果，它表明官僚化已经达到了严重危害社会利益的程度。

党的官僚主义化，从某种程度上说，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国家的性质。它使苏共往往难以正确制定和执行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并对群众缺乏关心。从性质上说，苏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因此，它的成员由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但是，在实践中，特别是在党掌权之后，权力的诱惑会吸引一些趋炎附势的野心家和政治投机分子想方设法钻进党内。这些人不是为党的利益，而是为个人的利益而来的，他们会逐渐形成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集团甚至阶层。苏共由于对权力的腐蚀作用认识不足，加上体制本身的问题，因而官僚主义发展得十分迅速。官僚主义和党的官僚化对政治体制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它保守、僵化、墨守成规，使整个社会对现存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认同感不断下降。党的官僚化严重损害了苏共的形象。1990年6月《西伯利亚报》所作的一项民意调查很能说明问题。在这份调查中，当人们被问及“苏共代表谁的利益”时，回答代表苏共党员的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1%，回答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回答代表工人的只占4%，而回答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到

了 85% 。

苏联的官僚阶层产生于计划经济模式。计划经济的理念要求有一整套按这一理念运作的机制，以及所需的一大批管理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由于对党的领导的认识有误，党的机关、各级党组织和整个苏共都被紧紧地绑在了这个机制上。这些人由于掌握权力而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逐渐形成了特殊的官僚阶层。

这个阶层反过来成为政党活动科学化的障碍。它改变政党活动的目的，而以自身的存在甚至发展为目的，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改革要触动这个机制，也必然危及这些人的利益。因此，这个阶层对改革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抵制和阻挠。当抵挡不住改革的正面进攻时，这个阶层的第二个反应就是在改革中处处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通过改革的名义使自己的利益合法化。改革成了他们维护自己利益的旗帜，这就必然导致改革的变形。在官僚阶层的支配下，改革往往退化为政治权力的争夺。在这种情况下，观点和主张的争论往往只是权力之争的外在的“话语”。这些“话语”实际上包含着利益的内涵，但又往往被贴上政治标签，掩盖了利益的内容。给任何争论都贴上政治的标签，使各种观点之间的相互靠近和影响变得十分困难。

只要国家存在，官僚机构就会存在，就会有官僚，就会有官僚主义。因此，取消官僚机构，根除官僚主义，在很长的时期内是不现实的。官员是施权者，官僚主义则是对权力的滥用。官僚主义必须反对，公务员的利益却是客观存在，应当予以承认。官员、公务员本来就是一种职业，有着和其他职业不同的特点。他们的职责应当是为人民服务。但这种服务不可能、也不应当是无偿的。过去苏共不承认这一现实，对显然由利益矛盾引起的各种问题视而不见。这种情况导致的是另一个极端，即机关和官员往往把自

① 《莫斯科新闻》1990年6月24日—7月1日版

己的利益隐藏在公共利益的后面 把它等同于国家利益 以党和国家的名义发号施令。这在客观上为党的官僚化、为形成有特殊利益的官僚阶层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很显然，只有正视他们的利益，才能正确解决由此带来的矛盾。当然，应当通过建立相应的机制，把这种利益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既然机关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那么人民满意不满意就是机关工作的尺度。机关工作人员的利益应当得到满足 但前提是要服务好。既不能只谈利益、不讲服务，更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这就给建立机制提供了基本的原则。明明有自己的利益，却非要说是没有任何私利的“公仆”老百姓是不太相信的。他们更能接受的是那种不避讳个人追求、同时又能正确地处理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关系的公务员。苏联的情况是如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

由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本意是要纠正以党代政的模式。从这个角度看 党把国家管理职能交还给政府的构想 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 苏共的改革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 盖在于没有理顺党政关系 使执政党回到正确的位置 因而也无法使苏共重新担负起应尽的历史责任。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苏共自身的改革没有能够把这个党建设成一个团结的、能够与其他政党竞争的党 关于这一点 我们在前面的有关章节中已有谈及 其二 由于作为执政党的苏共不到位 政治体制出现了真空 导致国家权力运作的失控。苏共党内的许多当事人在总结 80 年代以后的改革时都有这样的认识。例如 曾在当时任总理的雷日科夫 虽然赞同党政关系的改革，同时却认为：“由于几十年间形成的制度 无论在组织上 还是在法律上 国家权力机关都未作好立即承担这些职能的准备。需要时间来确立法治国家的全新制度，需要

时间来让社会按照法律运转。”^①利加乔夫也有类似的思想。他强调“应该‘有计划地把管理和经营职能移交给各级苏维埃，但一切应当从加强苏维埃的物质基础及其威信开始。实际上却反其道而行之，尽管苏维埃还是软弱无力和没有经验的，但却着着实实地强迫党放弃管理权。其结果便是无政府状态”。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当农民筹足资金和人力后，他开始建造宽敞的新房，在他从事这项不简单的事情时，他继续住在老房子里。只有当一切都准备就绪后，他才拆除老房屋。而我们呢，却反其道而行之，没有建造起任何新东西，却匆匆忙忙地摧毁旧东西。”^②利加乔夫是把这种改革战略的错误看得很重的。他指出：“由于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进程已不可控制，社会丧失了政治稳定，不受约束性占了上风，纪律急剧下降了，法制崩溃了，法律不执行了。在经济改革最复杂的阶段，社会稳定是成功的决定性条件，而把国家抛入急风暴雨的政治斗争是明智的吗？”^③事件之后的这些反思，都有一定的道理。

启示之二：从机制上保证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

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后来称工人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但是，实际上，无产阶级不可能整个阶级都坐在体现统治的职位上。例如在一个国家中，政府首脑只能有一个人，行使决策权的也只是人口中的极少数。这就产生一个问题：这么庞大一个阶级，如何才能体现自己的统治阶级身份？

① [俄] 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1 页。
[俄] 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93 页。
[俄] 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54 页。

怎样才能保证作为领导者的党和作为被领导者的人民群众之间的和谐和一致？

苏共包括同时期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以往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是不周延的。例如人们习惯于这样的观念：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共产党来实现统治，共产党能代表工人阶级，因为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求解放的理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成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指南，是因为它的科学性：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规律。从原则上说，这些观念没有错。然而，共产党是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应由谁来判断，工人阶级听从共产党的领导，通过什么途径来体现？工人阶级选择共产党替自己掌权，又是通过怎样一种形式来授予这种权力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就是说，在理论上，苏共是人民的代表，在实践上，苏共和人民之间代表和被代表关系的机制和渠道并没有解决。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党应当充分代表和反映人民的利益；二是党支持人民做国家的主人。如果在这两个方面都缺乏科学的体制、机制和渠道，党群关系的融洽便无从谈起。

苏共的问题，也恰恰出在这两个基本方面。它们导致了党和它所代表的群众之间的矛盾和隔阂。

首先，苏共的党群联系和沟通机制难以充分反映它声称所要代表的那些阶级和集团的利益。

对利益问题，列宁有非常深刻的见解，并始终注意解决这一问题。从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角度去确定和调整党的任务，根据各方面的利益去修正党的政策和目标，是列宁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这样的范例比比皆是。例如，制定新经济政策，就是同时考虑农民利益和党的目标之后作出的选择。但是后来，苏共在这个问题上

逐渐陷入了教条化。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苏共领袖在这方面有严重的失误。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把理论看成是绝对正确的，实践，包括群众的利益 都要无条件地符合理论。这种思维 使苏共不能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党的理论与群众的实际的关系，从而把理论与群众的利益对立起来了。党的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党所制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是为实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体系万万不能离开这个基础。苏共却不是这样。在苏共看来 为了“理论”本身的“纯洁性”甚至可以去牺牲群众的利益。在这种教条化倾向不断强化的情况下，理论不但逐渐脱离了群众的实际，而且逐渐变成了与群众利益相矛盾的东西。当这一现实为广大群众所认识时，它对苏共作为人民利益代表的地位的冲击是可以想见的。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苏共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没有发展上去。这是对的。但是，苏共不是不想发展经济。问题的关键不是想不想发展，而是用什么思想、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发展。不能摆正政党和民众之间的位置，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是错的，经济发展就缺乏正确的方向 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对利益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关键在于对个人合法利益认识有误。“左”的理论误读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 忽视个人利益 实际上是掏空了这一理论“为了人”的基本内涵 这就把公共利益建立在了虚无的基础上。美国前驻苏大使戴维斯曾正确地预测：“由于这是个建立在无私观念基础上的社会，所以目前它正遭受着无法消除的人类谋私本性的威胁。这些埋藏在人类的生理器官中的本性，是几个世纪来隔代遗传的结果。如果这些本性不能在一两代人中根除，那么政府的试验就会失败了。”^①如果不把对个人利益的追求都笼统地看做“谋私”而看做是必然需要的话 那

[美]约瑟夫·E.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

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后来苏联的发展被他说中了。

苏共在作为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方面不成功，在作为执政党对社会各集团利益进行整合方面同样不成功。执政党和领导夺取政权斗争的党有一个显著区别。作为与执政党对立的党，党的主要职责在于表达所代表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而作为执政党，则要尽可能代表社会多数，以使自己有比较牢固的执政基础。因此，由国家机器的社会功能所决定，政党在执政之后，一方面继续作为本阶级的政治工具，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而且是惟一执政党，它的政策不能不更多地体现社会各部分利益的一体化。苏共不是如此。就利益表达功能而言，苏共更多起的是一种普及作用，即自己制定政策，然后用思想的和行政的手段迫使人们接受。在这样的情况下，党的政策是否真的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很难判断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即是一个典型事例。就利益综合功能而言，在后列宁时期，苏共消除社会矛盾的主要思路受“左”的“在野党思维”的支配，往往倾向于依靠一部分人，而对另一部分人，有时是社会的多数，实行强制和压制，其政权的巩固以损害相当部分群众的利益为代价。这大大削弱了党执政的基础。

其次，苏共没有从制度上支持和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保证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翁地位。

苏共以人民的名义取得政权，并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党的旗帜。苏共执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列宁曾明确指出：“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列宁明确这一点显然是想说明，共产党政权的发展方向应是逐步实现劳动群众的管理，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应是不断扩大的。但是，由于建立的体制缺乏表达民主的渠道和途径，苏共与群众的隔阂，在列宁当政晚期就有所显露。为此，列宁曾对当时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脱离群众的官僚主

义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是后来，随着高度集权体制的强化，党群关系的消极面并没有被克服，反而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在后来的实践中，苏共越来越远离了民主的基础。在斯大林确立的传统模式中，群众与其说是“主人”，不如说是被统治者。而且在党内，在领导层圈子里，“主人”这个神圣的字眼被专用做对斯大林本人的称呼。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苏共在许多文件中都强调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发扬民主，并且不能说没有做一点工作。但总的说来，苏共对群众是缺乏信任的。对群众缺乏信任，使苏共往往害怕群众，对扩大群众的民主权利持消极、保守的态度。例如，苏共看到了权力行使过程中出现的弊端，提出了加强人民监督的问题，60年代已经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人民监督体系。但是，尽管这个体系在组织上十分庞大且无所不在，真正的权力却有限。首先，它对党的系统没有任何约束力，只是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党和政府的决议、指示、计划情况”进行监督；其次，无论是人民监督委员会，还是其他有权起监督作用的群众性机构，如工会、生产会议等，都不是决策机构，只有咨询权、建议权。所以，虽然组织是健全的，却无法阻止权力的滥用、官僚主义的泛滥和腐败现象的蔓延。又如，无论是苏联宪法，还是苏共的历届党章，都把群众的选举权放在重要的地位。然而在实践中，这项权利的落实却打了很大的折扣。苏共干部长期实行委任制，党内外群众的选举权实际上成了使委任制合法化的一种形式。苏共为推广选举做了一些工作，但这些工作和民主选举的要求相距甚远。到70年代，苏联才开始在某些生产企业中实行工长、总工长、工段长的直接选举制，在有关机关和团体中实行科技干部竞选招聘制。到1986年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才提出要普遍实行生产作业队长的直接选举制，并逐步推广到企业工长、班长、工段长、车间主任、国营农场的分场主管人员。可以想像，苏共这种缓慢的民主步伐，在反对派“归还”人民“普选权”的要求面前

显得多么缺乏吸引力。当然，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对民主的惧怕心理，归根结底还是既得利益阶层怕失去手中权力的心态在作怪。

苏共与群众关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和隔阂，使苏共的执政基础大为削弱。到改革前夕，维持苏共强大外表的，实际上主要是苏共手中掌握的强制性权力。党执政初期得到的那种群众性支持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可以说，改革后期人们对苏共的冷淡和遗弃，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状况发展而来的。社会民主与党内民主是如此缺乏，以至于六七十年代的持不同政见者组织和改革开始后出现的反对派组织能够轻而易举地扯起“民主”这面旗帜，把群众拉到自己一边。对于以争民主、搞社会主义为己任的共产党来说，这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正因为此，人们对苏共的改革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对苏共来说，在党群关系方面进行改革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它应当努力重建党和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应当承认，苏共在改革之初有这方面的主观愿望。而且“民主化”“公开性”这样一些概念从其含义说本身就带有很强的“还权于民”的色彩，因而颇受群众的欢迎。然而，实践表明，苏共的改革并未能使党群关系变得和谐。相反，在为改革激起的热情消退之后，我们看到，苏共与群众的关系更加恶化，人们对苏共更加失望，乃至最后认可了对苏共生存权的剥夺。发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从党群关系的角度而言，仍然是由于苏共长期脱离群众的错误，只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错误是由声称要纠正这一错误的戈尔巴乔夫来体现的。

这种错误表现在：

首先，在观念上，戈尔巴乔夫和他批判的前任苏共领导一样，不能把群众的意愿作为考虑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戈尔巴乔夫把人作为中心，把“民主”“自由”“人权”等看做是至高无上的东西，因而看上去要更强调人，强调群众，这是他和前任的不同之处。但是，口头上依靠群众，并不等于实际上依靠群众。在实践

中 戈尔巴乔夫的许多思想和主张 并不是忠实地表达了群众的意愿 反映群众的要求 而主要的是反映那些对他有影响的派别和人物的想法。这就使他的主张具有易变的特点。例如他对多党制的看法就是如此。在 1989 年 11 月为《真理报》写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中 戈尔巴乔夫强调一党制的历史性 强调一党制适宜于苏联国情。但是 1990 年 1 月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戈尔巴乔夫就认为多党制不是什么不幸，并劝人们不要“像魔鬼怕烧香一样地害怕多党制”了。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进而表达了同其他新出现的政党合作的愿望，明确地站到了多党制的立场上。戈尔巴乔夫的政党观发生如此急速的变化 其背景 不过是反对派势力的日益壮大和右翼力量的日益猖獗。也正是在这种势力的推动下 戈尔巴乔夫不顾广大党员的反对和抗议 宣布中止苏共的活动。此外 从戈尔巴乔夫崇尚中庸、热衷于无原则的调和、退让这一点 也可以看到那种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于不顾、靠政治手腕来达到目的的官僚政客作风。从这个角度看，尽管改革前后的苏共表面上区别很大，但在群众观念极其淡薄这一点上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其次，在方向上，戈尔巴乔夫也和他批判的前任领导一样，不能自觉地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改革不能不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相联系，不能不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相联系。对于这一点，苏共和戈尔巴乔夫的认识一开始是清楚的。但是到后来，当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摆到面前时，就出现了方向性的迷误。苏共和戈尔巴乔夫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位，认为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甚至在经济出现大幅度滑坡、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仍津津乐道于人民取得的“民主”和“自由”。这样 改革就错过了大好时机。等到苏共和戈尔巴乔夫终于认识到不能不抓经济的时候，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反对派羽毛已丰 苏共内派别分野也已形成 苏共再像过去那样推

行自己的政策已不可能。很显然 这种状况 是苏共过去对群众利益长期麻木不仁带来的一个后遗症。

此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 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政策。发扬民主，不等于不要领导和引导。戈尔巴乔夫低估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以为还权于民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从而也放松了对这方面的引导。美国前驻苏大使马特洛克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 戈尔巴乔夫‘在提出他的民主化计划时 他没有使人了解，改革可能是长期的和痛苦的。国民对旧的政策感到极为不满 就这一点来说 人民欣赏和支持他的坦率。然而 戈尔巴乔夫使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即只要引进民主因素 就能立即使商店里有更多的食品和其他商品。他没有呼吁人民在改革开始时付出代价 这种失误纠缠着他 特别是当经济急剧下降的时候’^①。

苏共在党群关系上的种种迷误，除了以上所说的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哲学的原因。俄国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曾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讲道：对世界和人的灵魂的改造的奇迹的迷信 会产生出一个“特种的、傲慢地把自己放在与平民对立的地位上的精神贵族阶级”。“以为为人民服务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在其对人民的态度上，经常地和必然地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崇民主义和精神贵族主义。各种形式的崇民主义需要（不管它是以赫尔岑创立的、主要信奉俄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精神的旧民粹主义形式出现，还是以最新的即以马克思主义形式出现。后者是以一部分人代替全体人民）产生于知识分子的信仰原则本身。但是这种信仰也必然产生出一种对立物——高于人民一等的思想，即把人民当成拯救的对象，当成未成年的、需要保姆为其培养‘党

① [美] 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册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73 页。

悟’的、未经知识分子教育过的人。”^①对于把改造世界作为自己历史使命的共产党来说，同样会遇到这个问题。一方面，共产党以民为本，一切为了人民，救人民于倒悬、领导人民走向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义不容辞的责任；另一方面，共产党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掌握着普通老百姓所没有掌握的改造世界的先进思想武器，有义务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因此，怎样正确地把握两者的关系，避免或者由于以民为本而做群众的尾巴，或者由于掌握先进思想而自认为高于群众，历来就是一个至关重要而又没有处理好的问题。可怕的是，在掌握政权之后，如果仍然缺乏这方面的认识，那就很可能以强力逼迫群众，强求他们服从统一的指令。这就无异于走钢丝：如果这个指令是对的，那还属于不幸中之万幸；如果这个指令是错的，那将导致党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列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正确地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后来的共产党领袖们则多是在这个方面把握失当，带来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启示之三：不断提高党的创新能力

社会主义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必须不断创新。在党内建立能够促进发展和创新的机制，使共产党总能适应要求，成为一个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党，是党的建设要解决的首要的、根本性的任务。领导现代化的政党，自身应当是一个有创新能力的政党。

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党，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在苏共的实践中，很早就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被批判的哲学家波格丹诺夫曾向列宁提出质疑：“请

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8 页。

您坦率地说 您的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 是科学 还是宗教。如果是科学 那么怎么会至今一成不变 而这几十年中所有其他科学都经历了巨大变革 如果是宗教 那一成不变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就请告诉我 而不要口是心非 不要抗议有些人老老实实用宗教术语来装饰残存的以外的信仰。如果马克思主义是真理，那么这些年它应产生新的真理。如果你们以为它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那它就是谬误。”波格丹诺夫这样批评列宁是不正确的 因为列宁决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但后来的继承者们，则几乎是个个都被波氏说中要害的。

苏共内部许多问题的争论 表面看是非在问题本身 实际上是一个科学、辩证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还是僵化、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一点，在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争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 反对列宁主张的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新经济政策使农民繁荣 会损害建立在重工业基础上的计划经济 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 农民作为小私有者 是社会主义的天然敌人。另一种观点认为，政治上层建筑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如果现在把经济基础变成自由市场、繁荣的农业与轻工业，那么政治上层建筑或早或迟会发生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变化。随着资本主义（即自由市场）的恢复 资本主义的政治实体就会取代社会主义。不难看出，就理论逻辑而言，这两种观点都有它的道理 但其共同的缺陷都是从理论出发来谈论问题 要求用理论检验实践 而不是用实践检验理论、修正理论。它说明 苏共党内“左”的东西是有深厚根源的。把马克思主义僵化、教条化的所有起点都在这里。

简单地把斯大林的实践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或是简单地把它看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违背，都是不正确的。斯大林的实践在许多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他最终建立了一个变了形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 这不等于说 如果斯大

林完全按照马克思的构想去实践 就一定是正确的，一定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在西方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下所作的一些设想，未必适合俄国的国情；另一方面，即使是原汁原味的马克思观点，在实践中实施也未必绝对正确。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消灭商品、货币的思想，实践证明带有相当的空想的性质。可见，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才科学。

斯大林在同党内“左”的和右的倾向斗争过程中保卫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用这一理论战胜了这些倾向。但与此同时，他也把这一理论神圣化了，以致捍卫这一理论本身成了党的最高目的。这在斯大林以及以后时期党内历次理论斗争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每当俄国的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点发生矛盾时，苏共总是让实践服从理论，而不是理论由实践来检验。例如，1928年布哈林提出经济平衡论，实际上是表达了国家计划起宏观调控作用，并且应按供求规律、用间接手段来管理经济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在深入研究了苏联当时实际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很有见地的。但苏共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围剿式的激烈批判，其主要依据无非是认为它对“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的命题有自己的解释。60年代后半期，东欧各国在经济改革中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苏联理论界也有人进行这方面的探讨。可以说，这一观点的出现，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要求的一种反映。苏共不是实际地考虑这种观点的合理性，而是以现成的理论为框框对其大加讨伐，理由就是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不符。

赫鲁晓夫对个人崇拜的批判，曾为苏共党内思想的活跃营造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氛围。特别是在他执政的最初几年，党内关于发扬民主、发展经济的探索空气还是比较浓的。但是由于赫鲁晓夫没有触动高度集权的体制，所有这一切仍然是建立在传统的行政命令方法之上的，因此到后来，苏共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到了思想

僵化、教条主义化的老路上。探索新道路越来越需要新思想，但苏共党内却越来越没有人起来提出不同意见。保持全党表面上的一致仍被认为是绝对必要的。如我们所知，赫鲁晓夫把党组织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很显然是一个给党的领导带来混乱的决策，实践上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但是，关于该问题的决议却是党的全会通过的。在全会上，有人对赫鲁晓夫的这一创意大加吹捧，称这是一个十分出色的变通之计。探索精神被窒息了，逐渐为千篇一律的歌功颂德、文过饰非所代替。

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后，苏共思想上缺乏活力、理论上缺乏创新的发展趋势更进一步发展。由于客观上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对立的阵营，苏共十分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里反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观点的斗争，实际上采取的是对思想领域严格控制的政策，把许多不同观点和意见，其中有不少是正确的，当做“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看待，加以镇压和压制。这一方面导致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而不愿过问政治的倾向，进一步窒息了积极探索的精神，另一方面使歌功颂德、阿谀奉承的习气泛滥起来，个人迷信之风也随之卷土重来。在这一时期，苏共理论宣传部门出版了大量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和言论集，称这些著作是“党的巨大瑰宝”、“政治才略的教科书”，称他本人为“真正列宁式的领导人”、“英明的领袖”、“英明的理论家”、“世界和平的旗手”等，而真正研究理论、特别是研究现实问题的著作却寥若晨星。这是苏共思想、理论上陷于贫乏的典型表现。这一时期后来被称作“停滞”时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此。

思想僵化、教条主义化给苏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极大地削弱了党的免疫力，使广大党员失去了分辨是非的能力，不能抵制错误思想和思潮的侵袭。教条主义的典型特点就是脱离实际，封闭在现成的理论中。这种理论在自我封闭的条件下“自我完善”，结果是越“完善”越脱离实

际。一旦进入开放的环境，理论便再难以驾驭实践。改革开始后，随着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大多数苏共党员发现自己过去熟知的那套理论、观念已不再适应时代的步调。更糟糕的是，过去那套理论完全没有教给他们如何对待所面临的新问题。这导致了党内的普遍迷惘和束手无策。当时报纸上的一幅漫画形象地描绘了苏共党内的这种状况：一间房子的大门敞开着，拥挤在房子里的人们愤愤地抗议为什么没有人引导他们走出这间房子，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们应当怎样走，而他们自己却没有一个人试着迈出第一步——其思想之僵化跃然纸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新思维”出现了。它一下子吸引了广大党员的注意力，把他们引上了一条前途未卜的改革道路。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在戈尔巴乔夫全面阐述了党的“革新”理论和措施后，有3411名代表对戈尔巴乔夫连任总书记投了赞成票，占当时代表总数的75%。国外不少报纸也观察到了这一点。如德里一家报纸报道：“戈尔巴乔夫再次当选总书记，表明人们对他的党的领导方针的信任投票。这是在国家历史的转折阶段第一次通过全党的信任投票、而不是一个中央委员会的投票选出总书记。”^①苏共的这种情况，说明了党的多数在思想、理论上的迷失，说明苏共自夸的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其说服力甚至比不上“新思维”，反映出长期以来苏共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的重大缺陷和失误。

其次，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助长了“左”的倾向，强化了投机心理，造成了党员心理、道德和思想素质的严重下降。教条主义往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从固定的条条出发，追求纯而又纯的东西，因而往往导致“左”的倾向。由于这种教条常常是难以做到的，或是严重脱离现实的，久而久之，弄虚作假、言行不一的风气就在党内蔓延开来。一些抱着个人目的的人乘机混入党内，攫取权力，另

^① 《真理报》1990年7月6日。

一些本来抱着真诚愿望入党的人则深感失望，逐渐丧失了理想和信念。这种状况从 30 年代到 80 年代整整影响了几代人，使党内普遍潜伏着对党离心离德的危机和信仰危机。在改革进行了几年、人们被改革激起的巨大热情消退之后，这种积蓄已久的危机便开始显露出来。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在改革中屡屡表现出机会主义无原则性和对政治的实用主义态度，大多数党员对苏共不断衰落和最终垮台表现出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冷淡和漠不关心，都与党内长期的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状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再次，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使党失去创新精神和革命政党的锐气，虽然提出改革却又不能领导改革，在同党内的“民主派”和反对派的竞争中丧失领导权。在戈尔巴乔夫对党进行“根本革新”之际，反对他这一套做法的声音也是有的，后来还有一部分共产党人以实际行动起来制止戈尔巴乔夫的路线。他们声称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全盘否定党的历史，有的还谴责戈尔巴乔夫搞“资本主义复辟”，是“共产主义的叛徒”。但是，在同戈尔巴乔夫的“主流派”和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的斗争中，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败下阵去。就连轰动世界的“八一九”事件，也不过坚持了 69 个小时，最后还是输给了对方。究其原因，盖在于“左派”对于他们要捍卫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坚持”而没有“发展”，对于改革只有谴责而没有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因而实在难以把广大党员和群众吸引到自己一边。很显然，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苏共内部长期的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它使苏共总是扮演阻挠、妨碍改革的角色，而不是推进、引导改革的角色，这就很难使群众心悦诚服地接受苏共的领导。

此外，党员对于党的领袖的盲从，在对待党的历史方面走到否定一切的极端，也都反映出苏共在长期的思想建设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虽然苏共长期以来没有放弃过党的思

想建设，但这种建设却是不成功的。它试图用一种先进的思想和理论来武装全党 结果是在机械地维护了这个理论的每条原理的同时，却丢掉了这个理论的精髓和活的灵魂。这使整个党在不断变化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面前显得极其落后、无能。党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没有思想、没有主心骨的党。

曾做过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厅主任的博尔金，在因卷入“八一九”事件被捕入狱期间 写了一本叫做《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的书，对苏共的失败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不知为什么，人们往往比较喜欢引用他书中把苏共失败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等一小撮人叛卖的观点。其实 博尔金的思考远比这要多得多。这里 我们不妨把他关于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误的认识那一段摘录下来，供读者品味。他写道：

“不管对选拔党和国家最高机构的干部方面的缺陷批评得多么正确，看来导致党被削弱和党的领导者中出现冒险主义者的最深刻原因是 苏共和生活失去了一个全民族的伟大思想 依靠这种思想 我们不仅完成了 1917 年的革命 而且团结了人民 经受住了国民经济改造的艰苦条件的考验 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战胜了希特勒帝国，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取得了不愧我们伟大人民的地位，它的伟大胜利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实际上没有一次重大的国际行动不是在苏联公开的或非公开的赞同下完成的。

“共产主义理想胜利地传遍了全世界，鼓舞了许多国家的人民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它对敌人的理论观点也产生了影响，资产阶级世界的实用主义者从共产主义理想中吸取了许多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并把社会主义国家所争取的东西用于实践。但是这个在 150 年前诞生的伟大思想到本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僵化’，我们的思想家违背时代的要求，长久以来并不无成效地把它变成了一种教条，他们坚持认为经典作家的思想是完美无缺的。

“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很清楚这一点，他们每天接触生活，

认为我们宣传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公式已经过时和落后了，他们力图使这一伟大思想适应急速发展的生活实际。但是欧洲共产主义遭到了苏共的强烈谴责，我们的意识形态卫士不仅不容许在苏联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且阻挠在西方国家这样做结果常常造成各国共产党的分裂。

“科学技术革命根本改变了形势，要求提出能够把群众联合起来的富有成效的新思想，但是苏共被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为首的意识形态偶像弄得昏昏欲睡，不愿在这日新月异的世界里革新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党依然坚持过去的立场，从而在对于世界社会发展的认识失去了战略优势，丧失了主动权，无力地、教条地反抗着西方宣传的进攻。形形色色的经济和哲学学派的思想大杂烩，从资产阶级政治学中舶来的思想代用品开始充斥意识形态空间。在我国条件下，利用这种理论大杂烩的做法导致的实际结果已是尽人皆知的了。”^①

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明了苏共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问题所在。苏共的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不能放弃，但也不能把它变成僵死的教条。党的指导思想的僵化，最终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党的机体的僵化。许多政党最后放弃马克思主义，实质上不过是对这种僵化的反动。

人们常常为究竟是“左”的东西、还是右的东西葬送了苏共而争论不休。我认为，事实是清楚的。苏共的失败，既有“左”的原因，也有右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左”对苏共的葬送。苏共一直未能摆脱“左”的思想。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首先出现的就是“左”，试图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来作为直接走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在不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又认为这是暂时的退却，全党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400—401 页。

实际上处在一种“容忍”和伺机进攻的状态；这就为斯大林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抛弃新经济政策提供了前提；赫鲁晓夫上台后，不是反思斯大林的整个路线而是只追究个人功过因而在许多方面依然如故甚至在自称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提出建设共产主义的口号即使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有所后退也远未回到正确的认识上来。所有这些，都说明苏共没有跳出“左”的框框。长期“左”的束缚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以致大多数人已经无法分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的教条的区别反倒认为要创新要前进就不能不放弃马克思主义。改革中人们对苏共采取墙倒众人推的态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这一状况造成的。

启示之四：努力推进党自身的现代化

一个执了政的党怎样变革和调整自身的体制和机制才能适应领导国家和社会以较快的速度发展，是共产党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综观苏共执政的历史我们看到正是由于没有解决这个课题苏共才变得越来越阻碍而不是推动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进步。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执政党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和任务的要求努力建立科学的党内运行机制使党的活动科学化。

建立科学的党内运行机制最重要的 是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党内民主。苏共模式以及与此相应的苏联模式 是以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为特征的模式。因此 改造这个模式 重点在发展民主。民主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的确是一个社会制度“可持续发展”的“真谛”。共产党的根本历史责任 不是代替人民管理社会 而是让人民逐渐学会自己管理社会，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这个目标 要通过充分发扬民主来实现。在很长一个时期里 由于忽视了

民主建设，民主和自由这些价值观念在苏联和其他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似乎成了稀缺资源，得不到重视，甚至干脆丢给了西方国家成了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和他们用以标榜资本主义、攻击社会主义的一张王牌。这是很不正常、很不明智的。西方国家在同社会主义的竞争中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如尼克松所说：“与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竞争，我们手中握有王牌。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价值在全世界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自由和民主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没有规定人们应该如何生活而只规定个人和民族应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虽然并不是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具有民主地管理自己的能力，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向往民主管理。”^①尼克松作为一个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出的这番话，道出了一定的真理，值得我们思考。

要发展社会民主，就必须首先发展党内民主。没有党内民主，社会民主是不可能的，也是做不到的。苏共及其他共产党执政党的教训都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共产党不仅是领导者、先锋队 and 惟一的执政党，而且是整个社会的榜样。党的状况对整个社会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如果在惟一执政党党内不能做到人人平等，不能保证普通党员的民主权利，党员不能就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自己独立的意见和建议，不能对掌握权力的人独立行使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党组织不能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那么，社会民主的所有内容都是空的。此外，共产党居于社会和国家的核心地位。党的内部不民主，要建立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就没有任何可能。苏联社会缺乏民主，人民的权利得不到保证，都首先是从党内缺乏民主、党员无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开始的。

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从机制上体现民主集中制、按这一原则运作的问题。少数服从多数，是整个民主

[美]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

集中制的基石。但是 从操作层面上看 这个基本原则不可能真的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来体现，例如领导者不可能每做一件事情都要全体党员的同意。恰恰相反，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往往最后落实到多数服从少数的形式上，例如全体党员服从党中央，一个省、市的党员服从党的省委、市委，一个工厂的党员服从厂党委等。从组织学的角度说 这是正确的。所以 关键不在于这种形式本身民主不民主 而在于事情的另一面 即这种形式如何体现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从机制和操作上如何保证这个形式上的少数代表的确实是大多数的意志 而不是名义上的 更不是这个少数可以打着代表多数的旗号为所欲为。换句话说，这个少数要有多数的合法授权。没有授权 这些代表便什么也不是 什么也不能做。做到这一点 不在于、或主要不在于领导者是否有这方面的主观愿望 而在于是不是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科学的机制。苏共所缺的 正是这样一套机制。在苏共党内，在整个授权过程的几乎所有关键环节上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都被虚化了 也即民主集中制的基石被虚化了。党员的选举权被机关的任命权所取代；党员的选择权被少数人划定的名单所取代；党员的评议权、批评权被千篇一律的颂扬、吹捧所取代 党员保留自己不同意见的权利被思想一致的要求所取代。这不单单是技术上的问题，带来的也不只是无关紧要的消极影响。我们知道，一旦人的民主意识增强了 权利感也会得到强化。这种权利感是无法取消的，总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显示出来。如果没有正常的渠道可以体现 它们就会以反叛的形式、以沉默之后爆发的形式来体现。在这种情况下 再发扬民主 恐怕就为时已晚了。苏共的失败，也多多少少包含了这方面的因素。

建立科学的党内运行机制 科学、完善的监督制度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们所说的监督 指的是政治运作中的监督 而不是指经济和其他领域的监督 其对象主要是权力 是掌握权力的机关和个人，首要目的在于防止权力的滥用。这种监督制度有两个方

面，即党内监督和对党的监督。苏共的监督则把所有这些关系都弄混了。首先，苏共把政治监督混同于一般监督，把生产监督、商品监督、技术监督、公共道德行为的监督等都纳入到同一监督体系中，看似监督内容广泛，实际上是用各种琐碎的社会管理掩盖了政治监督的缺陷。其次，苏共没有把监督的重点放在对权力的监督上，而是着眼于掌权者对不掌权者的监督、掌大权者对掌小权者的监督，这就完全颠倒了关系，使监督背离了本意。再次，苏共重视党内监督而忽视对党的监督，恰恰把党这个占据权力核心地位的领导者放到了监督之外，使最大的权力处于无人监督（确切些说是无人敢监督）的状态，使权力的滥用成为可能。最后，苏共的党内监督也不是普通党员对权力机关和党的干部的监督，正好相反，它是党的机关对普通党员、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这种完全不符合科学的监督制度，根本无法促进科学的党内运行机制的形成，倒是使这个机制变得更加不科学、不合理。它对苏共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的体制起了巩固、强化的作用。

建立科学的党内运行机制，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对党内斗争有正确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矛盾和冲突，都和利益有关。如果我们一以贯之地坚持这个观点，那就应当承认，党内斗争也是如此。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党内斗争是社会上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反映；第二，党内斗争本身包含了当事人之间为权力和利益进行讨价还价的因素。从这个角度理解党内斗争，就不能简单地把它解释为正确与错误、东风压倒西风的斗争。这种斗争，有时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有时则属于利益的调整。正确认识这类斗争，前提首先是对各种不同利益的承认。遗憾的是，无论是苏共，还是在其他许多国家执政的共产党，过去一贯的做法都是不肯承认利益或是不敢理直气壮地承认利益。这就使利益调整无从谈起。在潜意识中，人们还是习惯于高唱“全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调子，来体现对自

己利益的捍卫。结果是，利益的分配和调整都被掩盖在意识形态争论的下面，本来可以通过正常的谈判和讨价还价来解决的问题，现在演化成了政治观点的论争。从这个角度看，不能不承认党内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也和这种争论纠缠在了一起，使问题大为复杂化了。例如，解决经济问题的努力，被打上了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印记，相互之间寸步不让，结果使苏共解决经济问题的努力化为泡影。要了解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历史上看，大概因为俄罗斯文化中融进了许多法兰西文化的东西，而法国政治是以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政治为特点的。从苏共本身看，则不能不看到在列宁以后“左”的思潮的持续和泛滥给新的政治文化打上的烙印。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传统派也好，还是激进派也好，实际上都仍然没有摆脱旧的思维模式的困扰。

党自身运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共同构成一个过程目标，即党的现代化。历史造成了不容选择的现实，共产党都是在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取得政权的。这样，共产党执政的过程，就和推进国家现代化的过程结合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必然面临双重的任务：一方面，它要以自己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实施领导，以保证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它必须不断改革自身，以适应领导现代化进程的需要。换句话说，领导现代化的政党，自身首先应当是一个现代化的党。这里的所谓现代化，指的就是政党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适应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

苏共在整个执政过程中都缺乏这种现代化的意识。它长期停留在领导革命暴动时期的那套模式上，用“革命一斗争”的在野党思维看待整个社会，规范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始终没有完成从领导革命暴动的党向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党的转变。它不愿意接受制度的约束，相反试图按自己的模式来塑造国家。它不自觉地

维护着在掌权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造成了党和人民的严重隔阂。它在人们的民主意识不断觉醒的情况下，仍然紧紧地抓住权力不放，由争取民主的党蜕变成了坚持专权的党。这样的党，其思想失去吸引力 其能力受到怀疑 其活动跟不上时代步伐 其地位发生动摇，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改革的失败不过是为它提供了契机，这和地震为摇摇欲坠的大楼提供了倒塌的契机是一个道理。



责任编辑 张继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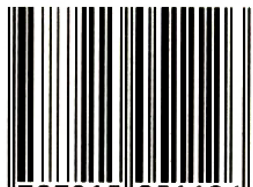
责任校对 李 晖

封面设计 张明方

版式设计 胡颖君

世纪之光

ISBN 7-215-05112-9



9 787215 051126 >

ISBN 7-215-05112-9/C · 196

定价：20.00元